

沙俄侵畧中国西北边疆史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

人民出版社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263,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1001·383 定价 1.35元

编者说明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是沙俄侵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本书初步叙述了：从十七世纪初起，直至二十世纪初止，三百年间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罪行。叙述的重点是沙俄的军事侵略和领土掠夺；同时注意它的政治、经济侵略及其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有侵略就有反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过程。这个反抗斗争的光辉史绩，也是本书力求着重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一些有关单位的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是由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新疆民族研究所和新疆大学等五个单位共同组成编写组，集体编写的。由郭绳武（西北大学）和陈华（新疆民族研究所）负责主编。

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本书的质量距离读者的希望和要求还很远，错误一定还不少。希望读后来信指正，以便在重印时再加修改。

一九七八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历史上的中国西北边疆	5
第一节 清以前中国历代对西北边疆的管辖	7
一、西域和内地的联系源远流长	7
二、两汉时期	9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20
四、五代十国、辽、宋、元、明时期	38
第二节 清代的中国西北边疆	46
一、清初对西北边疆统一管辖的加强	46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西北疆域	59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 侵略	89
第一节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开始	90
一、沙俄追求世界霸权的扩张政策	90
二、沙俄向西伯利亚扩张，覬覦中国西北边疆	94
第二节 沙俄侵略中国准噶尔部	102
一、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策动准噶尔贵族噶尔 丹叛乱	102
二、十八世纪初沙俄对中国准噶尔部的武装 入侵	107
三、沙俄妄图侵吞中国准噶尔部阴谋的破产	113

第三节	一七五九年至一八四〇年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117
一、	沙俄对中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入侵	117
二、	沙俄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向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入侵	121
第三章	沙俄逼签《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	128
第一节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沙俄加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129
一、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的对外扩张	129
二、	沙俄继续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强行建立科帕尔、维尔内等侵略据点	133
三、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138
四、	塔城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主权、火烧沙俄贸易圈的英勇斗争	144
五、	克里木战后沙俄把侵略魔爪伸进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地区、吹河流域和喀什噶尔	151
第二节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的西部“划界”条款	158
一、	《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划界”条款的产生	158
二、	《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划界”条款为沙俄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制造了“根据”	164

第三节	沙俄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	169
一、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的阴谋策划和 侵略部署 …	169
二、	一八六二年中俄塔城谈判 …	174
三、	塔城谈判中断后沙俄进一步对清朝政府施 加压力 …	178
四、	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	184
第四节	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 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	191
一、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关于中俄西段边界 走向的规定 …	191
二、	《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 约》和《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 …	196
第四章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伊犁地区,逼签《中 俄伊犁条约》……	201
第一节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伊犁地区 …	202
一、	沙俄加紧征服中亚,中国西北边疆出现严 重危机 …	202
二、	沙俄武装入侵中国伊犁,伊犁各族人民英 勇反抗 …	206
三、	沙俄霸占伊犁,继续入侵北疆,并勾结阿 古柏侵略南疆 …	217
四、	沙俄在中国伊犁地区的十年殖民统治 …	224
第二节	沙俄逼签《中俄伊犁条约》 …	233
一、	沙俄拒不交还伊犁地区,阻挠和破坏清朝 政府收复新疆失地 …	233
二、	沙俄利用交还伊犁地区疯狂扩大侵略 …	240

三、沙俄逼签《中俄伊犁条约》	248
第三节 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中国领土， 劫走中国居民，扩大政治、经济侵略	270
一、割占中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270
二、劫走中国十万多居民	284
三、扩大政治、经济侵略，加速了中国西北边疆 地区的半殖民地化	294
第五章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307
第一节 沙俄开始侵略中国帕米尔地区和逼签《中 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308
一、沙俄开始侵略帕米尔和清朝政府加强对帕 米尔地区的管辖	308
二、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 尔界约》	315
第二节 沙俄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 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316
一、沙俄扩大侵略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准备	316
二、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321
三、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划界交涉	330
四、沙俄勾结英国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	336
第三节 清朝政府关于保留帕米尔地区主权的声明 和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342
第六章 沙俄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 的阴谋及其破产	347
第一节 沙俄妄图吞并中国西北的阴谋	348
一、沙俄的远东政策及其吞并中国西北的狂妄 计划	348

二、沙俄妄图在中国西北边疆独占一切权益	354
三、沙俄利用修订《中俄伊犁条约》扩大对 中国的侵略	359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妄图吞并中国西北 边疆的活动	367
一、沙俄三路出兵,入侵中国西北边疆	367
二、沙俄霸占中国唐努乌梁海	379
第三节 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 经济垄断	391
一、沙俄扩张领事特权,加强对中国西北边 疆地区的政治控制	391
二、沙俄垄断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	401
第四节 策勒事件和西北边疆各族人民抗俄斗争 的高涨	418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430
附录二 外文参考书目	433
附录三 俄中人名对照表	443
附录四 俄中地名对照表	448

地图目录

清代中国西北边疆政区示意图	56—57
沙俄割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示意图	88—89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及有关勘界议定书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128—129
沙俄通过《中俄改定条约》和有关勘界议定书割占斋 桑泊以东中国领土示意图	270—271
沙俄通过《中俄改定条约》和《中俄伊犁界约》割占中	

国领土示意图	276—277
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示意图	316—317

插图目录

“汉归义羌长”印	11
汜德达告身	31
阿克别西姆古城遗址出土的瓦当	33
唐代大明宫宣政殿莲花纹瓦当	33
康熙帝给噶尔丹的谕旨	51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54
清乾隆皇帝宴渥巴锡于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	55
伊犁将军军府钟楼	60
一六九一年噶尔丹与沙俄勾结的信件	107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理藩院给俄罗斯咨文》	134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147
塔什库尔干居民请仍设阿奇木伯克呈	205
伊犁将军荣全的奏折	228
沙俄侵略军非法构筑的帕米尔哨所	331
杨增新关于沙俄出兵入侵阿尔泰给北京参谋部陆军 部电	373
沙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关于在古城设乡约给清朝地 方政府的照会	394
阿尔泰办事长官刘长炳关于沙俄侵略阿尔泰情形给 大总统电	398
杨增新关于俄侨不纳中国牧场税的呈文	404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西北边疆发行的纸币	410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五八五、五八四页）历史上，不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论那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存在于世界。

中国的西北边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劳动和战斗在这块土地上，为开发和保卫祖国的边疆，创造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西北边界本来是明确的。这不仅大量的中国官方文献为证，就连沙俄以及苏联的许多早期著作也都确认历史上中国的西部边界是在巴尔喀什湖北岸。

沙皇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同中国本来并不接壤。由于它向东侵略扩张，到十七世纪初，逼近了中国的西北边界，开始了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对象。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也进入了新

的更加猖狂的阶段。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到二十世纪初,沙俄用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夺走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三分之一就在中国的西北边疆。

早在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沙俄就把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领土的条款强加给清朝政府。一八六四年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时,沙俄又歪曲《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通过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割走了中国西北边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随后,沙俄又出兵强占中国伊犁,盘踞十年之久,于一八八一年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中国西北边疆的七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又被并入沙俄的版图。

沙俄掠夺中国西北边疆的领土,不仅通过逼签不平等条约来进行,而且还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地强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违反《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出兵中国帕米尔地区,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二十世纪初,沙俄利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时机,又吞并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其它违反条约,明抢暗夺,鼠窃狗偷事件,更是不断发生。

在一块一块地割走和强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同时,沙俄还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中国西北边疆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妄图变中国西北边疆为它的殖民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进行政治

控制,经济垄断,为吞并整个中国西北边疆进行了一系列罪恶的活动。

列宁曾经多次指出:沙皇俄国对中国实行的是“犯罪的政策”,是“掠夺政策”、“殖民政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列宁的论断无比正确。

为了清算老沙皇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罪行,说明历史真相,我们编写了这本《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第一章

历史上的中国西北边疆

中国的西北边疆，在沙皇俄国入侵以前，北到鄂毕河上游，西至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地区。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喀喇昆仑山横空出世，耸立于南；阿尔泰山、萨彦岭峰峦绵亘，屹立于北；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①，座落于西南；天山山脉东西横亘于中，把中国西北边疆分成南北两块各有特色的地区。在阿尔泰山环抱中的捷列茨科耶湖^②，中外著名的巴尔喀什湖^③，景色秀丽的伊塞克湖^④和水产富饶的斋桑泊^⑤，与博斯腾湖、罗布泊一样，都是当时中国的内湖。哈屯河（卡通河）、塔拉斯河^⑥、伊犁河，与塔里木河、玛纳斯河一样，都是当时中国的内河。

很早以来，西北边疆这块辽阔富饶的地区就与内地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特别是自两千多年

① 中国原称葱岭。

② 中国原称阿勒坦泊。

③ 中国清代文献写作巴勒喀什淖尔（蒙古语称湖为淖尔）。

④ 中国原称图斯库勒或图斯池，又称特穆尔图淖尔（维吾尔语称池为库勒）。

⑤ 中国原称烘和图淖尔。

⑥ 中国古代文献称都赖水，又称答刺速没鞞（没鞞即河）。

前西汉政府在西北边疆建立直接的行政管辖以来，这里与内地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过以后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五八五页)中国历史上的塞种、月氏、匈奴、坚昆、乌孙、羌、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和契丹等族,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在西北边疆劳动、生息,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发展了边疆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国各兄弟民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满、回、锡伯、塔吉克、乌兹别克、达斡尔、塔塔尔和汉等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建设和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为建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曾出现过分裂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主流。在分裂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也如同在内地曾出现过的许多地方政权一样,都是中国国内的割据政权,它们所统治的地区,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这些领土上生活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历史上的中国西北边疆,在沙皇俄国入侵以前,边界

是明确的。这条边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沙皇俄国越过这条边界所侵占去的土地，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个铁的历史事实，是由大量的历史文献所证实的。

第一节 清以前中国历代对 西北边疆的管辖

一、西域和內地的联系源远流长

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就和居住在內地的华夏族有着亲密的交往。据考古发现，分布在新疆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同东北、內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的细石器文化具有共同特征，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是中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许多地区出土的彩绘陶器，其制作、形制和彩绘，也与甘肃、青海一带出土的彩陶相似。在现在苏联阿尔泰巴泽雷克地区发现的公元前五世纪的墓葬中，出土有不少中国内地生产的绣花丝织品，其中一件绣着中国特有的凤凰图案。在这些古墓中还出土有中国内地制作的铜镜^①。一九六五年在新疆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公社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一面战国时代由内地制作的素面小铜镜。这些出土的文物确凿无疑地证实，从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内地与西北边疆一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内地华夏族和西北边疆各族的交往和情谊，还凝结

^① С. И. 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成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和传说，记载在先秦的许多古籍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了“西王母”和尧、舜、禹交往的传说，还提到了渤海（即今新疆罗布泊）^①。在《穆天子传》、《逸周书》和《禹贡》中都提到了“昆仑”。《逸周书》传说在周成王灭商以后，“莎车”以及葱岭以西的“渠搜国”、“康国”、“大夏”等地的民族首领都曾前来“镐京”，表示祝贺。此外，《史记》还有南疆地区的玉石很早就传入内地的记载^②。其它一些中国古籍中，也提到了西北边疆的一些山川河流及有关传说。

居住于内地的一些古代民族，也曾大量向西北边疆迁徙，他们与当地古代民族共同生产和生活，对开发、建设祖国西北边疆，作出过贡献。公元前一百八十年以前，伊犁河流域广大地区，游牧着被称作塞种的古代民族^③。公元前二世纪七十年代，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西迁，赶走了塞种，游牧于此地^④。公元前二世纪六十年代，曾与月氏共同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乌孙族，西击月氏，迫使月氏南迁，这里又成为乌孙的游牧地^⑤。中国内地这几个古代民族相继在这里生产、生活，

①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渤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罗布淖尔即蒲昌海也。”

② 《史记》第43卷《赵世家》记载有一封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书信，其中说，假如秦国出兵逾勾注山，切断恒山一线，则“昆山之玉”不复能为赵王所有。可见当时新疆的玉早已经常输入赵国。

③ 《广弘明集》第7卷中荀济《论佛教表》说：“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根据这一记载，塞种或其中一部分原是中国内地的古代民族。惟荀济所引之语，今本《汉书西域传》无。

④ 《汉书》，第61卷，《张骞传》。

⑤ 同上。

开发和建设了伊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天山以南，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羌族的一支，也在汉代以前就由内地迁到这里。据历史文献记载，羌族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沿昆仑山，东自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都散布着羌族的部落^①。它与西域^②各民族共同发展了当地农牧业生产，建造了城镇，开发和建设了直至葱岭的天山以南广大地区。

上述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在汉代以前，西北边疆就与内地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为西北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两汉时期

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初，在中国北部边疆，是匈奴族奴隶主建立的政权。匈奴西边的阿尔泰山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是中国古代游牧狩猎民族乌揭和坚昆活动的地区。天山以北，玛纳斯河、准噶尔盆地以

① 《史记》第123卷《大宛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大夏，“留岁余，还，并（即傍——引者）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这里所说的南山在于阗之南，即现在的昆仑山。《三国志》第30卷引《魏略》的记载说：“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上面所说的“盖同为羌种”。王先谦《汉书补注》也认为：“若羌国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由这些记载和研究可以看出，最早活动于甘肃东部一带的羌族，除一部分向南、向东南迁徙外，还有一部分向西迁徙，进入天山以南，沿昆仑山直至葱岭的广大地区。

② “西域”一词在我国古籍中所表示的地理范围大体有三种：一是指天山以南；二是指天山南北；三是泛指玉门关以西，包括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本书主要采用第二种用法。

西的广大地区,如前所述,原居住着塞种,以后相继为月氏和乌孙所占据。他们当时都以游牧为主,中国古代文献称他们为“行国”。天山以南(包括天山以北的玛纳斯河以东的部分地区)直至喀喇昆仑山,东起罗布泊,西至葱岭,是中国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他们多以农业为主,中国古代文献称为“城郭诸国”。西汉初,这里大约有三十六个地方政权,被称为“西域三十六国”。

在这个时期,中国匈奴族强大起来,逐步控制了乌揭、坚昆、乌孙和“西域三十六国”,还特别在焉耆、危须(今新疆博斯腾湖北)、尉犁(今博斯腾湖西)一带,设立“僮仆都尉”,在天山以南各地征取赋税,榨取农牧产品。匈奴奴隶主还经常骚扰内地,抢掠城镇,破坏生产。西汉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加强与西域各民族的联系,开展了对匈奴奴隶主的斗争。

公元前一三八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和公元前一一九年(汉武帝元狩四年),西汉政府两次派遣张骞到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等。公元前一〇四年(汉武帝太初元年)西汉政府伐大宛,打击和削弱了匈奴奴隶主在天山以南的势力,遂由敦煌到盐泽(即泐泽,今新疆罗布泊)建立亭站,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新疆库尔勒西南)设立“使者校尉”,管理驻兵、屯田等事。汉宣帝时,又任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校尉”,管理鄯善^①以西“南道诸

① 鄯善原名楼兰,公元前七七年西汉政府更名为“鄯善”,在今罗布泊西南若羌地区。

地”^①。公元前六〇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受匈奴单于委派统治西北边疆广大地区的匈奴日逐王归降汉朝,西汉政府废除了匈奴奴隶主设立的“僮仆都尉”,命令郑吉除管辖南道诸地外,还管辖北道诸地^②。由于他既“护”南道诸地,又“护”北道诸地,所以称为“都护”。此后,“都护”就成为西汉派驻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的正式官名。都护驻地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在西汉时期任过都护一职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李崇^③等十八人。西汉政府还在车师前王庭设戊己校尉,在伊循(今若羌县东北)设伊循都尉等,管理有关地区的驻兵、屯田^④。

此外,西汉政府还特别给西域一些地区的羌族首领颁发了“汉归义羌长”印,让他们代表汉朝政府管理这些地区的羌族。在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内,就曾发现过一枚这样的印。



“汉归义羌长”印

(1) 当时在天山以南,主要有两条通向中原地区的道路。沿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通道称北道,沿昆仑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通道称南道。“南道诸地”是指南道所经过的各地区。

(2) 即北道所经过的各地区。

(3) 都护李崇的私印曾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地方发现。

(4)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

东汉(公元二五——二二〇年)对西域的管理,基本上沿袭了西汉旧制。公元二九年(光武帝建武五年),行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以东汉政府的名义任命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管理西域地区^①。公元七四年(明帝永平十七年)正式恢复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公元一二三年(安帝延光二年)改设西域长史,驻柳中(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以代替都护一职。东汉时担任过都护或西域长史的官员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班勇、赵评、王敬等。

都护(或东汉时的长史)是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他代表中央政府指挥和征调西域各地的军队,处理边疆地区的各项事务。它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保卫祖国的西北边疆。西域都护下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官员^②。在西域的各个地区,两汉政府还任命当地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为王,在西域都护或长史的统率下,管理和保卫西北边疆。在各王所辖地区,又根据不同情况设置各类官吏。据《汉书》记载,各级地方官吏有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和侯。汉朝政府给王和各级官吏都颁发有印绶^③。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木牍的封泥上,还保留有“鄯善都尉”的印记。

汉代对西域的统一,消除了西域各地的分裂割据状

① 《后汉书》,第118卷,《西域传》。

② 《汉书》,第19卷,《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书》,第96卷,《西域传》。

况,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代表汉朝政府的都护在西域各地受到了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西汉政权被推翻后,莎车王就主动联合西域各地区抗击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护“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免遭匈奴奴隶主的残杀,并致书河西地区,探问内地的情况^①。东汉政府建立后,西域各地立即派人到洛阳要求派遣都护^②。东汉章帝时曾下令撤销西域都护一职,结果引起西域各地的很大震动。在都护班超奉命回洛阳时,疏勒(今喀什地区)都尉黎弇劝阻无效,竟当场拔出佩刀自刎。于阗王及其下属各官吏,在班超与他们告别时,“皆号泣”,竭力挽留^③。在西域各地的强烈要求和班超等人的努力下,东汉政府终于收回了成命。

汉代西域都护管辖范围的西境,即那时中国西北边疆的西境,据历史文献记载,包括了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④、大宛和葱岭等广大地区。

中国乌孙族自公元前二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西迁后^⑤,就活动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伊塞克湖周

① 《后汉书》,第118卷,《西域传》。

② 《后汉书》第118卷《西域传》说:“建武中(西域各地)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该传莎车条也说: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

③ 《后汉书》,第77卷,《班超传》。

④ “乌孙”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既是族名,又指这个族所居住的地区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本书采取了这个用法,在作族名时,后面加族字。

⑤ 关于乌孙族西迁的时间,中外史学家有过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在公元前一二六年左右,多数认为在公元前二世纪五、六十年代。参阅桑骥藏著,杨铄译:《张骞西征考》。

围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①。乌孙在当时西域各地区中,人口最多。据《汉书》记载,有户十二万,人六十三万^②。乌孙首领称作昆弥(或昆莫)。

早在西域都护设立以前,乌孙就与西汉政府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公元前一一九年(汉武帝元狩四年)西汉政府曾派张骞专程到乌孙。张骞返回时,乌孙昆弥派人护送,并向西汉政府献马数十匹。乌孙昆弥还要求与西汉皇室联姻。汉武帝将宗室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封为公主,嫁给乌孙昆弥为妻^③。她带去了内地大量的舆服等物,西汉政府为公主设置了一整套官属,派遣了大批宦官侍御,并按内地建筑式样在乌孙地区修建了宫殿楼阁。公元前七一年(宣帝本始三年),由于匈奴奴隶主不断派兵袭击乌孙,乌孙昆弥向内地告急,汉朝政府派遣大军五路出兵,与乌孙部队共同进击匈奴,给匈奴奴隶主以沉重的打击。在这次战争中,汉朝政府派常惠代表中央政府,实行统一指挥。战争胜利结束后,西汉政府又特派常惠代表中央政府对有功的乌孙官兵分别加以奖赏。

西域都护建立后,西汉政府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乌孙

① 1957年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哈萨克共和国史》、1963年苏联吉尔吉斯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吉尔吉斯史》也都认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是乌孙族的居住地。

② 乌孙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乌孙族,但也有其他族的人住在这里。《汉书》第96卷《西域传》说:“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

③ 汉皇室与乌孙昆弥联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把宗室女细君嫁给昆弥猎骄靡。第二次是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嫁给昆弥岑陬。这两次都在汉武帝时期。宣帝时又以相夫为公主,嫁昆弥翁归靡。西汉政府送相夫至敦煌,翁归靡死,乌孙内乱,遂招回相夫。

的管辖。宣帝时，西汉政府立元贵靡为大昆弥，驻赤谷城（今苏联伊塞克湖东南别牒里山隘西北的依什提克），乌就屠为小昆弥，给他们分别颁发了印绶，命他们分管乌孙地区。此后，乌孙昆弥死，新昆弥继位，都要由西汉政府册封。韩宣任都护时，又报请西汉政府批准，给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等官员，颁发了“金印紫绶”^①。西汉政府对乌孙内部事务的管理也十分重视。公元前一世纪中，乌孙大昆弥星靡不能镇守地方，曾跟随汉公主解忧长期居住在乌孙的冯嫫自愿要求再赴乌孙，西汉政府即派遣她扶助大昆弥治理乌孙，镇守边疆^②。长罗侯常惠曾与乌孙大、小昆弥“分别其人民、地界”，并且亲率部队“三校”在乌孙赤谷城地区屯田驻守^③，维护了乌孙地区社会的安定，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都护郑吉、韩宣、甘延寿、廉褒等也都曾亲自处理乌孙事务，排解乌孙首领之间的纠纷。特别是段会宗任西域都护时，乌孙大昆弥“怯弱”，不善治理，他亲为大昆弥“招还亡畔，安定之”，在乌孙地区威望很高。段会宗任满调离后，西域各地向西汉政府呈递报告，要求段会宗继续留任。汉成帝时，乌孙大、

① 以上均见《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汉制，两千石以上官吏，如相国、丞相、太尉等佩“金印紫绶”。

②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关于冯嫫，《汉书·西域传》说她是公主解忧的侍者，她随从公主到乌孙后，曾经代表公主以西汉政府的名义，向天山以南各地进行“赏赐”，“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还曾“锦车持节”，代表西汉政府帮助长罗侯常惠，处理乌孙事务。

③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又见第69卷《辛庆忌传》。汉代一校约五百人。

小昆弥互相攻伐，汉朝政府特派段会宗前往惩办祸首，升授“讨贼”有功的翎侯难栖为“坚守都尉”，收回失职的大禄、大吏、大监诸官的“金印紫绶”，给他们更换铜印墨绶^①，以示惩处。段会宗一生中曾五次被派去乌孙，最后以七十五岁高龄，病逝于乌孙，西域各地为他发丧立祠，表示怀念^②。

大宛在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据《汉书》记载，大宛有户六万，人三十万，也早与中原有密切的联系。公元前二世纪时，大宛境内就有汉族人“知穿井”，帮助当地人民打井取水^③。汉武帝曾封宛人昧蔡为宛王。昧蔡死，蝉封继位，并派遣其子到长安。西域都护设置后，大宛成为都护直接管辖的地区。

西域都护管辖的西北边疆的西南部，是葱岭（即今帕米尔）地区。《汉书》记载，当时天山以南都护所辖的“三十六国”，西边包括了葱岭。据中国清代学者的考订，这“三十六国”中，在葱岭的有：无雷，在今苏联巴达克山地区的南部，包括罗善山脉和阿尔楚尔山脉的广大地区；休循，在帕米尔北缘和阿赖谷地等。到东汉时期，又命班超等恢复葱岭及其周围地区与中央的关系，“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④。

在西起乌孙、大宛和葱岭各部，东到阳关、玉门关的

① 汉制官俸在六百石到两千石的官员，佩铜印墨绶。

② 《汉书》，第70卷，《段会宗传》。

③ 《史记》第123卷《大宛传》：“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秦人”，《汉书》第61卷《李广利传》作“汉人”。

④ 《后汉书》，第77卷，《班超传》。

广大西域地区，两汉政府还通过西域都护及其所属各级军、政机构举办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商业和交通运输，组织边疆各民族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活动。

汉朝在西域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是发展屯田。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公元前一〇四年，西汉政府就在轮台、渠犂举办了屯田。当时的搜粟都尉桑弘羊曾建议进一步发展西北边疆的屯田事业，主张先由轮台以东开始，然后逐渐扩大，“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①。到西汉昭帝时，根据鄯善王尉屠耆的意见，派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城，以后又扩大屯田规模，改派都尉管理其事。西域都护设立后屯田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②，屯田地区由东而西，一直发展到乌孙赤谷城。在伊犁河西南和伊塞克湖等地区的汉代乌孙墓葬中，就发现有碾谷子用的石头碾子、磨盘、烧焦的谷粒和粘附在一个器皿底部的谷粒皮^③。

随着屯田的兴办，水利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据考古发现，在库车西南沙雅县境内有一条汉代古渠，保存的遗址长达一百多公里，渠宽八米，深三米，至今人们仍称

①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

② 关于汉代在西域屯田的情况，在罗布泊西北岸出土的汉代木简中，有许多记载。从木简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汉代屯田士卒有的还携带家属共同在边疆从事劳动。例如有一条简文中说：“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物籍”。还有一些记载屯田士卒妻子人数的简文。简文中还提到了一些谷仓的名称。

③ 阿基谢夫：《1954年伊犁考古考察团工作报告》。载苏联《历史、民族志和考古研究所著作集》，第1卷，考古学。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阿拉木图出版，第29—30页。

为“汉人渠”。米兰古城遗址，即伊循城附近的汉代灌溉系统也很完整，渠道沿着古米兰河道，修建了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

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运输，早在汉代以前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到汉代，内地由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西域的交通通道，在天山以南，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南道，即从阳关（甘肃敦煌县西南）西南行，顺昆仑山北麓，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到达葱岭，还可继续通往大月氏、安息等地；北道从玉门关西行，沿天山南麓，经疏勒，到葱岭和大宛，还可继续通往康居等地。这两条商路，又称“丝绸之路”。此外，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在天山以北，还有一条经“后部西通乌孙”的大道，这条通道经车师后王庭（今吉木萨尔南），通过卑陆（今阜康东）等地，沿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西行，到达乌孙^①。

汉朝政府对这些通道的维修和行旅的安全也十分注意。在吐鲁番盆地和罗布泊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修整得很好的汉代古道路的遗迹。在通道的主要地段，汉朝政府还设有许多烽燧台，其遗址在罗布泊附近以及在

① 天山以南的南道从阳关西行，沿着南山（今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今若羌东）、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北）、扞弥（今于田东）、于阗（今和田南）、皮山（今皮山一带）、莎车等地，然后越过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天山以南的北道，后来又称中道，从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沿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焉耆、尉犁、乌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温宿）、疏勒等地，经过帕米尔到大月氏、大宛、康居等地。“后部西通乌孙”的这道，出敦煌，经伊吾（今哈密）、蒲类（今巴里坤）、车师后国，渡伊犁河、楚河达西海。

天山南麓的焉耆至库车的交通线上也发现不少。库车县西克孜尔尕哈的烽燧台遗迹,至今仍然保存着。

直至一五八年(东汉桓帝永寿四年)时担任“龟兹左将军”的刘平国,曾督率“秦人孟伯山”等六人,在现在拜城县境内凿岩作孔,修筑列亭,设立关卡,以稽查行旅,维持治安。在拜城县东北喀拉达格山麓的岩壁上,刻有当时记述这件事的诵文^①。

两汉政府的这些措施促进了西域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汉代的五铢钱遍布于新疆各地的遗址中。在和田地区,还发现过一面铸有汉字,一面铸有佉卢文^②的铜质钱币^③。

① 据考订,其文为: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阿羌
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
□□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至十日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俱披山□”

在此刻文近处又刻有:

“敦煌长□
淳于伯隗
作此诵”

参考孟池:《从新疆出土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文物》,1975年第7期。

② 佉卢文大约是公元二至三世纪时曾一度通行于鄯善和于阗一带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这种木牍,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很多,若羌等地也有发现。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由于当时实现了全国大一统，有力地促进了西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内地和边疆的密切联系，为巩固和发展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为以后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北边疆的管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自东汉政权灭亡到隋唐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政治形势大动荡、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时中国的西北边疆和内地一样，处于许多地方政权割据的状况。但是，建立在邻近西北边疆的内地政权，对西北边疆仍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管辖。

曹魏(公元二二〇——二六五年)建国初就在西北边疆恢复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戊己校尉最初由凉州刺史兼任^④，治所在高昌。西域长史驻海头^⑤。曹魏政权还

③ 这种钱币又称“汉法二体钱”或“和田马钱”，是一种无孔、无周廓的圆形铜币，有大、小两型。大型的正面中心有篆文“贝”字形，周围有“重廿四铢铜钱”六字。反面中心有马形图案，环以佉卢文字母二十个，内容为于阗王名及其封号。小型的重量只有大型的四分之一，正面汉字篆书“六铢钱”三字。反面中心或作马形，环以佉卢文字母十三个，或作骆驼形，环以佉卢文字母二十个，也都是于阗王的名字。根据东汉魏晋一般衡制标准考察，这种钱的实际重量与币面的铢数相差不到百分之二。这表明，于阗地区同内地的衡制是统一的。

④ 《晋书》第14卷《地理志》上载：曹魏以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

⑤ 海头在罗布泊西。王国维说海头在罗布泊东北，有误。据他的《流沙坠简序》说，斯坦因等人在罗布泊窃取汉晋木简的海头，在“稍西于东经九十度，当北纬四十度三十一分之地”。按这个经纬度来计算，海头当在罗布泊西，而非东北。见《观堂集林》，第17卷。

给西域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封爵，颁发印信。如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魏侍中”，号“大都尉”，并授予印信^①。当时曹魏对西域的管辖，正如历史文献所说：自曹魏兴起，“西域虽不能尽至”，但其主要地区，如“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②。

西晋（公元二六五——三一六年）政权建立后，承袭魏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还册封西域一些地区的民族首领为王，授以晋朝的官职。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晋代木简上，就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③的记载。西晋的一些政令在这里也得到了执行。如西晋政府规定，凡外出远行，须向官府领取“过所”，即通行证。从新疆出土的西晋木简中可以看出，这项政令在西域地区就得到推行。持敦煌太守发放的“过所”，即可通行西域地区^④。此外，西晋还曾派遣官员到费尔干纳地区，封兰庚为大宛王^⑤。

十六国时期（公元三一七——四二〇年）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王朝，都先后在西域的一些地区设

① 《三国志》，第30卷，《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

② 同上。

③ 王国维：《流沙坠简后序》，《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观堂集林》，第17卷。

④ 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晋简中，有一些记载着“过所”的事。如其中一枚写道：“违会不还或安别收私行采买无过所启信各私从吏”。又一枚称：“□石一人属典客寄□纤钱佛屠中自斋敦煌太守往还过(所)”。

⑤ 《晋书》，第97卷，《大宛国传》。

立过行政管辖机构。

前凉于三二七年在吐鲁番地区设高昌郡、田地县^①，把内地的郡县制推行到了西域。三三五年又派沙州刺史杨宣统一西域其他地区^②，逐步设立了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管理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在罗布泊附近楼兰古遗址中，就曾发现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给焉耆王的书信^③。

前秦政权成立后，三八二年，车师王、鄯善王等到长安，要求恢复西域都护，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前秦政府即任命车师前部王为“平西将军、西域都护”，鄯善王为“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并派吕光率领部队与车师、鄯善等的部队配合，统一了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吕光到达龟兹时，西域各地首领不远千里都来归附，把汉朝政府授予他们的“节传”交给吕光验视，并由吕光给他们换发了前秦政权的“节传”^④。三八六年吕光继前秦建立了后凉政权后，又于三九四年任命其子吕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己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设衙于高昌^⑤。

① 徐坚：《初学记》第8卷，引顾野王《舆地志》。

② 《晋书》第97卷记载：“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

③ 在罗布泊发现的李柏书稿共四份。一份是李柏向前凉政府的报告。另三份是给焉耆王的书信草稿。其中有“诏家（指前凉政府——引者）见遣□来慰劳诸国”等语（《观堂集林》，第17卷，《流沙坠简序》）。

④ 《晋书》，第122卷，《吕光载记》。“节”、“传”是中央政府发给有关官员的一种凭信，用以证明中央政府给予有关人员的某种权力、任务和官爵。“节”、“传”有的用金属制作，有的用竹、帛制成。

⑤ 《晋书》，第122卷，《吕光载记》。

南北朝时期(公元四二〇——五八九年),北魏太武帝曾派董琬、高明等“招抚”西域。董琬到达乌孙,受到乌孙王的热情欢迎。乌孙王“拜受”了北魏的“赏赐”,还向董琬说:破洛邨^①等地“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希望董琬前去,以“副其仰慕之诚”。乌孙王还特派向导和翻译陪同魏使到达破洛邨等地,宣布了北魏的诏谕^②。从此,龟兹、疏勒、乌孙和葱岭的渴槃陁等都向北魏政权遣使朝献,年年不断^③。北魏还在鄯善地区,任命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④;在吐鲁番地区,大批汉族人陆续迁入,各地普遍都有汉族居民^⑤。北魏时期,这里曾建立了以汉人为首的高昌政权。如四八一年敦煌人张孟明立为高昌王。四九七年,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榆中县)人鞠嘉又立为高昌王,北魏政府任命他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到唐代。

六世纪后期,西突厥统治了西北边疆广大地区。突厥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原游牧于叶尼塞河、阿尔泰山一带。六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占据了“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的广大地区^⑥。六世纪八十年代,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

① 即《新唐书》所说的拔汗那,又称钹汗。在帕米尔北缘阿赖谷地。

② 《北史》,第97卷,《西域传》。

③ 《魏书》,第4卷,《太武帝纪》;《北史》,第97卷,《西域传》。

④ 《北史》,第2卷,《魏本纪》;《魏书》,第102卷,《西域传》鄯善条。

⑤ 据《魏书》第101卷《高昌传》记载:高昌“有八城,皆有华人”。

⑥ 《北史》,第99卷,《突厥传》。

控制了整个西北边疆地区。隋朝（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年）建立后，西突厥首领阿史那玷厥，顺应祖国统一的历史趋势，于五八四年归属隋朝政府^①，西北边疆地区遂与中央政府恢复了隶属关系。隋朝政府设立西域都尉管辖西域各部，并在西域的东部地区设立了鄯善、且末^②、伊吾^③三郡。

唐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时期。在这时，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也在汉代都护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在唐政权建立后的第三年（即六二〇年），西突厥首领统叶护向唐朝政府遣使进贡。六三三年（太宗贞观七年）唐朝政府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到西突厥，册立其首领泥孰为“咄陆可汗”^④。六三四年，咄陆可汗死，唐朝政府又册立其弟同娥设为“唃利失可汗”^⑤。七世纪三十年代末，西突厥以碎叶为界，分为两部，在碎叶东的称咄陆部，在碎叶西的称弩失毕部。两部首领均向唐朝政府要求承认和册封。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唐朝政府派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册立弩失毕部的首领为“乙毗射钵罗叶护可汗”，

① 《隋书》，第1卷，《文帝本纪》。

② 《隋书》，第3卷，《炀帝本纪》上。

③ 敦煌发现的《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转见《唐代文献丛考》，第72页。

④ 《旧唐书》第194卷《突厥传》记载：“咄陆可汗泥孰者，亦称大渡可汗。……武德中尝至京师。时太宗居藩，务加怀辑，与之结盟为兄弟。既被推为可汗，遣使诣阙请降。太宗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贞观七年，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

⑤ 《旧唐书》，第198卷，《西戎传》；《旧唐书》，第185卷上，《韦机传》。

赐以鼓纛。又遣使册立咄陆部的首领为“乙毗射匱可汗”^①。唐太宗末年，游牧于阿尔泰一带的部分西突厥部落，因参加平定龟兹贵族叛乱有功，被唐朝政府安置于今阜康东北的准噶尔盆地，在这里设置瑶池都督府，以其首领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②。

唐朝政府对天山以南各地的管辖，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六三〇——六四〇年（贞观四——十四年）唐朝政府相继在伊吾设立伊州，在疏勒设立疏勒都督府，在高昌设立西州，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吉木萨尔设立庭州。为了统一管理这个地区，唐朝政府于六四〇年在西州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任命郭孝恪为第一任都护。以后又在焉耆设立焉耆都督府，在龟兹设立龟兹都督府，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均归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至此，唐朝政府通过册立可汗或设立都护府、都督府，恢复了对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管辖。

六五一年（永徽二年），设立于准噶尔盆地一带的瑶池都督府的都督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率领部落西走，击破唐朝政府正式册立的乙毗射匱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双河（今新疆博尔塔拉），又进犯庭州，严重威胁唐朝政府统一西域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唐朝政府经过六年的斗争，于六五七年（显庆二年）平定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遂在西突厥咄陆部地区设立昆陵都护府，任命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在弩

① 《旧唐书》，第194卷，《突厥传》。

② 同上。

失毕部地区设立濛池都护府，任命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据史书记载，到七世纪六十年代，唐朝政府在西域设立行政机构的地区“极于西海”。

七〇二年(武则天长安二年)唐朝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域地区的管辖，对西北边疆的行政设施进行了调整，除原有的安西大都护府之外，又在庭州设立了北庭大都护府。

唐朝政府在西域地区的行政设施，大体分两类。在一部分地区与内地一样，实行州、县、乡、里制度。其它地区实行都护制。

实行州、县、乡、里制的，主要是伊州、西州和庭州。伊州，下辖伊吾、纳职、柔远三县；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庭州，下辖金满、轮台^①、蒲类三县^②。唐朝政府的一切政令、制度，如均田制、租庸调法、乡里制度等，在这里与内地一样，都得到了贯彻执行^③。

在西域的其他地区，唐朝政府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先后设立了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

① 唐代轮台在乌鲁木齐北古牧地(今米泉)一带，与汉代轮台同名而异地。

② 后来庭州成为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又增设西海一县，合上述三县为四县，属北庭都护府管辖。据《旧唐书》第40卷《地理志》河西道记载，庭州于“长安二年改为北庭都护府”。

③ 由于这部分地区靠近内地，有关唐朝政府管辖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十分丰富，中外史学界都有详细的研究和论述，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介绍了。

府。在两大都护府下，又设有各级行政、军事组织，执行唐朝政府以及两大都护府的各项政令。

北庭大都护府，治所在庭州，管辖天山以北等西突厥广大地区。下辖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昆陵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北自阿尔泰山，南到天山，东起巴里坤，西至楚河流域的碎叶。昆陵都护府下辖匭延、双河、鹰沙、咽面州、温鹿州、涪山、阴山州、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等二十三个都督府^①。其中阴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玄池州都督府、金附州都督府设在西突厥葛罗禄部地区，管辖范围在阿尔泰山与塔尔巴哈台之间，包括斋桑泊、乌伦古湖等地。咽面州都督府管辖阿拉套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与阿拉湖之间的地区。温鹿州都督府管辖伊犁河中上游广大地区。涪山都督府在温鹿州都督府西北。这三个都督府的辖地，正是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濛池都护府的辖地，东自碎叶以西，西到西海。塔拉斯河流域的怛罗斯（今苏联江布尔）等，是这个都护府辖地内的重要据点。

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先在西州（今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后迁高昌（今吐鲁番东高昌故城），六五八年（显庆三年）又迁至龟兹。这个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直至帕米尔的广大地区，下辖很多都督府、州。在葱岭以东有龟兹都督府，下领九州；疏勒都督府，下领十五州；毗沙都督府，下领十州；焉耆都督府，不分州。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有康居都督府（今苏联撒马尔罕地区）、大宛都督府

^① 《新唐书》，第215卷，《突厥传》。

(今苏联塔什干地区)、休循州(今苏联费尔干纳地区)、安息州(今苏联布哈拉地区)。在毗沙都督府以西,波斯以东,包括葱岭广大地区,共设置十六个都督府,八十一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①。其中的鸟飞州都督府等就在今帕米尔地区。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大都护是唐朝从二品大员。都护府中还有副大都护一人,从三品;副都护二或四人,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此外,在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唐朝政府还根据西域地区政治、军事需要,设置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管理西域各地军队、戍守等事^②,节度使一般由都护兼任。两大都护府的各级官吏,均由唐朝政府任命。担任过两大都护一职的有郭孝恪、汤嘉惠、郭元振、王方翼、牛师奖、杜暹等。特别是唐肃宗李亨在当太子的时候,曾兼任过安西大都护^③。这说明,唐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防卫和管理是十分重视的。在两大都护府下,唐朝政府还任命西域各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各级官吏。唐高宗

① 《旧唐书》第40卷《地理志》、《唐会要》第73卷所载唐朝政府在这里所建都督府、州、县、军府的数字相同,我们采取了这个数字。《资治通鉴》唐纪十六所载数字为: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府一百二十六。《新唐书》第43卷《地理志》所载州数为八十八。

② 据《旧唐书》第38卷《地理志》记载: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斃,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

③ 《旧唐书》,第10卷,《肃宗本纪》。

时曾下令，给西突厥一般首领授刺史以下官^①，并给他们颁发了印信^②。这些官吏中，有些还属于“给禄居藩”^③，享有中央政府发给的固定俸禄。同时唐朝政府也允许西域各地区的首领保存“王”的称号。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和各都督府中，设有功曹、仓曹、户曹、法曹、兵曹等。各州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与内地都督府、州的设置基本相同。两大都护正是通过这些机构，代表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着西域广大地区。近几年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中出土了《贞观十九年行兵请赐物牒》和《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两件唐代文书，前者上面有安西大都护府的朱泥印文，后者是高昌县因一民事案件上呈大都护府的文书^④。此外，还在出土的各种文书上见到“安西都护府印”、“北庭都护府印”以及“高昌”、“柳中”、“轮台”等县印。

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也是唐朝政府派驻在西北边疆的最高军事机关，它除了有权调遣和指挥下属各府州的军事力量外，还直接统率着唐朝政府驻守在西北边疆的常备戍军。

① 《旧唐书》，第194卷，《突厥传》。

② 《唐会要》，第73卷，节度使条。

③ 《新唐书》，第221卷，《西域传》。

④ 《文物》1972年第1期《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3期《“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的主要内容是：一批由弓月城运往龟兹的绢，中途发生了问题，一个叫□禄山的人向西州长史作了报告，并由高昌县把这件事上报安西都护府。这件文物证明了那种认为安西都护府只管军事不管民政的说法是错误的。

唐朝政府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保卫边疆,在广大西北边疆驻兵守卫。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烽戍逻卒,万里相继”^①。唐玄宗时,在西北边疆驻军的数量,达到四万四千名^②。由内地派驻在西北边疆的军人,起初戍期较长,七二七年(开元五年)唐玄宗下令改为每期四年的轮换制^③。唐朝政府在西北边疆驻军的建置有军、守捉、城、镇等。当时在北庭大都护所辖范围内,驻有瀚海军、天山军、金牙军、玉河军、清海镇、神山镇等。安西大都护府掌管四镇重兵,即唐代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此外,设置在葱岭地区的葱岭守捉等也归它管辖。

碎叶镇和葱岭守捉是唐朝政府设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和葱岭的两个重要军政机构,是唐朝政府有效管辖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广大地区的重要标志。

碎叶镇设在碎叶城,又作素叶水城,是唐朝安西四镇中地理位置最靠西的一镇。它位于楚河南岸(今苏联托克马克附近),是西突厥设牙帐的一个地方,又是中西陆路交通的要冲,占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里。

早在七世纪二十年代末,唐代著名的僧人玄奘曾在这里会见过西突厥叶护可汗。当时碎叶城的城周约六、七里,已是不小的城镇。西突厥归属唐朝后,唐朝政府于七世纪四十年代设立安西四镇,碎叶就是安西四镇之

① 《旧唐书》,第196卷,《吐蕃传》。

② 《旧唐书》,第38卷,《地理志》。

③ 《册府元龟》,第135卷。

一^①。碎叶镇设镇守使，先后有保大军、瀚海军、天山军驻扎该地^②。六七九年(高宗调露元年)检校安西都护王方翼整修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③，进一步加强了碎叶镇的防守。八世纪初北庭大都护府设立后，碎叶地区即随同天山以北其他地区一起，由原属安西大都护府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管辖。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安西节度使汤嘉惠向唐朝政府建议，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焉耆地区设镇以代替碎叶^④。此后，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安西四镇中就只有焉耆而无碎叶了。唐代碎叶镇地位重要，镇守使一职往往由都护兼任。在碎叶镇隶属安西都护时，安西都护王方翼、杜怀宝等都曾驻守过碎叶。在碎叶隶属北庭都护府后，北庭都护吕休璟等都兼任过碎叶镇守使。此外，韩思忠、周以悌等也曾任过碎叶镇守使。直到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经过碎叶地区的耶律楚材，还亲眼看到碎叶镇城的遗址。

联系到唐代碎叶镇的设置，需要提一提有关的考古发现。据报道，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在楚河南岸的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曾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唐代古

① 四镇设置时间，史无具体记载。据《旧唐书》第198卷《龟兹传》记载“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唐太宗平定龟兹在六四八年(贞观二十二年)，四镇设置时间当在六四八年或稍后。

② 瀚海军原驻北庭，天山军原驻西州，七〇三年(长安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天山军并在碎叶城(《唐会要》，第78卷，节度使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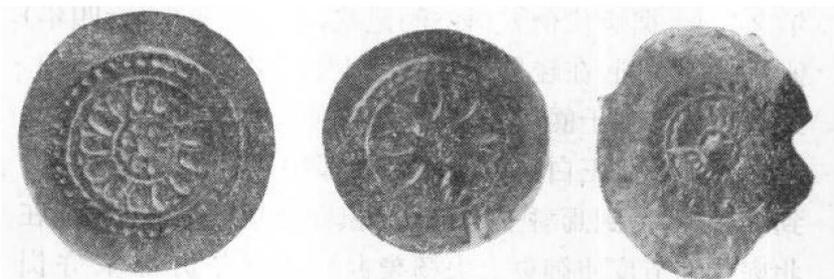
③ 《旧唐书》，第185卷，《王方翼传》。

④ 《新唐书》，第221卷，《焉耆传》。

城遗址。古城西南部的佛庙被确定为七世纪到八世纪的建筑物。据研究，这座庙宇墙壁的建筑原理，“是古代中国佛庙建筑学所特有的”^①。在这座庙宇的出土文物中，有一条很精致的瓷制残龙^②。在古城中发现的莲花纹瓦当，与西安出土的唐代大明宫宣政殿莲花纹瓦当一模一样^③。这个唐代城堡虽不能断定就是著名的碎叶镇城，但它肯定与当时的碎叶镇有密切的关系，它也充分反映了唐朝政府在楚河流域修城筑堡，屯军设防，施行管辖的历史事实。



阿克别西姆古城
遗址出土的瓦当



唐代大明宫宣政殿莲花纹瓦当

① 克兹拉索夫：《1953—1954 年对阿克别西姆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见苏联《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志考察团著作集》，第 2 集，1959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第 189 页。

② 同上书，第 177、201 页。

③ 阿克别西姆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见基谢列夫著：《中国瓦当的历史》，载《苏联考古》1959 年 3 期。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代长安大明宫》。

葱岭守捉是唐朝政府设置在今帕米尔地区的军事机构。开元(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中,唐朝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葱岭的军事力量,于渴槃陁地方(今塔什库尔干一带)置葱岭守捉。葱岭守捉扼守于葱岭,标志着唐朝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有效管辖。

唐代两大都护府对保卫西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

公元七五五年(天宝十四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藩镇割据,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在西域地区,吐蕃势力日益强大,两大都护府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道路梗绝,往来不通。但是,在李元忠、郭昕等率领下,两大都护府的官兵守卫西域地区达三十多年之久^①。据唐代僧人悟空的记载,七八八年(贞元四年)他从印度回国,在疏勒见到疏勒王裴冷冷和镇守使鲁阳;到于阗时受到于阗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的迎接;到龟兹时见到了龟兹王白环和安西付大都护、四镇节度使郭昕;到焉耆时,受到焉耆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的迎接;在北庭看到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这些官员都坚守岗位,与当地民族官员共同保卫和管理着西北边疆^②。

自七世纪二、三十年代西突厥归属唐朝政府,特别是自六四〇年安西大都护府建立后,直至八世纪末,唐朝政府的政令通过两大都护府,广泛推行于西域各地。例如,唐玄宗时,曾下令在南疆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及北疆

① 《全唐文》,第464卷。

② 《悟空入竺记》,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

的轮台等地征收来往商人的商税^①。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就有关于在轮台设置“孔目司”，负责征收商税的记载。此外，唐朝的钱币，也在西域地区流通使用。这些钱币在天山南北各地的遗址中发现很多。在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的阿克别西姆唐代遗址中也曾发现“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唐代货币。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有一面铸有汉字，一面铸有西域少数民族文字的唐代钱币^②。

屯田也是唐朝政府在西域地区实行的一种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的重要措施。据记载，唐朝政府曾在安西屯田二十七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每屯以五十顷计，这个数字也是十分庞大的^③。随着屯田和其他农业生产的发展，唐朝政府还在西域设有专门管理水利的“掬拓所”，任命“知水官”。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县知水官杨嘉恽、巩虔纯等关于修理堤堰的报告^④。另一件文书中还有知水官杨嘉恽同一位突厥首领骨逻拂斯一道筹划派人浇灌田地，给人夫分配粮食的记载。

① 《新唐书》，第221卷，《焉耆传》。

② 克兹拉索夫：《1953—1954年对阿克别西姆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见《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志考察团著作集》，第2集，第240—241页。

③ 南宋本《唐六典》，第7卷，《屯田郎中》条注，转引自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

④ 在吐鲁番墓葬中出土的这件文书上记载，知水官杨嘉恽等预算修塞新兴谷内堤堰一十六所，需要单工六百人，修塞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干渠需要单工八百五十人。从文书中还可以看出，这些堤堰每年都要定期差人夫修塞。人夫的来源有农民、手工业者，还有在当地落户的“胡人”。

唐朝兴办水利的措施，也推行到了塔拉斯一带。据耶律楚材的记载，他在路过塔拉斯时，就看到了唐朝在这里开凿的渠道、石闸等遗迹，还看到了唐朝“节度使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太原王济的碑^①。

唐朝政府对发展和维护西域地区的交通运输也十分重视。这时期西域的交通通道，在原来的三条大道之间增辟了许多新的支线，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从庭州到碎叶、从龟兹经热海（今苏联伊塞克湖）到碎叶、从龟兹向北到弓月（今新疆霍城）等路线。

为了保证内地与西域交通运输的畅通和安全，在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交通大道上，唐朝政府设立有许多驿站，便利来往官员和商人。新疆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记载了许多驿站名称，还有驿站的马料帐，签署者为“捉馆官”。其中一件文书记载着唐朝诗人岑参住驿馆的有关帐目。岑参曾有一首诗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经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②。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在西域地区乘驿行路的情况。

唐朝对西域的进一步统一，也大大地促进了西域和内地各民族间的交往和接近。当时，有大批少数民族人士进入内地，不少人成为唐朝统治阶级中的显赫人物。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唐代，突厥族的上层“布列朝庭，五品

① 耶律楚材：《西游录》，转引自《汉西域图考》第1卷。

② 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全唐诗》，第198卷。

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①。其中当有不少是西突厥的上层。内地的汉族也大量进入西域，其中最多的是当时的屯田士卒、卫戍战士，他们长期留驻西域，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和保卫祖国西北边疆。据《旧唐书》记载，自设置安西四镇后，每年都要从内地调发大量壮丁到西域充当戍卒^②。敦煌石窟发现的“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张君义告身”中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安西镇守军镇”，在镇多年，积劳有功，受到表彰。同他一起受奖的共二百六十三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其中有南方的洪州（今江西南昌）、婺州（今浙江金华）、润州（今江苏丹徒）；北方的燕州（今北京市顺义）、冀州（今河北冀县）；东部的青州（今山东益都）；河南的汝州（今河南临汝）、汴州（今河南开封）；西北的西（今新疆吐鲁番）、沙（今甘肃安西）、肃（今甘肃酒泉）、兰（今甘肃兰州）、灵（今宁夏灵武）各州^③。

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也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西域乐曲在内地得到普遍流行，著名的唐代十部乐中，就有龟兹、疏勒、高昌、安国、康国五部。尤其是龟兹乐，在唐代极受欢迎，影响很大。作为统一政令，传布中原文化的汉字、汉语在西域的一些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一九六九年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唐代古墓中，出土了一个十二岁的“义学生”

① 《资治通鉴》，第193卷，《唐纪》。

② 《旧唐书》，第196卷，《吐蕃传》。

③ 卫江：《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文物》1975年第8期。

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氏注》残卷，上边还有随手抄录的《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件珍贵的文物，生动而具体地说明：唐代西域有和中原一样的私塾（义学），教授汉文典籍；而且同中原一样，《千字文》也是西域学童启蒙的识字课本。当时西域少数民族的上层，懂汉语、汉文的大有人在。岑参诗中就有“花门^①将军善胡歌，叶河番王能汉语”的句子^②。

四、五代十国、辽、宋、元、明时期

唐代末期，回鹘族大批进入西域，对西北边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回鹘族又称袁纥、回纥、韦纥。他们原游牧于漠北鄂尔浑河流域，是突厥的属部。唐初，回鹘等部在唐的支持下，摆脱了突厥贵族的统治。六四七年（贞观二十一年）唐朝在回鹘地区设六府七州^③，划归燕然都护府管辖，授其各级首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等官职^④，封回鹘大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第二年，吐迷度死，唐朝任命其子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唐高宗初，西域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变，回鹘出兵五万，先后在伊犁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等人的统率下，转战西域，在维护

① “花门”指中国古代回鹘族。

② 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全唐诗》，第199卷。

③ 六府为回纥、仆骨、多滥葛、拔野古、同罗、思结；七州为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思结别部、白霫。

④ 《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

祖国统一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七四四年(天宝三年)回鹘部徙牙帐于乌德鞬山、崑昆河^①之间,唐朝政府封其首领骨力裴罗为奉义王,后又改封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中原地区发生“安史之乱”时,回鹘曾出兵参加平乱,帮助收复了西京和东京。唐王室曾先后五次把公主嫁给回鹘可汗。七八八年(贞元四年)应回鹘可汗的要求,唐朝允准将其汉字族名“回纥”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的意思^②。九世纪三十年代,回鹘为天灾和内乱所削弱,又受到黠戛斯部的袭击,各部四向迁徙,回鹘首领馺职及庞特勒率领的十五个部落,迁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楚河流域一带,与当地西突厥葛罗禄部(葛罗禄部原在阿尔泰山南北,当时已南迁于此)共同游牧。在安西(吐鲁番)、河西走廊、于阗直至葱岭一带,也都有回鹘部落迁入。八五七年(大中十一年)唐朝册封庞特勒为“唃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金禄毗伽怀建可汗”^③。唐懿宗时,回鹘首领仆固俊,配合瓜沙等州节度使张义潮击败吐蕃奴隶主贵族,并征得唐朝的许可,迁入吐鲁番一带^④,以后又逐步移居到了西域各地,并与突厥、羌等族和其他土著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为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

① 乌德鞬山是今杭爱山的一高峰。崑昆河即今鄂尔浑河。

② 《资治通鉴》第233卷考异;《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言捷鸷犹鹘然”。

③ 《唐大诏令集》,第128、129卷(《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作怀远可汗)。

④ 《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

回鹘族大量进入并定居西域的时期，正值唐朝政权灭亡，中原地区进入了五代十国（公元九〇七——九六〇年）。这个时期西北边疆也处于割据状态。当时割据于西北边疆的地方政权主要有三个：在原唐代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所辖地区的西部，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以中国葛罗禄和回鹘族为主的黑汗王朝，这个政权有两个中心，一个在喀什噶尔，一个在八拉沙衮。在原唐朝安西大都护府辖地的南部，以于阗为中心，形成了李氏政权，其统治者自称是唐朝皇室的宗亲。九三八年（晋天福三年），后晋授于阗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①。在原唐代的西州和安西都护所辖地区的东北部，是回鹘人建立的高昌政权，又称西州回鹘，这个地方政权一直使用开元七年唐朝政府颁发的历书，还特别珍藏着唐太宗、唐玄宗颁发的诏书^②。

这三个政权都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其中高昌和于阗两个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始终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九六二年（宋太祖建隆三年），高昌回鹘政权与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此后，历年朝献不绝。九八四年，北宋政府派王延德出使高昌，向其王颁赐裘衣、金带等物。于阗地方政权也经常向宋朝遣使朝贡。一〇六三年（嘉祐八年）宋朝政府应于阗黑韩王的要求，册封他为“特进归忠保顺砺麟（金翅鸟）黑韩王”^③。于阗王还

① 《新五代史》，第74卷，《四夷附录第三》。

② 《宋史》，第490卷，《高昌》。

③ 同上书，第49卷，《于阗传》。

与敦煌地区的宋归义军节度使、敦煌郡王曹氏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在敦煌千佛洞中就有于阗王修建的洞窟，洞窟的壁画和题词中保留着这方面的宝贵史料^①。

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辽朝（公元九一六——一一二七年）也曾在高昌和于阗设立高昌国大王府和于阗国王府^②。辽朝政府有权向各王府征调兵马^③，据《辽史》记载：九二六年（天显元年）就曾以回鹘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④。

公元十二世纪初，辽朝的一些贵族以耶律大石为首，率领部分臣民西迁，以虎思斡耳朵（今苏联托克马克东）为都城，重建辽政权，史称西辽。

西辽政权，其组织机构完全承袭辽朝的制度。耶律大石号葛儿罕，称“天祐皇帝”，年号延庆。以后西辽各帝都有汉字“尊号”和年号。西辽的官制也与辽朝一样，设南面、北面^⑤或称南衙、北衙。

① 在敦煌千佛洞中，有三座洞窟与于阗王有关。一座是 61 窟，建于九七九——九九五年之间。这座洞窟为曹元忠的妻子凉国夫人所建。窟壁上有曹氏一家人的画像，其中有“回鹘公主”和“于阗公主”的画像。一座是 444 窟，建于盛唐，但窟东壁两侧有宋时于阗王太子的题记，全文是：“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进供养”，“大宝于阗国皇太子□原供养。”仍沿袭后晋所授“大宝于阗国王”封号。第三座是 98 窟，建于九三八年，是为于阗王李圣天所建，题记用“大朝大宝于阗国大明天子。”题记中的“大朝”是指后晋。

② 《辽史》，第 46 卷，《百官志》。

③ 《辽史》，第 36 卷《兵卫志》记载：辽对各属国“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使，无常额。”

④ 《辽史》，第 2 卷，《太祖纪》。

⑤ 《金史》，第 121 卷，《粘割韩奴传》。

西辽管辖的地区，包括了唐代安西大都护府辖地和北庭大都护府所辖西南地区，具体说，北边包括额敏、海押立（今苏联科帕尔），南边达到喀喇昆仑山和阿姆河，东边包括吐鲁番，西边到达咸海。

十三世纪初，蒙古贵族灭亡了西辽，逐步统治了西北边疆。十三世纪中，库尔喀喇乌苏以东由畏兀儿亦都护管辖，西北边疆其他地区都是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哈台和第三子窝阔台的领地。

忽必烈灭南宋建立元朝（公元一二七一一——一三六八年）后，察哈台、窝阔台的后裔和畏兀儿亦都护，都在元朝政府的管辖之下。一二六八年（至元五年）以后，窝阔台后裔和察哈台后裔蒙古贵族发动叛乱，元朝政府经过四十多年的平叛斗争，使窝阔台、察哈台后裔的一些蒙古贵族逐渐恢复了对元朝政府的隶属关系。

自元朝建立以来，伊犁以东的广大地区一直是在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在伊犁地区，早在一二六八年（至元五年），忽必烈就以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为总管，统率大军驻守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在畏兀儿地区，包括吐鲁番和北疆东部地区，设置了镇北庭都护府^①。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又设北庭都元帅府。一二八九年以前，在和阗设有宣慰使元帅府。此外，元朝政府还在西域地区设立了北庭都元帅府、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宣慰司、织造局、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等军政机关。

^① 《元史》，第11卷，《世祖本纪》。

元朝政府通过这些机构在西域地区实行统一的军政管理，推行与中原统一的货币^①，直接向当地人民征收赋税和征调军队^②。同时也调遣内地人民到天山南北进行屯种。仅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元朝政府就派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巴里。这年十一月，又派遣蒙古千户曲出等统领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失巴里^③。元朝政府还在西域境内和由内地到西域的交通通道上设立了许多驿站。一二七四年（至元十一年）在于阗、叶尔羌两地设水驿十三处^④。一二八一年（至元十八年）在太和岭（今山西雁门以北）到别失巴里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增设新驿三十所^⑤。这些水陆驿站的设置，促进了内地与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元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

在元代，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大量进入中原，并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进入内地的维吾尔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西域征调来的手工业工人（“匠户”）和军队。直到元朝后期，维吾尔族的军队仍驻扎在湖北等地^⑥。还有不少精通汉文的维吾尔族官员和作家，在内地从事政治、科学和文学等活动。在政治方面，廉希宪、阿礼海涯等都

① 《元史》，第10卷，《世祖本纪七》；第11卷，《世祖本纪八》。

② 同上书，第10卷，《世祖本纪七》；第13卷，《世祖本纪十》。

③ 同上书，第14卷，《世祖本纪十一》。

④ 同上书，第8卷，《世祖本纪五》。

⑤ 同上书，第11卷，《世祖本纪八》。

⑥ 同上书，第42卷，《顺帝本纪》。

担任过元朝中央政府的中书平章政事、尚书右丞相，阿散担任过甘肃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担任过广东宣慰使，脱烈海牙先后担任过吏部尚书、礼部尚书、荆湖北道宣慰使等职。在文学、史学、科学方面，沙刺班曾参加过《金史》的纂修工作；廉惠山海牙是《辽史》的纂修官，并参加了英宗、显宗实录的编修；贯云石是著名的文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是杰出的农学家。还有一些翻译家，把《资治通鉴》、《本草》、《贞观政要》、《申鉴》等书译成维吾尔文。他们对交流中原与西域地区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元朝灭亡后，西北边疆广大地区仍然在中国蒙古族贵族的统治之下。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为帖木儿所统治；天山以北、伊犁以东有蒙古贵族建立的别失巴里政权；天山以南有于阗政权。据《明史》记载，自元朝灭亡，天山南北“各自割据，不相统属”。“迄宣德朝，效臣职，奉表笺，……多至七八十部”^①。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洪武时期，帖木儿政权曾向明朝政府“称臣纳贡”^②。别失巴里^③政权的首领黑的儿火者、沙迷查干、马哈木、纳黑失只罕、歪思等，也始终与明朝政府保持着明确的隶属关系。他们不仅经常派代表向明朝政府朝贡，就一些重大的对外关系

① 《明史》，第332卷，《西域传》。

② 同上。参看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商务印书馆版。

③ 别失巴里自歪思汗起，王庭迁至伊犁地区，所以又称亦力把里。

问题向明朝政府报告和请求批准。例如一四〇七年别失巴里王沙迷查干向明朝政府提出，撒马尔汗原是察哈台系蒙古贵族的辖地，请求明朝政府批准出兵收复^①；一四一六年别失巴里王纳黑失只罕与哈烈首领发生争端，他即向明朝政府报告，由明朝政府出面处理^②。别失巴里的首领继位，也要由明朝政府颁发玺书承认和批准^③。明朝政府还任命其各级首领为都督佥事、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等官职，颁发诰命、冠带等物^④。

吐鲁番、于阗和哈实哈儿（即喀什噶尔）等地区的蒙古统治者，也都与明朝政府有着隶属关系，他们经常向明朝政府朝贡。吐鲁番的一些蒙古贵族还被明朝政府任命为都督、指挥佥事等官职^⑤。此外，明朝政府还于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封哈密地区的蒙古贵族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一四〇六年设立哈密卫，给忠顺王安克帖木儿颁发哈密卫印，委派了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佐，任命哈密地区的其他首领为都督佥事、指挥佥事等官职。哈密成为明朝著名的“关西七卫”之一。

至于当时占据着哈密、别失巴里以北广大地区的瓦剌与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作专门叙述。

自西汉在西北边疆建立行政管辖机构以来，一直到明代，中间经历了一千七、八百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

① 《明成祖实录》，第49卷，第3页，永乐五年四月。

② 同上书，第100卷，第9页，永乐十四年三月。

③ 同上。

④ 《明宣宗实录》，第29卷，第9页，宣德二年七月。

⑤ 同上书，第49卷，第3页，宣德三年十二月。

的中央和地方政权在西北边疆广大地区设官置守，驻兵屯田，兴修水利，开通道路，有效地保卫和建设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一个整体。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在内的清代中国的西北边疆。

第二节 清代的中国西北边疆

一、清初对西北边疆统一管辖的加强

明末，中国西北边疆广大地区主要居住着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梁海等中国少数民族。当时，在这里处于统治地位的：天山以北是厄鲁特蒙古贵族，天山以南是察哈台系的蒙古贵族。

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主要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此外，还有一些部落游牧在额尔齐斯河、鄂木河、伊希姆河、托博尔河一带。苏联一些历史著作也承认，现在苏联境内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都是中国厄鲁特蒙古的辖地^①，巴尔喀什湖以西和西南的哈萨克部落，伊塞克湖一带的柯尔克孜部落，也曾经是厄鲁特蒙古的

^① 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编：《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史》，第1卷，1957年阿拉木图出版，第179页；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964年莫斯科出版，第118页。

属部。

十二世纪末，厄鲁特蒙古活动于叶尼塞河河源，被称为斡亦剌惕^①。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以忽都哈别乞为首的一部分斡亦剌惕部归附成吉思汗，并帮助术赤^②统一了万斡亦剌和其他十余个部落，得到成吉思汗的嘉奖。成吉思汗将女儿扯扯干嫁给忽都哈别乞的儿子脱劣勒赤。从此，斡亦剌惕部贵族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关系，在蒙古族各部中处于显赫的地位。成吉思汗曾派兵在他们居住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屯守。到窝阔台时，在叶尼塞河地区设置了谦谦州。忽必烈时，又在谦谦州设置万户府，并在斡亦剌惕部和吉利吉斯部之间，设置驿站^③，加强了对斡亦剌惕部的管辖。到元代后期，元朝政府正式册封斡亦剌惕部的首领也不干为延安王^④。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分裂为几个大的集团，厄鲁特部——在明代称作瓦剌，就是其中的一个集团。十五世纪初到十五世纪中叶，瓦剌贵族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在漠北、漠南建立了隶属于明朝政府的地方政权，他们的首领马哈木等，于一四〇八年（永乐六年）向明朝政府“请印信封爵”^⑤。第二年，明朝政府正式册封瓦剌的

① 《元朝秘史》第12卷称厄鲁特为斡亦剌惕；参看《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64页。

② 成吉思汗的长子。

③ 《元史》，第16卷，《世祖本纪》。

④ 《元史》，第109卷，《公主表》；《新元史》，第28卷，《表二》。

⑤ 《明成祖实录》，第59卷，第5页，永乐六年十月丙子。

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①。此后，他们的子孙仍然承袭王爵。明朝政府还多次任命瓦剌各级首领为都指挥僉事、指挥僉事、都督等官职，任命瓦剌的僧侣为“慈善弘化国师”、“都纲”等僧官，并向各级僧官颁发印、册^②。一直到明末，沙俄派到瓦剌的“使者”还亲眼看到明朝政府的官员在向瓦剌部征收赋税^③。

明代，瓦剌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也很密切^④。他们每年通过“贡马”的形式，把大量牲畜运入内地，换取生活、生产用品。“进贡”的人数经常在几百人以上，有时达三千人；“贡马”的数量经常达三、四千匹，各种毛皮万余张^⑤。

十五世纪中期，瓦剌又开始向西发展，以后逐渐越过杭爱山到达斋桑湖、额尔齐斯河上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西南到达吹河、塔拉斯河流域。

十六世纪后期，在厄鲁特蒙古中逐渐出现了称作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各部“部自

① 《明史》，第328卷，《瓦剌传》。

② 《明英宗实录》，第37卷，第3页；第38卷，第7页。

③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1919年伦敦出版，第37—39页。

④ 《明经世文编》第19卷，胡濙《论虏情疏》中说，瓦剌派到内地的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朝”。

⑤ 《明英宗实录》，第84卷，第7页，正统六年十月甲申；第160卷，第7页，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甲辰：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来朝，贡马四千一百七十二，貂鼠、银鼠、青鼠皮一万二千三百。

为长”^①，但也组成了一种比较松散的统一机构，即“丘尔干”（盟会之意）。“丘尔干”设有一至两个首领。自“丘尔干”建立以来，其主要首领一直由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据记载，和硕特部的首领博贝密尔咱“始称卫拉特汗”，即担任“丘尔干”首领，后传至其子哈尼诺颜洪果尔，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又传至拜巴噶斯。

在拜巴噶斯统治时期，正值明朝的统治日益腐败，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中原，在东北地区，中国满族逐渐强大，取代了明朝在这里的统治。这种形势，在厄鲁特蒙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厄鲁特首领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当时就从天山以北的牧地向尚未入关的清政权遣使进贡^②。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他又率领一部分和硕特部落向东迁徙，进入青海、西藏等地，成为以后清朝政府管辖下的青海厄鲁特蒙古。一六四〇年（崇祯十三年）拜巴噶斯死，其子鄂齐尔图率部分厄鲁特部落进入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成为清朝政府管辖下的西套厄鲁特蒙古。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清朝政府任命图鲁拜琥为厄鲁特首领，“赐甲冑弓矢，俾辖诸厄鲁特”^③。一六五三年又正式封他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简称顾实汗）。

十七世纪中，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巴图尔洪台吉排斥了顾实汗，把厄鲁特各部置于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之下。巴图尔洪台吉死后，其子僧格继任准噶尔首

①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9卷，《厄鲁特要略一》。

② 同上。

③ 同上。

领。不久，准噶尔贵族内哄，僧格被车臣卓特巴巴图尔所杀，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尔丹戮逐车臣，杀阿拉布坦，自立为准噶尔汗。

噶尔丹从小在中国西藏地区当喇嘛。僧格被杀后，他立即赶回准噶尔，于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成为准噶尔的首领。他每年向清朝政府派遣大批“贡使”，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准噶尔的“贡使”经常多达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于途^①。噶尔丹还向清朝政府“吁请恩赐白金，以育众庶”^②。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以黄教首领的名义授给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即向清朝政府报告，请求批准^③。清朝政府也不断派遣官员前往准噶尔，特别是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后，清朝政府派大员到准噶尔等边疆各地告捷，以示庆贺。康熙帝在给噶尔丹的谕旨中特意指出：“……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兹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赍捧重赏”^④。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发动了叛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噶尔丹还承认“与中华一道同轨”^⑤，表示不敢“自外于中华”^⑥。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叛军被清朝政府击溃

① 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2卷，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

② 同上书，第8卷，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己未。

③ 同上书，第1卷，康熙十八年九月丁酉。

④ 《清圣祖实录》，第103卷，第16—17页。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7卷，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⑥ 《清圣祖实录》，第137卷，第24—25页。



康熙帝给噶尔丹的谕旨

后，五世达赖特意请求清朝政府不要削除噶尔丹的汗号，“仍使存留，且加敕印恩赐”^①。这些记载都表明，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清朝政府的隶属关系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在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兵进入喀尔喀蒙古后，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占领了准噶尔地区，他立即向清朝政府“告捷”，并保证“嗣后大君凡有谕旨，俱愿遵行”^②。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的前期，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15卷，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庚子。

② 同上书，第9卷，康熙三十二年戊午。

与清朝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他遵照清朝政府的指示,在阿尔泰地区切断了噶尔丹的归路,加速了噶尔丹的灭亡。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死,策妄阿拉布坦遵照康熙帝的指令,将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儿一并送交清朝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策妄阿拉布坦也要奏请清朝政府批准。如一六九八年,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了战争,策妄阿拉布坦立即向康熙帝报告说:哈萨克头克汗杀掠厄鲁特人民,抢劫厄鲁特所属乌梁海,“臣是以兴兵而往,恐圣上谓臣喜事好兵,故陈此自白”^①。

十八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准噶尔贵族之间发生内乱。清朝政府于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分两路出兵西域,任命班第为定边将军,厄鲁特蒙古辉特部贵族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军进驻伊犁。在清军进驻伊犁后,阿睦尔撒纳要清朝政府封他为厄鲁特四部的汗,又妄图在西北边疆搞割据。由于野心未能得逞,阿睦尔撒纳即发动了叛乱。但是,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反对这一小撮厄鲁特贵族的叛乱,坚决支持清朝政府统一西北边疆,因而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至此,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48卷,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当时的俄国人也是承认的。例如,曾经代表沙俄与清朝政府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的萨瓦·卢基奇·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在他呈递给沙皇政府的一个报告中曾说:“浑台吉(指策妄阿拉布坦——引者)……将来可能脱离中国人而成为俄国的藩篱和最有益的同盟者,那么对他保持友善关系不是坏事情”。这段话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野心,他们明知准噶尔隶属于中国清朝政府,仍极力图谋分裂中华民族,侵吞中国准噶尔地区。转引自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圣彼得堡出版,第126页。

西北边疆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

准噶尔一小撮贵族的叛乱活动，一直遭到要求祖国统一的厄鲁特各阶层人民的反对。

在噶尔丹发动叛乱的时期，大批厄鲁特蒙古部落离开了准噶尔地区。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以憨都台吉为首的一部分准噶尔部落逃入内地，其首领向清朝政府控告噶尔丹的残暴统治^①。在噶尔丹进入喀尔喀蒙古后，准噶尔部落大半归附策妄阿拉布坦^②。跟随噶尔丹的准噶尔牧民，也大批逃亡^③。噶尔丹的叛乱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清朝政府平定的。此后，只要准噶尔贵族有叛乱活动，总有大批厄鲁特部落摆脱准噶尔贵族的统治向东迁徙。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迁入阿尔泰推河一带的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的牧民，数量已经很大，清朝政府把他们编设了六个旗^④。以后，厄鲁特各部牧民向东迁徙更加频繁。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杜尔伯特部六千余户由额尔齐斯河牧地东迁，清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阿尔泰推河一带游牧^⑤。第二年，辉特部、和硕特部四千余户东迁^⑥，其他各部也纷纷向内地迁徙^⑦。厄鲁特各部牧民摆脱准噶尔贵族统治向东迁徙的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3卷，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② 同上书，第13卷，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己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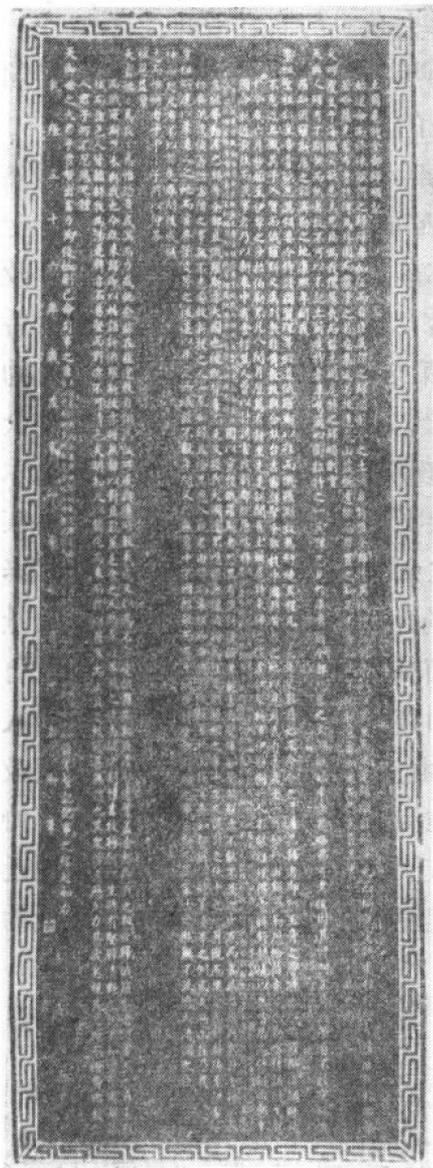
③ 同上书，第33卷，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

④ 《皇朝藩部要略》，第11卷，《厄鲁特要略三》。

⑤ 同上书，第12卷，《厄鲁特要略四》。

⑥ 同上。

⑦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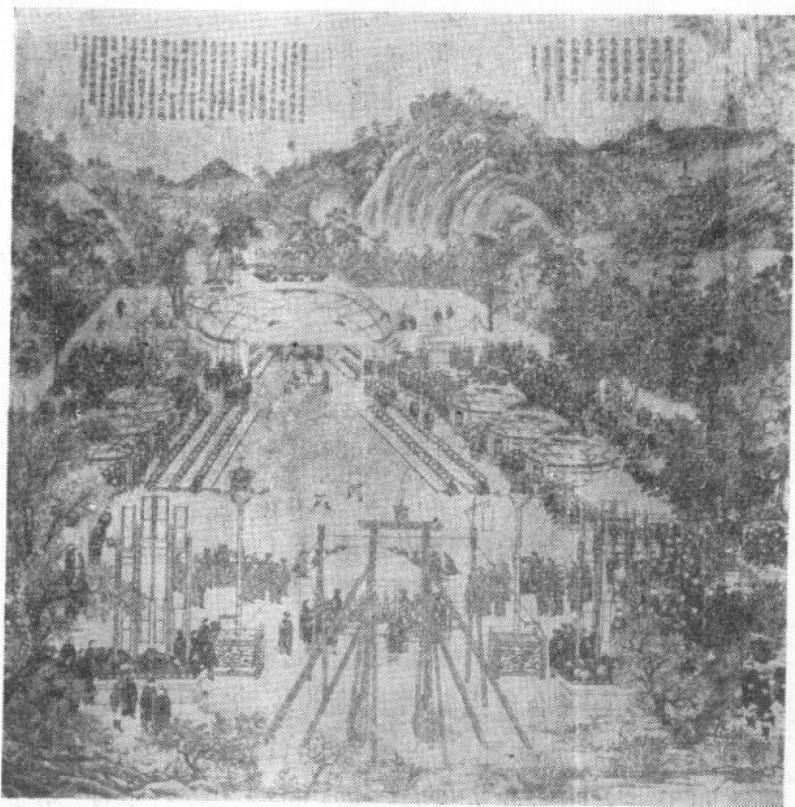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行动，表达了厄鲁特人民反对准噶尔贵族叛乱，要求祖国进一步统一的强烈愿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在向西北边疆进军中，沿途的厄鲁特各部落牧民，有的主动向清军供应羊马牲畜，有的向清军送乳浆、奶酪。在厄鲁特人民支持下，清军只用了八十多天就到达伊犁^①。

此外，当时轰动中外的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的事件，也是厄鲁特蒙古人民热爱祖国，要求祖国统一的一个生动事例。

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中的一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十八世纪七十



清乾隆皇帝宴渥巴锡于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

年代初，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不堪沙俄的勒索和压迫，毅然率领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②，扶老携幼，赶着畜群，不畏艰难险阻，沿途冲破沙俄军队的堵截，返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4卷。

② 见松筠：《新疆识略》，卷首，《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但据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记载，返回的土尔扈特部为“四十余万部众”，《西域闻见录》更说是“四十六万余户”。

回祖国。渥巴锡向清朝政府呈交其先世所受明朝永乐八年封爵的汉篆玉印一颗^①，表达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土尔扈特部在离开中国一百四十多年后经历千辛万苦重新返回，是厄鲁特蒙古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热爱祖国的最好说明。

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厄鲁特蒙古在政治上，从来就对中央王朝有着明确的隶属关系；在经济上，与中原地区从来就是密切联系，共同发展的。厄鲁特蒙古的广大人民对统一祖国，保卫祖国边疆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中国维吾尔族在清朝政府统一祖国西北边疆的斗争中，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十七世纪初，仍然在以叶尔羌为中心的察哈台系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十七世纪中叶，明朝政府被推翻后，吐鲁番的首领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济即于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向清朝政府遣使“奉贡表”。顺治帝在“谕旨”中说：“吐鲁番……今得幸而复合，……所受有明敕印，可遣使送来，以便裁酌授尔封爵”^②。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叶尔羌的首领也向清朝政府遣使进表^③，整个天山以南恢复了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噶尔丹乘南疆地区各封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38卷，《土尔扈特归服始末》。

② 《皇朝藩部要略》，第15卷，《回部要略一》。

③ 同上。

建主内哄的机会,进兵叶尔羌,统治了天山以南。准噶尔贵族在各城分设头目,榨取苛重的赋税,仅叶尔羌一城,每年要交纳十万“腾格”^①。准噶尔贵族任意强征劳役,抢夺牲畜,奸淫妇女,肆行残杀,造成了许多荒芜地区。如喀喇沙尔(即焉耆),原为“人户繁盛,果木黍稷盘空被野,夙称富庶之邦”。准噶尔贵族占领南疆后,“占据其地为牧场,……民不堪其扰,死绝逃亡,地遂空虚”^②。

准噶尔贵族的破坏和骚扰,引起了维吾尔族各阶层的反对。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哈密首领额贝都拉摆脱了准噶尔贵族的统治。第二年,他配合清军抗击准噶尔贵族的叛乱,擒获噶尔丹的儿子色布腾巴勒珠尔,给噶尔丹以沉重打击。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清朝政府在哈密编设旗队,设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各官^③。哈密成为清朝政府统一西北边疆的重要前哨阵地,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民,成为统一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支重要先头部队。

吐鲁番地区以额敏和卓等为首的一部分维吾尔族首领,苦于准噶尔贵族的压迫和掠夺,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就请求清朝政府向吐鲁番地区派驻部队。清朝政府也曾多次在吐鲁番驻兵、兴屯。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朝政府根据吐鲁番额敏和卓的要求,将吐鲁番近一万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77卷。“腾格”是当时南疆地区的货币单位。一“腾格”值银一两。

② 《西域闻见录》,第2卷。

③ 《皇朝藩部要略》,第15卷,《回部要略一》。

户维吾尔族迁入内地^①。在乾隆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时，这部分维吾尔族的部队同哈密等地维吾尔族的部队一起进军伊犁。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平定后，迁入内地的维吾尔族即于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返回吐鲁番。清朝政府命额敏和卓等管辖吐鲁番地区，并升授额敏和卓为贝子，授其子素赉璜为公^②。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进入伊犁后，释放了被准噶尔贵族监押在伊犁的叶尔羌和卓的后代布拉尼敦（即大和卓）和霍集占（即小和卓），还特派军队护送布拉尼敦回喀什噶尔。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霍集占竟伙同布拉尼敦发动叛乱。霍集占等破坏统一，搞封建割据的活动，违反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遭到南疆各地维吾尔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哈密扎萨克玉素卜率领哈密维吾尔族部队参加平叛^③。吐鲁番的额敏和卓担任参赞大臣，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库车“阿奇木伯克”鄂对、拜城“伯克”色提卜阿勒氏因反对大小和卓的叛乱，被迫逃往伊犁，后又随同清军，平定叛乱。在和卓兄弟被清军击败，逃往阿克苏、乌什城时，乌什“伯克”霍集斯等拒绝他们入城，并配合清军追剿叛军。

在维吾尔族等西北边疆各民族人民的反对下，大小和卓的叛乱于第二年就被清朝政府平定了。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32卷，雍正十年十一月乙未；第33卷，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庚午。

② 《皇朝藩部要略》，第15卷，《回部要略一》。

③ 《回疆通志》，第12卷。

在清朝政府统一西北边疆的斗争中，西北边疆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达斡尔等族也都发挥过重大作用。其中，锡伯族和达斡尔族等是从遥远的东北边疆移住于这里的，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守卫卡伦，巡查边界，建驿站，兴水利，开屯田，设牧场，对开发和保卫西北边疆，都有重大贡献。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西北疆域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随即在阿尔泰、萨彦岭、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与帕米尔的广大地区，以及天山南北，逐步设立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按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中国的西北边疆，分为两个部分：北部，即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北，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属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南部，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地区，归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管辖，这块地区自古称作西域，清代称新疆^①。

^① 新疆，历史上称作西域。自两千多年前汉朝统一西域以来，就一直在中国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管辖之下。明末清初，我国准噶尔贵族在这里建立了割据政权，随后又发动了叛乱。清朝政府平定了这次叛乱，重新统一了西北边疆。在向准噶尔进军时，乾隆曾说：“汉时西陲塞地极广”，天山南北“皆曾屯戍”，“唐开都护府，扩地及西北边”（见《清高宗实录》，第482卷，第19页）。这表明，乾隆并非不知道西域早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为了宣扬重新统一西北边疆的这件“武功”，又把西域称作“新疆”。乾隆年间编纂的《西域图志》还处处把清朝对西域的管辖同以前各朝对比，同时批评了一些朝代管辖西域方面的缺陷。那种故意割断中国历史，闭眼不看两千年来的事实，说什么“新疆”就是中国的“新边界”、“新的疆界”，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心的歪曲。



伊犁将军府钟楼(清光绪年间复修)

在中国漫长的西北边界上，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与沙皇俄国交界的，只是从沙宾达巴哈^①到额尔齐斯河一段。至于从额尔齐斯河到帕米尔这段边界，当时中国主要与左、右部哈萨克^②、浩罕、拔达克山等为邻，同沙皇俄

^① 清代文献又作沙必乃达巴汉或沙弼奈岭。满语称岭为达巴哈。此地在今苏联图瓦自治省的西北，仍沿用旧名。

^② 左部哈萨克(即中帐)，于一七五七年归顺清朝政府，其首领阿布賚向清朝政府表示：“情愿将哈萨克全部归顺”，并派遣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第二年，右部哈萨克(即大帐)首领阿比里斯等也向清政府声明：“我右哈萨克久欲归诚”，此后当“奋勉自效，永无二心”。自左、右部哈萨克归顺清朝政府后，年年入贡，经常入觐，清朝政府曾册封阿布賚及其子斡里相继为汗。两部的其他首领也曾受清朝政府的官职。特别是右部哈萨克，与清朝政府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国相距还十分遥远。中国清朝政府曾多次正式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明确了各自的管辖范围。这在当时中国的官方文件和有关的历史著作以及许多地图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下面就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中国西北边界的走向，清朝政府在边界地区的具体管辖情况，分别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一） 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所辖地区^①

中国西北边疆的北部，是清代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下的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部的一部分地区。这段边界的北部和西部，都与沙皇俄国交界。对这段边界的走向，中国的官方文件和著作，有明确的记载。

这段边界的最东端为沙宾达巴哈，是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最后一个界牌。这个中俄交界点载之条约，是举世皆知的。

从沙宾达巴哈往西北，在中国唐努乌梁海境内有阿穆哈河（今苏联阿巴根河）和察罕米哈尔河（今苏联切罕河）。据清朝文献记载，这两条河北流汇合后，“又北流达俄罗斯界”^②。

由这里往西，中国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境内有向北流的阿勒坦河（今苏联毕雅河）和哈屯河（今苏联卡通

^① 清朝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地方，喀尔喀四部官兵，并会办库伦以西事务。本节仅述定边左副将军所辖的一部分。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5卷，《色楞格河源流考》。

河),二水合流后,即为鄂毕河。据清代文献记载,中俄交界处在二水合流的西北^①。苏联的历史著作也承认,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堡垒线才扩展到这两条河汇合处的比斯克^②。

从比斯克起,中俄边界转向西南,以察拉斯河(今苏联恰雷什河)的支流白河为界。对这个交界点,俄国文献有明确的记载。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中国乌梁海宰桑鄂木布及其子博罗特等人逃入俄境,清朝政府派兵追赶到边界,并行文俄国西伯利亚当局索要逃犯^③。一七五七年,俄国政府就这件事给清朝的复文中明确地说:博罗特等人“惧罪逃入俄国边堡,该地位于国界处之白河岸上”^④。可见,白河是中俄边界上的一个交界点,沙俄政府是十分清楚的。

从白河向西南,中俄边界到达额尔齐斯河。俄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最东的居民点,是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中国文献称作铿格尔图喇,当时中俄在额尔齐斯河上的分界点,就在这里^⑤。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6卷,《额尔齐斯河源流考》。

② 《苏联史纲》(18世纪后半叶),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665页。

③ 当时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曾向沙皇政府报告说:鄂木布及其子博罗特等逃入俄国境内克雷完工场(位于白河西岸),清军追赶逃犯迫近白河(班蒂什-卡姆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第266页)。

④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1936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第178页。

⑤ 据《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40卷记载:一七六一年,中国准噶尔人色布腾等叛逃俄国,清军追至“俄罗斯之铿格尔图喇”,向俄方索要逃犯。

对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地区中俄交界的这段边界走向，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苏联史纲》也得出了与我们相同的结论。在这部书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分册中说，十八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在逐步侵占了托木斯克以南原属中国准噶尔部的辖地后，于一七五九年建立了一条“堡垒线”，它由相距数十里的许多小堡垒组成。这条堡垒线起初是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向东北延伸，一七六二年又改为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起，向北到白河西岸的克雷完工场，又向东北，经过比斯克，到库兹涅茨克（今苏联斯大林斯克），俄国人称这条堡垒线为“克雷完——库兹涅茨克堡垒线”。该书作者说，这条堡垒线是俄属“西西伯利亚的南面屏障”^⑥。可见，由沙宾达巴哈经比斯克到额尔齐斯河这段中俄边界，是沙俄在逐步侵占了托木斯克以南原属中国准噶尔部的辖地后才形成的。

对这件事，俄国官方文件中有相应的记载说：沙皇政府即命令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少校康斯坦丁·沙伊斯基接受清朝政府提出的逃犯名单，并将色布腾等一百五十三人交回中国（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303页）。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在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少校交回色布腾等人后，向乾隆皇帝报告说：“俄罗斯铿格尔图喇玛玉尔（俄语“少校”的音译——引者）等奉伊吉纳尔衙门来文，将玛哈沁色布腾等一百余人及军器马匹等物，全行送出”（《清高宗实录》，第647卷，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月丁亥）。从中俄双方对色布腾事件的记述中，清楚地看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就是铿格尔图喇，这里是中俄的一个交界点。此外，据《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篇第35卷记载，一七五七年清军追剿阿睦尔撒纳直至“俄罗斯境之铿格尔图喇，遣人告知，十八日俄罗斯喀丕坦（俄语“大尉”的音译——引者）等至额尔齐斯河滨相见。”这个记载也说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是当时中俄在额尔齐斯河上的分界点。

^⑥ 《苏联史纲》，第663页。

清朝政府在这段边境地区，行使着有效的管辖。

当时，在这段边界以内居住的主要是中国的乌梁海部落。

在这段边境东部地区游牧的乌梁海部落，原属中国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十八世纪初，清朝政府把这部分乌梁海部落编设佐领，任命扎萨克辅国公博贝等管辖。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后，又增编为四十六个佐领。因为这部分乌梁海居住在唐努山一带，所以称唐努乌梁海部。唐努乌梁海各佐领分布的地区很广，大部分在沙宾达巴哈东南，少部分在沙宾达巴哈以西、以南。在沙宾达巴哈以西、以南的唐努乌梁海各佐领分布的情况是：沙宾达巴哈南，是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四个佐领^①；鄂尔噶汗山以北，阿穆哈河与察罕米哈尔河汇合处以南，是三音诺颜部所属的十三个佐领^②；阿穆哈河与阿勒坦河之间，是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十个佐领^③。中国唐努乌梁海各佐领地处边界，在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朔方备乘》一书所说的：唐努乌梁海各佐领，“北控罗刹，南卫卡伦，峻岭回还，巨川萦绕，洵极边之保障也”^④。

在这段边境的西部，是中国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下

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 532 卷，《乌里雅苏台统部》。

② 同上书。据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鄂尔噶汗山即今苏联境内的喀尔雷罕山脉。

③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 532 卷，《乌里雅苏台统部》。

④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 11 卷，《北徼形势考》。

的乌梁海部落。这部分乌梁海部落原来都在中国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之下，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游牧于南部阿尔泰、推河、哈屯河地区的乌梁海首领扎木图、祚木特、韦根、赤伦、察达克等相继归清朝政府直辖。一七五五年，清朝政府将这部分乌梁海部落编为七个佐领，任命察达克为副都统、总管。一七六二年，清政府又把他们改编为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右翼三旗，任命两个总管分别管理^①。因为这部分乌梁海部落居住在阿尔泰（又作阿勒坦）地区，所以清代把他们称作阿勒坦乌梁海。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游牧于阿勒坦乌梁海西北部的乌梁海部落，也相继归清朝政府管辖。清朝政府统编这部分乌梁海部落为二旗，四佐领^②，任命其首领特勒伯克扎尔纳克为三品总管。因为他们游牧的地区主要在阿勒坦淖尔（今苏联捷列茨科耶湖）附近，所以称这部分乌梁海为阿勒坦淖尔乌梁海。

阿勒坦乌梁海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各佐领的牧地，分布在从阿勒坦河到铿格尔图喇这段边界以内的广大地区。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政府在科布多设立参赞大臣，管理这两部分乌梁海及其他游牧部落。按清朝政府规定，他们每户每年要缴纳貂皮两张，由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负责收齐上交^③。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清朝政府还因为他们能按时按量呈交貂皮，赏给阿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 19 卷。

② 同上书，第 17 卷。

③ 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

勒坦淖尔乌梁海总管蒙古勒花翎^①。

在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广大地区，除了由乌梁海各佐领根据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的指示保卫地方，行使管辖以外，在境内的一些交通要道上，清朝政府还设有许多卡伦，以区分各部落的游牧区，稽查行人，防御盗贼。科布多地区，最西部的卡伦：现在苏联境内额尔齐斯河上游右岸有和尼迈拉虎卡伦；那雷姆河上游，有那林卡伦；在和尼迈拉虎卡伦以东，有库兰阿吉尔噶卡伦；在布克图尔玛河上游左岸，有昌吉斯台卡伦；在斋桑泊以东，即现在苏联的阿克求别地区，有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等等。这些卡伦均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

此外，清朝政府在这段边境的一些地区，还定期进行巡查。起初规定三年一次，一七七一年改为每年稽查一次^②。每次查边，均由杜尔伯特协理台吉一人率兵八十名、阿勒坦乌梁海章京一人率兵十名、喀尔喀扎萨克一人率兵二十名，于五月间在哈克诺尔会齐，在哈屯河、汗山^③

① 《清宣宗实录》，第115卷，道光七年三月戊子。清朝政府对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阿勒坦乌梁海进行有效的管辖，也为当时的一些俄国人所承认。帝俄五级文官、科学院院士米列尔，在一七六三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承认：“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广大地区，由清朝政府管辖，这里的居民把“特产优质貂皮”作为赋税，“交给”中国政府，并说，这一地区与库兹涅茨克和克雷完—沃斯克列谢斯克工场为邻（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763年附件，第391页）。米列尔所说的这个地区，正是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阿勒坦乌梁海诸佐领的辖地。

② 《清高宗实录》，第888卷，第32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3卷，《北徼山脉考》：“汗阿林在中国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干，随额尔齐斯河东岸以北者”，即阿尔泰山脉的西部诸山。汗阿林即汗山的意思。“阿林”为满语山的音译。

一带边境地区巡查^①。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清朝政府仍然要求科布多地方官员“晓谕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齐心御侮”^②,指令科布多参赞大臣派官兵到哈屯河一带进行巡查^③。

(二) 伊犁将军所辖边境地区

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以后,清朝政府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正式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一职,统辖从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南到帕米尔,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各级地方官员,分别管理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

在伊犁将军所属各地区中,位于边界的,主要是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

<1> 塔尔巴哈台地区:

明末清初,塔尔巴哈台地区是中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牧地,土尔扈特部西迁后,成为中国厄鲁特蒙古辉特部的游牧地^④。同时,在塔尔巴哈台西北沿边一带,还有中国哈萨克族乃曼部的游牧部落。这部分哈萨克族

① 《科布多政务总册》。

② 《清穆宗实录》,第66卷,同治二年五月己酉。

③ 同上书,第77卷,同治二年八月丁酉。

④ 魏源:《圣武记》,第4卷,《乾隆新疆后事记》。

在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以前，是准噶尔的属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乃曼部在其首领阿布尔芳斯的率领下，归属清朝。清朝政府给阿布尔芳斯及该部其他首领册封官爵，颁发印诰。一七八三年阿布尔芳斯死后，又册封其女婿和卓为汗。这部分哈萨克部落一直在清朝政府的管辖之下，并成为现在中国哈萨克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塔尔巴哈台地区和在这里的游牧部落的管辖，于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正式设立参赞大臣一员，领队大臣二员，管理这一地区的军民、边防事务。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驻地设在雅尔，即现在苏联境内的乌尔扎尔。据《西域图志》记载，雅尔在塔城以西二百里。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经清朝政府批准，由参赞大臣绰勒多“率绿营兵六百名，屯种雅尔地方，建城垣，并派京健两

① 据俄国人列夫申著《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一书的记载，乃曼部首领阿布尔芳斯“和俄国没有任何联系”。列夫申还指出，乃曼部“由于驻扎在原属准噶尔人的领土上，所以得到了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引者）的保护”。一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乃曼部的阿布尔芳斯仍然“臣服于中国”。一七八一年、一七八三年阿布赉、阿布尔芳斯相继逝世，沙俄乘机立阿布赉的儿子瓦里为左部的汗，但遭到阿布赉其他几个儿子的反对。据列夫申说，阿布赉死后，“除了瓦里以外（实际上他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给他的汗号——引者），阿布赉的其他儿子们和近亲们很少和俄国人来往。其中几个明确地自认是中国的臣民”。他们与阿布尔芳斯的后代联合，推举阿布尔芳斯的女婿和卓为汗，请求清朝政府批准。这就是中国文献中的杭霍卓。乾隆四十八年，清朝政府正式任命他为哈萨克汗。以他为首的哈萨克部落，是中国哈萨克族的一个重要部分。

营兵驻扎”^①。第二年，雅尔城竣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正式移驻雅尔，新城被命名为“肇丰”^②。后因雅尔冬季雪大，清朝政府又于楚呼楚地方另筑一城，就是现在的塔城。

塔尔巴哈台地区东北沿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与科布多相接，东南是乌鲁木齐、古城地区，南边是库尔喀喇乌苏，西南隔勒布什河与伊犁地区相接，西北与左部哈萨克交界，只有北头一角，隔额尔齐斯河与俄国铿格尔图喇相望。中国清代文献对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这段边界，有清楚的记载。

塔尔巴哈台这段边界的北部，有喀尔满岭，又称喀拉玛岭，即现在苏联境内的喀尔宾山，为额尔齐斯河支流布昆河（今苏联布康河）、楚克里克河（今苏联科克佩克特河）与察尔河（今苏联恰尔河）的分水岭。据《朔方备乘》记载：喀尔满岭是“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处诸山”之一^③。该书还说，额尔齐斯河西北流至铿格尔图喇，河北是科布多地区，河“以南亦属中国界”^④。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富德为首的大批清军就曾驻扎在喀尔满岭^⑤。

① 松筠：《新疆识略》，第2卷。

② 参加过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中俄边界谈判的俄方全权代表巴布科夫在他的《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也承认：“在现在的乌尔扎尔哥萨克村庄，出现了塔尔巴哈台城，后来被迁到往东一百二十俄里（1俄里合1.0668公里）的现在这个地方。”（该书，第149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3卷，《北徼山脉考》。

④ 同上。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篇，第45卷，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甲申。

由喀尔满岭再向西南，塔尔巴哈台的边界在爱古斯河，即现在苏联境内的阿亚古斯河。《西域水道记》记载：“爱古斯河东距塔尔巴哈台城四百余里，与哈萨克以此河为界”^①。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的使者达里库，就在当时的边界爱古斯河旁，接受了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要求归顺清朝政府的表文^②。清朝政府还在爱古斯地区（今苏联阿亚古斯地区）设立鄂博^③，禁止牧民越界游牧。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批驳了所谓清朝政府将爱古斯地方“赏给”左部哈萨克的谣传，再次重申，爱古斯河是中国的边界^④。

根据这些记载，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清代中国的边界走向是：从铿格尔图喇跨额尔齐斯河往西南，越过喀尔满岭，沿爱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

这条边界以东的大片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被沙皇俄国逐渐侵占。被侵占的领土，是中国塔尔巴哈台最膏腴的地区，那里河流纵横，湖山相映，宜耕宜牧。北部，有著名的斋桑泊，中国清代文献称烘和图淖尔。早在隋唐时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4卷。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篇，第41卷，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申。

③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15页。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篇，第9卷，乾隆二十六年元月丙辰。直至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经左部哈萨克的多次要求，清朝政府始允许在爱古斯河边界以内，于“秋冬雪落后，……暂令哈萨克等住牧，每牲百只抽一，交卡上官员收取，以充贡赋，春季仍行遣回”（《清高宗实录》，第780卷，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己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朝政府还一再声明：“哈萨克自臣服我朝以来，向只准在爱古斯河以外游牧，嗣蒙恩赏借卡伦外千余里之地，令其住牧，仍在我鄂博以内”（《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21页）。

期,中国历史著作中就有这个湖的记载,当时称它为“仆固振水”^①。在塔尔巴哈台西南境有阿拉克图古勒淖尔(今苏联阿拉湖和萨司克湖),是清代塔尔巴哈台境内的又一大湖。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每年派兵“巡淖尔一周”^②。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清朝政府规定,以后每年春秋对这个湖进行祭祀^③。

清朝政府在塔尔巴哈台境内设立有许多卡伦。早在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尚未设立之前,清朝政府就在布昆河一带“可入俄罗斯之要路,俱安设卡伦”^④。其中:辉迈拉虎卡伦,在额尔齐斯河左岸,与科布多所属和尼迈拉虎卡伦隔河相对^⑤;扎哈苏淖尔卡伦^⑥也在额尔齐斯河左岸;阿布达尔莫多卡伦在斋桑泊西北的阿布达尔莫多河南岸;在斋桑泊西南的布古什河(今苏联布噶孜河)和哈尔巴哈河(今苏联喀喇布噶河)河岸分别设有布古什卡伦和哈尔巴哈卡伦^⑦,等等。

每年秋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还要派领队一人带兵到边境地区进行巡查^⑧。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

① 《西域图志》,第25卷。巴布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供认:“应当指出,……在《北京条约》订立以前,斋桑湖始终在中国版图内。”(《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9页)

② 《西域水道记》,第5卷。

③ 《西域图志》,第25卷。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篇,第55卷,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壬辰。

⑤ 同上书,续篇,第13卷,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辛丑。

⑥ 同上。

⑦ 《新疆识略》,第11卷。

⑧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3卷,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辛丑。

参赞大臣阿桂率兵巡查边境，在勒布什等地发现越界游牧者，立即派副都统伊柱领兵驱逐出境^①。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参赞大臣爱隆阿巡查边境时，又在勒布什等地发现越界游牧者，也立即驱赶，令其出境^②。到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清朝政府仍派兵巡查边界，“直至勒布什地方”^③。

清朝政府每年还派遣官员到金集里克、雅尔等地向当地中国哈萨克族征收赋税，按百匹抽一的规定，每年约收赋马八、九百匹^④。这也充分显示了清朝政府对塔尔巴哈台西部地区的主权。

〈2〉伊犁地区：

伊犁地区是中国准噶尔部的游牧地，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政府在这里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地。又设参赞大臣、抚民同知、理事同知、领队大臣等各级地方行政军事官员，具体管理伊犁地区。

清代伊犁辖地十分辽阔，它的东北部与塔尔巴哈台相连，东面是库尔喀喇乌苏、喀喇沙尔，南部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相接，它的西北、西和西南，分别与左、右部哈萨克、浩罕等交界。

清代中国伊犁地区的边界，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8卷，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申。

② 同上书，第30卷，乾隆三十年四月丁未。

③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23页。

④ 《塔尔巴哈台事宜》，第2卷，《杂赋》；第3卷，《议叙》。

这段边界的西北在巴尔喀什湖的北岸。这个湖，清代文献写作巴勒喀什淖尔或巴勒喀什池。据《西域图志》记载：“巴勒喀什淖尔，周回八百余里，伊犁全河，经流千里，屈折至此，百川万派，于焉归宿，盖准噶尔西北境最大泽也。”^①又说，伊犁西路“北至巴勒喀什淖尔”^②。《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与上书相同，指出伊犁边境“北至巴勒喀什池，接左哈萨克界”。《清朝通志》和洪亮吉撰写的《乾隆府州厅县图志》对此也都有明确的记载。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中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率部返回祖国，他们所经过的路线，据《西域闻见录》记载，是沿额尔齐斯河“入中国，乃由巴尔喀什淖尔（即巴尔喀什湖——引者）而进”。

此外，沙皇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作、历史地图也都确认，巴尔喀什湖是清代伊犁地区的湖泊。例如，一九五八年苏联政府审定出版的苏联海军参谋部编制的《海洋图》中，有一幅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就十分明确地把当时中国的边界划在巴尔喀什湖北岸。一九五八年由苏联政府审定出版的《苏联历史地图集》，也明明白白地划着中国的边界直到十九世纪还在巴尔喀什湖。连沙俄时代的《大百科全书》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③。可见，中国的西北边界在巴尔喀什湖，中俄双方都是确认的。

巴尔喀什湖西南的吹河，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

① 《西域图志》，第 26 卷。

② 同上书，第 13 卷。

③ 《大百科全书》，第 76 卷，1903 年彼得堡出版，第 805 页。

吹河是“伊犁西北境之巨川也。”由吹河向西南，有塔拉斯河（现在苏联境内，仍沿用旧名）。塔拉斯河是当时中国伊犁境内的大河。《清朝通志》记载，塔拉斯河“西北流经塔拉斯地，汇为淖尔，是为伊犁之极西境”^①。塔拉斯河下游两岸，清代称塔拉斯地区。这个地区的西境“有阿尔沙郭勒、阿克库勒淖尔、必库勒淖尔”^②，都是伊犁西路境内的河、湖。必库勒池“又西行入哈萨克界”^③。至今，这些河、湖仍沿用着旧名。

从必库勒池往东南，中国伊犁地区的边界过哈喇布拉岭。《西域图志》记载，萨尔巴噶什“西北有哈喇布拉达巴”^④，又说，“由是西北入右部哈萨克界，南踰山入安集延诸部界。”《西域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的伊犁地图也明确标出，哈喇布拉岭西北是右部哈萨克。

根据以上清代历史文献的记载，当时伊犁地区边界的走向是，从巴尔喀什湖的北岸到塔拉斯河的西端，又东南沿塔拉斯西南的哈喇布拉岭，到纳林河。

在伊犁西路的许多地方，清朝政府都设有卡伦。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朝政府命令阿桂在伊犁西路各交通要道选择设置卡伦的地点。阿桂从爱古斯河南下，在爱古斯、招摩多、勒布什、阿勒坦额墨勒（在今苏联境内伊犁河中游的北岸，现仍沿用这个地名）一带，选择

① 《清朝通志》，第27卷，《地理略》。

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17卷，《伊犁》。

③ 《西域图志》，第13卷；第21卷。

④ 蒙语、维吾尔语称岭为“达巴”或“达坂”。

了安设卡伦的地点^①。以后又在伊犁河以北设立数十座卡伦，其中在图尔根河(今苏联境内的博罗呼济尔河)河源地区设有博罗呼济尔卡伦；在图尔根河中游(今苏联境内的奎屯地区)设有奎屯卡伦；在奎屯以南(今苏联境内阔克塔勒附近)设有惠番卡伦；在奎屯卡伦以西(今苏联境内昆乃伦列地区)设有匡果罗鄂伦卡伦；等等^②。在伊犁河南，沿察林河，设有十二座卡伦。在察林城东设有特勒克卡伦；再往南，在特穆尔里克河(今苏联仍沿用此名)与察林河汇合处，设有渡口卡伦；再往东南，设有格根卡伦(今苏联格根城附近)；等等^③。伊犁西路南部，有善塔斯卡伦(今苏联伊塞克湖以东的善塔斯地方)^④。这些卡伦设在伊犁西路一些重要道路上，稽查行人，防卫地方，是清朝政府管理伊犁西路地区的重要措施，是清朝政府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清朝政府还在伊犁西路许多地方设立石碣，祭祀山川，从事工农业生产。例如，清朝政府在勒布什(今苏联克科列支特附近)、塔拉斯(今苏联江布尔)等地立有石碣^⑤。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清朝政府还规定，每年春秋两次祭祀阿勒坦额默尔岭^⑥。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在新疆各地大兴屯田，伊犁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7卷，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午寅。

② 以上卡伦均见《西域水道记》，第4卷；《西域图志》，第13卷。

③ 以上卡伦均见《西域水道记》，第4卷。

④ 同上书，第5卷。

⑤ 《清穆宗实录》，第41卷；《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

⑥ 《西域图志》，第22卷。

西路的吹河上游,就是当时屯田的一个重要地区^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在达布逊淖尔(今苏联喀拉套山西南的土孜库勒湖)以西格根河北岸,建起了一座炼铅厂,每年产铅六、七千斤至万斤不等。一七九五年以后,因产量渐少,才迁至他处^②。

伊犁西路地广人稀,界内外游牧部落复杂,迁徙不定,所以清朝政府对伊犁西路边境地区的巡查十分重视。据清代历史文献记载,早在伊犁将军设立之前,对伊犁西路的巡查就已经开始。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境外的一些游牧部落要求进入中国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游牧,清朝政府立即严词拒绝。同年,清朝政府命令参赞大臣阿桂等率兵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巡查边境,驱赶越界游牧的部落^③。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乾隆又指示军机大臣:“传谕明瑞等酌派人员,率同熟悉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塔拉斯、阿勒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又命令对“特穆尔图淖尔亦应一体巡查”^④。此后,就正式规定每年八、九月间由领队大臣一员,领兵五百名,巡查边境地区。巡查路线虽有过变动,但大体上分为两路。一路从惠远城出发,沿伊犁河北岸向西北,过哈喇塔拉(今苏联塔尔迪·库尔干以南)到达勒布什地

① 和瑛:《三州辑略》,第8卷。

② 《西域水道记》,第4卷。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7卷,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申。

④ 同上书,第22卷,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癸未。

区，与塔尔巴哈台巡边官兵会哨，即交换情况，互取凭据^①；另一路从惠远城出发后，向西南跨伊犁河，沿伊犁河南过古尔班阿里玛图（今苏联阿拉木图），到沙喇伯勒（今苏联楚伊犁山一带）、吹、塔拉斯，再向东南到纳林河与喀什噶尔巡边部队会哨。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副都统伊勒图向清朝政府建议，把向南面巡查的这一路再分为南北两路，“南路自特穆尔图淖尔之南，由巴尔琿岭至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至沙喇伯勒地方”^②。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西南一路伊犁巡边官兵的巡边路线，改为沿伊犁河南，经古尔班阿里玛图、沙喇伯勒、吹、塔拉斯至纳林桥，与喀什噶尔的部分官兵换防，然后经特穆尔图淖尔南岸返回。这样“周历查勘”^③。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以后，清朝政府把伊犁和喀什噶尔换防兵所经路线改为越善塔斯山，经特穆尔图淖尔以南的巴尔琿岭，过纳林桥到喀什噶尔，巡边路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索伦营领队福勒洪阿巡边时到达特穆尔图淖尔，看到湖北岸有许多中国古代石翁仲残象，见景生情，乃吟诗一首：“久戍边城客似家，而今雁爪更天涯，殷勤说与残翁仲，不是前朝旧鼓笳”^④。

在巡查边界时，查边官员还要向边境地区中国哈萨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 23 页。

② 《清高宗实录》，第 696 卷，第 4—5 页。

③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第 19 页。

④ 《西域水道记》，第 5 卷。

克、柯尔克孜游牧部落收取赋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①。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沙俄侵略势力已逐渐南侵，清朝政府还命令伊犁将军向境内的部落宣布，他们“在特穆尔图淖尔海迤西及吹、塔拉斯等处游牧，皆系天朝戡定地界，每年应交纳租马数十匹，仍当照常输纳”^②。

〈3〉喀什噶尔地区：

清代喀什噶尔地区北边与伊犁相接，西部与浩罕、拔达克山等为邻，清朝政府在这里设有参赞大臣总理南疆各地事务，还设有协办大臣等文武地方官员和各级伯克，具体管理喀什噶尔地区。

清代居住在喀什噶尔边境地区的，主要是中国柯尔克孜族的游牧部落。对柯尔克孜族游牧部落的管辖，就体现着清朝政府对边境地区的主权。

柯尔克孜族在清代被称为布鲁特，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③。他们最初游牧于叶尼塞河中上游，九到十世

① 《西域闻见录》，第1卷，第10页。

② 《清宣宗实录》，第244卷，第18—19页。

③ 汉代称柯尔克孜族为“鬲昆”或“坚昆”，唐代称为黠戛斯，元代称作吉利吉斯或乞儿吉斯，清代始称布鲁特。

柯尔克孜族很早以来就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六四三年（唐贞观十七年），黠戛斯向唐朝政府派遣使者，贡貂裘及貂皮。六四七年，黠戛斯首领失钵屈阿栈亲赴长安，觐见唐太宗。唐朝政府应他的请求，设立了坚昆都督府，封失钵屈阿栈为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府都督，属燕然都护府管辖。在整个唐代，黠戛斯始终与唐朝政府保持着隶属关系。宋、辽时期，辽朝政府在黠戛斯地区设黠戛斯大王府，委派黠戛斯头领和契丹人担任“大王”、“于越”等官。明代，柯尔克孜族成为当时中国割据政权别失把里的一个部分。十七世纪，柯尔克孜成为准噶尔的属部。清代所说的布鲁特，也包括了一部分中国塔吉克族。

纪，其中一部分逐渐向西迁徙，游牧于天山中部广大地区。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将游牧于叶尼塞河一带的柯尔克孜人搬迁到天山中部，使两部分柯尔克孜人汇合在一起^①。

十八世纪中叶，在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叛乱的斗争中，柯尔克孜族各部积极主动支持清军，并于一七五八——一七五九年先后归属清朝政府^②，在平叛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柯尔克孜族的部落主要游牧于阿特巴什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以后各部落要求清朝政府准许他们越过阿特巴什河向东游牧^③。一七五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337页。列夫申著《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一书的第二部分第一章和瓦里汗诺夫著《准噶尔概况》中，均有考证和论述。

② 清代布鲁特以游牧为主。“爱曼”是社会基层组织，若干爱曼为一“鄂拓克”，其首领称“比”。每位比有管一、二十或二、三十爱曼的。就整个布鲁特族来说，十八世纪中叶时，在政治上并不统一。《西域闻见录》说，布鲁特各部“虽皆为布鲁特，而其比不一，各君其地，各子其民，力敌势均，不相统辖”。但大体上亦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一七五八年东布鲁特各部归属清朝政府。一七五九年，布鲁特额德格纳部首领阿济代表西布鲁特向清朝政府表示：“自布哈尔以东，我等二十一万人，皆为臣仆。”（《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78卷，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庚申。）

③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萨尔巴噶什部首领车里克齐向到达图古斯塔老等地招抚柯尔克孜部落的侍卫乌尔登请求，准许他们到伊塞克湖一带游牧。乌尔登当即指出：就是柯尔克孜各部“现在耕种之纳里特（即纳林河一带——引者），珠木罕、塔拉斯等处，从前尚为厄鲁特所据，今大兵平定准噶尔，格根、喀尔奇喇、特穆尔图淖尔等处，仍须安设卡伦……。若尔等游牧狭隘，惟抒诚恳请，恭候皇帝天恩指定，不可私行迁徙”。（《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8卷，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辰。）

八年，经清朝政府批准，柯尔克孜族各部落遂越过阿特巴什河，进入伊塞克湖一带^①。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柯尔克孜族的游牧部落就遍布于“塔拉斯河与楚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科契科尔和珠穆翰，阿特巴什山和纳林河，克特缅丘别、图古斯塔老和其他天山地区”^②。

当时柯尔克孜各部落在政治上不统一，流动性很大。根据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当时属于中国柯尔克孜部落有十八个。其中萨尔巴噶什或布库部、萨亚克部、希布察克部、奇里克部、蒙科尔多部、额德格纳部、冲巴噶什部、萨尔特部的游牧地，都在喀什噶尔西部和北部边境，归清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清朝文献对中国柯尔克孜族部落在喀什噶尔境内的牧地及喀什噶尔地区与浩罕、拔达克山等地的边界，都有明确的记载。

这段边界的北部，从纳林河的下流起。在纳林河的南岸，主要是中国柯尔克孜萨亚克部和萨尔巴噶什部^③游牧的地区。这两个部落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最早归清朝政府管辖。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朝政

① 一七五八年柯尔克孜部落入觐首领又提出到伊塞克湖一带游牧的请求。乾隆当时即指出：“……尔等既为臣仆，此处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并指示兆惠等具体办理。此后柯尔克孜部落遂大批向东迁徙（《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62卷，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②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9页。

③ 萨尔巴噶什部以后分为萨尔巴噶什和布库两部，清代文献仍习惯把这两部都叫萨尔巴噶什部或布库部。

府派侍卫乌尔登等到达纳林河下游南岸的图古斯塔老，代表清朝政府视察、招抚萨亚克和萨尔巴噶什部落^①。当年，萨尔巴噶什首领车里克齐即“赴京入觐”，乾隆帝接见了，并命他“扈木兰行围，赐宴万树园”，授三品顶花翎。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车里克齐死，其长子承袭品位，又授其次子萨哩木伯特五品顶花翎，皆“世袭罔替”。同年，蒙科多尔部首领玉托伊玛斯在萨亚克部牧地图古斯塔老以东的纳林河上，修建浮桥。此后，每年由伊犁到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和巡查布鲁特游牧的巡边部队，即由塔拉斯东南行经纳林河桥，在萨亚克、萨尔巴噶什等部游牧地区进行巡查，该部落首领派人协同巡边。一八二四年，大和卓布拉尼敦的孙子张格尔窜扰喀什噶尔地区，并在纳林河流域建立据点。清军在柯尔克孜牧民协助下到达纳林河流域，清剿张格尔。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巡边部队和伊犁换防官兵经过纳林桥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又曾派遣萨亚克部首领伊里斯满底修复已经损坏的纳林桥。清军到达纳林地区时，萨亚克部的另一首领汰劣克遣人在纳林桥迎送，并向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遞稟请安”。布库部、萨尔巴噶什部的首领也都来协同查边，还预备了二百人马，听候调遣^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浩罕不断蚕食我国柯尔克孜的游牧区，萨亚克、萨尔巴噶什等部落的首领在纳林桥一带聚会，共同约定，协同清朝政府抵御浩罕侵略。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6卷，乾隆二十三年五月甲寅。

②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第42页。

由萨亚克部落的牧地往南，中国与浩罕以噶布兰、苏提布拉克二岭为界。据《西域水道记》记载：“回部(指南疆地区——引者)分界处有二岭，曰噶布兰、曰苏提布拉克，……岭东为回部，岭西为霍罕(即浩罕——引者)”。噶布兰、苏提布拉克在今苏联的古里察^①与奥希之间。

在这个交界点以东，是中国柯尔克孜族冲巴噶什和额德格纳两个部落的游牧区。冲巴噶什的首领阿瓦勒，曾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到北京入觐，被授予五品顶戴。清朝政府还在其游牧地区设立马场，由冲巴噶什部首领经管。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阿瓦勒因管理马场等事有功，授三品顶戴。阿瓦勒死，其子博什辉承袭品位。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博什辉被清朝政府升授二品顶戴^②。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朝政府授予冲巴噶什部落首领二品至七品官爵的达二十余人^③。其中许多人领取清朝政府发给的俸禄，他们和国内其他地方官吏同样受清朝政府的考核和奖惩。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冲巴噶什部的一个首领乌默尔率众抢掠安集延商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接到该商人的控告后，就将乌默尔传调至喀什噶尔审讯，并报请清朝政府法办乌默尔。乾隆帝指示：“必宜赏罚严明，……着将乌默尔比……送京”^④。以后，清朝政府还特别向喀什噶尔参赞

① 古里察在奥希东南五十多公里处，又作古勒沙。

② 松筠：《新疆识略》，第12卷，《布鲁特头人表》。

③ 同上。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9卷，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乙卯。

大臣指示：“嗣后当钦遵圣谕，有似阿瓦勒比之守分效力者，加以奖励，有似乌默尔比之盗窃为匪者，加以惩创，庶赏罚严明”^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浩罕不断侵袭喀什噶尔边境地区。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浩罕首领寄信冲巴噶什部首领托依莫特等，煽动他们扰乱边境地区，托依莫特立即将浩罕书信呈交清朝政府，并协助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探听浩罕动静，抵御浩罕入侵^②。

在这段边境地区游牧的，还有中国柯尔克孜族额德格纳部。这个部落的游牧地区，较冲巴噶什部的牧地广大，除在喀什噶尔西北山地与冲巴噶什部交错游牧外，还向南延伸，直至阿赖岭^③。中国喀什噶尔与浩罕交界的噶布兰岭、苏提布拉克及其东西的古里察和奥希，都是额德格纳部的游牧地。额德格纳部是清朝政府管辖的一个柯尔克孜部落。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额德格纳部首领阿济代表“西布鲁特”各部向清朝政府正式申请，表明归清朝政府管辖（见本章第七十九页注^②）。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额德格纳部属地奥希（即鄂什、鄂斯）为浩罕侵占。阿济亲自到喀什噶尔报告。乾隆帝立即指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派员向浩罕交涉，要回了奥希^④。十九世纪初，浩罕又侵占了奥希，并控制了额德格纳部的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1卷，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乙未。

②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第15—16页。

③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第36页。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7卷，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乙亥；第21卷，乾隆二十八年壬申。

一部分。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因不堪浩罕的掠夺和压迫，额德格纳部十位首领率两万余人摆脱浩罕的控制，返回祖国。清朝政府即安置他们居住在喀什噶尔所属特依列克达坂（又名铁列克达坂、铁列克达湾，今苏联帖列克岭）一带游牧^①。清朝政府曾多次征调这个部落的人员维持地方秩序，其首领多人被清朝政府授予四品至六品顶戴和金顶^②。

再往南，清代中国的西北边界在葱岭地区。葱岭（今称帕米尔），是清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地区。据《西域图志》记载：“葱岭一名极疑山，在天山西南，与南山（指昆仑山——引者）会合处。连岗叠嶂，数百余里，起伏迤邐，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③。葱岭以西，与清朝喀什噶尔交界的主要是拔达克山。

在葱岭，清代中国的边界有下面几个明显的标志：

阿赖谷地 阿赖谷地在葱岭的北端，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喀什噶尔的孜牙墩叛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即调派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部队“在阿贵地方截堵”孜牙墩。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素普也派出精壮维吾尔族部队一百名，“由乌帕拉特卡伦抄道赴阿赖地方”。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张格尔匪帮曾以阿赖地区为据点进行窜扰，清军进入阿赖地区，“把战士一小群一小群地分派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54页。

② 《新疆识略》，第12卷，《布鲁特头人表》。

③ 《西域图志》，第23卷。

到各个地区搜寻张格尔”^①。据清代文献记载，一八二七年秋，长龄、武隆阿致书正在阿赖地区的杨芳说：“驻兵阿赖，距浩罕较近，应须加意抚绥”^②。在这次平叛中，柯尔克孜族首领率领部民积极配合清军，他们或协同作战，或充当向导，探报敌情，在“军营出力，经各大员奖赏翎顶者”，就有十六人之多^③。这些记载说明中国喀什噶尔管辖的范围达到阿赖谷地。

和什库珠克岭 据《西域图志》记载，和什库珠克岭在喀什噶尔城西五百里，为喀什噶尔属山。岭东有大池，称哈喇库勒（今苏联喀拉湖）^④。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叛乱，曾据守该岭。清军越哈喇库勒在和什库珠克岭击败叛军。大小和卓退据阿喇楚勒（今苏联北阿尔楚尔），又被清军击败，清军于阿喇楚勒设营。

伊西洱库尔淖尔（又称叶什勒库勒淖尔） 据《西域图志》记载，伊西洱库尔淖尔“在布隆库勒（今苏联萨色克库勒湖）西四十里，水势深广，万山环绕，北通安集延，西限葱岭，南抵拔达克山”，是喀什噶尔地区的湖泊。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由这里逃入拔达克山境，清军即驻守伊西洱库尔淖尔西岸，致书拔达克山首领，索要逃犯。拔达克山首领将他们擒杀，献尸清军。后来清朝政府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以北十里的苏满塔什地

①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1963年伏龙芝出版，第286页。

②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第48卷。

③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第80卷。

④ 即喀喇湖，“哈喇”是“黑”的意思。“库勒”是维吾尔语“湖”的意思。

方，修筑纪功碑一座。碑上刻有乾隆亲自撰写的碑文，其中说：“伊西洱库尔淖尔者，我副将军富德等穷追二酋（即大小和卓——引者），至拔达克山之界”^①。嘉庆时编纂的《会典》也明确指出：“伊西洱库尔诺尔，在喀什噶尔西，上有高宗纯皇帝圣制碑，为伊犁^②极西境”。

从伊西洱库尔淖尔西南行，清代边界与拔达克山的什克南为邻。由此转东，到达喷赤河的上游，就是清代西北边界的南端。

喀什噶尔的这一段边境，是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部落的游牧地。清代文献记载，希布察克的游牧地“通拔达克山、布哈尔等地方”^③。《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一书也说：希布察克的游牧区，“分布在从奥希起，沿帕米尔高原到巴达克山，并由此沿喀拉昆仑山一带”^④。也就是说，和什库珠克、阿喇楚勒、伊西洱库尔淖尔等葱岭西部地区，是中国希布察克的游牧地。

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政府授予希布察克首领阿奇木为散秩大臣。大小和卓被清军击败，逃入葱岭后，希布察克部积极参加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一七六〇年初，兆惠向乾隆帝报告说：“蓝翎侍卫启泰招降希布察克布鲁特，在阿勒楚尔、伊西洱库尔淖尔击贼，直至拔达克山，俱奋勉效力”^⑤。一七六五

① 《西域图志》，第 28 卷。

② 因为当时天山南北均属伊犁将军统辖，所以又称新疆为伊犁。

③ 松筠：《新疆识略》，第 12 卷，《布鲁特头人表》。

④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第 36 页。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篇，第 83 卷，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

年、一七八四年（乾隆三十年、四十九年），清朝政府又授予希布察克首领拜尼杂六品顶蓝翎。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朝政府先后给这个部落的二十多个首领以官爵顶戴，其中有的还领受清朝政府的俸禄。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的上谕说：“富森布等奏称，希布察克部落布鲁特阿森、冲巴噶什部落布鲁特阿瓦勒比，奋勉当差，并无养贍之项，恳恩赏给等语。阿森、阿瓦勒比前俱在军营出力奋勉，既无养贍之项，着加恩于喀什噶尔库贮赏余一百腾格普尔内，每年各偿给五十”^①。到一八一五年，清朝政府仍对希布察克部进行着有效的管辖。

自纳林河下游南岸到葱岭的这段中国喀什噶尔边界，不仅有清代文献的明确记载，而且也为苏联一些历史著作所承认。《吉尔吉斯史》一书称：一七五九年，东天山的柯尔克孜族部落：萨亚克部、萨尔巴噶什部，接受了清朝政府的管辖，接着，东吉尔吉斯的其他部落、南吉尔吉斯各部落也都“臣服”了清朝^②。他还承认，一些柯尔克孜族部落，如奇里克、冲巴噶什、布库等，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吉尔吉斯”被俄国吞并以前，仍然是中国的游牧部落^③。另一本苏联著作《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中也说：“清朝当局为管理吉尔吉斯人建立了某些卫所”，“卫所的划分不尽与吉尔吉斯人的氏族单位相符，卫所主要

① 《清高宗实录》，第 923 卷，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丁亥，第 39—40 页。

② 《吉尔吉斯史》，第 1 卷，第 273—277 页。

③ 同上书，第 274 页。

是按地方……命名的”^①。这些著作虽然都在极力歪曲柯尔克孜族各部落与中国清朝政府的关系,但是,这些柯尔克孜族部落是中国清朝的游牧部落,清朝政府对他们及其游牧地行使着有效的管辖,这个基本事实,他们还是掩盖不了的。

综合所述,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西北边界是明确的。直到沙俄侵占这些中国领土之前,清朝政府对这些地区仍然行使着有效的管辖。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①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第 31 页。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沙俄对中国 西北边疆的侵略

沙皇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末，它东越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十七世纪初，侵吞了西伯利亚西部，才靠近了中国的西北边疆。

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七世纪初起，至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沙皇俄国不断使用收买封建上层的手段，妄图诱迫游牧在西北边疆的中国蒙古等族臣属于俄国；同时武装侵占了我国准噶尔部和喀尔喀札萨克图汗所辖的大片游牧地区。

第二阶段，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至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夕。在这段时间里，沙俄一方面向中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派遣间谍，掠夺资源，并多次企图深入这一地区，建造堡垒，兼并领土；另一方面，它在逐渐吞并哈萨克草原的同时，开始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当时，中国清朝政府对上述沙俄的侵略活动进行了反击，维护了主权。

第一节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开始

一、沙俄追求世界霸权的扩张政策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俄罗斯形成了统一国家。这个国家是以原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史书上第一次提到莫斯科这个地名，是在一一四七年。当时，莫斯科仅是诸罗斯公国中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王公统治下的一个居民点。十三世纪初，诸罗斯公国被蒙古人征服，成为蒙古人所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十三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幼子丹尼尔当了莫斯科王公，至此才出现了莫斯科公国。以后，莫斯科公国历代王公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依仗金帐汗国的力量，逐渐强大，先后吞并了附近其它公国。十五世纪四十年代，金帐汗国衰落，莫斯科公国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到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一五〇五——一五三三）时，俄罗斯所有的土地都并入莫斯科公国，从此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领土面积共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①，其疆界“北达白海，南至奥喀河，西及德涅伯尔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②。一五四七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一五三三——一五八四）在加冕典礼上正式自称“沙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史》，第2卷，1966年莫斯科出版，第142页。

②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1卷，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152页。

皇”^①。从此，“沙皇”就成为俄罗斯君主的专称。

农奴制是沙皇俄国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三页）俄国农奴主阶级具有极端残暴、贪婪和疯狂掠夺的本性，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农奴主贵族，特别是军事贵族、大商人、教会是主要的统治力量。沙皇用分封土地、赏赐农奴和授予各种封建特权换取他们的支持。沙皇和大大小小的农奴主都力求向外发动侵略战争，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农奴和其他财富。所以，早在沙皇俄国形成时，它就开始积极地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

到十七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出现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俄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这又成为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新动力。当时，俄国农奴主大多经营商业，有的逐渐成为具有很大势力的商业资本家，或农奴主兼大商人。为了打通商道，发展海盗式的贸易，掠夺他国的财富，向外寻找殖民地，他们积极地支持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早在十六世纪末，沙俄侵吞西伯利亚，就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特征，其野蛮、贪婪和残暴，与这时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掠夺暴行并没有什么区别^②。

① “沙皇”（царь）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凯撒”，凯撒原是罗马皇帝的名字。

② 苏联早期学者梁士琴科曾经写道：“露骨地掠夺，用酒灌醉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征毛皮税，以假珠宝和廉价物交换贵重皮货，这些便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莫斯科上层贵族和商业资本‘田园诗式’的积累资本的方式”。（《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1948年莫斯科出版，第12页）

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实行扶植工商业的政策,俄国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由商业资本和对外掠夺殖民地而积聚起来的财富,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了一批具有很大势力的工商业主。他们迫切要求对外寻找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积极支持沙皇政府对外扩张。

一六八九年彼得一世掌权后,沙皇俄国开始将追求世界霸权作为基本国策。彼得一世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三七页)他制定了争夺世界霸权的狂妄计划。

征服欧洲是彼得一世实现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为此,他首先企图打通向西欧的主要海道,即夺取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水域控制权。他竭力发展海军,谋求海上霸权,叫嚷:“水域——这就是俄国所需要的。”一六九五年、一六九六年和一七〇九年,沙俄为了打通南方的出海口,进入黑海,向土耳其发动了三次远征,但都没有得逞。于是,彼得一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西北方面的波罗的海。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打败了瑞典,把俄国的领土扩张到波罗的海沿岸,打通了从北面向西欧扩张的门户。

侵吞位于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波兰,以控制东欧,进攻西欧,是沙俄称霸世界狂妄计划的组成部分。彼得一世利用与瑞典的战争,不断入侵波兰的领土,干涉波兰的内政,把波兰牢牢地拴在自己的战车上。

在亚洲方面,彼得一世的狂妄计划是,要南下征服高

加索，占领中亚细亚，夺取西亚和印度，通向印度洋；东侵中国、朝鲜和日本，打通由日本海向太平洋的通路。

彼得一世不断向南对波斯发动侵略战争，夺取了包括德尔本特和巴库在内的黑海西岸，包括阿斯拉巴得在内的黑海南岸的土地^①。他还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亚哈萨克草原和中国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区。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彼得一世的继承者们按照彼得制定的狂妄计划，更加疯狂地向四周扩张，夺取欧洲霸权。叶卡特林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上台后，沙俄勾结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兼并了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地；又两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夺取了通向黑海的特权。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八〇一——一八二五）、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又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从土耳其手中割取了摩尔达维亚的比萨拉比亚和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后改名罗马尼亚王国）变成它的“保护国”，企图控制整个巴尔干半岛。

在亚洲方面，沙俄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二八年，先后吞并了南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王国、阿塞拜疆诸汗国和亚美尼亚的两个汗国。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沙俄又向中亚哈萨克草原扩张。

十九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追求世界霸权、镇压各国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一八一二年，沙俄纠集了欧洲各国封建君主打败了法国皇帝拿破仑，成了欧洲霸

^① 彼得死后，黑海南岸的土地又被波斯夺回。

主。一八一五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伙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组织了反动的“神圣同盟”。沙皇俄国先后镇压了西班牙、意大利（波蒙特和那不勒斯）的革命（一八二三年）和波兰起义（一八三一年），成为绞杀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血腥刽子手，扮演了“欧洲宪兵”的反动角色。

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沙俄追求世界霸权时指出：沙皇俄国“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四页）“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二六页）

十九世纪中叶前，沙皇俄国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向外侵略扩张，疯狂追求世界霸权的军事封建帝国。

根据马克思的估计，沙俄从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五三年这六十年内，通过侵略扩张所攫取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一三一页）

二、沙俄向西伯利亚扩张， 觊觎中国西北边疆

十六世纪后半叶，沙俄东越乌拉尔山，向亚洲的西伯

利亚扩张,以后才逐渐接近中国边疆。

西伯利亚土地宽广,资源丰富,盛产各种珍贵的皮毛,侵略成性的沙俄对它垂涎已久。处于氏族部落和宗法封建社会阶段的西伯利亚各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比较薄弱。一五五八年,沙俄大商人兼农奴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得到沙皇的允许,在乌拉尔山以西的卡马河等处,修建城堡,役使农奴和当地土著居民,经营制盐业和采矿业,掠夺了巨额的财富。一五七四年,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又从沙皇那里取得了向西伯利亚扩张的“特许状”。他大肆招募哥萨克^①、流亡犯,积极向东扩张。如收罗在伏尔加河一带杀人劫货的哥萨克逃犯叶尔马克,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一五八一年,叶尔马克受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派遣,带领了一支八百多人的哥萨克匪帮,越过乌拉尔山,沿土腊河而下,侵入额尔齐斯河流域。一五八二年十月,这伙武装强盗占领了原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西比尔汗国的首府——伊斯克尔城。他们到处烧杀抢掠,并将劫来的部分赃物(二千四百张黑貂皮、二十张黑狐皮和五十张海獭皮)奉献给沙皇。伊凡四世不仅宣布赦免了这个匪徒,而且“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了一件贵重皮衣,连同两副装饰富丽的盔甲、一个高脚杯及一大笔钱送给叶尔马克”^②,以示“奖励”。于是叶尔马克一变而为俄国农奴主

^① 哥萨克是流亡在顿河下游和伏尔加河一带流浪者的自称。这个名字原是鞑靼语,意思是指脱离本民族的自由民。

^② 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1933年纽约出版,第42—43页。

阶级心目中“具有伟大帝国创造气概的英雄”。

沙俄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在库程汗的领导下，同沙俄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五八四年八月，这伙侵略强盗终于被当地人民击溃，叶尔马克在溃逃中淹死在额尔齐斯河。

不久，沙俄又派遣了大批军队强占西比尔汗国的土地，野蛮地掠夺和屠杀当地土著居民。沙俄侵略军先后在这个汗国的领土上构筑了秋明（一五八六年）、托博尔斯克（一五八七年）、别廖佐夫（一五九三年）、苏尔古特（一五九四年）和塔拉（一五九四年）等侵略据点。一五九八年，库程汗被迫退入南方草原，不久死去。但是，西比尔汗国的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没有停止^①。

十七世纪初，沙俄侵吞了西比尔汗国。沙俄侵略者在吞并了西比尔汗国后，就不断派遣打着“使节”招牌的间谍特务，到中国西北的蒙古族各部进行阴谋活动，妄图侵吞中国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

一六〇七年一月，沙俄塔拉统领加加林奉莫斯科的命令，派遣“使节”到中国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企图诱迫他们转入“俄国籍”。第二年，沙皇政府得到加加林有关厄鲁特蒙古情况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加加林派出新的“使节”引诱厄鲁特蒙古首领亲自到莫斯科去。命令里还

^① 据米勒尔《西伯利亚史》记载，十七世纪中叶，原西比尔汗国人民继续坚持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他们曾一度进攻俄国据点塔拉、秋明等地，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194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29—30、92—115页）

说：“如果他们不相信，不肯来谒见皇上陛下，你们可给他们一些人作抵押，使他们确信皇上邀请他们”^①。接着在一六〇九年三月，加加林派出了以戈鲁平为首的新的“使团”，要求厄鲁特蒙古诸首领“宣誓效忠于沙皇”，并签订臣属于俄国的条约，遭到厄鲁特首领会议的严正拒绝^②。

一六一六年，沙俄统治西伯利亚的中心——托博尔斯克的统领库拉金派出了以彼得罗夫和库尼增为首的“使团”，再次到厄鲁特诸部，“敦促他们归顺”，结果仍然遭到了拒绝。彼得罗夫等人在窃取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后返回^③。

此后，在一六一七年、一六二三年、一六二四年，沙俄的“使节”不断出现在中国厄鲁特蒙古各部，进行阴谋活动，煽动厄鲁特臣属于沙俄。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逐渐强大，沙俄派往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一六三五——一六五三）处的“使节”更为频繁，约达十数次之多。这些“使节”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企图诱迫准噶尔部臣属沙俄。这在苏联一些历史著作中也是供认不讳的^④。但是，这些阴谋活动均未得逞。

① 夏塔乌里纳等：《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25—27页。

② 同上书，第38—39页。

③ 同上书，第51—52页；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7—40页。

④ 如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一书就承认：“俄国当局极力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把厄鲁特王公和执政者变为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为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见该书第168页）

与此同时，沙俄侵略者还觊觎中国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所辖的地区。十七世纪初，在扎萨克图汗领地的北部，即今乌布萨泊与库苏泊之间的广大地区，当时是由硕垒乌巴什洪台吉直接管辖的^①。硕垒乌巴什统治的地区不仅包括以后称为“唐努乌梁海”的整个地区，而且所有叶尼塞河上游和鄂毕河上游吉利吉斯（清代称“布鲁特”，即今柯尔克孜族）及其它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归他管辖^②。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③。十七世纪初，沙俄扩张势力达到叶尼塞河中下游后，就继续溯河而上，侵入了硕垒乌巴什所辖的叶尼塞河上游和鄂毕河上游地区。它采用构筑据点、武装移民的一贯手段，先后在上述吉利吉斯人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托木斯克（一六〇四年）、库兹涅茨克（一六一八年）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一六二八年）

① 沙俄称硕垒乌巴什洪台吉为“阿勒坦汗”（意为“黄金汗”），其他他并没有汗号，只称洪台吉，而且是扎萨克图汗的部属。据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0的记载，硕垒乌巴什系扎萨克图汗中左翼左旗（即和托辉特部）；按世系，他是扎萨克图汗素巴第的叔父。

② 据阿德里安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概况》（1904年托木斯克出版，第7页）等书的记载，叶尼塞河、鄂毕河中上游一带的吉利吉斯人，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是臣属于蒙古人的。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前，蒙古扎萨克图汗属部硕垒乌巴什统治着这里大部分吉利吉斯人。以后，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逐渐强大，这一带的吉利吉斯人又向他缴纳实物税。

③ 第一章第二节已叙述了吉利吉斯（黠戛斯）聚居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自七世纪以来隶属于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历史事实。关于唐努乌梁海，在七世纪中叶，唐王朝所设的瀚海都督府（属燕然都护府）也管辖居住在这里的都播部落。（见《新唐书》第317卷上，《唐会要》第73卷等）都播即今唐努乌梁海人，至今他们还自称“图瓦”，都播即图瓦的音转。十世纪时，唐努乌梁海隶属于辽朝。在元代，它归岭北行省管辖。明初，唐努乌梁海为瓦剌割据势力所控制。明末，这里又隶属于中国蒙古扎萨克图汗部。

等侵略据点。吉利吉斯人民奋起反抗，多次围攻沙俄的侵略据点。如一六二八年吉利吉斯人曾经联合当地其他民族向在构筑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据点的沙俄侵略者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打败了出动的侵略军^①。吉利吉斯人民英勇地抗击沙俄侵略者，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阻遏了沙俄侵略势力的南下。在整个十七世纪，沙俄始终未能侵占叶尼塞河上游和鄂毕河上游地区。只是有少量的哥萨克侵略军在十七世纪中叶深入到叶尼塞河上游阿穆哈拜商(即今苏联阿巴钦、米努辛斯克地区)一带，建立了一些象“荒岛”一样的居民点或哨所^②。

沙皇俄国在武装蚕食中国扎萨克图汗所辖领土的同时，还企图通过派遣“使节”，诱迫硕垒乌巴什投靠沙俄。

早在一六〇八年，沙俄托木斯克统领就曾派遣以贝洛戈洛夫为首的“使团”到硕垒乌巴什处，并计划由此前往北京。但是这次侵略活动没有成功。这个“使团”在途中听到硕垒乌巴什同准噶尔部发生武装冲突后，随即返回^③。

一六一六年，沙皇政府直接派出了以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为首的“使团”，从托木斯克乘船沿鄂毕河而上，进入吉利吉斯人聚居的地区。他们大搞颠覆分裂活动，极力煽动吉利吉斯人投靠沙俄。在乌布萨泊附近，丘麦涅茨见到硕垒乌巴什，要求他臣属于沙皇^④。这伙沙俄侵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93—94页。

② 《米努辛斯克边区概况》，第8—9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126页。

④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53页。

略分子竟然把硕垒乌巴什举行的一次喇嘛教宗教仪式，当做他加入“俄国籍”的宣誓典礼^①。沙皇政府得到报告后喜出望外，重赏了丘麦涅茨。事实表明，所谓硕垒乌巴什宣誓加入“俄国籍”，不过是沙俄侵略者的狂想而已。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硕垒乌巴什死后，沙俄继续不断地派遣“使节”到他的继承者俄木布额尔德尼处。如一六三四——一六三五年的图哈切夫斯基“使团”、一六三六——一六三七年的格列恰宁“使团”、一六三八——一六四〇年的斯塔尔科夫和涅维罗夫“使团”等。这些“使团”不择手段地妄图强使俄木布额尔德尼投俄，但没有任何结果。相反，俄木布额尔德尼对沙俄侵略者残杀和勒索其所属吉利吉斯人，越来越表示愤慨。一六三八年，当斯塔尔科夫“使团”到达俄木布额尔德尼处时，俄木布起初拒绝接见他们。以后，在接见时，俄木布又因这伙侵略分子要他首先问候沙皇而十分愤怒，将他们推出帐外，断绝粮草供应^②。

也就在这一年，整个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即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臣属了兴起于中国东北的清政权。各部每年向清贡白驼一、白马八，称为“九白之贡”^③。一六五五年清朝正式在喀尔喀蒙古各部设立八扎萨克，

①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年莫斯科出版，第82页。

②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14页。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3。

扎萨克图汗诺尔布及同族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各为右翼扎萨克之一^①。鲁卜藏诺颜即罗卜藏额琳沁,是俄木布额尔德尼的儿子。一六五七年俄木布额尔德尼死后,沙俄又派“使节”,继续诱迫罗卜藏向俄国称臣纳贡,也没有得逞^②。

一六六二年,罗卜藏袭杀了扎萨克图汗旺舒克(诺尔布子),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出兵打败了罗卜藏^③。到一六六七年,准噶尔僧格(巴图尔洪台吉的儿子)又出兵击败并俘获了罗卜藏。此后,罗卜藏虽然被准噶尔部释放,但势力已大大削弱。沙俄派遣“使节”煽动罗卜藏投靠俄国的阴谋活动还没有停止^④。

上述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前,沙俄觊觎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说明了沙皇俄国早就千方百计地在中国边疆地区进行颠覆和渗透,妄图吞并这一地区。

① 据《清圣祖实录》卷95,以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等记载,顺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敕封喀尔喀蒙古八扎萨克之一有鲁卜藏诺颜;而《皇朝藩部要略》卷3所记八扎萨克中无鲁卜藏,而只有其父俄木布额尔德尼。按俄木布额尔德尼死于一六五七年,可能是他让儿子鲁卜藏承授扎萨克,疑《皇朝藩部要略》误。

②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72页等。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0,“扎萨克图汗”。

④ 据《清圣祖实录》,卷104,第2—3页记载,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八月,罗卜藏被释之后,曾“欲与鄂罗斯合谋”攻扎萨克图汗。后扎萨克图汗“遣其子率兵万人,于今岁(即一六八二年)二月终旬夜,乘罗卜藏酣寝执之。其属下人,俱为俘虏,财物及马驼牛羊,俱为我军(指扎萨克图汗军——引者)所获。”

第二节 沙俄侵略中国准噶尔部

一、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策动

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叛乱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后，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势力已由勒拿河推进到了中国东北边疆。从一六四三年起，盘踞在雅库次克的沙俄侵略者先后派遣以波雅科夫、哈巴罗夫为头目的武装殖民强盗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占据雅克萨等地。这些殖民强盗在中国土地上杀人放火，劫掠居民，甚至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六五八年，从叶尼塞斯克侵略据点出动的另一股沙俄殖民强盗，侵入中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强占了中国的尼布楚。

中国军民对沙俄侵略者野蛮的入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数次歼灭入侵的沙俄殖民强盗。但是，沙俄仍不断派遣侵略军，侵扰中国黑龙江流域，构筑据点，严重威胁着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当时，中国清朝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多次抗议沙俄的武装侵略，建议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但是沙俄置之不理。在多次交涉无效后，清朝政府为了维护领土主权和边境安全，于一六八四——一六八五年派军队收复了雅克萨，盘踞于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投降，并被遣回。他们在返回途中遇见了从尼布楚派来增援的俄军，又背信弃义，重占雅克萨。一六八六年，清朝政府为了再次驱逐盘踞在该地的沙俄侵略者，对雅克萨进行了半年的围困。沙俄侵略军弹尽粮绝，只剩下六十

余人。同时，由于沙皇俄国当时在西方同波兰争夺乌克兰，进行了多年战争；和土耳其、瑞典的关系也很紧张；国内人民不断起义，使沙俄困难重重，没有力量抽调更多的兵力到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行大规模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才被迫接受中国清朝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在得知沙俄同意遣使谈判后，清朝政府立即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

就在一六八四——一六八六年，中国东北地区军民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的前后，沙俄还加紧了和中国西北准噶尔反动贵族的秘密勾结，支持准噶尔反动贵族发动叛乱，妄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

准噶尔部僧格台吉死于一六七一年，继任统治准噶尔部的是僧格的弟弟噶尔丹。噶尔丹是个野心家，他上台后不久，就先后进攻游牧于青海一带的和硕特部和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地区，残酷地压迫和掠夺那里的人民。妄图侵吞中国西北边疆的沙皇俄国乘机加以利用，积极支持噶尔丹发动叛乱，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一六八七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次克停留的途中，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扩大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①。第二年，戈洛文在给沙俄外交事务衙门的报告中，建议立即派“使团”到噶尔丹处，和他建立联盟。戈洛文在报告里竟然说什么：与噶尔丹建立联盟就使臣服于俄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1972年莫斯科出版，第621页。

国的“异族贡民将始终不渝地臣服俄国，而许多其他蒙古台吉也将起而效法，投归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永为臣民”^①。这段话清楚地反映了沙俄勾结噶尔丹阴谋分裂中国的罪恶用心。

在沙俄的策动下，一六八八年噶尔丹悍然率领叛军向东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各部。当时，中国喀尔喀土谢图汗正进行着反抗沙俄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噶尔丹的进攻，迫使土谢图汗撤除了对沙俄侵略据点色楞格斯科的包围。显然，噶尔丹这一叛乱活动正是与入侵中国东北的沙俄侵略军互相配合，遥相呼应的。喀尔喀蒙古的首领们不止一次地从俘虏的噶尔丹叛军中得知，噶尔丹这次进攻是同沙俄的军队“联合行动的”，“有大批的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②。

在沙俄军队的配合下，噶尔丹叛军占领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游牧地区。蒙古族人民遭到空前的灾难。许多人被杀死，草场被强占，牲畜被掠夺一空，喀尔喀蒙古各部被迫南迁，清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科尔沁草原（今内蒙古北部）。

一六八八年底，噶尔丹分三路派“使者”到捷连姆宾斯克、尼布楚和伊尔库次克同沙俄进一步进行军事勾结^③。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307、360页。

③ 同上书，第622—623页。

一六八九年八月间，戈洛文从伊尔库次克抵达尼布楚，并开始与中国使团进行谈判。九月七日，中俄双方通过谈判，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尽管清朝政府在领土上作了重大让步，但这一条约仍然是平等的。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暂时遏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入侵。但是沙俄并未放弃向中国侵略扩张的基本政策，而是寻找各种借口，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一六八九年十月，即《尼布楚条约》刚签订一个月左右，戈洛文返回伊尔库次克就立即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达尔罕。他答允继续支持噶尔丹的分裂叛乱，表示俄国“可根据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引者）的进攻形势”，“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引者）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指喀尔喀蒙古——引者）”^①。接着戈洛文派遣基比列夫携带致噶尔丹的复函，随达尔罕一同到噶尔丹处。戈洛文在给基比列夫的训令中，令其一再向噶尔丹表示：只要他集中兵力进攻喀尔喀蒙古人，那么沙俄的官兵“永远不会停息干戈”，就会“根据博硕克图汗进攻的情况及各方面的情报，……对这些敌对的蒙古人进行军事搜索”^②。

一六九〇年六月，噶尔丹得到沙俄的支持，率叛军向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620页。

② 同上书，第623—624、626页。

内蒙古一带进犯，气焰十分嚣张，“扬言假俄罗斯兵六万，又火器手六万至”^①，并且要挟清朝中央政府处决喀尔喀蒙古首领。六月，沙俄“使者”基比列夫到达噶尔丹牙帐，与叛首秘密勾结。基比列夫在噶尔丹处呆了七个月，支持了进犯内蒙古的叛乱活动。并根据戈洛文的训令搜集了大量情报。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沙俄干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有力措施。一六九〇年六月，当清朝政府得悉沙俄策动和支持噶尔丹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的消息后，康熙帝立即召见在京的俄国使臣，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指出：如果俄国要派兵帮助噶尔丹叛乱，“是负信誓（指尼布楚条约——引者）而开兵端也”^②。八月，康熙帝亲率大军在乌兰布通（即今克什克腾旗境内）击溃了噶尔丹叛军，噶尔丹狼狈地逃窜到科布多一带。乌兰布通之役沉重地打击了叛乱分子噶尔丹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有力地回击了妄图借噶尔丹叛乱以分裂中国的沙俄侵略者。

一六九一年初，沙皇政府从托博尔斯克派遣马特维·尤金到噶尔丹处，再次策动叛乱。于是噶尔丹收拾残部，妄图卷土重来。并乞求沙俄“就兵员、火药、铅弹、火炮等一切军需”给予支持。^③一六九六年，清朝政府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帝第二次率领大军亲征。在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48卷，“考订俄罗斯事辑”。

② 《清圣祖实录》，第146卷，第8页。

③ 沙斯季娜著：《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959年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



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噶尔丹与沙俄勾结的信件

喀尔喀蒙古昭莫多地区(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和克鲁伦河间)再次击溃了噶尔丹叛军。这时,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乘机占据天山以北准噶尔地区,夺取了汗位,杜绝了噶尔丹的归路。一六九七年,当清朝大军逼近噶尔丹时,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自杀。

清朝政府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愿望,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正义的、进步的。沙俄策动噶尔丹叛乱以分裂中国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二、十八世纪初沙俄对中国 准噶尔部的武装入侵

十八世纪头二十多年,是沙皇彼得一世疯狂向外侵

略扩张的时期。沙俄加强了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先后两次派遣侵略军，妄图用武力侵占从额尔齐斯河上游至叶尔羌的中国西北边疆。

一七〇三年彼得一世从中亚希瓦汗国的使臣那里，再一次听到在中国西部叶尔羌地区有丰富金矿的传闻，更加激起了他侵吞中国西北边疆的贪欲。一七一三年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向彼得一世呈交了一份设置一条从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叶尔羌的堡垒线的计划。彼得一世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准备派遣一个“考察团”去实行。一七一四年五月，彼得一世任命中校布赫戈列兹为“考察团”团长。这支打着“考察”幌子的沙俄侵略军，由两千九百多名兵士和大批俄国商人组成，装备有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同年，这支侵略军经过塔拉时，又补充了一千多名骑兵。一七一五年十月，布赫戈列兹的侵略军入侵到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在中国准噶尔部的亚梅什湖岸修筑堡垒。

在这支侵略军出动的前后，加加林和布赫戈列兹先后分别派人到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处，企图用各种花言巧语使准噶尔部相信：“考察团”并无征服目的，只是为了勘察矿藏。但是，准噶尔部并没有相信沙俄侵略者的谎言。一七一六年二月，准噶尔部集合了约万名军队开向沙俄盘踞的亚梅什堡附近，要求沙俄军队撤离。在沙俄侵略军拒绝之后，准噶尔军队英勇地攻击堡垒，并把堡垒包围起来。

这时，沙俄从托博尔斯克派遣的增援部队被准噶尔

部歼灭。于是加加林又急忙派遣契列多夫到准噶尔，妄图继续欺骗准噶尔部，以配合布赫戈列兹的入侵活动。策妄阿拉布坦拒绝接见契列多夫，继续围攻龟缩在亚梅什堡垒内的沙俄侵略军。一七一六年四月，残留在堡垒内的沙俄侵略军（约七百名）炸坏了堡垒，狼狈地乘船沿额尔齐斯河撤退。在逃跑途中，他们在中国准噶尔部所属鄂木河河口，构筑了鄂木斯克堡垒，作为以后扩大侵略的据点。

沙俄这次武装入侵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加加林因此被撤职，同布赫戈列兹一起被召回彼得堡受审。可是，彼得一世并没有放弃侵吞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计划。

一七一七年沙俄在鄂木斯克与亚梅什湖之间构筑了热列金斯克堡。一七一八年，又在亚梅什堡之南，额尔齐斯河边修建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堡。

一七一九年，彼得一世再次派遣以利哈列夫为头目的侵略军，仍以“考察”为名，循布赫戈列兹的老路，侵入中国西北边疆。彼得一世训令利哈列夫：“尽可能达到斋桑泊，……傍湖修建要塞”^①。一七二〇年以利哈列夫为头目的沙俄侵略军沿额尔齐斯河而上，侵入到中国斋桑湖一带，并越过该湖，逆喀喇额尔齐斯河深入了八十俄里，强行登陆。沿途，他们测绘地形，大肆盗窃情报，并准备建造堡垒。可是，这支侵略军同样遭到中国准噶尔部约两万军民的奋勇抵抗，最后不得不由原路退回托博尔斯克。利哈列夫在撤退中，又在准噶尔所辖地区构筑了

^① 转见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347页。

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堡。

沙俄两次派遣侵略军企图侵占从额尔齐斯河至叶尔羌中国的西北领土的阴谋，虽因中国准噶尔部军民的坚强抵抗而未能得逞；可是，通过这两支侵略军在额尔齐斯河所建的侵略据点，沙俄把它的军事控制线沿着这些堡垒向南扩展到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以后，沙俄又将这些堡垒连成一条堡垒线，名为“额尔齐斯河堡垒线”（或称“西伯利亚堡垒线”）；并进一步侵占了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至比斯克，直到库兹涅茨克以北的大片中国准噶尔部所辖的土地。

沙俄的武装入侵活动，不仅是彼得一世为了掠夺中国叶尔羌金矿，更重要的是，为了侵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额尔齐斯河沿岸。这是沙俄进一步向哈萨克草原、向中亚各汗国、向中国侵略扩张的重要步骤之一。由于这一时期，策妄阿拉布坦在哈密、西藏等地掀起叛乱，准噶尔北部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使沙俄侵略者乘机侵占了额尔齐斯河上游中国准噶尔部的大片辖地。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夫曾直言不讳地供称：“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准噶尔人的大量土地”，是利用了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时机，才得以实现的^①。

中国准噶尔部首领对沙俄野蛮地侵占该部所辖土地，不断提出抗议。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统一西北地区前夕，噶尔丹策零及其继承者还派人到彼得堡，要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3页。

求沙俄拆毁“在额尔齐斯河堡垒线上的一切堡垒”^①。一七二〇年底至一七二一年初，清朝政府也曾向出使北京的沙俄使臣伊兹迈洛夫表示：中国政府将在额尔齐斯河沿岸修建堡垒和驻扎军队^②。

一七二一年至一七二二年，当清朝政府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的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沙皇俄国又乘机向策妄阿拉布坦加紧施用政治收买的另一手。一七二一年底，沙皇政府派出“特使”翁科夫斯基到准噶尔部，目的是诱迫策妄阿拉布坦集团派出“全权代表”到俄国，签订“自愿臣服”于俄国的条约，并诱使中国准噶尔封建上层，同意沙俄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修建堡垒。彼得一世在给翁科夫斯基的训令（第五条）中说：如果签订了臣属于俄国的条约，沙皇“就可以下令象保护自己的臣民一样保护它，免遭他人侵犯。并可首先发函说服中国皇帝不要对洪台吉（指策妄阿拉布坦——引者）进行任何欺侮，因为他已是皇上的臣民。假若中国皇上不听，则要设法用强力迫使他同意”^③。这一训令是沙皇俄国妄图分裂中国，侵吞中国准噶尔部的又一罪证。

中国清朝政府得悉沙俄派使臣到准噶尔阴谋活动的消息后，康熙帝立即传见在北京的俄国特派代表、商队头目郎克，向他提出质问和抗议。郎克多方推诿和狡赖，一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7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7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354页；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80—81页。

七二二年七月被中国清朝政府驱逐出境^①。

准噶尔反动贵族的分裂卖国活动，越来越不得人心，甚至准噶尔统治集团中也有许多人反对投靠沙俄。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和准噶尔人民的反对，翁科夫斯基在准噶尔尽管呆了两年多，“在政治方面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实际效果”^②。

十八世纪初，沙俄对中国北部喀尔喀蒙古的侵略活动也十分猖狂。喀尔喀蒙古的北部不断被沙俄武力蚕食，侵略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建立。针对这种情况，清朝政府多次向沙皇政府提出抗议，并建议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但是沙俄一再拒绝中国清朝政府的合理要求，继续扩大他们的侵略活动。直到一七二五年才派遣使臣与中国谈判。

一七二六年至一七二七年，中俄双方先后在北京和恰克图举行了第二次边界谈判，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一七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和《中俄恰克图条约》（一七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以恰克图为中心，东至额尔古纳河、西到沙宾达巴哈的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中国清朝政府在领土上作了很大让步。沙俄将贝加尔湖一带中国蒙古地区的土地划入俄国的版图。签订条约的沙俄特使萨瓦在报告中承认：根据这一条约，沙俄获得了俄国人未

① 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8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5—146页。

曾领有过的土地^①。他的属员郎克等也发誓说：按照条约所立的界标，使俄国控制的地区向蒙古推展了要走几周路程的地方^②。

三、沙俄妄图侵吞中国准噶尔部阴谋的破产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沙皇俄国为了进一步向哈萨克草原和中国西北边疆扩张，不断在哈萨克草原东北和额尔齐斯河沿岸增加侵略兵力，设置一道又一道的军事堡垒线。一七四四年，沙俄在托博尔斯克建立了西伯利亚军队指挥所，指挥靠近中国边界的西伯利亚军队。第二年，抽调由金杰尔曼少将指挥的两团步兵和三团骑兵，驻扎在额尔齐斯堡垒线上。

这时，中国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策妄阿拉布坦之子）死去，准噶尔上层统治者之间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乱。沙俄侵略者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准备随时插手。奥伦堡和托博尔斯克成了沙俄收集有关情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基地。一七五一年，准噶尔最有势力的贵族达瓦济（噶尔丹策零侄）及其支持者辉特部贵族阿睦尔撒纳在与喇嘛达尔扎（噶尔丹策零长子）争夺汗位的斗争失败后，逃到哈萨克左部阿布赉处。沙皇政府得到这一情报后，于一七五二年八月向奥伦堡总督发出指示，命令他“邀请”达瓦济和阿睦尔撒纳到奥伦堡，以便利用达瓦济

① 巴拉诺夫：《乌梁海问题》，1913年哈尔滨出版，附录，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这个“真正有权统治全准噶尔人的人”，为俄国的侵略政策服务^①。按照这一命令，奥伦堡总督于一七五二年九月派了雅科夫列夫大尉到哈萨克左部。但是，当他到达阿布赉处时，达瓦济和阿睦尔撒纳已离开哈萨克左部，回到了准噶尔。

一七五三年初，达瓦济和阿睦尔撒纳袭杀了喇嘛达尔扎，达瓦济登上了准噶尔汗位。以后，在他们两人之间又因争夺权力发生了混战。准噶尔上层统治者的内乱，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一批又一批的准噶尔人民以及一些封建上层纷纷迁入内地，要求清朝政府制止内乱，统一西北边疆。阿睦尔撒纳也因争夺权力的失败，请求清朝政府出兵。这种形势，促使清朝政府于一七五五年由乌里雅苏台和哈密两路出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到三个月就俘获了达瓦济，迅速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

但是，阿睦尔撒纳这个野心家，妄图成为厄鲁特四部的总汗，目的没有达到，他就发动叛乱，袭击清朝的军队和台站。沙俄乘机与阿睦尔撒纳勾结，企图达到它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一七五六年夏，阿睦尔撒纳分裂祖国的叛乱，遭到准噶尔人民和部分封建领主的反对而宣告失败，狼狈地窜逃到哈萨克左部阿布赉处。这时，沙俄奥伦堡总督又派遣巴什基尔一个头人阿布杜拉·卡斯金诺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435页。

夫送信给阿睦尔撒纳，“邀请”他到奥伦堡去。卡斯金诺夫于八月底到达阿布赉处。他起初极其秘密地与阿睦尔撒纳的亲信建立联系。阿睦尔撒纳通过亲信向卡斯金诺夫表示，他准备逃离哈萨克左部，要求把这事预先通知沙俄边防官员。以后，当他见到卡斯金诺夫时，对沙俄的“邀请”表示感谢^①。

同年秋末，阿睦尔撒纳潜回准噶尔塔尔巴哈台山区，聚集残余叛军，妄图作垂死挣扎。他一方面与一七五六年发动叛乱的喀尔喀封建领主青衮扎卜勾结；另一方面又派人向沙皇政府“求援”，背叛祖国，投靠沙俄。一七五七年一月，阿睦尔撒纳派代表达瓦到达彼得堡，奴颜卑膝地表示愿意投降沙俄，乞求沙俄立他为准噶尔汗，并派俄军在中国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一带建立堡垒，对抗清朝军队^②。这本是沙皇俄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侵略目标，可是，因为当时沙皇俄国在欧洲正与普鲁士进行争夺霸权的战争，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来支持阿睦尔撒纳。同时，中国清朝政府取得了平叛的决定性胜利，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不得人心的叛首阿睦尔撒纳已处于即将灭亡的困境。因此，沙皇政府没有答应阿睦尔撒纳的全部要求。但却暗中支持，应允阿睦尔撒纳及其随从叛匪可以在俄国“避难”，“而且在吃、穿和其他方面给以称心如意的救济”^③。同年六月，清朝军队在追击狼狈溃逃的阿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453—454页。

② 同上书，第457—458页。

③ 同上书，第458页。

睦尔撒纳时，还从俘获的行李当中发现了一包沙俄边防长官劝诱阿睦尔撒纳叛国降俄的信件。

一七五七年，阿睦尔撒纳彻底为清朝军队所击溃。这个卖国贼逃入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公开投靠沙俄。清朝政府多次行文沙皇政府，要求按照一七二八年《中俄恰克图条约》有关逃犯引渡的规定，将这个叛首交还中国。可是沙皇政府一再推诿，迟迟不交。直到九月，阿睦尔撒纳在托博尔斯克患天花死去，沙俄才答应把尸体运到中俄边界上的恰克图，交中国政府验视^①。

在中国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叛乱过程中，沙皇政府还命令沙俄边境当局大肆引诱和非法强迫被叛乱分子裹胁到俄国堡垒线内的准噶尔人宣誓加入“俄国国籍”。这是沙俄违背《中俄恰克图条约》，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罪行。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曾数次行文沙皇政府，要求按照条约将被裹胁到俄国的准噶尔人归还中国。但是，沙俄硬说这些人不是中国臣民，而且已加入“俄籍”，拒不交还^②。

尽管沙俄千方百计干涉中国内政，阻挠清朝政府平定叛乱、统一西北边疆的正义战争，但是，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北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清朝政府终于统一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这样就使中国西北各族人民重新回到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有力地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增强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力

① 《清高宗实录》，第555卷，第1—2页；第557卷，第33—34页。

②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第23页。

量。对于长期以来妄图征服中国准噶尔部，侵吞中国西北领土的沙俄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第三节 一七五九年至一八四〇年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一、沙俄对中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入侵

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统一西北边疆后，野心勃勃的沙俄仍然继续入侵中国西北边疆。它大肆制造中国要向中亚“扩张”、“威胁”俄国的谎言，伺机向中国西北领土入侵。当时，与沙俄接壤的中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就成为沙俄侵略的重要目标。

修筑堡垒，偷立标记，武装蚕食，是沙俄在这一时期的侵略特点之一。

一七六〇年三月，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索伊莫洛夫借口防御中国“进攻”，向沙皇政府提出要从俄国边堡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沿中国领土布克图尔玛河到阿勒坦淖尔建筑堡垒的建议。为此，他派出了两个武装“勘探队”侵入中国哈屯河、阿勒坦淖尔一带，树标测量，勘察建筑新城堡和多角堡的地形。当时，中国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总管扎喇纳克立即将沙俄的这一侵略活动上报清朝政府。清朝政府命令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传集游牧兵丁”，前往查办；并抽调官兵“两路会哨巡查阿勒坦淖尔等处，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

驱逐”^①。

沙俄根据以上两个“勘探队”提供的情报，于同年底下达了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到阿勒坦淖尔之间的中国领土上建筑堡垒的指令^②。一七六一年至一七六三年，沙俄不断侵入中国布克图尔玛河、色毕河（今苏联恰雷什河支流）、卫满河（今苏联哈屯河支流）和库克乌苏河（今苏联哈屯河支流）等地，准备建造堡垒。一七六三年九月，清朝政府得知沙俄侵入上述地区后，命令成衮扎布派遣厄鲁特、乌梁海官兵各一百名，前往色毕河等地，“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同时指出：以上地区均系中国准噶尔地方，“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观此，足见俄罗斯渐有侵占准部地方之意”^③。第二年夏天，清朝军队遵照上述命令，拆毁了沙俄在布克图尔玛河、色毕河等处所建之房屋木栅。清朝政府的措施，遏止了沙俄这次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侵略活动。

沙俄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一七六四年十月，在彼得堡召开了沙皇政府的“国务会议”，决定强化西伯利亚的统治，不仅增加东西伯利亚的兵力，而且增加西西伯利亚的兵力，伺机向中国西北边境入侵。

一七七一年，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向清廷报告：在所属境内汗山、哈屯河一带发现有潜入该地耕种的俄国人，建议“将三年稽查一次之处，改为每年稽查一次。”

① 《清高宗实录》，第 617 卷，第 8—9 页；第 16—18 页。

② 《帝俄法律全书》，第 1 编，第 15 卷，圣彼得堡出版，第 543 页。

③ 《清高宗实录》，第 692 卷，第 1—2 页。

清朝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下令“每年委派千员,带兵百名搜查一次”^①。到了十八世纪最后十年,沙俄武装殖民者又沿额尔齐斯河而上,潜入中国布克图尔玛河一带,非法建盖木房,逼迫当地中国人民归附俄国。一八三一年以后,有沙俄商人潜入哈屯河上游推河一带,陆续建木房三十七间^②。并通过非法的贸易,残酷盘剥中国乌梁海牧民。

沙俄除了采取上述筑垒移民,蚕食领土的侵略手段外,还不断派遣间谍和其他人员,深入中国斋桑泊一带,刺探情报,掠夺资源。

早在一七一四年至一七二〇年间,沙俄先后派遣以布赫戈列兹和利哈列夫为首的侵略军,入侵中国额尔齐斯河上游、斋桑泊的同时,还先后派遣以伊凡·卡尔马科夫为头目的“考察队”(一七一六年)和以安得列·乌拉索夫和索莫夫中尉为头目的“考察队”(一七一九年),潜入中国斋桑泊一带窃取情报。卡尔马科夫是最早潜入中国斋桑泊的沙俄间谍之一。乌拉索夫和索莫夫相继在斋桑泊沿岸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情报^③。

一七六四年,沙俄西西伯利亚边界长官施普里格尔派遣泽列诺夫和格涅泽尔再次到斋桑泊一带,沿喀喇额尔齐斯河而上,深入七十俄里。同一时期派去的另一名间

① 《清高宗实录》,第888卷,第32页;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292卷,第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6卷,第24页。

③ 休基纳:《中亚地图是怎样形成的》,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21页。

谍科兹明,潜入到阿勒坦河和叶尼塞河之间的中国领土,盗窃情报^①。一七七一年,沙俄的一名间谍阿列菲·涅兹纳耶夫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到中国的科布多城,秘密编绘了路线图,并附有对该图的详细说明。一七九三年,沙俄的间谍西伐尔斯、斯内格希罗夫等甚至潜入中国塔尔巴哈台山区,进行窃取有关资源情报的活动^②。从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七年,沙俄托木斯克当局还秘密测绘了从沙宾达巴哈至布克图尔玛河、那林河一带中国边境地区地形图(比例尺为每吋二俄里)^③。这些特务、间谍窃取中国西北边疆有关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的情报,为沙俄进一步侵略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掠夺资源方面,沙俄驻额尔齐斯河堡垒的哥萨克军队,从一八〇三年起,逐渐沿河而上,侵入中国斋桑泊,掠夺渔业资源。最初,他们在中国布克图尔玛河至那林河口一段非法捕鱼;以后又沿额尔齐斯河而上,到达中国卡伦和尼迈拉虎、辉迈拉虎一带捕鱼;最后,竟进入到斋桑泊进行掠夺。一八〇八年,沙俄公然建立了“军用渔场”,大肆掠取斋桑泊一带的渔业资源。据俄国人统计,仅从一八〇三年到一八四五年这个时期,沙俄哥萨克军队掠取的渔业收入就达五十万零四千八百八十八卢

① 林基纳:《中亚地图是怎样形成的》,第24—25页。

② 普尔热瓦斯基著,摩尔根译:《从固尔扎越天山到罗布淖尔》,1879年伦敦出版,附录,第171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28页。

布^①。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沙俄掠夺中国西北渔业资源的侵略活动又从斋桑泊发展到喀喇额尔齐斯河口；到三十至四十年代，沙俄哥萨克竟然沿喀喇额尔齐斯河而上，深入到哈巴河、布尔津河和克兰河一带非法捕鱼。

此外，俄国商人和企业主也潜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窃取了大量的金沙^②。

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皇俄国对中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种种侵略活动，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中国清朝政府对沙俄多次筑垒移民、蚕食侵吞中国领土的入侵活动，给予了反击，维护了自己的主权。直至一八六四年，沙俄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前，清朝政府仍然在这一地区行使着有效的管辖，任免乌梁海各部总管，征收赋税。

二、沙俄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向中国 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入侵

在向中国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入侵的同时，沙俄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沙皇俄国的边界与中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9—202页。

② 据沙俄官方编制的调查报告，自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八一年，沙俄在谢司达克穆河流域等中国唐努乌梁海境内各金矿，共掠夺砂金四百六十四普特二十一俄磅，总值九百五十万卢布。（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68—469页）

国的巴尔喀什湖相距尚远。以后，沙俄疯狂地向里海以东扩张。当时，在里海以东广阔的哈萨克草原上分布着哈萨克人的三个“帐”（又称玉兹），即大帐、中帐和小帐。中国清代文献上称右部、左部和西部。沙俄侵略者不断深入哈萨克草原，修建军事堡垒，并把这些堡垒连结成堡垒线，把哈萨克大块大块的土地和牧场圈入了俄国的版图。在这些侵略堡垒中，一七三七年建在里海东北奥尔河入乌拉尔河处的奥伦堡（今苏联奥尔斯克），后来成为沙俄侵略中亚和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基地^①。同时，沙俄又采用武力威胁和欺骗拉拢的手段，诱迫哈萨克封建上层归附俄国。在这种形势下，哈萨克西部的统治者，以及左部的一部分上层，被迫在名义上“臣服”沙俄。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沙皇俄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积极向中亚、印度和中国扩张，加紧了吞并被它视为“通向亚洲各国地方的关键和大门”的哈萨克草原^②。一八二二年，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拟定了一份所谓《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③，经沙皇批准执行。这一条例是沙俄加紧吞并哈萨克草原、入侵中国西部边疆的重要措施。

本书第一章已经述及，在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

① 俄国土地建设局移民处编：《亚洲的俄罗斯》，1914年圣彼得堡出版，第29—30页。

② 斯楚勒：《土耳其斯坦》，第2卷，1876年伦敦出版，第403页。

③ 这里的吉尔吉斯是指今哈萨克族。在十八、十九世纪时，欧洲人普遍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把哈萨克草原称为吉尔吉斯草原。又把现名吉尔吉斯族称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

叛乱后，哈萨克左部和右部于一七五七年“归顺”了清朝政府。一八二四年五月，清朝政府派遣伊犁领队大臣乐善按惯例前往哈萨克左部敕封爱毕勒达（即哈贝杜拉·瓦里罕）为汗，并祭奠其父瓦里苏丹。当行至巴彦乌尔附近时，爱毕勒达已启程赴巴彦迎接。沙俄竟然派遣哥萨克军队赶到巴彦乌尔附近，无理地将爱毕勒达劫去，强迫他出任沙俄科克切托夫苏丹长^①。这一事件反映了沙俄在哈萨克草原强制推行殖民制度，极力破坏中国与哈萨克左部关系的侵略本质^②。哈萨克西部和左部的一部分汗政权就这样相继被废除，原来的部落组织被沙俄设立的区、乡所代替。与此同时，沙俄把内地省份的移民和堡垒线上的哥萨克大量迁到哈萨克草原，强占哈萨克人的土地和牧场，把他们赶向荒芜的沙漠。这些移民聚居的村落，以后逐渐成了俄国殖民行政的中心。此后，西部、左部相继划归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和奥伦堡总督管辖。

根据一八二二年的条例，沙俄还在临近中国西部边界地区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所谓“外围州”。如一八二四年设置科克切托夫和卡尔卡拉林斯克两州，一八二六年设置巴彦乌尔外围州。

这种不断侵吞哈萨克草原，把沙俄在西伯利亚的边界向南扩张，逼近和入侵中国西部领土的侵略方针，在上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3—4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1页。

^② 尽管这样，爱毕勒达于一七二六年派其弟萨尔拜又将清朝敕封爱毕勒达为汗的敕书领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8卷，第42—43页。）

述条例中也有表述：“西伯利亚边界线在防卫意义上不是永久的设施”，“这种防卫可以向前推进，最后应该在实际的国界上永久固定下来”^①。就在这个时候，沙俄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按照这一侵略方针，沙俄派遣军队深入中国领土，大搞颠覆分裂活动，企图建立侵略据点，武装蚕食中国领土。同时，还不断派遣间谍秘密测绘地形，大肆盗窃情报。

一八二五年八月，沙俄派遣舒宾上校率领三百多名侵略军，侵入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库克乌苏河（今苏联卡拉塔尔河）上的哈喇塔拉一带，向哈萨克贵族赠送腰刀、金钱等礼物，加以收买，并强征当地哈萨克人赋税，私盖房屋；扬言“明岁筑城种地，为屯兵之所”^②。九月间，伊犁领队大臣乌凌阿依例巡查边界，征收哈萨克马租，中途发现沙俄越境在哈喇塔拉所盖土房，查明后即上报清廷。清朝政府得到报告后，认为沙俄的侵略行为“若不行禁止，将来渐侵及卡伦，于地方大有关系”^③。于是行文沙俄枢密院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凡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是中国领土；斥责沙俄“越境远来盖房侵占”，应“速行拆毁”^④。

沙俄枢密院自知理亏，在回文中多方狡赖，诡称什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3页。

②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9—10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④ 同上书，第15—16页。

么，俄军有无建盖房屋，“并未呈明国王，即兵丁等建盖土房数间”，也只是“暂避风雨”，“凉不日亦坍塌”等^①。由于中国对该地拥有明确的主权，沙俄虽然多方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但在清朝政府的抗议之下，仍不得不于一八二六年拆除了非法建盖的房屋^②。

十九世纪初，伴随俄国商业资本的渗透，沙俄还向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特穆尔图淖尔地区不断派遣间谍，在当地中国柯尔克孜各部大搞颠覆分裂活动。一八二五年，舒宾上校所统沙俄侵略军的一支，由纽哈洛夫少尉率领，侵入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地区柯尔克孜族布库部的居地。他们采用武力威胁和拉拢收买等各种卑劣手段，妄图将布库部“置于自己的保护下”，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实际的效果”^③。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更加紧了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二年，沙皇政府两次专门召开“西伯利亚问题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策划向中国西北边疆侵略扩张的方法和步骤。会议决定仍然继续遵循以前的“渐进行动”和“审慎行事”的原则，即是说，要“一步一步地逐渐占有据点，移入武装居民和建立防卫线；在防卫线上逐渐准备继续前进活动的工具和物质材料”，蚕食中国领土。正如执行沙俄这一侵略政策的巴布科夫所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4页。

③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1963年伏龙芝出版，第280—281页。

供认：“在行动中遵循一些渐进步骤和慎重态度，不去惊扰中国人，但是同时必须贯彻始终地、可以说是渐渐地使他们理会到额尔齐斯河彼岸的一切土地，沿阿亚古斯（爱古斯——引者）、列普萨（勒布什——引者）、科克佩克丁斯克各河流，并继续向前到斋桑湖，直至中国卡伦线，都是属于俄国的”^①。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沙皇政府命令西西伯利亚总督继续在楚克里克河（即今苏联科克佩克特河）、爱古斯河中国边界附近驻扎军队。命令中还说：“如果中国人想用武力迫使我们放弃这些地点”，俄国军队“不得退出”^②。同时，在临近中国西部边境地区，沙俄先后建立了阿亚古斯（一八三一年）和科克佩克特（一八三九年）两个外围州。一八三八年，沙俄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把西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由托博尔斯克向东南移到了鄂木斯克。

在这段时期里，沙皇政府派遣间谍潜入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盗窃情报的侵略活动更加频繁。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七年，沙俄间谍费奥多罗夫等从爱古斯河潜入巴尔喀什湖以东勒布什一带，偷偷地进行天文定点和测绘^③。一八三九年，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派遣阿赛诺夫率领一小队哥萨克兵士，侵入巴尔喀什湖，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2—153页；第158—159页。

② 同上书，第153页。

③ 普尔热瓦斯基著，摩尔根译：《从固尔扎越天山到罗布淖尔》附录，第166—167页。

测量水深和试行捕鱼，窃取了大量情报^①。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沙皇政府根据间谍所窃取的情报，绘制了五俄里比一吋的整个额尔齐斯河以南的草原地区直至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为止的地图，勘查测量了巴尔喀什湖及伊犁河口^②。这些侵略活动都是为其后来侵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作准备的。

① 兰斯代尔：《中国中亚细亚》，第1卷，1893年伦敦出版，第273页。

② 同上。

第 三 章

沙俄逼签《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伴随着这一变化，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同以前也有了根本的不同。在一八四〇年以前，尽管沙皇俄国早已开始了对华的侵略，但是由于中国当时还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就中俄两国关系来说，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而在一八四〇年以后，正在向资本主义过渡（后来是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沙俄，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已经毫无平等的关系可言。中国成了沙俄掠夺、宰割的对象。俄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展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它利用半殖民地中国的困难处境和清朝政府的日益腐败，在采用颠覆分裂、经济掠夺、派遣间谍以至武力强占领土

等侵略手段的同时,又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先后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西北边疆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一八五一年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又名《伊犁通商条约》)使沙俄攫取了在中国西北边疆的重大政治、经济特权;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又名《续增条约》)和一八六四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沙俄野蛮地割走了中国西北边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第一节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沙俄 加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一、十九世纪中叶沙俄的对外扩张

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正处于农奴制危机日益加剧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

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俄国迅速地发展起来。一八二五年,俄国全国大的手工工场共计五千六百二十一个,工人共有二十一万余人;到一八六〇年时,大工场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个,工人增至五十六万五千余人,其中雇佣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87%^①。三十年代以后,俄国的手工工场已经大量使用机器,到十九世纪中叶,全部纺织业都已使用机器生产。

但是,由于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俄国资本主

^①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中译本,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75页。

义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同当时西欧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农奴制俄国的工业，不论在发展水平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远远地落在后面。特别在农业方面，农奴制的束缚更为严重。三十年代以来，俄国农村灾荒频仍，田园荒芜，大批农奴破产或死亡，农业经济陷于日益衰败的境地。

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这时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以沙皇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为首的俄国反动势力力图维护旧的统治秩序，挽救农奴制度的崩溃。然而，人民革命运动的风暴已经势不可挡。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五四年，各种形式的农民暴动就达七百多次。

这些情况表明，俄国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农奴制的总危机已经到来。

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利益的沙皇政府面临农奴制度的危机，“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三六页）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对于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的又一重要势力。在农奴制存在的情况下，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十分狭窄，在欧洲市场上也很难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相竞争。因此，俄国资产阶级特别依赖于政府的侵略扩张，来打开和扩大国外市场，尤其

是力图建立对经济比较落后、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亚洲市场的垄断。

基于这种疯狂的对外扩张政策,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一面继续在欧洲充当反动盟主和宪兵的角色,野蛮镇压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九二页)进行侵略活动;一面加紧把侵略魔爪伸向西亚、中东和远东各地。一八五三年恩格斯在揭露沙俄对外扩张的这种疯狂性时就曾指出:“是否可以设想,这个如此庞大、扩张得这样厉害的国家,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而会在半路止步呢?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十七——十八页)

沙俄向亚洲的扩张中,中国是它的重要目标。一八四〇年以后,沙俄向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同时发动进攻,疯狂地展开了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活动。

在中国东北边疆,沙俄侵略分子涅维尔斯科伊于一八四九年乘“贝加尔”号船侵入中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第二年八月,强占黑龙江口的庙街,建立以沙皇名字命名的侵略据点——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沙俄大批侵略军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指挥下,不顾中国清朝政府的抗议,三次闯入中国黑龙江,进行武装航行,非法强占江北大片中国领土。一八

五六年十二月，沙俄政府公然宣布成立以尼古拉耶夫斯克为首府的东伯利亚滨海省，将大片中国土地强行划归俄国“管辖”，为其正式吞并制造“既成事实”。

在中国西北边疆，沙俄的侵略活动同这一时期它在中亚的扩张是紧密相连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沙俄加快了征服中亚的步伐。它在逐步完成对哈萨克草原吞并的同时，就把矛头指向了中亚南部的三个汗国（希瓦、浩罕、布哈拉）。一八三九年，沙俄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率军远征希瓦，中途失败而归。一八四五年，沙俄在威海北面的土耳其盖河和伊尔吉兹河上建立土耳其盖和伊尔吉兹两个侵略堡垒。一八四七年，又在威海东北岸距离锡尔河口六十俄里处修建赖姆堡垒（后改称阿拉尔斯克堡，即威海堡），屯驻重兵，并在威海组织舰队。一八五三年，彼罗夫斯基率领侵略军，从威海堡出发，溯锡尔河而上，攻占浩罕要塞阿克·麦吉特，在此建立沙俄侵略据点彼罗夫斯克堡（今苏联克孜尔·奥尔达）。这时，沙俄沿锡尔河筑起一连串侵略堡垒，形成所谓的“锡尔河堡垒线”，即沙俄向中亚南部进行武力推进的“西线”。一八五四年，彼罗夫斯基第二次率军进攻希瓦，强迫希瓦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在中亚的这种扩张，正象恩格斯于一八五八年写的《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既然它在最近二十五年来在土尔克斯坦迅速地、悄悄地和连续不断地获得了成就，就很有把握可以预料，它的国旗不久将在兴都库什山和博洛尔塔格山的山隘上飘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六

四〇页)

沙俄侵略势力在中亚的扩张,越来越造成从北、西两个方向包围和威胁中国西北边疆的形势。它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活动也就越来越猖狂了。

二、沙俄继续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强行建立科帕尔、维尔内等侵略据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沙俄西西伯利亚当局就不断派出军队,沿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向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进行武装渗透。一八四六年八月,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悍然派侵略军向中国领土纵深推进,越过勒布什河,强占了中国库克乌苏河上游一带。一八四七年二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批准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的呈文,指使西西伯利亚总督在其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上长期驻扎军队,建立俄国的殖民统治。沙俄侵略军就于同年在库克乌苏河和勒布什河之间的中国土地上,建造了科帕尔堡垒,作为它在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进行侵略的前哨阵地。

沙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居住在库克乌苏河上游一带的中国哈萨克族广大牧民,面对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俄军在中国领土上连最普通的畜牧产品、木材、石灰都无法搞到,不得不从国内远道运来。一八四九年九月,清朝伊犁领队大臣伊昌阿带领官兵巡查边界,发现沙俄

军队侵入这一地区的情况，立即派员前往俄国兵营，要求俄军立即从中国境内撤走。但是，沙俄侵略军拒不撤走。清朝政府接到边防官员的报告后，于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向沙俄政府发出抗议咨文，明确指出：勒布什河、库克乌苏河流域一带均属中国领土，俄军“远出俄罗斯边界”，“不遵旧章，妄行侵越”，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咨文还援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理藩院给俄罗斯咨文》

引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俄人越界于哈喇塔拉一带“搭盖房屋”，经中国抗议后拆毁的事实，要求沙俄政府立即将侵略军“全数撤回”，“毋得占越”^①。

①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理藩院给俄罗斯咨文》。

沙俄政府接到清朝政府的照会后，一面在外交上施展拖延和狡辩的手法，应付清朝政府；一面密令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采取必要的措施”，向科帕尔一带增调部队和粮食^①。一八五〇年十月，清朝政府接到沙俄政府第一次复文。沙俄政府诡称：“俄罗斯头目、兵丁何敢越界滋事，致伤两国和好之道”，又说对于清朝政府所抗议之事，要等本国西西伯利亚总督“查明回报”，“再行咨复”^②。四个月以后（一八五一年二月），沙俄交来第二次复文。沙俄政府在这次复文中，公然歪曲事实真相，把一八四九年到达库克乌苏河向俄军提出抗议的中国巡边官兵说成是到那里“查访”失落的马匹，声称这些马匹已经俄官在哈萨克部落中查出，并交还了中国。企图以此回避对中国抗议咨文的正面答复，否认中国对库克乌苏河流域土地的主权^③。这种拙劣伎俩，充分暴露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时既理亏心虚，又蛮横霸道的丑恶嘴脸。

面对贪婪、强暴的沙俄侵略者，清朝政府的抗议交涉完全无济于事。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政权的清朝政府，这时在西北边疆的防御力量已经薄弱，未能对侵略者采取有效的反击行动，给沙俄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沙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巩固和强化了科帕尔侵略据点，并进一步凭借武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5页。

②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四日收到俄罗斯萨那特衙门咨复》。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卷，第3页。

地区步步侵吞。一八四八年，沙俄政府在科帕尔非法设置“吉尔吉斯大玉兹警察官”一职，由西西伯利亚侵略军中的校级军官充任，受西西伯利亚总督指挥，对当地中国哈萨克族人民进行武力征服。一八五二年，沙俄在中国阿拉湖北面的雅尔地区（清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治所旧城遗址附近）建立乌尔扎尔侵略据点。一八五五年，又在中国勒布什河上游建立列普辛斯克侵略据点。

进入五十年代后，沙俄进一步越过伊犁河，向南入侵。一八五〇年，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派遣以大尉古特科夫斯基为头目的一支侵略军，由科帕尔出动，入侵伊犁河南中国哈萨克族居住地区。当地哈萨克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进行英勇的抵抗。沙俄侵略军在伊犁河支流卡斯克连河附近被数千名手持自卫武器的哈萨克族牧民所包围。尽管古特科夫斯基向当地哈萨克族首领们发出欺骗信件，说什么俄军越过伊犁河“是专为从伊犁河盆地驱逐浩罕人”，“不会采取反对吉尔吉斯人的任何敌对行动”^①。但是谎言骗不了哈萨克族人民。古特科夫斯基侵略军遭到当地群众沉重打击，不得不向伊犁河撤退。一路上，哈萨克族人民又到处挖掘壕沟，设置障碍物，进行阻击，使沙俄侵略军狼狈逃回科帕尔。古特科夫斯基侵略伊犁河南中国领土遭到失败不久，戈尔恰科夫即被沙皇政府撤去了西西伯利亚总督职务，由另一个侵略头目加斯弗尔德继任。加斯弗尔德上任后，更加卖力地推行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16页。按：引文中的“吉尔吉斯人”是指今哈萨克人。

沙俄政府的侵华政策。一八五一年，哥萨克上校卡尔宾切夫率领一营步兵、两营炮兵和五百名哥萨克，再次入侵伊犁河南，在中国哈萨克族居住区大肆骚扰。一八五三年，所谓的“吉尔吉斯大玉兹警察官”、少校彼列梅什里斯基带领侵略军到伊犁河南岸寻找建筑堡垒的地点，图谋进一步在这一地区扩大侵略。沙俄政府在给彼列梅什里斯基的秘密训令中，要他“在伊犁河的彼岸寻找一适宜地点，该地点应选在伊犁河和楚河之间适中的地方，以便在那里修筑堡垒”^①。彼列梅什里斯基经过窥探，认为位于伊犁河支流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一带“便于采伐林木，拥有大片极好的、河渠纵横的、适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和大片割草场”^②，是侵略军盘踞的合适地点，立即作了报告。一八五四年，沙俄政府批准这一报告。彼列梅什里斯基侵略军就在古尔班阿里玛图这块中国领土上非法建造了又一侵略堡垒——名为“维尔内”堡垒（即今苏联阿拉木图）。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年，沙俄又接连调来两个哥萨克连，驻扎于维尔内附近，建立大、小阿拉木图殖民村。维尔内侵略据点的建立，是沙俄在中国西北领土上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步骤。沙俄侵略者狂叫：“随着维尔内堡垒的建立，直达楚河的整个外伊犁边区就可认为完全归入了西西伯利亚总督的管辖范

① 别克马哈诺夫：《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135页。

② 同上。

围。”^①

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行建立科帕尔、维尔内等侵略据点后，就把大批侵略军移驻在中国境内。在北起塞米巴拉金斯克、阿亚古斯，中经科帕尔，南至维尔内，这一线的两侧，大肆建造碉堡、殖民村，修筑军用公路，形成所谓沙俄的“新西伯利亚堡垒线”。这条“堡垒线”，既是沙俄侵吞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扩张线，又是与“锡尔河堡垒线”遥相呼应的、沙俄向中亚南部进行武力推进的“东线”。它切断了中国西部伊犁、塔城边防部队正常巡边的道路，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置于沙俄军队武装占领之下。一八五六年，沙俄政府在他陆续侵占的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土地上非法成立以维尔内为中心的所谓“阿拉塔夫特区”，归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对当地中国居民进行血腥的殖民统治。

三、《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沙皇俄国在大肆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领土的同时，还通过所谓“通商贸易”竭力将其政治、经济势力打入中国西北地区。

十八世纪下半叶——十九世纪上半叶，中俄两国的陆上贸易主要集中在边境城市恰克图一地。至于中国西北部，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不准与俄国通商^②。但是，

^① 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编：《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史》，第1卷，1957年阿拉木图出版，第351页。按：“外伊犁边区”是当时沙俄扩张分子对伊犁河以南、天山以北，包括伊塞克湖一带中国领土的称呼。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37卷，《俄罗斯互市始末》。

沙俄政府为了殖民掠夺和向外扩张，长期以来无视清朝政府的禁令，鼓励俄商潜入中国西北边疆，非法进行贸易活动。一七九七年，沙俄政府单方面颁布沿额尔齐斯河与中国西北部的“通商办法”^①。一八〇五年，沙俄政府派戈洛夫金出使中国，要求清朝政府“开放两国全部疆界，以便通商贸易”^②。一八一一年，沙俄又派遣普蒂姆采夫潜入中国伊犁，盗窃当地商务情报。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与中国进行“五口通商”等侵略权益。这时，在北京以传教为幌子进行间谍活动的俄国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③借口与英国的侵略势力相抗衡，竭力主张在中国西部为俄国开辟新的对华贸易市场。一八四四年四月，佟正笏在向俄国政府的报告中抱怨说，《中英南京条约》保证了英国在中国沿海通商的优越地位，“威胁”着俄国商品的销路，建议俄国政府在“英国人不易达到、而距俄国则较近的中国西部开辟新的销售市场”^④。沙俄政府就于一八四五年派遣外交部官员柳比莫夫化装成商人潜入中国伊犁地区，盗窃有关中国西北部的商务情报。柳比莫夫从中国回去后，向沙皇政府报

①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84页。

② 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第25期，第193—194页。

③ 佟正笏，本名波里卡尔普，是俄国东正教第十二届来华传教士团的领班修士大司祭（中国称为达喇嘛）。

④ 《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苏联《红档》杂志，1932年第53卷，第164—166页。

告说，同中国西北部贸易“有利可图”，积极鼓吹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商约”，把俄国的经济势力伸向中国西北地区^①。

一八四七年七月，沙俄政府通过佟正笏首次向中国清朝政府提出在中国西北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三处通商的要求。一八四八年六月，再一次提出这个要求。清朝政府两次都以“俄罗斯除在恰克图地方交易外，所有霍尼迈拉呼卡伦，俱不准通商，所请与例不符”^②，加以拒绝。一八四九年，沙俄政府又借驻北京的传教士团换班的时机，派遣科瓦列夫斯基^③担任监护官，携带沙俄给清朝政府的咨文来北京，借口“生齿日繁”，“在恰克图贸易货物，实不敷用”，再次提出“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添设贸易”^④。接着，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俄国商船两次闯入上海要求通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虽然明知沙俄要求在伊犁等地通商“其心本属叵测”，但又害怕拒绝会“致激事端”^⑤，被迫同意了沙俄的部分要求，准许在塔尔巴哈台、伊犁两处通商，并命令伊犁将军与沙俄代表谈判通商的具体事项。

①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857—1868)》，1960年莫斯科出版，第41页。

② 《清宣宗实录》，第443卷，第8—9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卷，第7页。

③ 此人后来当了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卷，第8页。

⑤ 《清宣宗实录》，第475卷，第29—30页；《清文宗实录》，第31卷，第2—4页。

一八五一年七月，沙俄政府派遣科瓦列夫斯基为代表，到达伊犁，与清朝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进行谈判。科瓦列夫斯基首先提出，除伊、塔两处之外，还必须满足俄方在喀什噶尔通商的要求。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坚决拒绝，双方“相持数日”，才作罢论。但科瓦列夫斯基仍声称，这个问题“俟数年后或数十年再看机会”^①。在讨论伊、塔通商的具体事项时，科瓦列夫斯基施展其威逼、诱骗的手段，把许多不平等条款强加在中国身上。

一八五一年八月六日（咸丰元年七月初十日），《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正式签订。沙俄通过这一《章程》，攫取了在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侵略特权。主要是：

（一）设置领事。《章程》第二条规定，伊塔通商后，沙俄可在此两处设置“管贸易之匡苏勒（俄文“领事”音译——引者）官”^②。沙俄政府通过他们，以特殊的身份驻在中国西北，进行各种侵略活动，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一八五一年以后，被沙俄政府首次任命为驻中国伊犁、塔城两地领事的，是跟随科瓦列夫斯基前来伊犁谈判的两个随员——扎哈罗夫和塔塔林诺夫。塔塔林诺夫不但在塔城领事任内作恶多端，而且以后被选派为协助伊格纳提耶夫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随员。至于扎哈罗夫，自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担任伊犁领事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卷，第5—6页。

^② 本目所引《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文字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北京版，第78—80页。

期间，更是罪行累累。他直接参与策划和执行了沙俄侵吞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奴役和残害中国人民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是地地道道的沙俄侵华的急先锋。

(二) 贸易免税。《章程》第三条规定，中俄双方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通商，“彼此两不抽税”。这实际是单方面取消中国关税的极不平等的规定。因为《章程》规定的两个通商地点——伊犁和塔尔巴哈台都在中国境内，俄国商队到中国境内经商，应向中国政府交纳关税。在此以前，中国在西北边疆同中亚国家的商人（包括冒充中亚商人的俄国商人）的贸易中，也一直是抽取一定数量的关税的（一般进口商品税率为三十分之一）。《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中的免税规定，完全破坏了中国在西北边疆利用关税保护本国经济的权利，为沙俄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一八五一年以后，俄国对中国西北的贸易额激增，仅一八五〇——一八五三年之间，增长就将近一倍^①。俄国商人销售到中国西北市场上的，是大量棉、毛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而掠走的则是农畜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西北地区开始沦为沙俄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三) 领事裁判权。《章程》第七条规定，在伊、塔两地，中俄“两边商人遇有争斗小事，即著两边管贸易官员究办。”“倘遇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图之例办理”。这一规定，表面上好象是仿照恰克图贸易的规定，实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这是沙俄在中国西北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开

^①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21页。

始^①。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俄恰克图市约》中规定:“两边人民交涉事件,如盗贼、人命,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讯明确后,本处属下人,由本处治罪,尔处属下人,由尔处治罪,各行文知照示众。”^②这种边官会审、各自治罪的规定,在恰克图——买卖城地处双方边界的情况下,对于中俄两国是对等的。伊、塔通商与恰克图贸易情况迥然不同。俄国商人是在中国境内的通商口岸进行活动,如果犯罪,理应由中国当局进行法律制裁,行使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沙俄代表科瓦列夫斯基在谈判这一问题时,却蛮横地坚持俄国人在中国犯罪不能交由中国政府制裁,并且“呈出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办过旧章”^③,进行蒙混和欺诈。参加谈判的清朝政府代表奕山等在沙俄诱骗之下,同意“仿照办理”。从此,沙俄侵略分子凭借这一规定,公然无视中国法律,在中国西北的罪恶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了。

(四) 建立贸易圈。《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尔巴哈

① 早在鸦片战争前一百多年,沙俄即图谋在华设置领事,并设法从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一七一九年沙皇政府在给来华特使伊兹迈洛夫的训令中,就曾指示他设法获准在中国设立领事馆,领事应有权处理在华俄国人彼此间一切纠纷,俄商犯罪,领事有权裁决,并将其押送回国。(见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第88、508—511页。)《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沙俄这种侵略愿望的初步实现。以后的《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了俄国领事裁判权的规定。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9—3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卷,第7页。

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便住人、存货。”这即是沙俄在伊、塔两地建立“贸易圈”(亦称货圈、买卖圈子)的最初的“条约”根据。贸易圈开始不过是俄商盖房居住和存货的场所，但是随着沙俄侵略的深入，它的占地越来越广，并且逐渐排斥中国主权在圈内的行使，实际上成了沙俄建在中国西北城镇的侵略据点。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沙俄利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势，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有关中国西北边疆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评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时曾指出：“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指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引者）曾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七页）事实说明，《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从陆上打开了中国西北的大门，是沙俄侵略中国的重要一步。

四、塔城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主权、 火烧沙俄贸易圈的英勇斗争

一八四〇年以后，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无比痛恨。他们从沙俄侵略

者踏上中国西北领土的第一天起，就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断给沙俄侵略者以打击。其中，一八五五年发生的塔城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主权、火烧沙俄贸易圈的斗争，就是突出的一例。

雅尔噶图金矿位于塔城西南的雅尔噶图山，这里盛产“金砂”。很早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就前往开采。一八五三年七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丰绅根据清朝政府户部关于广开金矿的指示，奏请在雅尔噶图正式设厂，鼓励人民前往采挖，得到批准。自此以后，前往该地的人民更多。塔城当局发给当地“金头”以“委牌执照”，作为凭证，进行管理^①。

贪婪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听到雅尔噶图有金矿，就起意霸占。一八五三年九月，沙俄擅自派人到雅尔噶图，阻拦中国矿工挖金，胡说这里是俄国的地方，中国人不得采挖，如要采挖，须先向俄国交税。中国矿工据理驳斥了沙俄的谎言，照常在这里挖矿^②。沙俄便转而通过西西伯利亚总督向清朝伊犁将军发来咨文，宣称雅尔噶图一带是俄国的地方，中国方面必须把挖金矿工由该处“即速撤回，勿令复入”，并威胁说：“不然日后不和之事，起与不起，我们不保”^③。伊犁将军奕山接到沙俄咨文后，指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色克通阿进行调查处理。色克通阿指出雅尔噶图是中国的领土，报请伊犁将军复文俄方予

①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② 同上。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1卷，第24页。

以申明，但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借口金矿不旺，下令撤销雅尔噶图金矿，禁止人民前往采挖。可是，塔城人民并没有被沙俄的威胁和清政府的禁令所吓倒。他们仍然继续前往雅尔噶图采挖。一八五四年九月，沙俄再次致函伊犁将军，一面强辩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人查看寻挖金矿之事稍有不实”，妄图否认中国对雅尔噶图地区的主权；一面催逼清朝当局将“挖金人撤回”^①。在沙俄的压力下，清朝官员又一次妥协，竟派出军队前往雅尔噶图驱赶矿工。塔城人民不顾清朝兵丁的驱赶，继续坚持在雅尔噶图开挖金矿。

沙俄侵略者眼看着对英勇的塔城人民施加压力无效，终于凶相毕露，于一八五五年二月，派遣七、八百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军扑向雅尔噶图，强行驱赶中国矿工。矿工们不屈不挠，据理进行抗争。沙俄强盗竟采用枪托打、绳捆、赶入河中等野蛮手段，对中国矿工进行血腥屠杀。这伙野兽还灭绝人性地将中国矿工堵入矿洞，“用烟火烧熏”，当场熏死中国矿工陈兴等六人。在制造这次流血惨案之后，沙俄侵略军又不断在雅尔噶图一带进行搜索，发现中国人民，非杀即打，并将死者尸体抛入湖中，销证灭迹。六月间，中国矿工安玉贤等六人前往雅尔噶图，被沙俄军队截获，当场枪杀五人，安玉贤惨遭毒打^②。据当事人的控告，在雅尔噶图前后遭到沙俄侵略者杀害的中国矿工共达二百余人。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1卷，第24页。

②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其殺天律愛民後天光華二十二年仙童而人
今幸到奇能臣首領去老命侵吞國課銘通書天
開表疆土自去

王幸六十法紀事情因小節著控歲十二月八日有字
夫人心忠君愛民之心在存山羅不撥國則設至廢
人排控劫國侯民伊歷生處然全該仰均多財狀股
右曉已至三年八月內有者英俄羅斯忽封山羅
表官官用金銀製名愛疆土不准不挖善此把標控
與伊細課小的署起普天三千差非土土具條

皇上從界所基一東原有

憲上天情用金寶德薩羅私影官廢天職改官
力以官長民求誠繩網投防立傷身亡良民數
名似速死在可達十年臘月二十日和老命時看
職用明火燒埋之死良民六名有在者皇監親當前達
官知薩羅長去首昂開子以生處去換罪親之情
噶天街內飲提作樂請賜跨前達薩路前達阿老
一若官員枉德薩羅官居五品与老為親友及交

皇上

紀例甚眾取笑誠何道孔所有傷人今俄羅斯
信命債的牛者亦有國天區可證華年五月十日
蘇紳大夫德思仍權開設官廢的土裡求度飲限
命薩羅在恨不且尋信裏賊陪金勳殺博死飛
入海內有殺作土之民之人惟存厚民之思克德
何月傳信的手行六進山破賊用槍打此之名
爾士王監提留你赤命用刺擄打回俄報在報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沙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加猛烈的反抗。塔城人民愤怒集会，拥向塔城管理与俄人通商事务的清朝章京萨碧屯衙前，要求清朝当局向沙俄交涉，保卫雅尔噶图矿山主权，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不料这一正义要求，却遭到媚外的萨碧屯拒绝。这个被沙俄“用金买通”的民族败类，早已与沙俄侵略者“为亲为友”^①，竟以“聚众闹事”的罪名，将带领群众进行斗争的矿工领袖徐天尧、安玉贤等枷打。塔城人民又向参赞大臣英秀控告沙俄罪行。英秀在高涨的群众抗俄斗争面前，深恐“激变民情”，不得不一面派萨碧屯等到雅尔噶图进行调查，一面向俄国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提出质问。塔塔林诺夫竟蛮横地表示：“卡伦以外，是我们哈萨克的地方，你们将民人逐回，不然亦难保事之有无。”^②

塔城人民眼见沙俄侵略者的蛮横无理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更加忍无可忍，于是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咸丰五年七月十四日）夜，被沙俄的侵略暴行所激怒的塔城人民五、六百人，在安玉贤、马隆兴等率领下，直奔沙俄贸易圈，他们用苇子点燃贸易圈的草堆，一举焚毁了沙俄贸易圈。沙俄领事塔塔林诺夫和俄国商人等狼狈逃走。这就是大快人心的塔城人民火烧沙俄贸易圈事件。

火烧沙俄贸易圈一举，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沙俄侵略者的威风。塔城人民的抗俄斗争情绪更加高

① 《民人徐天尧上告萨碧屯里通外国呈》。

② 《英秀奏塔尔巴哈台民人焚烧俄罗斯贸易房屋原由折》。

昂。十月，塔城群众代表徐天尧、安玉贤、马隆兴等向伊犁将军派来调查事件经过的官员阿克达春投递连名呈禀，控告章京萨碧屯等“通俄夷害人”的罪状，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媚外投降的清朝官吏。

塔城人民的抗俄斗争，吓坏了沙俄侵略者。沙俄政府急忙向清朝政府提出照会，施加压力。沙俄在照会中，不敢提及火烧贸易圈一事的起因，反诬蔑塔城人民是“匪徒”，逼迫清朝政府“务将人犯拿获治罪，以警其余”^①。在沙俄的压力下，清朝政府竟以“挟嫌妄控”“烧圈泄愤”等罪名，将徐天尧、安玉贤、马隆兴等人治罪，判以重刑^②。

塔城烧圈事件发生后，沙俄政府在给清朝政府的几次照会中，除要求“查拿人犯”外，还一再提出所谓“赔偿”问题。一八五六年八月，沙俄派来伊犁谈判解决塔城事件的代表更向清朝政府大肆勒索，声称：“塔城游民焚圈抢货，总因塔城官员未能保护所致，是以必须赔还货物。”^③甚至扬言：“所有敝国在塔城遗失物件，贵国应按十倍赔偿。”^④清朝政府代表表示不能接受。沙俄代表竟以停止谈判相威胁，于当年十月回国。此后，沙俄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一八五七年六月，俄军窜犯中国伊犁奇沁卡外一带。接着，沙俄又向清朝政府提出“将通商货物由伊犁河内载船行运”^⑤的无理要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14卷，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4卷，第9页。

④ 同上书，第14卷，第6页。

⑤ 同上书，第16卷，第33页。

求。一八五七年九月，沙俄悍然向清朝当局宣称，“因判断烧抢贸易圈子，我们断事，贵处不取”^①，因而将俄国驻伊犁领事和商人等全部撤走。在采取这些威逼、要挟手段后，一八五八年七月，沙俄派遣驻伊犁领事扎哈罗夫从鄂木斯克前来塔尔巴哈台，与清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谊、伊犁协领哈布齐贤进行谈判。扎哈罗夫随带兵队四百余人，在谈判中杀气腾腾，态度蛮横。清朝政府这时正面临英、法、俄、美等侵略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讹诈勒索，唯恐沙俄对西北边疆采取新的侵略行动，被迫向沙俄的无理要求屈服。一八五八年九月七日（清咸丰八年八月一日）清朝政府在塔尔巴哈台与沙俄签订条约。清朝政府除答允由中国重新修盖被焚的俄国贸易圈房屋外，还以“贴补”俄商名义，赔款白銀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两，以武彝茶五千五百箱作抵偿，分三年付清^②。此外，在条约签订后，扎哈罗夫又以保护俄领、俄商为借口，强迫清朝政府承认沙俄在伊、塔两处俄国贸易圈内各驻俄兵五十名的侵略特权，开了俄军在中国西北城镇驻扎的恶劣先例^③。

塔城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主权、火烧沙俄贸易圈的正义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7卷，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31卷，第27—29页。

③ 同上书，第31卷，第46—47页。

五、克里木战后沙俄把侵略魔爪伸进 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地区、吹河流 域和喀什噶尔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在欧洲爆发了以沙俄为一方，以英、法、土耳其、撒丁为另一方的克里木战争。这次战争，以沙俄大举入侵土耳其开始，中途由于英、法参战，演变为沙俄同英、法争霸巴尔干和地中海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沙俄遭到惨败。根据一八五六年三月签订的巴黎和约，沙俄被迫放弃它于一八一二年侵占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并不得在黑海保有舰队和建立要塞、设立兵工厂等。沙俄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使沙俄在欧洲的扩张受到严重挫折。

然而，沙俄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战后沙俄一面在欧洲加紧扩军备战，图谋废除巴黎和约，卷土重来；一面将侵略矛头更多地指向亚洲，企图继续同其他列强争夺亚洲霸权。

在中国西北边疆，沙俄这时一面巩固它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占的侵略据点，强化它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一面继续深入中国领土，向特穆尔图淖尔、吹河流域中国柯尔克孜族居住地区伸出魔爪，以至妄图吞并中国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地区。

一八五六年以前，沙俄已派小股部队潜入特穆尔图淖尔地区的中国柯尔克孜族布库部落中进行侵略活

动^①。一八五六年五月，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根据沙皇政府的侵略计划，派遣当时的所谓“吉尔吉斯大玉兹警察官”上校哈明托夫斯基率领哥萨克骑兵队，从维尔内出动，大举进犯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地区。哈明托夫斯基侵略军企图在特穆尔图淖尔湖岸修建堡垒，受到中国柯尔克孜族布库部落、萨尔巴噶什部落广大牧民和爱国首领们的坚决抵抗。沙俄侵略者进行血腥的屠杀。仅在吉尔根巴什地方，一次就残杀柯尔克孜人四十余名，其中包括柯尔克孜族首领五人，还抓走了许多进行反抗的柯尔克孜族牧民^②。然而，侵略者的屠刀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在柯尔克孜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沙俄在特穆尔图淖尔地区建堡的企图没有得逞。哈明托夫斯基侵略军偷偷测绘了特穆尔图淖尔以北地区的地形图后，便退回了维尔内。

哈明托夫斯基侵略军刚刚撤走，打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招牌、以“科学考察”为名的侵略分子谢苗诺夫，又于一八五六年九月和一八五七年六、七月两次窜入特穆尔图淖尔和天山地区，进行侵略活动。谢苗诺夫在沙俄侵略军“护送”下，所到之处大肆炫耀俄国的武力，竭力在中国柯尔克孜族布库部落和萨尔巴噶什部落之间制造分裂，拉拢收买这些部落的一些上层分子，企图诱迫他们

^① 一八五五年九——十月，俄国的“吉尔吉斯大玉兹警察官”彼列梅什里斯基曾派少尉卢特舍夫率领哥萨克部队经格根河潜入中国特穆尔图淖尔东岸进行活动。

^② 《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第1册，1963年莫斯科出版，第534页。

“加入俄国国籍”。谢苗诺夫还深入中国天山腹地，进行地理观测。他偷偷绕过中国卡伦，窜入天山中部的特克斯谷地，对中国伊犁和喀什噶尔之间的重要通道——穆扎尔特达坂进行窥探。谢苗诺夫带着从中国西北盗窃的大量情报回国后，即大肆鼓吹侵占中国伊犁河以南，包括特穆尔图淖尔和吹河地区对沙俄扩张的“意义”，狂叫“占领外伊犁边区和在这里的不断垦殖对俄罗斯所建立的功绩不比占领黑龙江沿岸边区为小”，要在这块中国土地上“为俄国在中亚的势力和统治建立起一个最强大的、不可摧毁的堡垒”^①。他还向沙皇政府献策：“必须立即臣服布库人，然后再臣服跟布库人一样、处于锤砧之间危机状况的萨尔巴噶什人，……这样一来，由于占有了整个伊塞克湖地区，俄国国界就会一直延伸到天山雪峰”^②。这些侵略主张，后来都被沙皇政府所采纳。

在哈明托夫斯基和谢苗诺夫以后，沙俄又陆续派出一些武装部队到特穆尔图淖尔地区进行骚扰和所谓“考察”。但是，由于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反抗，在一八六〇年以前，沙俄侵占这一地区的计划始终未能得逞。

中国南疆富庶的喀什噶尔地区，也是贪婪的沙俄侵略者垂涎已久的地区。从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远征叶尔羌的狂妄计划破产后，沙俄吞并喀什噶尔地区的野心始终不死。随着沙俄在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建

^① 谢苗诺夫：《1856—1857年天山游记》，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194—195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立侵略据点，实行武装占领，它对喀什噶尔地区的侵略就更加迫不及待。一八五七年，发生了浩罕利用原喀什噶尔和卓后裔倭里汗匪帮入侵中国喀什噶尔的事件。沙俄政府注视这一事件的发展，伺机插手。沙俄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这时秘密炮制了一份《关于喀什噶尔事件的情况和我们对它的态度》的报告，竭力鼓吹“在政治意义上喀什噶尔对俄国以及对英国的重要性”^①。建议沙皇政府利用倭里汗匪帮入侵喀什噶尔的时机，大肆进行侵略活动。

根据科瓦列夫斯基的报告，沙皇政府决定：先派一名“训练有素”的军官潜入喀什噶尔刺探情报，并在临近喀什噶尔一带增派俄国侵略部队，同时加紧同倭里汗匪帮进行勾结。沙俄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在把这一决定通知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时，特专门提醒他，不要忘记历届沙皇政府对喀什噶尔一贯所抱的企图，声言：“俄国政府自叶卡特林娜二世时起，即对于同喀什噶尔建立政治和贸易关系一事甚为注意，在谈判签订伊犁通商条约（指《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引者）过程中，也曾力图在喀什噶尔建立俄国商业区，然而没有成功。”因此，要加斯弗尔德不能错过时机，要再次努力进行活动。加斯弗尔德接到这一指令后，立即草拟了派遣俄国部队支持倭里汗匪帮的行动计划，并且狂妄地声称：“在目前中国政府所处的困境中，可以极有把握地等待喀

^① 《瓦里汉诺夫文集》，第1卷，1961年阿拉木图出版，第62页。

什噶尔的分裂”^①。

但是,与沙俄侵略者的愿望相反,倭里汗匪帮不到四个月即被中国军民所击溃,狼狈逃出了国境。沙俄勾结倭里汗分裂喀什噶尔的阴谋破产了。然而,沙俄对这次失败并不死心,决定继续派遣特务潜入喀什噶尔进行间谍活动。

沙皇政府对这次间谍活动的人选十分重视,经谢苗诺夫、加斯弗尔德等推荐,批准由西西伯利亚军团骑兵中尉瓦里汉诺夫^②充任。瓦里汉诺夫是沙俄政府的忠实走狗,一八五八年以前曾多次参加加斯弗尔德、谢苗诺夫等人组织的入侵活动,在中国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间干了不少罪恶勾当。沙俄政府给他的特别训令中明确提出:“此举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商业性的。”^③一八五八年六月底,瓦里汉诺夫照沙俄政府事先精心策划的部署,在科帕尔附近加入了一个由沙俄组织的以浩罕人为主的商队。瓦里汉诺夫剃了头,改穿乌兹别克民族服装,化名阿里姆巴依,伪称是商队头目浩罕人姆桑巴依的亲戚。商队经过特穆尔图淖尔、纳伦河上游,向喀什噶尔前进途中,瓦里汉诺夫偷偷地记录了山川形势、民族分布等情报。商队经过中国卡伦时,他混过了检查,进入喀什噶尔城。

①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857—1868)》,第108页。

② 瓦里汉诺夫是哈萨克民族的败类。他是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费的曾孙,瓦里汗的孙子。在哈萨克左部被沙俄吞并后,瓦里汗诺夫随其父成吉思卖身投靠沙俄,充当沙俄的走卒。

③ 《瓦里汉诺夫文集》,第1卷,第65页。

从一八五八年十月到一八五九年三月，瓦里汉诺夫在喀什噶尔以“经商”为掩护，大搞特务活动，还曾潜入南疆的英吉沙尔。瓦里汉诺夫竭力盗窃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乌什、阿克苏、莎车、和阗等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他特别注意搜罗中国与浩罕之间的关系、和卓后裔历次入侵喀什噶尔的经过、中国柯尔克孜族各部的分布和社会状况、南疆的军事设施等情况。此外，还掠取了一批古代文物、生物标本和矿石样品等。一八五九年四月，瓦里汉诺夫返回维尔内以后，整理他所盗窃的情报，提交俄国政府。沙俄参谋总部在他提交的报告上批道：“这是一份极有趣和极有用的报告”^①，并摘录呈报给沙皇。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沙俄还把侵略触角伸进了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吹河地区。当时，这里地处沙俄东、西两条堡垒线——“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和“锡尔河堡垒线”之间。沙俄为了扩大对中国西北边疆和中亚的侵略，正急谋连接这两条堡垒线（即填补维尔内至阿克·麦吉特之间五百多公里的缺口）。因此，吹河流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侵略目标。同时，清朝政府在这一带的边防力量比较薄弱，在沙俄侵略势力伸进来以前，浩罕曾不断向这一带入侵，并在吹河上游建筑了皮什别克、托克马克等堡垒。沙俄认为这是侵占中国领土的有利时机，便打着“防御浩罕人”的旗号，向吹河地区伸出魔爪。一八五

① 《瓦里汉诺夫文集》，第1卷，第73页。

九年春,沙皇政府在彼得堡连续召开两次“咨询会议”,进行侵略部署,决定首先抢占吹河上游,作为俄国“未来边界的据点”^①。根据这一侵略部署,一八五九年夏,沙俄派上尉维纽科夫率领一支侵略军,从维尔内出发,沿吹河而下,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这支侵略军沿途测量地形,绘制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的平面图,并收集有关吹河流域和中国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大量情报。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根据这次侦察结果,进一步制定了进攻吹河上游的侵略计划,并在卡斯捷克山口建立前哨堡垒。在进行了这些侵略准备以后,一八六〇年八月,沙俄派上校齐麦尔曼率领配有各式火炮的两千余名侵略军,大举入侵吹河上游,先后攻占托克马克、皮什别克等地。加斯弗尔德在给彼得堡的报告中,把他们这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无耻地吹嘘为一次“光荣的远征”,说这次行动“彻底确立”了沙俄“在外伊犁地区的统治”,“完全保障”了俄国殖民者“在该地区的定居”^②。

沙俄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之间的短短二十年时间里,通过武装入侵、筑垒移民等手法,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的大片领土。此后,它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逼迫中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把它二十年来的中国西北边疆所侵占的领土“合法化”,并且通过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侵略。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60—90年代)》,1965年莫斯科出版,第112页。

② 同上书,第118页。

第二节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的西部“划界”条款

一、《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划界”条款的产生

一八五七年初，沙俄政府利用英、法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派遣沙皇的亲信、侍从将军普提雅廷为公使来华，趁火打劫。一八五七年八月，普提雅廷乘兵船到达天津，向清朝政府递交咨文，声称：“东北至海，西至伊犁等处，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址。现在阻止在该处居住，恐起争端，即应复行商定界址。敝国以此事为要，……特派亲信大臣赴京。”并威胁说：中国“内乱”，又加英国“欲犯广州”，“如使俄罗斯大邻国不和，至于为敌，则贵国诸多有碍”^①。沙俄企图以威胁、恫吓为手段割占中国土地的无理要求，遭到清朝政府的断然拒绝。一八五七年九月一日，清朝理藩院咨复普提雅廷，明确指出：中俄边界早经《尼布楚条约》等约章划定，岂容再有更改？只有东北乌第河一处当时未经分界。俄使可去该处会同中国黑龙江将军商办。此外，西至伊犁，东北至海，向来属于何国，人所共知，无何可议。同时，拒绝俄使来京。

普提雅廷勒索未遂，便窜到香港，勾结英、法、美三国公使，共同进行侵略中国的活动。他极力鼓动英、法两国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6卷，第13—14页。

对中国使用武力,向英、法侵略军头目献策说:“除非使北京本身受到压力,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①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普提雅廷伙同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北上,企图乘势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上海,普提雅廷通过美国领事于一八五八年二月再次向清朝政府递交照会,一面表示支持英、法的侵略要求,一面又提出中俄“划界”问题,要求两国在东北“以黑龙江为界”,在西北“伊犁地方分明界址”^②,露骨地表现了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的野心。在照会中,普提雅廷还以威胁口吻说:中国“如却退各国,令其不悦,诚然可危”^③。对于普提雅廷的这次照会,清朝政府同样加以拒绝,并通过两江总督复照普提雅廷,要他仍照中国上次照会的答复,去黑龙江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指示黑龙江将军奕山,等俄使到后,“据理与之辩论,……杜其觊觎之心”^④。

普提雅廷见两次讹诈都没有成功,便同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乘兵船闯入渤海湾,会聚于白河口外,直接对京、津地区进行武力威胁。他一面鼓动英、法侵略军攻占大沽,进犯天津;一面诱迫清朝政府屈服投降。普提雅廷通过玩弄这一系列阴谋手法,终于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清咸丰八年五月三日),抢在英、法、美三国之先,

① 《有关 1857—1859 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讯》,第 47 号,见《英国议会文件》,1859—1860 年伦敦出版,第 5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18 卷,第 33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卷,第 32 页。

④ 《清文宗实录》,第 245 卷,第 21—22 页。

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沙俄不仅取得了在中国沿海七个口岸通商、内地自由传教、领事裁判权、陆路通商人数货物本银不受限制、派兵船至各通商海口保护教士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侵略特权，而且在该约第九条里还特别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①这就为此后沙俄以“清理边界”为名，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制造了借口。

在普提雅廷逼签《中俄天津条约》前半个月，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利用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机，乘兵船直趋瑗琿，凭借武力，逼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签订了《中俄瑗琿条约》。沙俄通过《中俄瑗琿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为中俄“共管之地”。

沙俄尽管通过《中俄瑗琿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从中国攫取了重大的侵略权益，但是仍不满足。《中俄天津条约》的抄件刚刚传到俄国，沙皇政府中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就抱怨这个条约“过分注意欧洲利益的一致性，却完全忽视了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漫长的陆上疆界”，叫嚣要捍卫“俄国陆上利益”，对《中俄天津条约》追加“补充条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页。

款”^①。

一八五九年四月,沙俄政府指令在北京办理《中俄天津条约》换约手续的沙俄代表彼罗夫斯基(旧译丕业罗幅斯基——引者),向清朝政府提出对《中俄天津条约》的所谓“补充条款”八条。其中,在领土问题上除要求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之外,对于中国西北边疆,沙俄居心险恶地提出,两国从沙宾达巴哈起至额尔齐斯河、斋桑;又自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地方,至阿拉套山、浩罕边为界。企图把中国境内的斋桑、阿拉套山等处作为两国分界的标志,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此外,沙俄还要求在中国西北的喀什噶尔和东北的齐齐哈尔、华北的张家口等地通商并设置领事。沙俄的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清朝政府办理换约手续的代表肃顺等人的严词驳斥。清朝政府还数次照会沙俄代表,对“八条”逐款进行批驳。针对沙俄提出的在中国西北部“立界”问题,清朝政府指出:中国在该处“均有向来定界,应毋庸议”^②。

沙俄政府在指令彼罗夫斯基向清朝政府提出八条“补充条款”的同时,又任命侍从武官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进行讹诈。一八五九年六月,伊格纳提耶夫到达北京,代替彼罗夫斯基与清朝政府谈判。伊格纳提耶夫又抛出一个所谓“补续和约”草案六条,并附有《补续和约条目详解》一份,压迫清朝政府接受。这个《补续和约》草案的内容,不仅包括彼罗夫斯基所提八条“补充条款”的全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1902年旅顺出版,第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7卷,第16页。

部侵略要求,又进行新的勒索。关于中国西北领土问题,沙俄无视中国政府关于该处“均有向来定界”的历次声明,再次提出“划界”,并声称:“倘中国仍不商办,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①。同时,沙俄还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境内划分两国西部疆界的原则,即:“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喀(卡)伦等处,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②明目张胆地要求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伊格纳提耶夫在其《补续和约条目详解》里,杀气腾腾地威胁说,如果清朝政府不照他们的要求办理,俄国将仿照英、法对中国“争战”^③。

清朝政府对沙俄这个《补续和约》草案六条据理进行了驳斥。关于西疆问题,清朝政府再次申明,中俄两国在这一地区“本有分疆地界”,并表示如果俄国一定坚持要“划界”的话,只能由该处中国官员会同俄国使臣“照旧定交界办理,以免侵占”^④。

伊格纳提耶夫在北京对清朝政府施展种种威逼、诱骗手段,在谈判中大肆恫吓,一再以战争相威胁,但是始终遭到清朝政府拒绝,未能达到讹诈目的。于是,他便采用普提雅廷的故伎,于一八六〇年五月离京前往上海,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9卷,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④ 同上书,第34页。

正在那里集结的英、法侵略联军直接勾结，策划再次武装北上，对清朝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此后，在英、法侵略联军从北塘登陆到进犯北京的过程中，伊格纳提耶夫一直充当英、法联军的帮凶和谋士的可耻角色，搞了许多罪恶勾当。一八六〇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清朝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北京只留下恭亲王奕訢办理“议和”。伊格纳提耶夫即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对清朝政府展开逼降活动。他协助英、法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分别于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事后，又以“调停有功”自居，向清朝政府勒索“报酬”。伊格纳提耶夫提出一个比一年前抛出的《补续和约》六条更为狠毒的《续约草案》十五条，逼迫清朝政府签字画押，“几于一字不能更易”^①。他以十足的强盗口吻威胁清朝政府说：“俄国可以严厉地惩罚你们，……对俄国来说，如果要在—万俄里长的中俄两国边界线上对你们任何一地发动一次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把联军召回北京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只要致函英、法公使，说他们同中国订立的条约不牢靠，需要修改，就行了”^②。清朝政府在伊格纳提耶夫百般威逼之下，被迫全部接受沙俄的要求，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咸丰十年十月二日）同沙俄签订了《中俄续增条约》，也称《中俄北京条约》。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8卷，第14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05、230页。

《中俄北京条约》是沙俄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继《中俄璦琿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取得了在中国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和西北的喀什噶尔等地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领事裁判权等许多特权，而且在条约中写入了它长期以来所谋求的、旨在侵吞中国西北领土的所谓中俄西疆“划界”条款。

二、《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划界”条款为沙俄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制造了“根据”

《中俄北京条约》共十五条，其中关于西部“划界”问题的规定，集中在该约第二、第三两条。

《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的全文是：“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①。这一条款是伊格纳提耶夫一八五九年抛出的所谓《补续和约》草案第二条的翻版，是沙俄一手炮制并强加给清朝政府的以划界为名行割地之实的条款。

这一条款所规定的中俄西疆“划界”原则，把中国的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0页。

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指为分界必经之点，把中国西北的常驻卡伦列为分界标志之一，为沙俄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

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是中国的内湖，这是中外共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斋桑泊北距中俄交界之处的俄国边堡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有四、五百里之远，西面到中国边界河流爱古斯河还有近四百里。特穆尔图淖尔距离边界更为遥远，从该湖西面到边界要经过吹河和塔拉斯河流域。《中俄北京条约》将这样两个距离边界很远的中国境内湖泊硬指为“划界”时必须经过的地点，明显地是要在中国境内“划分”两国疆界，将大片中国领土强割给俄国。

至于把中国西北的常驻卡伦列为分界标志，更是荒谬之极。“卡伦”一词，源出于满语，原意为台，是“更番候望之所”，即军队哨所^①。清代在西北地区大量设置卡伦，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平定乌梁海和准噶尔贵族叛乱之后。其作用主要是为了：（一）驻守山川隘口、交通要道，盘查来往商旅行人，拱卫重要城镇；（二）对流放到西北的罪犯和官设厂矿工人、屯工、船工等进行监视，“缉捕逃人”；（三）区分境内游牧民族、部落间的地界，禁止相互“私越”，执行一定的管理职能^②。有的卡伦还兼有传递文书、情报等任务。卡伦设置的地点，遍布于西北地区的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0卷，《北徼喀伦考》。

② 《西域图志》，第31卷，《兵防》；《新疆识略》，第11卷，《边卫》；《嘉庆朝大清会典》，第491卷，《兵部、八旗处分例、捕逃》。

东、南、西、北各地，并不局限于西面和北面一线。如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南部的叶尔羌、和阗等地均设有卡伦，前者还与设在甘肃省的卡伦相衔接。这些卡伦之间巡查的道路（即“开齐”），构成一个网状系统，是清朝政府在广大的西北地区进行管理的设施之一，同国界完全是两回事。

即使就最靠边境的卡伦而论，与国界也都相距尚远。如北面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的卡伦，设置在唐努山以南、布克图尔玛河、那林河至额尔齐斯河一线，卡伦之外为中国唐努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族的居住地。卡伦至国界之间的距离，少者数百里，多者达千余里。西面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的卡伦，以塔城为中心，东北方与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卡伦相衔接，称塔尔巴哈台东路卡伦；向西南至阿拉套山，称塔尔巴哈台西南路卡伦。这两路卡伦之外，均为中国哈萨克族一些部落的居住和游牧地，其间地域辽阔，以设于额尔齐斯河西岸的辉迈拉虎卡伦计算，与国界相隔也在二百里以上。西面伊犁将军管辖的卡伦，以伊犁将军住地惠远城为中心，在伊犁河以北，分布于阿拉套山、图尔根河（今苏联博罗呼济尔河）一带；在伊犁河南，分布于察林河、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一带^①。这些卡伦与国界相距更为遥远，自五百里至千余里不等。卡伦之外，都是中国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居住和游牧地。

^① 本目所述西北卡伦设置地点，均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夕情况为准。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卡伦根本不是也不能作为中国国界的标志。至于“常驻卡伦”，更是如此。

中国西北地区的卡伦，按照设置情况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称“移设卡伦”，是按照季节的不同进行挪移的卡伦；一类称“添撤卡伦”，是在一定季节设立、其它季节撤除的卡伦；一类为“常驻卡伦”，即常年固定、不移不撤的卡伦。在这几种卡伦中，常驻卡伦多数都设在城镇附近，更加靠近腹地。如伊犁西面的常驻卡伦，有的距离惠远城不过一百多里。十分明显，《中俄北京条约》把这样的卡伦硬列为分界标志之一，较之把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指为界湖更为狠毒，是要在整个中俄西段边界线上，将俄国国界一直推进到中国西北的纵深地带，割占大片中国的领土。

本章第一节里已经叙述，在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前，它已经用武力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土地，向中国西北的许多地方伸出了侵略魔爪。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当时仍未能占领中国的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两个湖泊和两湖周围地区，更谈不到把它的非法占领线扩张到中国常驻卡伦附近。《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使沙俄不仅得以借此将它过去一手制造的强占中国西北领土的侵略事实“合法化”，而且还给它进一步掠夺更多的中国土地制造了“根据”。站在沙俄扩张主义立场上的俄国人布克斯盖夫登，后来在写作《1860年北京条约》一书时，就曾洋洋得意地叫嚷：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俄国人“得以

将边界线任意向中国的西部推进”^①。

还应当指出,《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文字,中文和俄文两种条约文本是有差异的,例如:(一)中文约本列为两国分界标志之一的“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在俄文本中写做“中国现有卡伦路线”,没有“常驻”二字;(二)中文约本对从沙宾达巴哈开始的两国分界走向,规定为“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俄文本写做“向西南到斋桑湖”。这一差异,完全是沙俄侵略者所制造的。因为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沙俄一手包办了起草条约俄文原本和把俄文本译成中文的全部工作,清朝政府只能在俄方拟好的两种文本上一字不改地签字画押。对于上述两种条约文本的差异,沙俄后来在同清朝政府进行具体“划界”谈判过程中,采取了极其卑劣的态度,即从两种文本中分别抽取那些它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文字,交替用两种文本对清朝政府进行讹诈,以便尽可能多地侵吞中国领土。例如,在卡伦问题上,沙俄后来抓住中文约本上所写的“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字样,硬要以常驻卡伦划界;而在从沙宾达巴哈开始的两国分界走向问题上,沙俄又说必须以俄文约本规定为准,即“向西南到斋桑湖”,否定中文约本中“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的规定。

《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内规定,中俄西疆划界、立界牌工作由双方派员“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经过实地查勘后,定界立牌^②。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35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0页。

第三节 沙俄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一、《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的阴谋策划和侵略部署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政府又积极策划和部署新的侵略活动，利用这个条约有关在西段“划界”的条款，向清朝政府进行勒索，企图更多地割占中国西北领土。

一八六一年八月，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派遣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作业部主任巴布科夫到塔城，和清朝政府谈判西部边界的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会商中俄西段边界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已由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商定：双方派员于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一日在中国的塔城会谈。明谊在巴布科夫来到塔城后不几天，就把中俄双方的这一协定通知了巴布科夫。可是，这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却迫不及待地提出不必等到来年，要马上按照地图约定国界方向。他还要中国方面通知各处守卡官兵，对沙俄在当年冬天和来年春天向沙宾达巴哈一带运送木石，不要阻拦。这显然是企图在中国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地定约，并设置界牌，以达到多侵占中国领土的目的。中国谈判代表明谊等以巴布科夫既没有俄方的全权证书，所提要求又违反中俄双方的协议，

予以拒绝，坚持等到第二年再开始商谈勘界问题。同时声明，俄方运送木石不得越入中国境内^①。

巴布科夫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他利用在塔城的机会，盗窃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和中国西北边疆地理方面的许多重要情报。

巴布科夫回到鄂木斯克以后，在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的指使下，着手整理他所搜集到的情报，并开始炮制一条任意侵吞中国领土的中俄西段边界线。杜加麦利和巴布科夫还同驻中国伊犁的沙俄总领事扎哈罗夫^②进行密商，如何最大限度地把俄国国界线向中国西北境内推进。接着，巴布科夫就亲自带着所搜集到的大批材料和所草拟的中俄西段边界线图纸赶到彼得堡，同沙皇政府的要员们进行密谋策划。一八六二年一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集陆军部、外交部头目开会，研究和决定侵略部署，任命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人为同中国谈判的全权委员。会后，亚历山大二世还亲自召见巴布科夫，面授侵略旨意，并且赏给他一枚刻着沙皇名字的宝石戒指^③。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也就是代表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伊格纳提耶夫，在把沙俄政府外交部有关和中国谈判西部边界的训令交给巴布科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卷，第36—40页。

② 扎哈罗夫因为利用塔城火烧贸易圈事件侵华“有功”，被沙俄政府提升为“总领事”。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31—139页。

夫时说：“授予你完全的行动自由、极广泛的主动权”，保证支持巴布科夫的任何侵略行动^①。

沙俄外交部在这个训令中，首先要求其委员在同清朝政府谈判中，紧紧抓住《中俄北京条约》中有关西部“划界”的条款，并对《北京条约》第二条尽量作有利于沙俄的曲解，作为勒索的借口。训令中说：“应该在这种意义上解释《北京条约》的第二条，即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来进行。”俄国委员对此要“加以特别的注意和坚持”，设法“说服中国各委员，使他们在划定国界时接受以常设卡伦线为基础”^②。沙俄外交部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要把《北京条约》第二条中关于以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分界标志之一的规定进一步歪曲成全部国界都要“以中国常设卡伦线为基础”来划分，以达到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目的。

沙俄政府在训令中，还公然指示巴布科夫等人违反《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把中国的斋桑泊据为俄国所有。《中俄北京条约》仅仅规定，斋桑泊作为中俄西段边界线经过的地点。而训令却强调说：斋桑泊的问题对俄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保留对斋桑泊的专有权，是我们的愿望”^③。按照沙皇政府的这一训令，俄国谈判代表挖空心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191页。

③ 同上。

思地安排了这样一条国界线：“使它的一点顶到斋桑湖的东端，然后绕过喀喇额尔齐斯河的三角洲，沿该河右岸东行到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吉尔吉斯人称为阿克求别），从这里陡转向南，向塔尔巴哈台山岭前进”^①。这样就不仅吞并了整个斋桑泊，而且还将囊括中国斋桑泊周围的绝大部分领土。

沙俄政府在训令中，对特穆尔图淖尔地区的“划界”问题，更是明目张胆地篡改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关于边界线应顺特穆尔图淖尔划分的规定。他们不但要把整个特穆尔图淖尔划归俄国，而且还要吞并该湖以东的察林河、格根河和特克斯河水系上游的全部地区。沙俄外交部告诉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占有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善塔斯山口和从特穆尔图淖尔地区通向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城市最便捷的通道^②。这就更露骨地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巴布科夫等人根据沙俄政府的这一训令，炮制了一个准备在谈判中强加给中国的中俄西段“国界草案”。这个“国界草案”，不仅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关于中俄西疆“划界”的规定加以具体化，而且在许多方面明显地歪曲了该约的规定。当时沙俄驻塔城的领事斯卡奇科夫也认为这个“国界草案”所标划的中俄西段国界线，是“与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03页。

② 同上书，第193—194页。

《北京条约》不相符合的国界线”。他担心：“如果中国知道我们这次硬要坚持把那些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和计算出的界线以外的地方多划给我们，那么为此要雄辩地说服他们，就需要用许多巧妙办法才行。”^①

贪婪无比的沙俄侵略者巴布科夫等人为了达到侵略目的，预先商定了一个在谈判中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的“行动方针”，即在谈判中首先逼迫清朝代表“按照中国的常设卡伦线实行划界”，然后抛出俄国制定的“国界草案”，“向中国委员提出并请求作出绝对的答复”。如果清朝代表不同意，俄方就以“停止谈判”相要挟^②。他们还采用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侵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的办法，派出武装部队，占领“国界草案”中俄方所要求的土地，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朝政府屈服。

一八六二年春，巴布科夫亲自到深入中国境内的沙俄据点科帕尔一带，和扎哈罗夫会面，密商侵略步骤，并和沙俄在中国西北领土上的侵略头目——所谓的“阿拉塔夫特区”区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一起，进行军事部署。在他们指挥下，沙俄武装部队从维尔内、科帕尔、科克佩克特等侵略据点纷纷出动，向中国常驻卡伦推进，占领他们任意划定的“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据点。在伊犁河南，俄军侵入特穆尔图淖尔地区，并向东越过察林河，在格根河上驻扎；在伊犁河北，俄军进逼博罗呼济尔卡伦，从该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86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处威胁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在斋桑泊地区，俄军越过斋桑泊，占领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盆地，深入到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附近。此外，沙俄还向临近谈判地点塔城的巴克图河边派驻了军队，以直接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这些沙俄侵略部队在中俄塔城谈判将要开始时，大肆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无理阻拦中国派往勒布什、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巡查的边防部队；擅自在中国卡伦附近垒立边界标志——鄂博。巴布科夫疯狂叫嚣，这是为了“使中国人意识到，常设卡伦所在的那些地方的这条界线，实质上也就是国界”，“我国部队分布在边界上的这一事实，明确地向中国人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可能随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①。

二、一八六二年中俄塔城谈判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朝政府根据条约的规定，对即将在塔城举行的新疆“划界”谈判进行准备。一八六一年三月，清朝政府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为“会勘地界大臣”。六月，明谊由乌里雅苏台驰抵塔城，一面等候俄国代表前来，一面对中国西北边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明谊、明绪等在给清朝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从我境内、卡内分界，关系甚重”，“若特穆尔图淖尔，则在伊犁边内；至于斋桑淖尔，则明明在塔尔巴哈台辉迈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79页。

拉扈等三处卡伦之内。若自此议分，不特占据我国之边界，恐将中华原设之卡伦更被其包入”^①。然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更加软弱和妥协，不敢提出废弃《中俄北京条约》中这些割占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款，只是希图通过谈判，向俄人作一些“割辩”，以尽量减少领土的损失，并防止沙俄在谈判中进行新的讹诈，“任意侵占，漫无限制”^②。

中俄塔城谈判原定一八六二年五月举行。后经中俄双方商定，推迟到七月。

一八六二年七月，俄使巴布科夫由科帕尔出发，经由阿亚古斯、乌尔扎尔，来到塔城。巴布科夫袭用一八五八年扎哈罗夫来塔城谈判的故伎，随带马步兵三百余人，大炮两门，在逼近塔城城垣的巴克图卡伦外驻扎，对谈判施加军事压力。这时，明谊也由乌里雅苏台来到塔城，会同明绪等人，准备与俄使举行谈判。

八月三日，中俄双方代表举行首次会议。巴布科夫根据预先策划好的侵略步骤，一开始就提出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的无理要求，并出示俄方拟定的国界地图，“内点红色为限，不论中华边疆，止以常住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③。中方代表当即驳斥俄方对《中俄北京条约》的歪曲，指出：“条约内载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至浩罕边界为界，袤延万里，其中仅有三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卷，第18—19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9卷，第35页。

地名，系指大数而言，再未详细指定逐段立界之处。况条约内载现在中国常住卡伦等处，并无为界之语。自应细查条约，遵照地图，于从前已定旧界之外，专论从前未定之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查勘后，秉公商办”^①。中方代表并举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辖境内的中国乌梁海族人民和塔尔巴哈台辖境内游牧于爱古斯、勒布什一带的中国哈萨克族人民，以及伊犁辖境内特穆尔图淖尔、哈喇塔拉地区的中国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人民，尽管居住于常驻卡伦之外，但他们都是中国的属民，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都是中国领土，不能将其地“分隶”俄国。然而，俄方代表对中国这些有理有据的申述，或“佯为不理”，或“强词”相辩^②，一味坚持其无理要求。最后商定八月六日再议。

八月六日继续谈判，俄使仍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中方代表提出：“条约所载因系未定之界，是以两国特派我等会议。现有我国旧址地图，自应照图详议”。俄使立即声色俱厉，大声恫吓：“若要如此，即可不议”，“我们只好带来兵队占据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③。由于沙俄代表的蛮横无理，谈判陷入僵局。

八月十日，俄方参加谈判的另一代表、驻伊犁总领事扎哈罗夫赶到塔城。扎哈罗夫来后，在中方代表全权证书的效力问题上无理纠缠十余日之久，直到八月二十四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卷，第35—36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37页。

日，双方才又继续会谈。会上，扎哈罗夫一人“刺刺不休”，对中方代表声称，如不依照俄方提出的方案以常驻卡伦为界，即是中国“废了条约”。明谊等人驳斥扎哈罗夫，指出：中俄“彼此疆界各有定制”，常驻卡伦从来都不是中国的国界线。至于《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系总其大纲，商办始定其界址”，因此双方应当“据图而议”。明谊等还举出位于常驻卡伦以西的勒布什为例，指出“自乾隆年间立有石碣，现在尚存，且我国伊犁、塔尔巴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该处查收哈萨克呈交之租马，均在此界会哨，岂非大清国之境界耶？”扎哈罗夫在事实面前恼羞成怒，竟然破口大骂：“此界系你们伊犁将军私行偷立”，“伊犁将军真乃小人之行，我们不能为凭”^①。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此后，中俄双方代表又连续在塔城进行几次会谈。俄使始终坚执以常驻卡伦为界。中方代表竭力辩驳，毫无结果。九月下旬，俄使按照预谋，抛出事先拟好的“国界草案”，威逼中方代表说：“若不照此办理，即可毋庸再议”^②。明谊等人表示，对俄方提出的草案要等请示后才能答复。沙俄代表竟以中方“推缓日期”为借口，单方面中止谈判，声明定于十月十二日离去^③。当中方代表挽留俄使在塔城稍候数日时，扎哈罗夫大叫大嚷：“已经会议十数次，你们不能以常住卡伦为界，我们不能等候”。中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卷，第39—40页。

② 同上书，第10卷，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方代表询问双方代表以后在何时、何地再行会谈，扎哈罗夫用威胁口吻回答说：“将来议与不议，尚难预定”^①。

这次中俄塔城谈判，就因俄方代表无理离去而中断。

三、塔城谈判中断后沙俄进一步 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

塔城谈判中断后，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明谊等人关于塔城谈判情况的报告，曾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两次照会沙俄驻京公使巴留捷克，进一步申明中国对《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西疆“划界”的态度，驳斥沙俄在塔城谈判中“故意偏解”《北京条约》，企图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种种谬论。照会指出，沙俄代表所称要“以现在中国常住卡伦为界”，完全是对《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曲解。《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住卡伦等处”，是说“分界时亦有可以及常住卡伦之处”，“非谓统以常住卡伦为界”。所以，“条约仅载有及卡伦等处字样，并无以卡伦为界之语”。对于沙宾达巴哈到斋桑泊地区划界问题，照会指出《北京条约》第二条明文规定：“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并不是“由沙宾达巴哈向西南斜行至斋桑淖尔湖”。俄方在塔城谈判中对此段国界所提出的要求，“是往向西南，而背条约内‘往西’之语。且既往西南，系属斜行，更背条约内‘直至’之语”。照会还质问沙俄政府：俄方代表扎哈罗夫在塔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卷，第53页。

会谈中“动云带兵占踞”，并出口不逊，诬蔑乾隆年间中国政府在勒布什所立石碣为“私立”，谩骂伊犁将军为“小人之行”，“如此恃强背理，为守条约乎？抑废条约乎？”最后，清朝政府表示：即使按照《中俄北京条约》来划界，已“于中国亏损甚多”，何况现在俄方又“欲强占于条约之外”，中国当然不能答应。因此，要求巴留捷克将中国政府的上述意思和态度告知俄国政府通知俄方谈判代表，“令其照约办理，勿再另生枝节”^①。

对于清朝政府的照会，巴留捷克一味支吾搪塞，借口“未深悉该事情形”，表示“难从中剖辩”，只答允将照会交本国政府和西西伯利亚总督^②。

这时沙俄政府正在利用塔城谈判的中断，部署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沙皇政府向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发出指令，要他“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我（俄）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并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国界问题上协助支持我（俄）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得以监视吉尔吉斯人和草原上的治安”^③，也就是镇压俄军非法占领区内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沙俄政府要杜加麦利在一段时间内故意“对中国人不表示俄国方面同意恢复划界谈判的决心，并为此避免对中国地方当局作出边界问题的任何说明”。如果中方主动提出恢复谈判的建议，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1卷，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11卷，第6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52页。

那么,必须要求中国人“提出证明”,保证“国界将沿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而行”,“全部国界问题将按照俄国代表所提出的方案解决”,否则就予以接受^①。

根据这一侵略指令,沙俄西西伯利亚侵略军从一八六三年春季开始,以比上年更大的规模,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紧逼中国常驻卡伦。

在塔城附近,俄军数百人携带枪炮器械,于四月中旬侵入中国巴克图卡伦之外,强行驻扎。中国官兵提出质问,俄军声称:“你们常住卡伦之外就是我们地方,我们上司到此防守。”^②五月,俄军竟潜入中国卡伦开齐^③内,偷垒鄂博,被中国驻卡官兵发现后拆毁。

在塔城东北部,俄军侵入中国乌里雅苏图卡伦附近,阻拦中国官兵越过哈穆尔山去斋桑泊一带查卡,并持械逞凶,强拆中国出卡巡查官兵的帐篷,逼令中国官兵移至卡伦之内居住^④。

在斋桑泊地区,巴布科夫亲自率领一支由武装部队组成的所谓“斋桑考察团”,侵入斋桑泊地区进行活动。俄军还乘坐轮船“万岁号”,由鄂木斯克出发,强行驶入额尔齐斯河上游和斋桑泊,进逼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巴布科夫宣称,这个“斋桑考察团”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占领邻接斋桑湖的地方,一劳永逸地使中国人了解,斋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5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5卷,第54页。

③ “开齐”即卡伦之间巡查的道路。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7卷,第3—4页。

桑湖也好,全部周围地方也好,从今以后都无例外地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①。

在科布多地区,五月上旬,俄军侵入昌吉思台卡伦附近,声言要在布克图尔玛河、推河和哈喇布勒扈克及汗山一带“搭房住牧”^②。五月中旬,俄军侵入和尼迈拉虎与胡兰阿吉尔干两卡伦之间,守卡官兵进行阻拦,俄军竟武力驱赶和尼迈拉虎卡伦守卡官兵,捣毁卡伦毡房、帐房,抢走军器马匹,并将中国官兵十三人绑架到俄国兵营进行毒打。俄军扬言:自昌吉思台卡伦以西、阿尔泰山后、科尔沁河西部都是俄国地方,不准中国人住牧行走,否则将“拿获解送”俄国^③。

在伊犁西部,俄军的入侵活动更为猖獗。从五月开始,即有数以千计的俄国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从西北、正西、西南三路进逼博罗呼济尔、奇沁、鄂尔果珠勒等卡伦,在科斯莫鑫、倭根塔斯、爱达尔科木、格根等地强行驻扎,阻拦中国巡查官兵,“语言强聒,诸形叵测”^④。

与此同时,沙俄加紧在占领区内推行其殖民统治,强迫哈萨克等族人民“出给手印字具”,声明“归属”俄国^⑤。沙俄还加紧向纳林河上游一带扩张,派出所谓“喀什噶尔部队”,到这一地区寻找建立堡垒的地点,并企图“开辟一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68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6卷,第1页。

③ 同上书,第16卷,第21—22页。

④ 同上书,第17卷,第7页。

⑤ 同上书,第16卷,第22页。

条从外伊犁边区到喀什噶尔的直路”^①。

对于沙俄上述一系列的侵略和挑衅行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一八六三年六月至八月曾多次照会沙俄驻华代办格林卡（中国文献旧译作格凌喀），抗议俄国军队深入中国境内，阻拦中国部队巡逻，驱赶、拘禁中国守卡官兵等罪行，要求沙俄“将各处兵队撤回”^②，并迅速派员到塔城重开谈判。俄国代办格林卡在复照中，一面颠倒是非，反诬中国军队在中国境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是进入俄国界内“滋事”^③，声称：“两国西北边界至今尚未议定，此系中国分界大臣之咎，因此，不得谓本国官民不能前往按约分界后应归本国界内之地”^④；一面蛮横地表示，中国必须全盘接受俄方谈判代表上年在塔城所提出的划界议单，否则俄国代表不能前来谈判。对于沙俄代办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八月七日的照会中予以驳斥，指出：“中国派兵巡查旧有边界，系照向章办理，并非自去年为始，既未越过中国旧界，亦无滋事情形。其贵国官兵忽来强占，并拘禁卡兵，抢去马匹，正是滋事。盖边疆未分之先，中国人前往旧界，不为背理；俄国兵突来占踞，实为背理。若谓各该地方系分界之处，亦应俟分界后互相守卡，方为各守各界。乃突然派兵前来，便非各守各界本意。况现在条约尚未讲明，更

①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第256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7卷，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17卷，第45页。

④ 同上书，第37页。

何由知该处应归贵国界内耶？”^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给俄方的历次照会中，还就《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款的解释问题反复申明中方态度，驳斥俄方的曲解，要求沙俄对上年十二月中方关于这一问题的照会给予答复。七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直接照会俄国外交大臣，并将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中方照会再次抄录递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再催问下，格林卡在八月三日复照中，就这一问题进行诡辩。格林卡借口说，由沙宾达巴哈到斋桑泊一段的国界走向，按照《北京条约》俄文本的规定，应为“向西南到”，因此，中文约本写作“往西直至”系翻译错误，一口咬定俄方谈判代表所提划界议单“实属与条约之正义相符”^②。可是，对《中俄北京条约》两种文本中关于“中国现有卡伦”和“中国常驻卡伦”这一差异，格林卡却默不作声。沙俄在这里，完全是利用两种约本的差异随心所欲地进行讹诈。

就在清朝政府向沙俄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交涉和中俄双方就约文解释往返辩论的过程中，沙俄军队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入侵挑衅活动却逐步升级，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进犯中国卡伦、向中国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官兵的流血事件。

六月中旬，俄军向伊犁西北的博罗呼济尔卡伦发动进攻，“用大炮向防堵官兵施放，并火箭炸炮击打”^③。中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7卷，第47—48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18卷，第38页。

国守卡官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俄军还在卡外一带扬言：“自索伦营沙冈以外地方，是我们用银子换的。若不给我，用炮攻取后，再取喀什噶尔地方。”叫嚣要“派匡苏勒官带兵一千名，同往塔尔巴哈台，入塔勒奇沟，进伊犁城”^①。

六月底、七月初，俄军又连续两次进犯博罗呼济尔卡伦，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多人。中国士兵进行还击，将俄军击退^②。

七月中旬，俄军向伊犁西南的鄂尔果珠勒卡伦发动袭击，“直扑防堵营盘，施放枪炮滋扰”^③，中国士兵和当地的哈萨克族人民英勇反击，俘获俄军三人。

此后，俄军在伊犁西部所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仍继续不断。在塔城和科布多地区，俄军的入侵活动也更加猖獗。沙俄就是以这种野蛮的军事入侵和挑衅，向清朝政府进行威胁、恫吓，配合它在谈判桌上的卑鄙讹诈。

四、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在沙俄的入侵挑衅活动面前，中国西北各族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抗斗争。驻守西北边疆的清军广大士兵，对野蛮残暴的沙俄侵略者早已“恨之切齿”^④，面对俄军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8卷，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28页。

④ 同上书，第17卷，第8页。

的挑衅，他们忍无可忍，“人情汹汹，勇气十倍”^①，坚决给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打退了俄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居住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广大群众和爱国首领，积极支持边防士兵的抗俄战斗。他们不仅“送羊助马”，并且亲自协助作战，“出力拿贼”^②。在俄占区内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一直坚持斗争，有的毅然离开俄占区，迁入卡内，表示誓死不肯从俄的决心。如游牧于斋桑泊一带的哈萨克族的克烈部落，拒绝臣服于沙俄，绝大部分在首领哈萨克公阿吉带领下，内迁到阿勒泰地区^③。在纳林河一带居住的柯尔克孜族人民，还在鄂斯满、察尔根等人领导下，聚集一万多人，在松库勒（即森格尔池）附近阻击入侵俄军，“打仗三昼夜”^④，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面对沙俄的侵略暴行，伊犁各族人民也以各种方式对俄国强盗展开斗争，拒绝向沙俄领事馆和贸易圈供应生活用品，向派出来采购食品的领事馆卫队投掷石块。在伊犁人民高涨的抗俄斗争情绪面前，俄国领事馆代理馆务科洛托夫金（旧译廓罗托维精）终日提心吊胆，惟恐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于一八六三年七月的一个晚上仓皇逃出伊犁城。科洛托夫金在逃跑途中，怕被伊犁人民活捉，连失落的护兵和证书、文件、银两都顾不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7卷，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29页。

③ 至今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哈萨克族群众还清楚地诉说，他们的祖先是怎样为了留在祖国的怀抱而忍痛离开斋桑泊一带的。见《新疆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9卷，第43页。

得寻找，活现出侵略者在中国人民的反抗声中丧魂落魄、狼狈逃窜的丑态^①。

可是，和广大人民坚决抗俄的正义行动相反，清朝政府却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之下又一次向沙俄侵略者妥协屈服了。

早在一八六三年上半年，当俄军纷纷出动，陆续紧逼中国西北的常驻卡伦的时候，清朝政府认为新疆划界之事“早结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若再稽滞迁延，恐将来又另生枝节”^②。因此，一面照会俄国政府，催促俄方代表前来谈判；一面命令明谊“迅赴塔城，先期以待”^③，希望将新疆划界“速行议结”。不过，这时清朝政府还不甘心全部接受俄方侵略要求，而是希望能够“降格以求”，“折中定议”^④。这种让步，当然满足不了沙俄侵略者的胃口。因此，沙俄对清朝政府提出的重开谈判的要求不予理睬，而俄军在中国西北的入侵挑衅事件却继续加剧。六、七月间，俄军在伊犁西部进犯中国卡伦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清朝政府更为恐慌。这时，清朝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西北回民起义，它不仅害怕沙俄在西北边疆进一步扩大事态，造成“兵连祸结”^⑤的局面，而且还担心俄军在中俄接壤的其他地区“乘虚来犯，蹈我之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0卷，第30—32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78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5卷，第52页。

③ 同上书，第16卷，第3页。

④ 同上书，第17卷，第34页。

⑤ 同上书，第18卷，第56页。

瑕”^①。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了清朝统治阶级不惜对外妥协,以维持在国内的统治。清朝政府竟以“该国似此强横,……若不早为完结,诚恐酿成不可收拾之势”^②为理由,向沙俄的军事压力屈服,全部接受了俄方的侵略要求。一八六三年九月九日,清朝政府照会俄国驻华代办,表示同意按照俄方上年塔城谈判中所提出的分界议单勘定边界,“妥商照办”^③。同时,清朝政府提出俄方应以撤退入侵俄军为交换条件。俄国代办格林卡坚持不肯以书面保证撤退军队,仅敷衍清朝政府说,可“请求本国政府从国界上撤退部队,如果那个国界已经被部队所占据”^④。事后,巴布科夫承认:“我国代办给予中国人以这种诺言,是注意到这个诺言他并没有向中国人保证履行,所以无论如何对于我国不可能有拘束的力量。”^⑤就是说,完全是欺骗性的。实际上,此后沙俄的入侵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步步进逼。

一八六三年十月十日,沙俄谈判代表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等再一次来到塔城。十月十六日,刚刚恢复谈判,俄方就拿出他们单方标画的边界图纸,要中方代表接受,声称若不照图定义,就要在十月二十二日起程回国。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8卷,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60页。

④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67页。

⑤ 同上。

谊等由于还没有接到清朝政府关于同意俄方议单的通知，表示必须等政府通知到达后才能“遵照换约”^①。沙俄代表态度专横，不肯等待，又一次中断谈判，起程回国。

其后不久，明谊等人接到清朝政府指示，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照会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表示同意按照俄方议单办理划界，要求俄方“派员前来，商办换约”^②。不料，杜加麦利却在复照中答复说，明谊等人照会中写有“商办”之语，说明中方代表“打算在当前会议中再来从事应当如何划分国界的争论”^③，因此悍然拒绝派员前来。此后，明谊等人又几次照会杜加麦利，说明在俄方议单内“多有含混不清之处”^④，如有关划入俄方土地上的中国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的住牧生计问题，需要双方进行协商，作出适当安排。但是，沙俄竟连清朝代表提出的这样一点点微小的协商余地也不允许。杜加麦利极其蛮横地表示，在常设卡伦以外的中国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均为该国所屬之人”^⑤，无可协商。并说，中方代表如果想要同俄方谈判划界，那就必须赶快送出答复文件，保证“毫无变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4卷，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22卷，第32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1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7卷，第32页。

⑤ 同上。

地接受俄方所拟定的国界线，“在当前的会议中没有争论的企图，而只是从事于编制议定书和地图”^①，就是说，中方代表只能签字画押，不能争辩。杜加麦利甚至威胁说，如果中方不如此照办，那么“边界事务委员会将被结束，而国界谈判此后就不能恢复”^②。在沙俄一再威逼之下，清朝代表被迫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向杜加麦利发去了“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③的屈服照会。

一八六四年九月，俄使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等又一次来到塔城。同时，俄军六百余人，携带炮械，驻扎于城外的小水地方“逞兵挟制”^④。扎哈罗夫、巴布科夫等人的态度较之过去更为傲慢专横。未曾会谈，先就拿出他们预先已经“画定分界限道”的边界图纸，要中方派人前去俄使住所“添写清字地名，以便互换”，并宣布：“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⑤。会谈期间，扎哈罗夫等人“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⑥。俄方还节外生枝地提出无理要求，要“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外小水地方旧住种地民庄五处，务于立界前向内挪移”，“自咸丰十年京城换约（指《中俄北京条约》——引者）之日起，所有中国向在卡外住牧陆续越入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4页。

② 同上。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8卷，第3页。

④ 同上书，第29卷，第21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22—23页。

卡内者,应于立界时拨回原处”等^①。经中方代表再三交涉,俄使才同意改为:小水地方民庄,于立界后十年之内移到中国新的国界之内;由卡外陆续迁移到卡内的中国人民,以此次换约之日为准,“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随地归为何国管辖”,如有在换约后越境到别处居住的,再照条约拨回原处^②。

十月七日(清同治三年九月七日,俄历九月二十五日),明谊、锡霖、博勒果素被迫与俄使扎哈罗夫、巴布科夫在塔城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当日,双方互换记约两份,地图两份(地图全系俄人绘制)。这个界约记共十个条款^③,主要内容是:

(一) 按照俄方意图重新规定了从沙宾达巴哈起到葱岭为止中俄两国的边界线,将这条新边界线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强行划归了俄国;

(二) 规定在新边界线附近的居民,“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

(三) 规定自换约之日起,二百四十天后,两国立界大臣在边界会齐,“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

至此,持续三年之久的中俄西疆“划界”谈判以清政府被迫屈服、沙俄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而告终。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9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23—24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15—218页。

第四节 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一、《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关于中俄西段边界走向的规定

沙俄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强迫清朝政府接受它一手炮制的划界方案，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从沙宾达巴哈起到葱岭止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沙俄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一条规定：“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勒台山岭；至斋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斋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

根据这一条规定，原自沙宾达巴哈过阿穆哈河和察罕米哈尔河汇流处，经阿勒坦河与哈屯河汇流处到铿格尔图喇的中俄边界线，被向东南推移至萨彦山、唐努山、奎屯山到斋桑泊一线。原属中国的阿穆哈河、阿勒坦河、

哈屯河、察拉斯河、布克图尔玛河、那林河流域和阿勒坦淖尔都被划入俄境。在这一地区居住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乌梁海十佐领，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两旗和哈萨克族部落都被沙俄吞并。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二条规定：“自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往东南行，至赛哩鄂拉；先往西南，后往西行，顺塔尔巴哈台山岭；至哈木尔达巴哈，即转往西南，顺库木尔齐、哈喇布拉克、巴克图、苇塘子、玛呢图、沙喇布拉克、察汗托霍依、额尔格图、巴尔鲁克、莫多巴鲁克等处卡伦之路；至巴尔鲁克、阿拉套两山岭中间，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盖、阿鲁沁达兰两卡伦中间，择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岭东边末处为界。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

根据这一条规定，原自铿格尔图喇过额尔齐斯河，经喀尔满岭、爱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的中国边界线，被向东南推移至赛哩山、塔尔巴哈台山和库木尔齐、巴克图、莫多巴鲁克等卡伦一线。原属中国的爱古斯河、布昆河、阿布达尔莫多河、布古什河、雅尔河流域和斋桑泊、阿拉湖都被划入俄境。在这一地区游牧的哈萨克各部都被沙俄吞并。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三条规定：“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岭东边末处起，依阿拉套大岭往西，顺阿勒坦特布什、索达巴哈、库克托木、罕喀尔察盖等山顶行，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至向东流水之

萨尔巴克图河,向西流水之库克鄂罗木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匡果罗鄂博山,即转往南。向西流水之库克鄂罗木等河之处,为俄国地;向东流水之萨尔巴克图等河之处,为中国地。自此由奎屯河西边之奎塔斯山顶,行至图尔根河水从山内向南流出之处,即顺图尔根河,依博罗呼济尔、奎屯、齐齐哈尔、霍尔果斯等处卡伦,至伊犁河之齐钦卡伦。过伊犁河,往西南行,至春济卡伦,转往东南,至特穆尔里克河源。转东,由特穆尔里克(即南山也)山顶,围绕哈萨克、布鲁特游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转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处,为俄国地;温都布拉克等向东流水之处,为中国地。自此往西南,由喀喇套山顶行,至毕尔巴什山,即顺向南流水之达喇图河,至特克斯河。过特克斯河,顺那林哈勒哈河,靠天山岭为界。自此往西南,分晰回子部落、布鲁特部落住牧之处,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

根据这一条规定,原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到吹河、塔拉斯河西端,经哈喇布拉岭过纳林河至图古斯塔老的中国边界线,被向东南推移至阿拉套山、匡果罗鄂博山、图尔根河、伊犁河边的齐钦卡伦、伊犁河南的春济卡伦、特穆尔里克山和天山正干一线。原属中国的勒布什河、库克乌苏河、伊犁河中下游、吹河、塔拉斯河、纳林河上游广大地区和巴尔喀什湖、特穆尔图淖尔都被划入俄境。在这一地区游牧的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辖哈萨克和柯尔克孜部落都被沙俄吞并。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规定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好多地方明显地不符合《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西疆“划界”原则。例如，被《中俄北京条约》列为界湖的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都被划入俄境。中俄在斋桑地区的边界走向被定为由斋桑泊北的察奇勒莫斯山往东南，沿斋桑泊岸、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这样，尽管边界线似乎顶到了斋桑泊的一端，实际上却使沙俄吞并了整个湖泊，占据了湖周绝大部分土地。至于特穆尔图淖尔，《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规定的边界线根本同该湖不沾边，而是从湖东相隔甚远的特穆尔里克河源、格根河源、达喇图河等处穿过。从而使沙俄不仅割走了整个特穆尔图淖尔，而且也把湖东大片中国领土据为己有。

在谈判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过程中，沙俄政府和谈判代表歪曲《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文，一再声称必须“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然而，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规定的边界走向可以看出，沙俄连自己所声称的这一原则也并不遵守，而是进一步任意侵吞，将中国常驻卡伦“包去多处”^①。如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的乌克克、沁达盖图、乌尔鲁、昌吉斯台等卡伦，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辖的阿鲁沁达兰等卡伦，伊犁将军所辖的匡果罗鄂伦、惠番、特克斯色沁、敦达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等卡伦均被划入俄境。这不但违背了《中俄北京条约》俄文约本第二条关于以“中国现有卡伦路线”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4卷，第26页。

作为分界标志之一的规定，而且也超过了《中俄北京条约》中文约本第二条以“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分界标志之一的规定。

早在一八五八年，恩格斯在评论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时就曾指出：俄国“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现在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十九页）从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到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以“勘分”边界为名所进行的侵略活动，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就是把中国西北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对于这一铁的事实，甚至沙俄的谈判代表也都承认。扎哈罗夫曾毫不隐讳地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对俄国“有利的议定书。据此，大片领土从中国转归了俄国”^①。巴布科夫也曾说：“由于按照中国常设卡伦线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有属于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我国（俄国——引者）领域之内。”^②他供认，仅在斋桑泊周围，沙俄就从中国夺走了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平方

① 《关于中国、东西伯利亚和朝鲜文集》，第十三篇，《关于伊·伊·扎哈罗夫的回忆》。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71页。

俄里土地和六万四千居民^①。

二、《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和《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

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六条的规定，自该约换约之日起过二百四十日，为两国立界大臣约定日期，双方在阿鲁沁达兰、喀布塔盖两卡伦中间会齐，分为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两起，前往实地，“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但是，由于从一八六四年开始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日益猛烈，清朝政府相继失去对南疆、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等地的控制，双方建立界牌鄂博的工作未能按时举行。

沙俄利用这种情况，一面加紧向新近从中国所吞并的地区派兵筑垒，血腥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建立沙皇的反动统治秩序；一面在边境大肆活动，为新的侵华步骤作准备。沙俄公然违反《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四条关于划归俄国土地上的原有中国卡伦在双方会同“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听中国在彼住守”的规定，不断派兵侵扰这些卡伦，“要挟挪避”^②。到了一八六八年四月，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哩竟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来照会，借口“俄国封疆大吏，志在安边，不便仍准中国驻守旧卡”，提出“所有布克图拉苏穆河（即布克图尔玛河——引者）一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5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9卷，第47页。

带,从昌吉斯台至乌科克等卡,照约归俄各卡,按现在机宜,均应退撤”^①。清朝政府根据条约规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沙俄竟悍然于当年九月派兵至布克图尔玛河一带,绑架中国守卡官兵,逼令乌克克(即乌科克)、沁达盖图、乌尔鲁、昌吉斯台、哈喇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干、和尼迈拉虎等八处卡伦全部后撤。当中国守卡官员拒绝时,俄兵倚仗武力,鞭打中国守卡官兵,捣毁卡伦帐房,抢劫中国军器衣物,将中国八卡官兵强行驱逐至乌克克卡伦以东^②。在当地住牧的中国哈萨克族人民,不愿沦入沙俄的殖民统治,在首领察干玛克里带领下,忍痛离开原牧地,移入霍湍和尔滚、科布多河、博罗布尔噶苏等处^③。

面对沙俄日益猖獗的侵略活动,清朝政府认为,“西疆界址未清”是“俄人滋生事端”的重要原因^④。因此,向沙俄提出先在当时清朝政府仍控制着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布伦托海等地区的边界建立牌博。这一建议,得到俄方同意。双方商定,两国代表于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科布多边界乌克克地方会齐举办。

届时,中方立界代表、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按约到达乌克克,等候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9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61卷,第20—21页。

③ 同上书,第62卷,第19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半月有余，至六月八、九日，俄方立界代表巴布科夫(当时已升任西西伯利亚军区副参谋长)、帮办立界官穆罗姆佐夫(旧译穆鲁木策傅)、翻译官巴甫林诺夫(旧译巴巴勒闹傅)才带领俄兵五六百人陆续赶到。双方商定，实地勘界立牌工作，分南北两路进行：北路在赛留格木岭到沙宾达巴哈之间建立界牌鄂博；南路在赛留格木岭至玛呢图噶图勒干之间建立界牌鄂博。

在实地勘界立牌过程中，沙俄代表盛气凌人，诡计多端，寻找种种借口，企图多占中国领土。北路在赛留格木岭准备建立第一座界牌时，沙俄代表即违反《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关于此段边界“顺赛留格木山岭”而行的规定和中俄互换地图上所划的边界红线，借口原约第六条中有“建立界牌鄂博时，总以各界址处所水流之方向作为立界之凭，择其地方形势建立”的文字，声称“此地虽系赛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须再行找寻，方可建立牌博”。清朝代表指出：“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不容篡改。俄方代表竟然蛮横无理地表示：“红线、条约可不必遵，止以水源为主。”^①由于沙俄的无理狡赖，双方僵持三日之久，最后才在赛留格木山岭的柏郭苏克山上建立了界牌。在建完第二座牌博，到达珠鲁淖尔时，按照原约红线，边界应当“顺唐努山南向西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转往北行，顺萨彦山向东至沙宾达巴哈”。可是沙俄代表却借口这段边界路途难于行走，提出“止就珠鲁淖尔迤北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6卷，第14页。

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①，企图以此多占中国领土。清朝代表据理力争，“舌敝唇焦”，沙俄的阴谋才未能完全得逞^②。南路建立牌博的情况也和北路一样，沙俄代表处处“狡赖牵混，意存多侵”，“并不按照原图画分红线建办”，而是专执“以水源形势立界”^③。由于沙俄的这些要求明显地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互换地图不符，遭到清朝代表的拒绝。

根据南北两路实地勘界建牌的结果，中俄双方代表分别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三日（同治八年七月六日）和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签订了《中俄科布多界约》和《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前约规定了自布果素克达巴哈（即柏郭苏克山）起至玛呢图噶图勒干止一段的中俄边界的界址起止处所、牌博名目，后约规定了自柏郭苏克山起至沙宾达巴哈止中俄边界的界址起止处所、牌博名目。

在《中俄科布多界约》和《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签订之后，沙俄代表巴布科夫、穆罗姆佐夫等竟然不候清朝政府代表前往参加，单方面于一八六九年秋在玛呢图噶图勒干以南至哈巴尔苏之间建立边界牌博。清朝政府闻讯后，当即照会俄国驻华公使，指出俄方企图以“独勘之界”，作为两国“共勘之界”强加于中国，完全“与会办原议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6卷，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③ 同上书，第16—17页。

不符”，要求俄方等候中方代表前往“会办”^①。同时，清朝政府催令布伦托海大臣文硕（后改派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赶赴边界，“约齐俄国使臣，将玛呢图嘎图勒汗至哈巴尔苏一带，逐一查勘，会立牌博”^②。不料一八七〇年二月，沙俄公使又发来照会，公开宣布：“接西悉毕尔（即西西伯利亚——引者）总督来文，设立边界鄂博，至哈巴尔阿苏（即哈巴尔苏——引者），去秋俄国分界大臣业已妥善完竣”^③。在沙俄造成的既成事实面前，清朝代表奎昌于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同治九年七月十六日）同沙俄代表穆罗姆佐夫签订了《塔尔巴哈台界约》，规定了自玛呢图嘎图勒干起至哈巴尔苏止的中俄边界的界址起止处所、牌博名目。

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规定的哈巴尔苏以南的中俄边界，由于新疆各地的反清斗争仍在继续和阿古柏的入侵，当时没有进行勘界立牌工作。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9卷，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71卷，第16页。

第 四 章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伊犁地区， 逼签《中俄伊犁条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

从六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殖民地。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趋尖锐。

在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中国是被争夺的一个重要对象。沙俄尤其凶暴贪婪，是争夺中国的急先锋。在中国西北，它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西北地区大片领土后，又开始了新的侵略活动。

一八七一年，沙皇俄国武装侵占中国西北边疆的伊犁地区，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血腥殖民统治。伊犁各族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下，沙皇政府不得不答应归还伊犁，但又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劫走了

中国人民，勒索了巨额赔款，并且攫取了大量政治、经济侵略特权。

第一节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伊犁地区

一、沙俄加紧征服中亚，中国西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沙皇俄国通过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相互勾结，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妄图夺取更多的殖民地。

沙皇俄国对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中亚细亚的征服和吞并，与它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是互相联系，紧密配合的。一八六四年，沙皇政府通过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就在这一年，沙皇政府经营已久的“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和“锡尔河堡垒线”，在完成了它对哈萨克草原的征服之后，分别从东翼的维尔内和西翼的阿克·美切特开始进行合围，最后侵占了奇姆肯特，实现了它蓄谋已久的两条堡垒线钳形包围圈的合拢计划，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等三个中亚独立汗国。

一八六五年，沙俄侵略军开始进攻浩罕汗国。切尔尼亚耶夫率领的侵略军，对浩罕的塔什干城发动围攻，塔什干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六月二十九日，沙俄侵略

军占领了塔什干。八月，沙皇政府下令将塔什干并入俄国版图。接着，沙俄侵略军又向浩罕的另一城市霍振特发动进攻。浩罕统治者胡达雅尔汗于第二年被迫向沙俄求和，浩罕从此成为沙俄的附庸。

一八六六年，沙俄借口布哈拉的艾米尔干涉了俄军侵占浩罕的事务，出兵侵略布哈拉。五月二十日，沙俄侵略军在伊尔扎尔打败了布哈拉的军队，接连侵占了布哈拉的许多城市。一八六八年，沙俄侵略军又向撒马尔罕发动猛攻，并切断了布哈拉水利灌溉工程的水源泽拉夫善河，给布哈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考夫曼在血腥镇压布哈拉人民的反抗之后，占领了撒马尔罕等城市，布哈拉为沙俄所吞并。

沙皇政府在占领塔什干后，就在这里建立起沙俄统治中亚的殖民机构。一八六七年，沙皇政府正式颁布命令，宣布在新占领的塔什干城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府，下辖七河省和锡尔河省。七河省管辖地区主要是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侵占的中国领土^①，锡尔河省管辖的是沙俄新征服的中亚各汗国的领土。考夫曼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总督。

土耳其斯坦总督府的设立，是沙俄吞并中亚、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又一严重步骤。沙皇政府授予考夫曼很大的权力，使他疯狂地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

^① 所谓七河省，是指沙俄侵占中国的七条河流即伊犁河、卡拉塔尔河、比茵河、阿克苏河、勒普什河、巴斯坎河和萨克坎德河命名的。这七条河流都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这时，中国新疆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八六四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新疆地区的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反对清朝政府封建压迫的斗争浪潮很快波及天山南北。伊犁地区的各族人民起义，斗争锋芒不仅针对着清朝政府和地方封建伯克^①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直接指向沙俄在伊犁地区的侵略势力。沙俄驻伊犁和塔城领事馆的官员和贸易圈的商人闻风潜逃。

起义不久，一些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混入起义队伍，并逐渐篡夺了领导权；有的地方，一开始就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控制。他们实行封建割据。黄和卓据库车，控制南疆的东四城；马福迪据和田；阿布拉毛据叶尔羌；司的克伯克据喀什噶尔；妥明据乌鲁木齐；伊玛木据塔城；麦孜木杂特据伊犁。后来，艾拉汗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夺取了伊犁地区的统治权，建立了伊犁苏丹^②政权。由于起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破坏了起义队伍的联合和团结，于是外国侵略者乘机而入。

一八六五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残酷镇压英勇反抗的南疆各族人民，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拉沙尔（今

^① 伯克，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上层封建统治者的职称。清朝政府基本上沿袭未改，分别在南疆和伊犁地区任命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伯克、哈孜伯克等三十多种官职，管理各城乡的事务，阿奇木伯克为一城之首，其余伯克分管各个部门的事务。详见《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等书。

^② 苏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对它的统治者的一种称号。

其公家水城社戶民毛宜克大仁大氏克下才蘭提致拉堡莊因蘭木白合提以作新地
 之沃艾山塔海滿庄滿三莊庫在可夫瓦的極子達什巴依中第班底二莊庫魯板下而改水
 二蘭月佳費烏溪莊毛拉提伯克費買提卜荷下札板爾羊莊買買托和夫木蘭
 意買買提何難木十二蘭小同莊奴已克卯宜克阿米里克莊晒余則力下得里干札克
 拉思二蘭大阿右魯木薩二莊買買庫力色買提尼則買要伯克云蘭塔爾莊買提
 土地阿吉科索拉堡莊卡札阿吉二買提率塔氏十四莊六百姓等為世難地而久研
 思仍設正阿奇日以順與情緣滿帶避處極深居處不測日動動喜道
 該邑已什身任其事與各竭力交涉已將入畜一件收回保護治安毫無驚恐
 者三餘年迨至光緒二年力盡身亡遺留子二長阿不都勒艾山次改里布伯請以該次
 子承襲其美迨後老帕夏被逐莊有喀什即該兄弟二人前赴中遠該地居民已
 歸服中國業主七難斷不能任意從匪致干咎斥該老帕夏聞知前語聞未重啟三營
 隨行前往三營同莊房屋燒燬殺其曾祖母暨祖母二人等三名親去路脫百餘頭毛
 牛二尊餘條羊三千隻又有奇銀錢財產概行搜去充公該兄弟二人暗害至是走避
 數月該老帕夏逃匿荒山佔有邑城居民不服嚴難回方往前將帥劉銳帶大兵南
 未盡明色勒庫爾在塔西部況地共計二十八處均歸以里布所管即調前往札委該
 里布者理阿奇日仍似色勒庫爾一帶況地屢著戰功積勞成疾於四生去病故行以

塔什庫爾干居民請仍設阿奇木伯克呈

它反映阿不都勒艾山等領導色勒庫爾人民反抗阿古柏(即文中所指的老帕夏)的斗争。

焉耆)等城，一八六七年底，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巴达乌勒特汗”(意为“幸运之主”)，残酷压榨和奴役中国新疆南部各族人民。据清朝文献记载，阿古柏匪帮窃踞南疆以来，“杀人不以挺刃，有所讐恶，辄饵以毒药，登时

毙命。缠回(维吾尔族人——引者)幼女自八岁以上悉被奸淫,死者十常七、八。又诛求无厌,终岁取盈,其最惨者,缠回亡一家长,安夷(指阿古柏入侵匪帮——引者)酋长恫喝之曰:尔家财产系尔家长所积,家长既亡,应将财产悉数充公。有不缴者,则非刑吊拷,一旦夕间,而缠回人亡家破,流离失所矣!”南疆广大人民,“莫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①一八七〇年,阿古柏击败妥明,侵占吐鲁番地区后,又侵占乌鲁木齐。新疆大片领土沦陷。

由于阿古柏匪帮侵占了南疆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沙俄又在虎视眈眈地准备扩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危机。

二、沙俄武装入侵中国伊犁, 伊犁各族人民英勇反抗

沙俄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后,沙皇政府中的一批军政官员又在叫嚣:“应把中国西部的国界向东推移三百俄里到五百俄里,即深入中国准噶尔腹地,使俄国国界沿着从东方围绕这整个地区的山岭而行,这整个地区即指从天山山脉向北到阿尔泰山山脉之间的中国伊犁、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各省。”②这个狂妄野心,是妄图把整个北疆领土并入俄国的版图。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提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2页;参看《新疆图志》,奏议八,第2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39页。

出,要“占领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并在该处安置俄国移民”^①。沙俄侵略者的这一片喧嚣,充分说明中国新疆地区已经成为沙俄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

一八六四年,伊犁地区的各族人民起义群众攻占了許多城镇,包围了伊犁将军府所在的惠远城。清朝伊犁将军常清、明绪,为了镇压起义人民,维持清朝在伊犁的统治,曾向沙俄七河省当局提出借兵和支援武器的问题,随后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向沙俄驻华公使多次商谈借兵助剿的问题。沙皇政府别有野心,“以借兵之事再不必提说见答”。清朝政府也考虑到借兵助剿将“贻后日无穷之患”,下令“著毋庸议”。^②一八六五年初,阿古柏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沙皇政府对当时中国新疆地区的局势,采取窥测方向、待机而动的方针。沙俄侵略者认为,中国西北边疆的斗争形势发展下去,将要出现一个脱离中央政权统治的分裂局面,清朝政府没有力量把这种分裂局面统一起来。对这种分裂力量,沙皇政府不应和他们“结成仇恨,而合乎俄国意图的,则应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③为此,沙俄侵略者最初对伊犁苏丹政权采取诱骗、拉拢的手段,妄图通过伊犁苏丹达到它侵略北疆的目的。

一八六七年以后,沙俄在征服中亚的战争中,血腥镇

①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857—1868)》,第182—183页。

② 《清穆宗实录》,第151卷,第35—36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23页。

压了中亚人民的反抗，先后迫使浩罕和布哈拉两个独立汗国臣服。同时，在新抢占到手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沙俄侵略者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加强它的军事殖民统治。这时，沙俄就公然向清朝政府挑衅，无理责问清朝政府，说中国西部地区的暴动“现在设有何法扑灭，边界能否尅期一律肃清”，并且威胁说，俄国“绝无坐视之理”^①。接着，在一八六八年，沙俄侵略者决定派出三支常驻部队，兵力是各一个连，一个哥萨克骑兵营^②，并配有两门炮，分别进驻巴克图、博罗呼济尔和特克斯河上游；另派两支部队侵入中国博尔塔拉北部的哈布塔盖卡伦和伊犁西境的春济卡伦等地^③，对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实行军事威胁。

一八六八年以后，沙俄侵略者开始不断在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向伊犁苏丹政权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妄图迫使伊犁苏丹政权让步。要求允许沙俄商人在伊犁地区“自由出入”；要求交还因反抗沙俄统治遭到迫害，从沙俄占领区逃出来的原中国哈萨克族牧民^④。但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9卷，第28—29页。

② 沙俄的陆军编制有正规部队和哥萨克兵两种。哥萨克是沙俄推行侵略政策的又一工具和帮凶，在侵略中亚和中国的战争中，哥萨克是侵略的急先锋。巴布科夫供认，哥萨克在沙俄的侵略战争中，“总是作为前驱，自己承担起最初的攻击”。（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9页）

③ 费奥多罗夫编：《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第1卷，1903年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出版，塔什干，第50页注。

④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双方勘界工作尚未进行，驻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牧民，反抗沙俄的侵略，有

是，伊犁苏丹政权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对沙俄多次入侵抢掠的罪行提出了抗议。后来，沙俄又要求允许俄国船只沿伊犁河收购和运输煤炭、粮食和木材。伊犁苏丹政权答复沙俄说：“以前没有运出的先例”，“这样做并非百姓所愿”^⑤。对沙俄提出的其它无理要求，伊犁苏丹政权“或置之不理，或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⑥。沙俄侵略者对伊犁苏丹政权的讹诈和威胁没有达到目的，它原先妄图利用苏丹政权侵占伊犁的幻想破灭了，于是决定出兵强占。

一八七〇年七月，考夫曼命令七河省省长兼部队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迅速出动部队占领中国伊犁通往南疆最捷便的交通要道穆扎尔特山口，同时还向逼近中国西部边境的其它沙俄军队发出战备命令。伊犁各族人民，反对沙俄的入侵，反对沙俄侵占中国的穆扎尔特山口。伊犁苏丹政权向沙俄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走乌尔坚穆扎尔特河的侵略军，“否则将以武力赶走”^⑦。

的纷纷迁入中国内地，要求清朝政府和伊犁苏丹政权拨给牧场放牧，有的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如破坏邮路，袭击军事哨所，烧毁军火仓库等。沙俄殖民当局对反抗者实行血腥镇压和野蛮屠杀。参与反抗的人，有的逃入中国境内，沙俄就说他们是“逃犯”、“盗马贼”，一再要求伊犁苏丹“引渡”，并多次借“追捕逃犯”之名，侵入中国境内进行抢劫和挑衅。仅一八六九年十月的一次，沙俄侵略军数百人就侵入中国境内一百多里，在霍尔果斯附近的马扎尔(库尔加什)，对中国牧民进行了野蛮的枪杀和掠夺。

⑤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0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22页。

考夫曼气急败坏,立即授命科尔帕科夫斯基:如果伊犁军民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就“不能只限于消极的防御,应采取进攻行动以惩罚塔兰奇人(指维吾尔族人——引者),迫使他们尊重俄国的政权和武力”^①。随后他决定派遣军队,侵占逼近伊犁北境的赛里木湖和博尔塔拉一带,配合穆扎尔特地区的入侵军,从南北两面威胁伊犁。考夫曼向沙皇政府提出入侵伊犁的报告,要求立即武装侵占伊犁。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日和五月二日,沙皇政府两次召开关于侵占伊犁的专门会议。会议决定,命令科尔帕科夫斯基指挥集结在伊犁西境的军队,占领中国西部战略要地——伊犁。

五月初,沙俄侵略军的军事部署就绪,侵略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向伊犁苏丹政权提出要求七天之内(即五月十五日以前)交出“逃犯”塔扎别克^②,否则就武装深入中国境内追捕。同时,沙俄侵略者还派出侦探部队,刺探伊犁各族人民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力量,积极准备入侵。追捕“逃犯”,实际上是军事入侵的借口。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五日,沙俄进攻伊犁的战争开始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3页。

② 一八七一年三月,哈萨克族阿勒班部落中的一个首领塔扎别克,不堪沙俄殖民当局对他的压制和迫害,写信给伊犁苏丹当局,准备带领他的部落牧民离开俄境,避居中国境内游牧。沙俄殖民当局探悉这个情况后,派军队包围了塔扎别克,准备逮捕镇压。深夜一时,塔扎别克率部突围,被沙俄军队发觉,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到黎明,塔扎别克乘机脱逃,到了伊犁。沙俄侵略军要求伊犁苏丹政权交出“逃犯”,伊犁当局未予理睬。

了。集结在伊犁西境的沙俄侵略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一路由博罗呼济尔出动,沿伊犁河以北东犯马扎尔;一路由恰尔克迪苏出动,向东北进攻伊犁河南的克特缅山口。

由巴利茨基少校指挥一个步兵连和九十名哥萨克骑兵,共二百余人,从博罗呼济尔东犯,于五月十六日在阿克肯特附近遭到伊犁军民的袭击。十八日,沙俄侵略军渡过霍尔果斯河,进迫马扎尔。马扎尔各族人民事先已经作好了抗击沙俄侵略军的准备。他们坚壁清野,埋藏、转移了粮食,截断了沿途的大小水渠。沙俄侵略军依靠大炮的威力,虽然占领了马扎尔,但在村镇内“只找到了数量极少的小麦、面粉和黍米”,“牧草也非常缺乏”,使沙俄侵略军的“部队确实处于无水的境地”^①。撤出村镇的伊犁军民,利用周围的树林、果园和房屋,不断袭击沙俄侵略军,切断了沙俄侵略军与其后方的联系。伊犁军民对敌人的围困和袭击,迫使沙俄侵略军在马扎尔不敢久驻,更不敢前进,便于二十一日野蛮地破坏了马扎尔村镇后,撤向霍尔果斯(拱宸城)。在撤退的路上,伊犁军民又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不断袭击敌人,使侵略军首尾不能相顾。二十二日夜,伊犁军民向沙俄在霍尔果斯的营地发动夜袭,勇敢的冲入俄军军营,砍杀敌人。沙俄侵略军在伊犁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不得不于二十四日放弃霍尔果斯,继续向阿克肯特撤退。在敌人逃跑的过程中,伊犁军民又“利用道路两侧的森林、高地、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9页。

草场以及一切天然掩护物，连续不断地进攻”^① 敌人，打得沙俄侵略者狼狈不堪，仓皇逃回博罗呼济尔。

在这路侵略军进犯马扎尔的同时，叶连斯基中校指挥的另一路侵略军，于五月十九日从恰尔克迪苏河谷向克特缅山口发动了进攻。伊犁军民利用峡谷的有利地形，设置重重障碍，英勇抗击入侵之敌。他们多次发动有力的攻击，并以居高临下之势从侧翼包抄敌军。激烈的争夺战从二十日上午十时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沙俄侵略军用大炮轰击伊犁军民的阵地，用骑兵绕过障碍物从侧面爬上山头进攻伊犁军民。伊犁军民撤出阵地后，继续利用陡峭的山崖、稠密的森林和崎岖的道路，用密集的火力的顽强地阻击敌军，使侵略军无法前进。就在这天夜晚，沙俄侵略军被围困在克特缅三千公尺的高山隘口，不敢久留，于次日从克特缅山口撤退。二十六日，伊犁军民在增援部队到达后发起反击。二十七日，包围了正在撤退的敌军，从岩石后、森林中“用小口径炮猛烈”^② 向敌军轰击，围攻敌军达六小时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沙俄侵略军控制克特缅山口、侵占伊犁河南岸的计划未能得逞。

遭到伊犁军民严重打击的沙俄侵略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立即纠集兵力，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沙俄侵略者把驻在博罗呼济尔等地的大批侵略军调集春济，组成由米哈洛夫斯基为指挥的一支侵略军，包括两个常备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连、半个哥萨克骑兵连、一个哥萨克教导队和一个炮兵连，共计数百名侵略军，由春济东犯克特缅，接应由恰尔克迪苏河谷出动的叶连斯基指挥的侵略军，越过克特缅山口，侵占克特缅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谷地。同时，又派巴利茨基从博罗呼济尔再次东侵阿克肯特作为策应。从此，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六月六日，米哈洛夫斯基指挥的沙俄侵略军从春济出动，第二天就在科斯阿加奇附近遭到伊犁军民的袭击。胆战心惊的敌人“排成战斗队形”^①，龟步前进。伊犁军民选择有利地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或正面阻击，或拦腰截击，或以骑兵包抄敌人的后卫，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六月八日，伊犁军民又凭借路旁山沟、村落，阻击向克特缅进犯的敌人。六月九日凌晨，又给企图偷袭克特缅村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当沙俄侵略军调集五门大炮对据守克特缅村的伊犁军民进行野蛮轰击时，伊犁军民已经安全转移了。

六月十日，叶连斯基指挥的侵略军，越过克特缅山口北上，与侵占克特缅村的敌军会合。这时，得到增援的伊犁军民，决定利用敌军宿营分散的弱点，反守为攻，夜袭敌军。十一日夜晩，伊犁军民在漆黑多雾的有利条件下，分股通过纵横交错的沟壑，隐蔽地接近敌人，占据了克特缅河谷两岸的高地。黎明前，准备开往博罗呼济尔的俄军将要出发，伊犁军民就从两面高地上俯冲而下，迅速包围了敌军，控制了克特缅村，向敌发动猛攻，并将敌军分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2页。

割成两半，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南面的敌人拚命向高地和村庄反扑，企图抢占有利地形。伊犁军民英勇抗击，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重创敌军，沙俄骑兵上尉也被打伤。村北疯狂反扑的敌军，也遭到隐蔽在建筑物中的伊犁军民的顽强阻击，伤亡很大。伊犁军民还越过布满沟壑的克特缅河床，抢占右岸高地，包抄敌军。

伊犁军民在克特缅村的这次保卫战中，激战了四、五个小时，直到十二日上午八时才结束，使沙俄侵略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①。就连参加过这次入侵战斗的《征服中亚史》一书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伊犁军民表现出“罕有的顽强”，“战斗时间延续之长，以及不仅与骑兵而且和步兵的多次白刃战中，都证明了塔兰奇人有进攻的能力。”^②

另一股由巴利茨基指挥的侵略军（两个连的步兵和一些骑兵、炮兵），六月六日由博罗呼济尔东犯，七日到达阿克肯特，八日在周围森林地带遭到伊犁军民的袭击。一部分沙俄侵略军追入森林，被伊犁军民包围起来，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巴利茨基亲自带领骑兵后备队前往增援，才把被围的人救回去。在伊犁军民的不断袭击下，入侵阿克肯特附近的侵略军接连遭到失败，直至六月十四日，未能前进一步。十六日伊犁军民得到新的增援后，分三路向阿克肯特的敌人进攻，两支骑兵包抄敌人的营地，步兵占领了阵地侧翼的树林。骑兵包抄敌人营地后，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步骑三路同时向敌人进攻，炮火从四面八方射向敌人。但是由于敌人援兵赶来，炮火猛烈向伊犁军民轰击，伊犁军民撤出阵地。

六月二十日，战争进入第三阶段。沙俄侵略军司令、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赶到博罗呼济尔直接指挥。他为了集中力量，进犯北路，不仅将盘踞在中国伊犁河南的叶连斯基部调往北路，而且还从科帕尔等地调集兵力。据统计，沙俄在这次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中，直接投入的兵力有：八个半步兵连、五个半哥萨克骑兵连、十三门大炮，共官兵二千余人^①。伊犁地区各族人民，面对入侵敌军，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霍尔果斯、清水河子、绥定、伊宁等地，构筑工事，深挖战壕，积极投入抗击沙俄侵略军的斗争。

六月二十六日，科尔帕科夫斯基率领的沙俄侵略军的主力到达阿克肯特附近，前哨部队这时已经侵入霍尔果斯一带。中国伊犁军民的主力约四千人，在霍尔果斯以东的阿里玛图村等地布置防线，进行防御；并出动骑兵在霍尔果斯河两岸阻击敌军。

六月二十八日，沙俄侵略军主力渡霍尔果斯河，向据守阿里玛图村的伊犁军民进攻。伊犁军民在阿里玛图以西的谷地构筑了工事，两侧伸向树林和墓地。敌军在大

^① 据费奥多罗夫《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记载，侵略军主攻部队是六个半连，四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十门大炮，侧攻部队是两个连，一个哥萨克骑兵连，三门大炮（见该书第51页）；参看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

炮的掩护下从两翼进攻。伊犁军民英勇进行抵抗，并派骑兵突入敌军的左翼，使敌军的大炮失去作用，严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

六月二十九日，沙俄侵略军进逼清水河子。驻守的军民以城堡为中心，利用附近的凹地、丛林、果园和村庄布置了防线，准备迎击敌军。三十日黎明前，伊犁军民用土炮轰击沙俄侵略军的营地，同时出动骑兵冲入敌军防线歼灭敌人。接着沙俄侵略军开始向清水河子发动全面进攻。伊犁军民一面在自己的工事里用各种土枪、土炮、刀矛、弓箭等武器阻击进犯的敌军，一面出动骑兵向敌军左翼和后方迂回包抄。沙俄侵略军主力集中进攻果园阵地，伊犁军民在敌人优势炮火的压力下，被迫从果园撤退。俄军步兵尾追，伊犁军民的骑兵冲出丛林，突袭敌步兵，并与科尔帕科夫斯基派来救援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刺杀，重创敌军，敌骑兵头目考尔巴斯少校也被击伤。接着，科尔帕科夫斯基从东、南、西三面进攻清水河子城。守城的中国伊犁军民用密集的火力，横飞的乱石，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清水河子被沙俄侵略者攻陷。

七月一日，沙俄侵略军扑向绥定。从清水河子撤出的伊犁军民和绥定军民联合起来继续抗击侵略者，伊犁河南一千五百多兵民赶来支援。伊犁军民控制大路两旁的高地，沿途设防阻击敌人，战斗很激烈。沙俄侵略军用炮火野蛮轰击，伊犁军民的骑兵不顾侵略军密集的炮火，从高地俯冲而下，进攻并包围敌军的侧翼。这时敌军后

援部队赶来，伊犁军民被迫撤退。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

七月三日，侵略军从绥定向巴彦岱进犯。伊犁苏丹艾拉汗最后投降了敌人，交出了武器和仓库。七月四日，沙俄侵略军占领了伊犁苏丹政权所在地固尔扎（今伊宁市）。

在沙俄侵略军重兵入境的情况下，英雄的伊犁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无数中华儿女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些英勇的烈士，有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汉族人、回族人、蒙古族人、锡伯族人、柯尔克孜族人、索伦族人。他们英勇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西北边疆的各族人民。

三、沙俄霸占伊犁，继续入侵北疆， 并勾结阿古柏侵略南疆

沙皇俄国武装侵占中国伊犁地区后，进一步扩大对新疆地区的侵略。

沙皇政府早在侵占伊犁前，就曾经策划对中国新疆“两个主要中心城市——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①有的沙俄扩张主义分子还狂叫，要在占领乌鲁木齐之后，继续向东推进，占领鄯善和哈密，一直达到新疆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25页。

的东部^①。

沙俄侵略军占领伊犁地区后，威胁当地居民说：“伊犁永归俄辖”^②，“俄国所占的地区，将永远不归还中国”^③。而沙皇政府却于八月二十八日给它的驻华公使发来电报，转告清朝政府，俄军于七月四日将伊犁“代为收复”^④，并虚伪地提出：“请定如何办法”^⑤。

清朝政府收到中国边防官员的报告，得悉沙俄侵占伊犁，立即谕令军机大臣等：“此事关系甚重，亟应豫为筹画，以弭衅端”^⑥。一面命令署伊犁将军荣全，驰赴伊犁，会见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交涉收回伊犁，“免致日后肆意要求，难于收拾”^⑦；一面命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等，迅速规复乌鲁木齐，“务当绸缪未雨，先事图功，勿落他人后著”^⑧。

荣全奉命后，先派多仁泰前往阿拉木图，与科尔帕科夫斯基接洽，谈判收还伊犁问题，自带步骑百余人于十月间由乌里雅苏台出发，急速向伊犁前进，后续部队千余人陆续开拔。沙俄对谈判设置重重障碍。先提出要荣全到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30页。

② 一八七八年《西国近事汇编》，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石印本，第3卷，第14页。

③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圣彼得堡出版，第85—86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8页。

⑤ 同上书，第6页。

⑥ 同上书，第7页。

⑦ 同上书，第8页。

⑧ 同上。

那丹木克议事，后又改在谢尔基奥波利（今苏联阿亚古斯），拒绝了多仁泰要到伊犁去的正当要求。

一八七二年三月，荣全到达谢尔基奥波利，等候科尔帕科夫斯基，一直等了五十多天，不见俄方谈判代表到来。直至五月中旬，才接到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封信，内称：俄方谈判代表，已另派鲍戈斯拉夫斯基（旧译“布呼策勒傅斯奇”）了。

五月十五日，鲍戈斯拉夫斯基来到谢尔基奥波利，与中国清朝代表荣全会晤。谈判一开始，俄方代表敷衍搪塞，根本不谈交还伊犁的事，反而提出一系列荒谬问题：“你们大兵何时前来？将军自己调兵多少？”“你们地方，何时平定？我们要去科布多、布伦托海、哈密、巴里坤并喀什噶尔新疆各处通商”。“你要赈济（伊犁兵民），将银子交给我，我转交廓尔帕柯斯克依（科尔帕科夫斯基）散发，你们不可派人前去”。鲍戈斯拉夫斯基还蛮横无理地要挟荣全：“你们乌鲁木齐、玛纳斯……几天取回来，与我立下字据！”“各处地方，中原（指清朝中央政府——引者）若不取，俄国能取。”荣全看穿了沙俄以“帮助”为名妄图出兵继续扩大侵略的阴谋，指出“我们中原已动大兵，俄国不必相助”。接着问俄方代表：“我系奉旨来办伊犁之事，伊犁的事，究竟如何议论？”这位沙皇钦差竟蛮横地说：“伊犁的事，我一句也不能说，等著我请示我们国君，才能论说。”^①谈判毫无结果。荣全不得不返回塔城。

荣全通过这次谈判，看清了沙俄的罪恶用心。他在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6卷，第36—38页。

给清朝政府的奏折中说：“逆探其志，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踞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已有而后已。”^①

就在谈判的时候，沙俄侵略军已向新疆北部地区继续进犯了。

沙俄侵略军，由伊犁以北的果子沟等地出发，沿途占领了中国的大河沿子、西湖、精河等地的一些据点，四出搜索居民，胁迫当地人民接受俄国管辖^②。沙俄七河省当局在侵占精河等地后，向伊犁将军送来公文，荒谬宣称：“伊犁所属土尔扈特游牧，西湖、晶（精）河、大河沿子居民，均归顺我们，……西湖人民，皆我们所属之内，我国大官无话，你们军营不可前往。西湖各村立有界限，贵国不可派员管理。”^③当侵略军前哨到达乌苏地区时，又借口为了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宁”，声称：“自塔尔巴哈台至库尔喀喇乌苏大路迤南及极西地方，均交给我国官员以兵力办理，凡事与你们无涉。”“你们不得搀越一人”^④。沙俄侵略者就是用这样强横的办法，步步侵占中国的领土。

沙俄侵略者每占一地，便任意绑架中国政府官员，残害各族群众，抢劫牲畜财物。如在精河，将中国当地政府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9卷，第9—10页。

② 沙俄侵略分子捷连季耶夫供认：“为了更牢靠的保证新占领地区的安宁，……必须向靠近中国村庄西湖的地方派驻常驻部队。这支部队完全封锁了吉尔吉斯（哈萨克）前往玛纳斯的通路，迫使他们完全服从我们政权的管辖。”（《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54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8卷，第21页。

④ 同上书，第93卷，第8页。

粮员吉喇图、把总官荣等人绑架至伊犁^①。在库尔喀喇乌苏，侵入土尔扈特郡王、贝子两牧场，将蒙古族郡王、贝子等劫走，“畜产、财物均被抢掠一空，毡帐、铁锅以及喇嘛佛像、经卷全被其损坏。枪伤四人，刀伤一人，踏死小儿一名”。^②

在侵占精河地区以前，就有成批侵略军冒充商人，窜入精河地区活动，为武装侵略开路。侵占精河地区以后，这些所谓“商人”又潜入乌苏和沙山子，收集情报。其中一些所谓安集延的俄国商人，还利用宗教关系，在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居民中进行煽动、分裂和颠覆活动，为武装占领开路。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一批冒充“货帮”的武装匪徒，侵入玛纳斯以西的石河地区，遭到当地民团徐学功部的迎头痛击，死伤五十余人，余部仓皇逃窜^③。

沙俄边防官还公开扬言，要“派兵两千前往玛纳斯”^④。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为扩大他的侵略范围，给荣全送来公文，竟胡说什么“塔城系伊犁兼管，也是俄国暂管地方”，居然狂言荣全行署暂驻塔城“尚属不合”^⑤，妄图把清朝军政官员从塔城赶走，强行武装占领。

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秋间，沙俄七河省官员“率兵百余名并炮车等物，无端突至我土尔扈特北部部落游牧、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3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91卷，第6页。

③ 同上书，第89卷，第23页；第93卷，第13—15页。

④ 同上书，第83卷，第15页；第86卷，第41页。

⑤ 同上书，第86卷，第38—39页。

察罕鄂博东喇嘛庙中，将扎萨克头等台吉图普新柯什克捆绑行半程，旋释之。掠去铜佛像大小二十五尊，并银两马匹衣物等件。”^①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三月，索思诺夫斯基一帮二百多匪徒，携带武器，冒名经商，在中国布伦托海地区结营驻扎，收集情报。随后又向东侵入中国科布多地区。所到之处，“绘画地图，钉立标干”^②，为后继的武装入侵军引路。这帮匪徒还在上述地区的土尔扈特寺中，借游览为名，进行滋扰，抢去寺内佛像大小七十二尊及其他财物，并非法殴打该寺僧众。另一伙沙俄侵略分子波塔宁等人，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携带武器，骑马闯入承化寺（在今新疆阿尔泰），举枪威胁僧众。当即被该寺喇嘛拉下马来，收缴其武器马匹。波塔宁当场认错，该寺主持棍噶扎勒参将其驱逐出寺。这伙匪徒回国以后，向沙俄七河省当局捏造谎言，进行诬告。七河省当局一面行文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提出交涉；一面派乌拉索夫带领侵略军百十余骑，闯入中国境内寻衅。棍噶扎勒参当面揭露沙俄侵略分子在附近地区多次闯入佛寺，抢去佛像的侵略罪行，质问沙俄何不究办？波塔宁执照内并无至阿尔泰字样，为何来此？乌拉索夫无词以对，狼狈而去^③。但是，沙俄还不甘罢休，又通过驻北京公使布策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要挟。在沙俄的压力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卷，第31—3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6卷，第24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卷，第19—25页；第13卷，第31—34页。参看《新疆奏稿》（抄本）。

下，清朝政府竟将棍噶扎勒参等人分别惩处。

对中国南疆地区，长期以来，沙俄就有吞并的野心。阿古柏侵占南疆后，沙俄便勾结、控制和利用阿古柏来侵略南疆。

一八六六年，浩罕臣服后，沙俄就出动侵略军进逼南疆。在纳林河附近与阿古柏匪帮勾结，协定：“双方允许任何一方不干涉他方之行动，并给任何一方有人他方境内追捕逃犯之权”。^①后来，沙俄又提出修筑纳林河大桥和经此通往喀什噶尔的军用道路的要求。

一八六七年，沙俄一支“考察队”在波尔塔拉茨基上校的率领下，经格根河和特克斯河流域，到达纳林河上进行探测活动。波尔塔拉茨基要阿古柏和俄国“建立正常的商务关系”。阿古柏同意“在喀什噶尔开设俄国贸易站”^②。接着，彼尔武申率领的俄国商队就到达喀什噶尔地区。

一八六八年，沙皇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伊格纳提耶夫派遣的俄国商人赫鲁道夫到达喀什噶尔。阿古柏接待了赫鲁道夫，还派他的侄子沙迪·米尔扎前往塔什干，向考夫曼表达他对俄国的“友谊”。

一八七〇年，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派人到达喀什噶尔，要求阿古柏如同浩罕和布哈拉一样，臣服俄国，承认俄国的宗主权，并写信给阿古柏，“如果不愿意同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62页。

②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第323页。

俄国建立象浩罕、布哈拉一样的关系，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①

一八七一年，沙俄准备出兵侵占伊犁之际，考夫曼公然叫嚣：“支持喀什噶尔阿古柏政权”^②，妄图控制阿古柏，侵略南疆。为此，沙俄把侵略军开到靠近中国边界，距离喀什噶尔一百多公里的罗巴特山口和恰提尔库尔。

一八七二年，沙皇政府正式派遣以参谋总部大尉考利巴尔斯为头目的所谓“使团”，进一步与阿古柏勾结。考利巴尔斯代表沙皇政府正式承认阿古柏的反动政权；以此攫取了在中国南疆地区的贸易特权，进一步排挤英国势力。考利巴尔斯同阿古柏匪帮于一八七二年六月二日订立了一个所谓“通商条约”。沙俄通过这个“条约”，窃取了在南疆地区通商、建立牙行、商队过境、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俄国货物的关税定为2.5%，在任何情况下，不超过当地人纳税的标准。

阿古柏于第二年夏季派遣他的亲信赛义德·阿古布前往塔什干，拜见考夫曼。以后，又从塔什干到达彼得堡，朝拜了沙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接见了赛义德·阿古布，并表示给阿古柏以积极的支持。

至此，沙俄和阿古柏的勾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沙俄在中国伊犁地区的十年殖民统治

沙俄侵略者武装侵占中国伊犁地区，在这里进行了

^① 斯楚勒：《土耳其斯坦》，第2卷，第321页。

^②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第87页。

长达十年之久的残暴统治。^①

沙俄侵略军武装入侵伊犁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伊犁各族人民进行野蛮征服的过程。

沙俄侵略军在伊犁地区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野蛮地屠杀了无数英勇的中国人民。在马扎尔、克特缅、霍尔果斯和清水河子等战役中，沙俄侵略军野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许多村庄、耕地和果园。参与这次入侵战争的捷连季耶夫在他所著的《征服中亚史》一书中供认：入侵克特缅山口的战斗中，“在高地上，在河谷纵横交错的沟壑中，遗弃了许多（中国人的）尸体。”在入侵清水河子的战役中，“城外各个战场上，（守卫者）横尸遍野”^②。在占领绥定后，沙俄侵略者还出动全部骑兵，四处追杀城外的军民。

沙俄侵略者占领伊犁地区后，继续对伊犁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和野蛮的屠杀。他们一村挨一村地搜索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的中华儿女。许多抗俄英雄惨遭杀害。

^① 沙俄侵略军一八七一年七月四日侵占固尔扎，开始对伊犁地区实行殖民统治。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答应归还伊犁。同年八月十九日，中俄双方在彼得堡交换文本，条约正式生效。根据条约规定，自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交还伊犁事宜。九月二日，清朝政府命令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七日，清朝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带兵进抵伊犁，与沙俄官员施舍玛勒伏反复交涉，决定于三月二十二日正式交还伊犁，结束沙俄对伊犁地区的殖民统治。但沙俄又以“管束迁移之人”为理由，延期驻兵一年，大肆胁迫伊犁居民。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沙俄侵略军才从伊犁撤出。

^②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6、47页。

沙俄侵略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下令解除伊犁人民的一切武装，并将固尔扎城内的两个火药工厂和全部生产设备销毁。甚至分散在伊犁人民中间的零星刀矛也被搜索净尽，连切菜刀也规定几家合用一把，大量农具被作为武器收缴。

根据沙皇政府的命令，入侵伊犁的侵略军继续留在伊犁地区待命。主要城镇都住满了军队。为了控制伊犁地区四周的要塞，侵略军派出几个侦察队，带领测量人员，把伊犁四周的交通道路全部进行了测量。伊犁以北的果子沟，是通往中国内地的主要交通干线，沙俄侵略者强征当地居民进行修整，作为它继续东侵的军用通道。

沙俄从七河省首府阿拉木图直到伊犁的固尔扎设置了十七个军事台站。又从图尔根沿伊犁北边的塔勒奇山到固尔扎设置军事台站五处。伊犁以南则有沙俄侵占穆扎尔特地区的所谓“天山部队”盘踞。这样，沙俄将伊犁周围的要塞“各处把守，水泄不通”。^①

沙俄侵略军在伊犁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十年期间，军事台站密如蛛网，碉堡营垒森严林立，处处是关卡，村村设哨所，伊犁各族人民处在沙俄侵略军的铁蹄之下，陷入了人间地狱。

在实行军事殖民征服的同时，沙俄侵略者加紧进行政治上的殖民奴役。他们完全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设施，撤换和驱逐清朝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直接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6卷，第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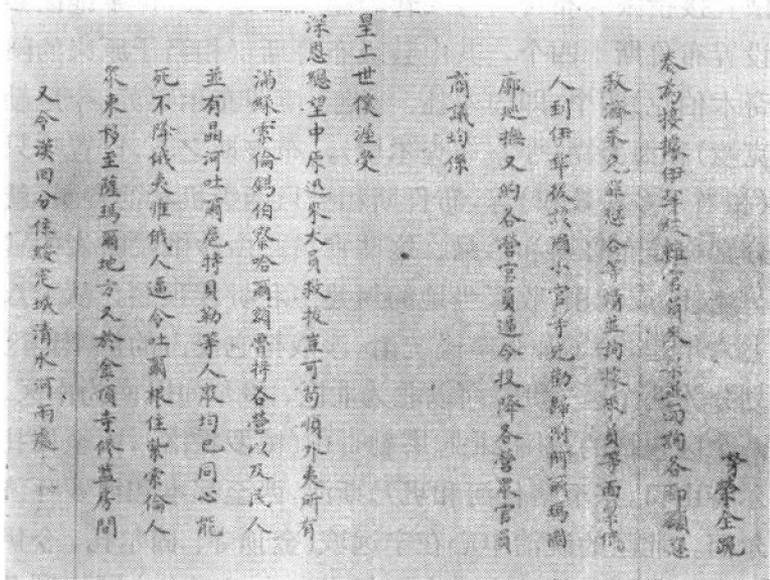
治。在驻军司令部下设立专门处理伊犁事务的特别办公室，管理伊犁的行政事务。伊犁地区原先实行的伯克制度被取消了，按照土耳其斯坦地区管理草案，改成了沙俄直接指派的布鲁斯行政管理制度。起初，伊犁地区共设置布鲁斯十四个，其中县级布鲁斯（相当于原来的阿奇木伯克）四个，即固尔扎、绥定、博罗布尔噶苏（今尼勒克境）和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境）。布鲁斯之下，设置哈只（相当于乡村政权）等，布鲁斯和哈只两级机构的官员，就分别称作布鲁斯和哈只。这些官员或由沙俄侵略者的官员兼任，或利用、收买当地的封建主和贵族顶名。从一八七六年起，为了加强殖民统治，沙俄把它侵占的伊犁地区划分为两个区：伊犁河以北为北区，伊犁河以南为南区。两个区包括的范围，北起塔勒奇山（博罗霍洛），南至穆扎尔特山口，东至喀什河和巩乃斯河，西至都本和博罗呼济尔河。北区的统治中心在宁远城（金顶寺、固尔扎，今伊宁市），南区的统治中心在海努克。十三万多中国伊犁各族人民，处在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①。

沙俄侵略者对伊犁各族人民，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恫吓诱骗，强迫“归附”。接着，科尔帕科夫斯基就下达命令，对清朝各营官员“逼令投降”^②。为了强化对中国伊犁各族人民的殖民统治，侵略者逼迫伊犁各族人民改换原

^① 据《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第56页记载：一八七六年统计，伊犁地区定居居民为八万二千一百四十二名，游牧民为四万九千七百六十八名，共计十三万一千九百一十名；科斯岑科：《准噶尔》、斯楚勒：《土耳其斯坦》等书所列人口数字均为十三万多人。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4卷，第10—11页。

来居住的地方，迁移至另外住地。居住在图尔根的索伦族人民，东迁至萨玛尔地方，汉、回人民强迁至绥定、清水河子分别居住，维吾尔族人民迁移在回城和东山各处。各



伊犁将军荣全的奏折

族居民之间，驻有沙俄侵略军监视，不许他们相互往来，违者要严加惩罚。沙俄侵略者就是如此蛮横地在伊犁地区实行按地区、按民族“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

沙俄侵略者为了把伊犁地区和伊犁人民从中国分割出去，严格监视伊犁人民和清朝官员来往，也限制和阻挠清朝政府派遣官员前往伊犁地区。对前往内地和给新疆地方当局送信的伊犁人民，一经查获，即遭审问和拷打，没收财物，焚毁信件，有的就被长期关押。对清朝政府派

往伊犁的官员，百般刁难、阻挠。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还无理地写信给伊犁将军，说伊犁是俄国“管辖”地方，以后，伊犁人众，中国“勿庸照管”，免得“人分二心”^①，有碍沙俄的统治。以后中国派员前往办理公事，须先向俄国提出照会，办理何事，派人若干，限期几日，如所请与俄国条例相符，就发给路照，若无俄国路照，“即行捉拿”^②。

清朝政府设置在伊犁边疆亦兵亦农的锡伯营，顽强坚持抗俄斗争，更是被沙俄侵略者视为眼中钉。沙俄入侵者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镇压，将营制官职一律予以废除，对锡伯营官兵备加侮辱和残害。对锡伯营署领队总管喀尔莽阿，沙俄侵略者借口“俄国屡次交办之事，均不遵办，且将伊犁情形，时常禀你们将军（指清朝伊犁将军——引者）知道，以致伊犁各营，人分二心”^③，将他“看押凌逼（逼）”^④，经过种种迫害摧残之后，限期半月，携眷“出境”。沙俄侵略者还威逼喀尔莽阿说：“若不速去，我们即派兵将你拿送西悉毕尔（西西伯利亚——引者）地方，永不令你回国。”^⑤喀尔莽阿在沙俄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之下，始终忠贞不屈，终于被沙俄侵略者驱逐出境。

对其他锡伯营官兵，沙俄侵略者将他们全部管束起来，一一逼令投降，不从则严刑拷打。官员吉尔噶布等被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9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92卷，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93卷，第17页。

④ 同上书，第86卷，第38页。

⑤ 同上书，第93卷，第17页。

打得遍体鳞伤,其余官员被“日日凌虐”^①,锡伯营五、七牛录等官员被一律撤换^②。在沙俄侵略者的直接迫害之下,“各营人众,日受俄人逼迫,十分困苦”^③。

伊犁各族人民,在沙俄侵略者残酷的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沙俄殖民当局还利用各种借口,把他们流放西伯利亚或者进行枪杀^④。

沙俄侵略者对伊犁人民在经济上的压榨、勒索,也非常苛重。

沙俄侵略者在伊犁地区勒索榨取的主要方式是“按灶科赋”,不管穷富,只要烟囱冒烟,就要纳税。为了推行这种制度,在占领伊犁之初,四处派出侵略军,“日向各营偪(逼)勒银两,索要户口册籍”^⑤。索要户口册籍的目的,就是要把伊犁各族人民登记编制起来,政治上监视、统治,经济上敲榨、勒索。这种“按灶科赋”的剥削制度,是根据沙皇政府的命令执行的。当中国伊犁地方当局提出交涉时,沙俄七河省省长竟无理地送来照会,声称:“所向各官摊派银两,系奉我国旨意,并大臣等谕,才行摊派”,并威胁清朝政府伊犁当局说:“若你们大官不遵我们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6卷,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91卷,第7页。

③ 同上书,第87卷,第28页。

④ 据费奥多罗夫《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透露:沙俄殖民当局为了进一步强化统治,一八七三年又颁布了新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于一八七三年将十五名中国伊犁居民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二年有四人被处死。这仅仅是无数残害事件中的一例。(见该书第1卷,第60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6卷,第38页。

之谕，日后必治重罪。”^①

当时沙俄侵略者在伊犁地区榨取的各项赋税，据清代文献记载，“每年不下数十万两”^②，又载：岁收“农商之利数十万金”^③。如果以前引沙俄统计的伊犁居民总数为十三万多人，三万户计，平均每户的税银在十两以上。从沙俄统治下逃出来的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牧民报告，“自从受制俄人，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④。以上几个数字，反映了沙俄在伊犁地区每年的勒索量，仅赋税一项，已使人触目惊心。

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及其他巧立名目的勒索。

沙俄当年在伊犁地区每年所搞的军事设置，修筑台站、道路，以及营房碉堡的建造，都是强征伊犁人民无偿服劳役^⑤。伊犁人民除在本地服役以外，还要自带口粮到俄国境内服劳役。

各种巧立名目的剥削，举不胜举。例如养鸡要缴鸡税，种菜要缴菜税，盖房要上房地税，吃水要交水钱。至于军队过境的过路费，官员办公的通事（翻译）费，夜晚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9卷，第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7卷，第16页。

④ 同上书，第15卷，第29页。

⑤ 据费奥多罗夫《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记载：居民的徭役负担，包括修整道路，当哥萨克不在时，派人站岗及押送犯人，战时有义务为军队出车。（见该书第1卷，第59页）

遑的夜差费，如此等等，难以数计。

沙俄侵略者把伊犁人民的财产搜刮净尽，使他们生活无着。这伙侵略者又伪装慈善，散发口粮，妄图使伊犁居民“归顺”沙俄。中国“兵民不从，亦不领粮”^①，坚决表示和沙俄侵略者斗争到底。

沙俄侵略者还无理扣留清朝政府调拨给伊犁的“赈济”银两。当清朝政府提出交涉时，俄国官员竟说什么由科尔帕科夫斯基代为发放，不许你们官员前去，免得“人分二心”。

沙俄侵略者把大批中国赈济金侵吞中饱，反而说是发给了寄住在图尔根河两岸的中国土尔扈特和索伦族人。当中国官员到达上述地区看望时，他们“皆挖房居住，蓬头垢面，褴褛不堪，间有赤身露体者……均皆痛哭”，并愤怒控诉了沙俄侵略者每年逼令他们加入俄籍的罪行^②。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掠夺，也是沙俄侵略者经济勒索的一个重要方面。沙俄侵占伊犁后，俄商蜂拥而至，俄货充斥市场。他们低价收购农牧产品，高价出售俄国货，牟取暴利。伊犁人民为了交付苛重的税收，不得不向俄国商人、高利贷者借款。

沙俄侵略者还强迫人民种植鸦片，图谋厚利。

沙皇政府趁清朝政府无暇西顾，出兵侵占中国伊犁地区，在“代收”、“代守”的谎言下，对伊犁地区实行了长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9卷，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69卷，第33页。

达十年之久的血腥殖民统治。富饶肥沃的伊犁地区，成了人间地狱。

第二节 沙俄逼签《中俄伊犁条约》

一、沙俄拒不交还伊犁地区，阻挠和破坏清朝政府收复新疆失地

沙俄武装入侵伊犁，阿古柏窃踞南疆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地区，中国新疆的大片领土沦于敌手。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沙俄驻华公使多次交涉，又命令荣全等边疆大臣向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及七河省当局反复交涉，都毫无结果，沙俄的侵略活动反而日益猖獗，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重。

新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怀念祖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沙俄的统治下逃出来，向清朝当局递送报告，要求清朝政府迅速出兵驱逐入侵者，收复失地。蒙古族牧民自愿供应驼马，支援清朝政府驱逐侵略军。“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精）河土尔扈特贝勒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①清朝边疆官员在边疆军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下，认为“事已至此，非口舌所能争”，只有力图自强，整顿军威，才能抵御外侮，赶走入侵者，收复失地。他们请求清朝政府，迅速出兵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然后向沙俄“遣使责问，索取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4卷，第11页。

伊犁”^①。

这时，清朝政府内部出现了收复还是放弃新疆失地两种主张的斗争。

主张放弃新疆失地的代表李鸿章，是一贯对俄妥协的投降派。他认为，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等国，南近英属印度，“外曰强大，内曰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②。他还援引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的卖国投降谬论，主张停止西征，把塞防的费用移充海防。他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清朝政府“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现“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需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③。这种谬论，就是公开主张放弃新疆的大片领土，遗弃数百万新疆各族人民，听任沙俄侵略者和阿古柏匪帮侵占、蹂躏。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在边疆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坚决主张出兵新疆，收复失地。他们的代表是左宗棠。他们认为“但使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至拘衅于东南”^④。左宗棠主张“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否则，“我师日迟，俄人日进”^⑤，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迅速出兵，驱逐入侵者，收复失地，才能使海防、塞防得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3卷，第17—18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8—19页。

③ 同上书，第24卷，第19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卷，第4页。

⑤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第46卷，第36页。

到巩固。左宗棠还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清朝称新疆北部为准噶尔部,或称准部;称新疆南部为回部。——引者);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①。他主张外交与军事相配合,向沙俄展开收复伊犁的斗争。这些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得到广大军民的支持。

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命令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新疆。左宗棠在兰州筹办粮饷,整编部队,积极作出关的准备。先头部队刘锦棠、张曜所部,陆续经过肃州(今甘肃酒泉),开赴哈密等地。

清政府出兵收复新疆,驱逐阿古柏匪帮的行动,使沙俄侵略者十分害怕,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沙俄特务索思诺夫斯基一伙盗窃军事情报并企图利用粮食问题阻挠清军西进。

沙俄政府派遣的以索思诺夫斯基为首的所谓“科学贸易考察队”经过北京、天津、汉口、襄樊、老河口(今湖北光化)、安康、汉中等地于一八七五年七月到达兰州。在兰州见到了左宗棠。这伙特务在兰州停留的二十七天中,通过各种方式,偷绘军队列阵图,刺探清军装备、人数和武器制造等情报^②。索思诺夫斯基了解到中国人民坚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第13卷,第2页。

② 皮谢茨基:《1874—1875年到中国不成功的考察》,第108页;又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卷,第13页。

决支持清朝政府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同时他们也看出阿古柏匪帮最终一定要失败，“这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太不相称”^①。

索思诺夫斯基探到清军出兵新疆，粮食运输困难，便别有用心地向左宗棠表示愿意出售五百万斤军粮。沙俄出售军粮给清军，是企图利用粮食，控制清军，阻挠清军收复新疆。索思诺夫斯基供认：“假若七万名武装得不错的、守纪律的、善战的但又因为缺粮不能打仗的军队依附于我们的给养，那末请注意——所有的权力都在我们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也就不给粮食，并且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我的思想是把左宗棠的军队全部依赖于我们的粮食上。”^②果然，索思诺夫斯基一回到斋桑，就自食其言，制造借口，提出先通商后运粮的要求，进行要挟，“大有得步进步之意”^③。

但是，与侵略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一八七六年七月（清光绪二年五月），清朝西征军经过整顿裁编，减少了冗员，加强了战斗力，同时筹运了大批粮饷。左宗棠的指挥部由兰州移驻酒泉。一八七六年八月，清军在新疆各族

① 索思诺夫斯基：《1874—1875年到中国的考察》，1883年莫斯科出版，第544页；又据皮谢茨基《1874—1875年到中国不成功的考察》一书称：“我很清楚并由此看到，叛乱的败局是无可挽回的”，“左宗棠无疑可在十二月攻克乌鲁木齐”，“按全部情况看来，就连阿古柏本身亦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前途”，“归根到底是要退却的”。（见该书第110页）

② 索思诺夫斯基：《1874—1875年到中国的考察》，第545—546页。

③ 《左文襄公书牍》，第16卷，第7页。

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乘胜前进，一举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十一月占领玛纳斯。北疆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清军在收复北疆的过程中，不仅得到关内运来的大批粮食，还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他们运粮供草，协助清军。同时清军还在河西走廊、哈密、巴里坤、奇台、塔城、科布多等地进行屯耕，收获了一批粮食。这样，粮食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沙俄企图利用粮食问题控制清军，阻挠收复新疆的阴谋破产了。

沙俄侵略者不甘心它的失败，继续玩弄新的花招，捏造所谓清军劫粮事件，制造外交事端。沙俄驻北京公使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说，清军劫走了他们商队的粮食，一起发生在石河附近，一起发生在玛纳斯。而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来文则说，一起发生在西湖二、三台，一起在破城。两种说法自相矛盾。沙俄还诬说这批粮食是金顺所买的军粮，被荣全部下抢劫了。据左宗棠调查，金顺与卡缅斯基（旧译康密斯克，或库毗斯喀敏额斯克·依）买粮协议是在十月中旬商定的，头批粮食的运送在十二月初，而沙俄诬告的所谓“劫粮”事件，则发生在十月初。事实彻底戳穿了沙俄的谎言^①。沙俄侵略者捏造所谓“劫粮”问题，制造外交事端，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并妄图挑起清军各部之间的矛盾，制造混乱，阻挠和破坏清军进军，用心是极其狠毒的。

在南疆，沙俄进一步加强对阿古柏的控制，迫使阿古柏投靠沙俄。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卷，第4—5页。

英国面对沙俄在新疆的不断扩张，为了保持它在南疆的利益，也加紧同阿古柏勾结。一八七四年，英国与阿古柏签订商约十二条，承认阿古柏政权。

沙俄立即派遣莱茵达尔使团与阿古柏签订协定，取得了与英国同等的特权。沙俄还不断对阿古柏施加军事压力。一八七五年春，考夫曼在喀什噶尔边境集结了两万多军队。

一八七六年底，沙俄又派出了以库罗巴特金为头目的“特别代表团”，其目的不仅为了给面临覆灭的阿古柏匪帮撑腰，支持阿古柏垂死挣扎（库罗巴特金在他的《回忆录》中供认：“我们实指望中国不能战胜阿古柏和占领喀什噶尔地区。”）；并且企图从阿古柏手中乘机窃取中国新疆西南部的大片领土和重要军事据点，攫取大量政治、经济特权。

一八七七年一月，库罗巴特金一伙经过喀什噶尔，到达库尔勒。库罗巴特金吹捧阿古柏“不仅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国家，而且能够英明地管理它。”^①阿古柏立即表示，他“是一个小人物，理应依靠俄国”^②。库罗巴特金声称：俄国使团的任务是“巩固我们双方从未中断的友谊”，并向阿古柏指出“服从土耳其斯坦总督命令的必要性”。阿古柏也认为“只有借助这一友谊之助，他才有希望维持他目前的统治地位”^③。通过库罗巴特金的这些活

①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1879年圣彼得堡出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11、13页。

动，沙俄对阿古柏控制得更紧了。

正当库罗巴特金和阿古柏在库尔勒打得火热的时候，清军向阿古柏匪帮盘踞的达坂城发动了进攻。刘锦棠所部由乌鲁木齐进军，围攻阿古柏的大管家爱伊德尔·呼里（又译作哀义德胡里）据守的天山要隘达坂城。此时，张曜所部由哈密直攻吐鲁番。刘部全歼达坂城之敌后，沿白扬河过天山与张曜所部会师，会攻吐鲁番。从陕西败窜到新疆、勾结阿古柏、盘踞吐鲁番地区的民族败类白彦虎狼狈遁逃。驻守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闻风南逃。

阿古柏匪帮在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等地的失败，大大鼓舞了南疆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士气。恶贯满盈的阿古柏，此时看到大势已去，于五月底在库尔勒自杀。

一八七七年八月，清军继续向南疆进发，穷追逃寇。深受阿古柏匪帮奴役和残害的维吾尔族、回族和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纷纷起来协助清军，参加消灭侵略者的斗争。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残匪逃往阿克苏，阿克苏人民闭城抗击。和田、叶城等地的各族人民奋起自卫，迎接清军，共剿残匪。残匪逃入喀什噶尔，企图负隅顽抗。中国广大军民四面包抄，痛歼顽敌，于十二月收复喀什噶尔。至此，沦陷十三年、惨遭蹂躏和奴役的南疆八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沙俄利用阿古柏侵略南疆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但是，沙俄侵略者贼心不死，继续陈兵边境，将潜逃

的阿古柏残匪头目接入俄境，把伯克胡里一伙窝藏在安集延地区，把叛匪白彦虎等留置在托克马克地区。清朝政府多次向沙俄当局交涉，要求交还逃犯，沙俄侵略者一再推诿不交。

二、沙俄利用交还伊犁地区疯狂扩大侵略

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清朝政府驱逐了入侵北疆的阿古柏匪帮之后，就要求沙俄兑现“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伊犁的诺言。并命令左宗棠、金顺等派员与沙俄土耳其斯坦当局交涉收还伊犁的问题。一八七八年，伊犁将军金顺派遣提督殷华廷等前往阿拉木图，向沙俄交涉收回伊犁问题。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以“伊犁事关重大，非我所能擅专”为词，推托说要由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答复。考夫曼则诡称：“交还伊犁之事，未奉上司交派，此事应由你们上司与我驻京使臣议办。”^① 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向沙俄驻华公使交涉，沙俄公使以“交涉各案”^② 未办

① 《光绪四年九月初七日金顺奏派员赴俄收取伊犁并索白逆彦虎各情由》。

② “交涉各案”（又称“边界交涉要案”）是沙俄为了拖延交还伊犁，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勒索的借口。沙俄先后提出的交涉“案件”共达一百零九起，其中重大“案件”十多起。如伪装“商队”入侵玛纳斯以西的沙俄侵略军，被民团徐学功部歼灭一事；波塔宁、乌拉索夫等闯入承化寺，持枪行凶，被僧众驱逐一事；以及所谓“清军劫俄商粮队”等。这些所谓“案件”，清朝政府已经先后进行了查处，但是沙俄仍纠缠不休，要挟刁难。直至一八八〇年，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时，沙俄仍以“边界各案未办理完结”为理由，表示拒绝进行谈判。在沙俄的压力下，清朝政府答应增加赔款，并在其它方面向沙俄作出让步，才算结案。

理完结为理由，加以推托，要清朝政府与土耳其斯坦总督议办。中国使臣复往阿拉木图交涉时，沙俄悍然阻挡前往。

为了从沙俄侵略者手中收回伊犁，清朝政府于一八七八年决定，派遣崇厚出使俄国，向沙皇政府直接交涉收回伊犁以及索还叛匪白彦虎等问题。

崇厚出使的消息传到俄国后，沙俄统治集团内部立即围绕着要不要交还伊犁，如何交还，也就是利用交还伊犁，向中国勒索什么代价等问题，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坚决反对归还伊犁。参谋总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也急忙向海军上将海登呈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从所处的位置来说，伊犁是一个现成的、威慑力量极其强大的炮垒，因此从军事上看，我们必须占领伊犁。”“如果我们由于已经轻率的许诺而不得不归还伊犁的话，则必须向中国提出要求，赔偿我们这八年来用于该地区的费用和一八六三年以来俄中贸易方面的损失，赔偿费用应为一亿金卢布，此项赔款，用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① 外交部则担心如不交还伊犁，会使俄国丧失在华的利益，而使英国坐收渔人之利。

为了炮制一个最大限度的侵略计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命令陆军大臣米留金召集专门会议，进行讨论。一八七九年六月三十日，米留金召开了财政、外交、陆军和海军等部高级官员的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决定：沙俄要继续占领伊犁的战略据点；而以归还伊犁的一部分地区

^① 《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回忆录》，第95页。

为诱饵，来换取俄国在中国商业贸易方面的特权和边界地区的“调整”，并向中国勒索五百万卢布的军事占领费^①。

沙俄原先不打算归还伊犁，这时予以讨论，乃是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

沙皇政府原来不相信清朝政府能够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失地。这时，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势如破竹，横扫阿古柏入侵匪帮，逐渐恢复了清朝政府在新疆各地的行政设施。不仅如此，中国各族人民要求乘胜前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伊犁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侵略者感到继续霸占伊犁，难以得逞。

沙俄国内，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市场缩小，财政困难。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俄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沙皇政府进一步扩大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他们想利用交还伊犁，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允许俄商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就在这个时候，从中国“考察”回国，窃取大量政治、经济情报的索思诺夫斯基一伙，发表了他们的报告，竭力鼓吹在中国贸易有利可图。沙皇政府炮制了《修改陆路通商章程草案》，企图利用归还伊犁，要挟清朝政府，勒索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军事赔款。

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朝政府特命钦差全权大臣崇厚到达俄都彼得堡。在与沙皇政府

^① 《米留金日记》，第3卷，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149页；《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回忆录》，第95页。

外交部交涉呈递国书的日期时，沙俄外交部以崇厚所携国书中未载明“头等”公使字样，进行刁难^①。等到电问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后，才于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日接见。

沙皇政府精心策划了接见仪式。接见时，“以六马公车迎迓”^②，布置了隆重的仪仗队，由沙俄亲王引导进入宫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接受国书时，对崇厚“优礼相待”。

谈判开始，沙俄的代表是外交部重要官员热梅尼、驻华公使布策和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梅尼科甫，由署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在里瓦几亚操纵。谈判从一八七九年一月下旬开始，到十月为止，历时近九个月。

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对崇厚施加各种压力，玩弄种种卑劣手段，榨取侵略权益。布策在谈判中阴狠毒辣，狡猾刁钻，“我愈急，彼愈缓；我愈退，彼愈进。不履其欲不止，履其欲方止。”^③崇厚“偶有不允之事”，布策“便相持不下”^④。

谈判初，中方代表提出索还伊犁问题的节略。格尔斯诡称：“事关重大，拟将节略奏明国君，会商户、兵两部总理，方可定义”^⑤。之后，俄方复照，内分通商、分界、补邮俄民三项，但语意含糊，不得要领。经几次会谈，沙俄才

① 《邵友濂文稿》，《奏为恭报行抵俄国日期、接见外部情形折》，镇江市博物馆藏手稿。

② 《邵友濂文稿》，《奏为呈递国书，进见俄国君主折》。

③ 《邵友濂文稿》，《致吴蕙吟等函》。

④ 同上。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31页。

透露：所谓通商是指允许俄国商人到新疆天山南北各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贸易，并把贸易地区扩大到中国西部各省，由嘉峪关直达汉口开辟通商路线。分界提出三处：一处是伊犁西部，说什么“以为自固疆圉计，顾为地实属无几”；一处是在塔尔巴哈台，要另定新界，美其词曰“将人地分清，永息边患”；一处是天山以南地区，借口俄国新併浩罕，“自应划清交涉，免起争端”。对兵费及俄商补邮费则称“数目无多”^①。实际上，沙俄要利用交还伊犁，向中国榨取什么权益，都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但是在谈判过程中，他们不是和盘端出，而是先诱骗后压榨，先笼统后具体，把绞索套在崇厚的脖子上，渐渐勒紧，从而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

崇厚在沙俄的威胁和讹诈下，轻率地答应了他们的侵略要求，而且独断专行，对谈判过程中的详细情节不向清朝政府报告，反而为穷凶极恶的沙俄侵略者粉饰辩护。他给清朝政府的奏折中说：通商“察其用意，盖为便益商民起见”，“设官（指设领事——引者）指定何处，彼尚无成见”；至于分界、偿款，则以所要“实属无几”、“数目无多”的谎言呈报^②。此外，崇厚还奏请清朝政府，改变“一边交还伊犁，一边商议各事”的既定原则，允许在接交伊犁之前，“弛禁”（开放关卡）允其通商。

清朝政府一再电谕崇厚，指出：沙俄“虽允交还（伊犁——引者），其欲藉此要挟，图占便宜，固在意中”。“崇厚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32页。

^② 同上。

务当力持定见”，“利害相权”^①，“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②。但是，崇厚在沙俄的压力和讹诈下，不请示清朝政府，就于十月二日（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擅自在沙俄一手炮制的“条约”即所谓《里瓦几亚条约》上签了字。与此同时，还逼签了《璦琿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兵费及邮款专条》。

按照这个条约，沙俄将取得如下一些权益：

关于割地赔款 沙俄归还伊犁，但要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如果沙俄的这一阴谋得逞，伊犁地区就成了三面临敌，无法防守的孤城，对整个中国西部边疆，也将造成极大的危害。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又要占去斋桑湖以东、哈巴河等地区的大片领土。南疆西界的大片土地也将要被强割。

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合中国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通商贸易方面 按照旧约，只准沙俄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四处设领事，《里瓦几亚条约》又增加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领事。通商路线扩大为三条：由尼布楚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由科布多至归化城，经张家口转天津；由新疆经嘉峪关、兰州、天水、西安或汉中直至汉口。开放松花江，准俄商航行至吉林的伯都讷贸易。这样，沙俄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便由边界地区深入到腹地。在条约中还规定：俄国商人在新疆和蒙古，享有免税贸易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3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96卷，第5页。

的特权,在其他地方,享有减税特权。

崇厚签订的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使沙俄窃取到巨大的政治、经济等特权,而中国则将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对此,《俄国在东方》一书的作者耶拉维奇说:俄国通过这个条约从中国“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愿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①俄方谈判代表热梅尼得意忘形地狂叫:“为了使我国舆论满意,必须大力宣扬我们从中国方面所取得的商业和战略上的利益”^②。但是,他们在得意的同时,也担心“中国政府对条约有什么看法,和将要采取什么措施”^③。

沙俄强迫崇厚签订卖国条约的消息在中国传开以后,举国震惊,群情激愤,各族各阶层人民,纷纷谴责沙俄侵略者的罪行,要求清朝政府惩办卖国贼崇厚,拒绝批准这个卖国条约,并为收复伊犁而继续斗争。边疆各族军民,更是仇恨满怀,严阵以待。

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推动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纷纷向清朝政府上书,痛斥沙俄侵略者的罪行和《里瓦几亚条约》的危害,指出:“我睦邻之谊尽而又尽,彼履足之道加无可加”^④,沙俄名曰归还伊犁,其北境、西境、南境皆为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1959年来丁布利尔出版社出版,第100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③ 同上书,第97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7卷,第2页。

俄属，“孤注万里，何以图存？”^①“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边圉虽防，堂奥已失。”“伯都讷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迹，肩背单寒。”^②新疆、蒙古“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未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委输。”^③乌鲁木齐等地增设领事，“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④“若界务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定议外再许侵占，商务于嘉峪关内再允推广，则有关国家疆圉、华民生计者甚大，……异时防不胜防，必将于大局有误也。”^⑤因此，他们主张将条约中“不公不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评其曲直”^⑥，以伸张正义，激发人心。他们还提出要清朝政府严饬边防，“明谕边臣，整備以待”，“先折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⑦，交涉不成，就准备武力收复。“料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何畏之有。”^⑧当时，驻守新疆边境的将领金顺、刘锦棠、锡纶等，也纷纷上书谴责沙俄侵略者的罪行，痛斥条约的危害，决心坚守边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卷，第4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④ 同上书，第19页。

⑤ 同上书，第17卷，第2页。

⑥ 同上书，第18卷，第20页。

⑦ 同上书，第6页。

⑧ 同上书，第22页。

疆，严阵以待，“彼如越境窥伺，则勒兵以痛击之，静以制动，逸以待劳。……其能就我范围交还伊犁也，固可相遇而安；其不就我范围交还伊犁也，亦可相机而动。”^①全国军民决心为反抗沙俄侵略者，收复伊犁而斗争。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清朝政府拒绝承认和批准崇厚签订的卖国条约，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又于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九日，照会沙皇俄国：崇厚在俄国所议条约、章程、专条各款，“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窒碍难行”^②，不予批准。宣布沙俄强迫崇厚所签条约无效。

为了继续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向沙俄侵略者索还伊犁，清朝政府决定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并将这个决定通过沙俄驻华公使转告沙皇政府。在争取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同时，清朝政府也作了如果谈判失败，就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命令左宗棠统筹布置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事宜。

三、沙俄逼签《中俄伊犁条约》

由于清朝政府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严惩崇厚，沙俄即将得到的侵略权益捞不到手了。它恼羞成怒，就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进行军事威胁。

清朝政府依法惩处崇厚，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沙俄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3页。

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四日，竟到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无理取闹，讯问是何用意？中国政府回答：这是中国内政，与俄国无涉。凯阳德气急败坏，大嚷：“既是中国内政，俄国使臣在此无事可办，只可就走，遂即艴然而去。”事后，中国官员前往俄驻京使馆进行解释，凯阳德竟以武力恫吓中国官员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①英、美、德、法等国驻华公使也要求清朝政府释免崇厚。

在施加外交压力的同时，沙皇政府开始在中国边疆、沿海集结军队，进行武力威胁。当时，沙俄在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边境集结的军队达数万人。北部边境，沙俄在西西伯利亚增兵一万五千，东西伯利亚集结兵力达数万，仅黑龙江以北就驻兵一万二千。沙俄驻华公使布策在彼得堡对中国驻俄参赞邵友濂扬言：俄国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率领的二十三艘军舰，已由黑海开往日本长崎。同时，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的远东舰队也驶集上海，并决定派两艘军舰驶驻天津。在渤海海域，沙俄又在阴谋策划新的入侵北京事件。

在中国西北边境，沙俄集中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这批侵略军的部署是：伊犁部队三十个连和二十个哥萨克骑兵连，共步骑七千余人；巴克图部队两个连；纳林部队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骑兵连；穆扎尔特部队五个步兵连，三个哥萨克骑兵连；斋桑部队七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骑兵连。由费尔干省集结在中国新疆西南边境，准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卷，第11页。

备进攻喀什噶尔等南疆地区的沙俄侵略军，计二十七连，达四千余人。以后，沙皇政府又继续从国内增派来大批侵略军。这些侵略军的作战计划是：伊犁部队为主力军，一旦战争开始，就迅速越过塔勒奇山口，占领精河、乌苏、玛纳斯和乌鲁木齐；巴克图部队和斋桑部队入侵中国边境后，占领木垒、奇台，直达哈密，切断清军的后路，夺取辎重；费尔干纳部队占领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南疆地区。侵略军主力占领乌鲁木齐后，接着进犯吐鲁番，然后到哈密。占领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和田的入侵军，将四千八百人分布在和田到阿克苏一线，其余的分布在阿克苏到哈密一线。沙俄侵略者预计，入侵新疆的军队将可达二万九千人。库罗巴特金指挥的沙俄侵略军，对伊犁周围的地形进行了勘测和调查，绘制了详细地图，并对地形照了相^①。侵略军第一步兵旅旅长、先头部队指挥官库罗巴特金狂妄地叫嚷：“我所指挥的先头部队，有七个步兵营，一个哥萨克骑兵团和三个炮兵连，……士气是旺盛的，一旦下达前进的命令，是会受到部队热烈欢迎的”^②。

原来崇厚赴俄交涉时，曾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向沙俄提出索还白彦虎等逃犯的问题。一八五一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两边为匪逃逸人犯，彼

① 根据科斯岑科：《准噶尔》（俄文本），第304—308页；费奥多罗夫：《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第64—66页；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255—257页；《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回忆录》第96页等书的资料综合整理写成，所列数字主要根据《准噶尔》一书。

② 《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回忆录》，第96页。

此均不准容留，务须严行查拏，互相送交，各自究办。”^①据此，沙俄政府应将白彦虎、伯克胡里等重大罪犯，押送中国政府审理究办。但是，沙俄侵略者不予遣送，并且企图把他们当作傀儡扶植起来，进行新的阴谋活动。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曾经妄图“把中国人驱逐出准噶尔和喀什噶尔之后，在这些地区建立两个独立的穆斯林汗国：一个是白彦虎为头子的东干汗国（在准噶尔——原注），一个是中亚编年史中著名的阿古柏伯克之子伯克胡里伯克管辖下的塔兰奇汗国（在喀什噶尔——原注）。”^②这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还疯狂地叫嚣：吞并准噶尔和喀什噶尔地区，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迟早要实现这一艰巨的……使命。”^③

考夫曼于一八八〇年春，多次在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府召见伯克胡里等匪首，唆使这伙匪帮卷土重来，侵犯中国。考夫曼煽动伯克胡里：倘若因伊犁问题使中俄两国开战，那就是你“复国”的好时机，我们一定帮助你“复国”。考夫曼还唆使伯克胡里，立即派人到喀什噶尔，纠集残匪，煽动暴乱，侵占南疆地区。

在考夫曼的策动和支持下，大批阿古柏残匪又窜入中国边境，进行骚扰抢掠。他们扬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各城”。据被擒匪徒供称，他们“由俄境纠众内犯时，俄官姜达郎嘱以此行务取喀什噶尔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9页。

② 科斯岑科：《准噶尔》，第318页。

③ 同上。

城池,否则不准再入俄境。”^①白彦虎所部匪徒,在博尔塔拉、塔城、精河、大河沿子、沙湾等地窜扰,“官饷、商货被劫”,“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的事件不断发生^②。但是,这帮残匪在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大部分被歼灭,残余复窜回俄境。

在沙俄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下,清朝政府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收回伊犁。一方面将沙俄逼签的《里瓦几亚条约》及其附件交政府官员逐条剖析,分别可行与不可行,作为重开谈判的依据;并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作好准备,赴俄谈判。同时,又屈从于沙俄的压力,将崇厚“暂免斩罪”。另一方面,谕令军机大臣和驻守边疆、沿海的部队,加强防卫,防止沙俄入侵。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清朝政府报告,准备在谈判破裂、沙俄拒不交还伊犁时,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

一八八〇年七月,清朝政府特命钦差大臣曾纪泽出使俄国。这次谈判,从八月四日会见格尔斯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条约签字,历时六个多月。

从八月初到十月初这段时间,沙俄在谈判地点和中方谈判代表的资格等问题上进行种种刁难。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在华的侵略利益,也积极活动,逼迫清朝政府向沙俄让步;同时也对沙俄施加影响,希望沙俄接受谈判。沙俄侵略者也害怕中国出兵收复伊犁。所以经过

^① 《左文襄公奏稿》,第55卷,第20—21页;《新疆图志》,第98卷,奏议八,第2—3页。

^② 魏光燾:《勘定新疆记》,第4卷,武功四,第4页。

反复策划,决定重开谈判,以保持它在《里瓦几亚条约》中既得的某些权益。

曾纪泽初到俄国,就从英国驻俄公使德佛楞那里得知沙俄之意,要中方对“边界要案(即边界交涉各案)数件必须速办”,“崇罪必须赦免”^①。

八月四日,曾纪泽到沙俄外交部拜会,商谈呈递国书日期,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沙俄外交部官员梅尼科甫、驻华公使布策在座。格尔斯对曾纪泽厉色相待,“面冷词横”^②,声言俄国所办各事,“俱载在约章及与崇(厚)往来照会之内,现在只要照办,无可商议”^③,以拒绝谈判的架势,威胁中方代表。曾纪泽一再说明清朝政府的态度,申述改约的要求后,格尔斯允将呈递国书及改约要求奏呈沙皇。

在沙俄的威胁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清朝政府于八月八日批准,将原议边界交涉各案办结,又于八月十二日,将崇厚免罪开释,并分别将办理情形照会沙俄驻华代理公使转告沙皇政府。

八月二十三日,曾纪泽到沙俄外交部,向格尔斯、热梅尼和布策等沙俄外交部官员提出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六条要点:一、交还伊犁全境;二、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地方与俄国的交界,仍照《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之规定勘界,如实有小处必须酌改,应由两国特派大员查勘面

^①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第4卷,第5页。

^②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第37页。

^③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88页。

订；三、交还伊犁全境之后，始允沙俄到嘉峪关通商，俄商可在尼布楚和科布多增开两条商路；四、除嘉峪关增设领事外，其余地方暂不添设；五、哈密、巴里坤、古城不设领事，俄商可择一处留货；六、俄国在新疆贸易，不能全部免税，若处处免税，中国甚是吃亏，尚须商量办理。格尔斯当即表示：“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①，“甚不满我意也”^②。八月二十四日，中方代表根据俄方要求，将上述六条要点书面照会沙皇政府。

八月二十五日，沙皇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修改条约的问题。会议由米留金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外交部官员格尔斯、热梅尼、布策、梅尼科甫，海军部官员佩休罗夫，陆军部官员格依金、麦谢里诺夫、索包列夫等。会议确定了重开谈判的原则。

（一）在坚持不离开《里瓦几亚条约》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就某些部分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由布策前往北京进行；

（二）要中国增加军事赔款，并同意调整其他地方的边界代替特克斯河流域这块地方，作为补偿，俄国就可以不坚持按照《里瓦几亚条约》的规定，占领特克斯河流域；

（三）修改条约不能指望俄国让步，不能影响俄国的尊严；

会议认为：如果两国争执拖得太久，对俄国是极端不利的。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坚决要求中国人结束一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切争执的问题^①。

这一决定的实质，是坚持《里瓦几亚条约》的权益，把归还特克斯河流域作为割地、索款、榨取特权的筹码，“巧妙地讨价还价”^②。

八月二十八日沙皇政府正式照会中方代表，借口曾纪泽所提节略，将崇厚所订条约“要务全驳，无可和衷议改”，坚持“伊犁割地，推广商务，均须照办”^③，拒绝同曾纪泽在彼得堡谈判，要另派布策前往北京与清朝政府直接交涉。并提出交涉的四项内容：一、赦免伊犁居民，二、赔偿代收伊犁兵费，三、为安插愿入俄籍之人割占土地，四、改定两国边界^④。沙皇政府随即派布策动身前往北京。

清朝政府对布策来华谈判一事，十分恐惧，一再电令曾纪泽，向沙皇政府交涉，“设法转圜”，“从容商议”^⑤，坚持在彼得堡谈判，谈判条件可再作让步。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给曾纪泽的电文中说：“布策挟兵船而来，必且于十八条之外更多无理要求，应之则贻患尤甚，拒之则兵衅立开，深恐大局不可收拾。”告曾纪泽在俄“如能多争几条，固可藉以转圜，万一十八条竟不能挽回，无论如何定义，较之布策来华，多方挟制，仍处于不得不允，其利害

① 《米留金日记》，第3卷，第267页；苏联国立莫斯科中央军事档案局军事教育档案处档案第582辑，1880—1881年，第2—6页。转引自纳罗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02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2卷，第22页。

④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94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2卷，第22页。

轻重,又复大相悬殊。”^①曾纪泽在接到电文后,于九月十八日到沙俄外交部交涉,坚持在彼得堡谈判,并表示“但有可让之处,我必酌量相让”^②。于是,沙皇政府于九月二十二日召回布策,同意在彼得堡谈判。他们的策略是:“不管谈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舰队还是作为一种威胁,而留在那里。”^③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内部就归还特克斯河流域、向中国勒索什么东西的问题,加紧进行策划。八月二十五日的专门会议只作了原则性的决定,究竟榨取什么,最大限度能榨取多少,各部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财政部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商业优惠”,把归还领土作为“向中国巧取商业利益的手段”^④。外交部认为本质问题是“取得我们边境上的正常和巩固状态,以及我们实际上的商业利益”^⑤。陆军部的考夫曼野心更大,忽而提出一亿卢布的军事赔款作为归还特克斯川的补偿,忽而要从伊犁北部划出相当于特克斯川流域一样大的领土和通往中国内地的道路来交换。海军部主张在乌苏里江以西割占一块土地,因为这个地方对俄国远东海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十月一日,布策返回彼得堡,热梅尼面授机宜,指示:暂不和曾纪泽正式谈判,而采取“单独地通过私人形式的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2卷,第26页。

②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95页。

③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04页。

④ 同上书,第103页。

⑤ 同上。

会晤”^①，向曾纪泽摸底，掌握他究竟能“让出”多少东西，及时呈报沙皇，决定最后的策略。

十月二日，布策会晤曾纪泽，声称：奉沙皇的命令，询问曾纪泽有无“全权”字据，要有全权字据，才能放心，以“全权”问题作为外交讹诈的手段，进行刁难。布策还要曾纪泽提出修改条约的方案。曾纪泽根据俄方的要求，又一次提出让步方案，不再坚持八月二十三日的六点改约要点。

曾纪泽在谈话中首先答复了沙俄外交部八月二十八日给清朝政府照会中提出的四个问题：一、按照《里瓦几亚条约》的规定，允赦伊犁居民；二、允偿代守伊犁兵费和补恤银两；三、“允将伊犁西边之地于修界时酌让若干，归于俄国，以便安置迁出之民”^②，但特克斯川一带地方，是中国要紧之区，势难割让；四、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修改边界之事，“中国俱允派员前往勘定”^③。同时，曾纪泽还根据沙俄的要求，答复了关于通商条款的问题：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增设领事，其他地方“俟通商开办兴旺之后，再议添设”^④；删除嘉峪关至汉口的商路，俄货运至嘉峪关，照天津一样享受减税特权，完税后准运往内地销售；尼布楚和科布多两条商路，“当于约内详细声明”^⑤；俄船运货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0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03—104页。

由松花江航行至伯都讷专条,中国不能允许;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由“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茶税分别酌减一事,必定允许。布策摸了曾纪泽的底以后,要求曾纪泽写成节略,以书札的形式提交沙俄^①。

尽管清朝政府作了很大让步,但沙俄方面认为“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②,与他们设想的“使《里瓦几亚条约》稍加修改就获得批准”^③的原则相差甚远。在领土方面,认为“最主要的是不能无偿地把特克斯川让回去”^④,必须以相等之地抵偿,或者在伊犁北部,或者在东西伯利亚,或者在乌苏里江^⑤。在商业贸易方面,认为至少要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及其专条中规定的内容,这样,沙俄在松花江“就获得了航行的权利”^⑥。至于赔款问题,是不是提以一亿卢布为目标,要由沙皇决定。于是,布策就割地、赔款和通商等问题,又与曾纪泽会谈,进一步压迫清朝政府让步。

(一)关于割地问题

十月六日,布策首先提出割地要求,诡称:俄国不能把伊犁“白白送与中国”,如中国要素还伊犁,“必须以相抵之地补偿俄国”。接着又说:“即如本国割留伊犁西边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04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10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④ 同上书,第110页。

⑤ 同上书,第150页。

⑥ 同上书,第110页。

及特克斯川一带地方,非欲贪得中国土地,实缘该处时有变乱,不得不留此地以保疆圉;且以安置伊犁迁出之民。”^①曾纪泽对沙俄的这种侵略谬论,没有当面进行驳斥,也不再坚持要求沙俄归还伊犁地区的全部中国领土,而是屈服于沙俄的压力,竟说什么伊犁居民中国既允赦免,要求迁出者,“纵偶有之,亦必不多”^②,“要割地安置迁民,则伊犁西边之地已尽够了,中国可以照原议界址将伊犁西边地方割归俄国,仍议将特克斯川一带地方归于中国。”^③这样,曾纪泽就把伊犁西部的大片领土按照《里瓦几亚条约》的规定,轻易放弃了。

沙俄把伊犁西部的大片领土强夺到手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布策诡称:“伊犁西边地方,亦是中國去年已经让给俄国之地,如中国以特克斯川要紧,欲请俄国退还中国,俄国亦看视该处地方最重,势难遽让,必须为俄国想一地步,始可让还。”^④并提出塔尔巴哈台与喀什噶尔等地同俄国交界之边界,不能把《里瓦几亚条约》所定的界址删除。要指明界址,若不指明界址,则“派员勘定,永无了期”^⑤。布策还气势汹汹地质问曾纪泽:你“究竟有定界之权否?”如你“不能任此事,惟有到北京商办”,“如北京亦不能办,俄国必须另想办法”。曾纪泽回答说:“我原有定界之权,但是不肯自用此权”,“如要中国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0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让地于俄，我不能答应也”。^①

布策进一步强割中国领土的讹诈未能达到目的，便和热梅尼一伙进行密谋策划，“研究了方法和手段”^②。同时，还从凯阳德的报告中知道中国方面已经缓和了战备，妥协派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③于是，沙俄决定要抓住曾纪泽奉命坚持在彼得堡谈判，不能回北京去的处境，对曾纪泽进一步施加压力，并以谈判决裂相威胁，认为“这种威胁无疑地会对曾（纪泽）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还电令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要他转告清朝政府，“只有在他们让步和补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协议”^④。

十月九日，布策又以“原约难以更动”威胁曾纪泽，提出“按本国之意，原约照旧批准，如其中有中国请商改者，不妨另立续增之条，并载明中国以何项补偿本国。”^⑤如中国要素还特克斯川，“须以相抵地方补偿本国”^⑥。至于“伊犁西边地方，系去年已让本国者”，欲归还特克斯川，要以另外之地相抵偿。曾纪泽以前约未经批准作回答，布策以前约为根本相要挟，还说什么“约内利益，应算已得的”^⑦，扬言：“如不以前约为准，难以商量”^⑧，如中国

① 《伊犁条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09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13页。

③ 同上书，第118、121页。

④ 同上书，第114页。

⑤ 《伊犁条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13页。

⑥ 同上书，第115页。

⑦ 同上书，第118页。

⑧ 同上书，第116页。

要素还特克斯川，必须在约外另给补偿。布策绕了许多弯子，最后追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曾纪泽答复：“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地土，断无再让之事。”^①

沙俄方面没有从曾纪泽手中达到新的割地目的。热梅尼和布策一伙把他们策划的种种设想报告沙皇。经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格尔斯转告热梅尼：要清朝政府批准附有议定书的《里瓦几亚条约》，俄国归还伊犁，放弃特克斯川，中国要答应补偿。如果曾纪泽拒绝，就停止同他谈判，到北京去交涉，“毫无疑问，我们谈判代表的名字（指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引者）将会使中国人吓一跳”^②。热梅尼还建议沙皇政府：命令勒索夫斯基，向清朝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时，要有断然的态度，即“不应只限于举起拳头，而且要有准备和有决心去使用这个拳头”^③。但是，沙皇政府又恐怕清朝政府采取另一种办法，宣布废弃《里瓦几亚条约》，暂不收回伊犁，保留中国主权，这样，谈判拖延下去，俄国就要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热梅尼要求沙皇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是马上开战，还是保持现状。

十月二十日，曾纪泽到沙俄外交部，继续谈判。沙俄方面由热梅尼出场。热梅尼采取贼喊捉贼反咬一口的卑劣伎俩，威胁中方代表。明明是沙俄首先集结数万侵略军压在中国边境，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反而诬蔑中国“派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20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52页。

③ 同上书，第119页。

添防兵,举动诸多不善,逼得本(俄)国亦设防添兵,并派水师(海军)前往中国”^①,企图把挑衅备战的罪责推给中国一方,并扬言“情愿(把伊犁)退还友国,但不愿让还仇敌之国”^②。中方代表申述中国愿与俄国和睦相处,无发动战争的打算后,接着反问热梅尼:“贵国何以遽派水师”到中国,“我实在不解!”^③热梅尼无词可答,又别出花招,提出什么伊犁“险要,战守得力”,本国武官“不愿退还”,“今中国请还特克斯川,当以相抵之地让与俄国,作为补偿,不然,无以对本国武官。”^④

曾纪泽在领土问题上没有再作让步,热梅尼又进一步施加压力。他威胁曾纪泽说,再过十一天,条约批准的限期就满了,根据沙皇的旨意,限期满时,就派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和凯阳德将沙皇的最后一句话告知中国,“本国不得不如此,别无办法,……若再延迟,不如打仗合算。”^⑤曾纪泽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告诉热梅尼:既然问题不能解决,“可照贵国之意,将前约全行废弃,伊犁地方,暂时仍不索取,以期两便,而固邦交;至于通商利益,如所请者,中国可以答应,仍可从容商议,此却是我的末了一句话了。”^⑥热梅尼以为有机可乘,急忙对曾纪泽说:“将前约全行废弃,……但恐不说明伊犁地方归俄国管

① 《伊犁约定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22—123页。

⑤ 同上书,第124页。

⑥ 同上书,第125页。

属，将来中国复索此地，岂不又有为难？本国之意，务求结实办法，免得含糊。”^① 曾纪泽回答热梅尼：“若说伊犁径归俄国管属，无论中国国家，断不肯出此言；……断不肯办一文书，将该处地方送与俄国。”“我说一句直话，可以释贵国之疑。中国将来再索伊犁，如仍系两国友睦和平，商议之时，中国以礼来索，贵国亦以礼相答；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②

热梅尼和布策一伙通过威胁、讹诈和多次的“讨价还价”，了解到曾纪泽在领土问题上“没有权力作出条约以外的让步”^③，十分恼火。而且，曾纪泽最后的摊牌，将使谈判有陷入僵局之势。热梅尼在给格尔斯的报告中承认：“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④，中国人不愿意打仗，但是中国知道俄国也没有力量打仗^⑤。沙俄侵略者当时很想发动一次新的侵华战争，达到它的侵略目的，但由于侵略土耳其的战争，使它国库空虚，民怨沸腾，无力发动新的战争。沙俄侵略者自己承认，发动战争的“这种必要性，对我们可怜的财政讲起来，是十分困难的”^⑥。在军事方面，沙俄供认，它的远东舰队“没有力量干出什么大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25页。

② 同上书，第125—126页。

③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16页。

④ 同上书，第121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118页。

事来”，而在陆地上又“没有向北京进兵的手段”^①。而且，战争如果“引起中华帝国的崩溃”，俄国又要碰到一个新的对手^②，后果将更难预料。沙俄侵略者供认，他们是在“一个冒风险的、劳民伤财的、危险的战争和一个不体面的、不可靠的、暂时的缓和以等待时机”的两种侵略政策中，进退维谷，犹豫不决^③。

沙俄侵略者这时无力发动新的战争，曾纪泽在领土问题上无权再让步，清朝政府提出废弃前约，暂时不索回伊犁，但保留中国主权的方案，沙俄又认为会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困难”^④，迫使他们从现在起就要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于是，沙皇政府不得不放弃归还特克斯川必须以相抵之地作为补偿的割地要求，转而以归还特克斯川作为勒索赔款和榨取其他侵略特权的手段。

此外，沙俄还继续坚持《里瓦几亚条约》中关于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地方强割中国领土的条款。沙俄借口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交界地方的哈萨克人“杂处难分”，要重改边界；喀什噶尔地方与俄交界之边界，沙俄又借口“浩罕归俄管属”，要求“分清界限”^⑤。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坚持塔尔巴哈台地方要以《里瓦几亚条约》为依据，中方代表坚持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为根本，双方相持不下。直至十二月十七日，沙俄逼迫曾纪泽接受了这两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2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54页。

⑤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59页。

处边界的勘界方案：中国塔尔巴哈台地方与俄国交界之边界，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里瓦几亚条约》规定的两条边界线“之间酌定界限”^①；中国喀什噶尔地方与俄国交界之边界，“照两国现管之界为根”^②。曾纪泽明知如此勘界，“则俄人所沾利益已不少矣”^③，但还是接受了这些方案。

（二）关于赔款问题

在十月二十日的谈判中，热梅尼毫不掩饰地说：由于中国拒绝批准条约，俄国“设防添兵，并派水师前往中国，所费卢布已一千二百万元。如事情延迟一日，则本国多一日之费，本国兵费愈多，将来中国吃亏愈重。”“本国已用过一千二百万卢布预备水师，若再延数月，必加至二千四百万了。”^④当时，中方代表认为这只是沙俄施加压力，强割领土的一种手段。十一月八日，热梅尼在送给中方的正式照会中，专列条目，提出赔偿兵费之事。中国代表质问：“要中国出钱，系何名目？”热梅尼恬不知耻地回答：“此系中国赔补俄国备兵设防之款。盖中国既不批准前约，又不向本国和平商议，遽然调兵制械，一切举动，显示与本国不睦之意，逼得本国亦动用巨款，备兵设防，……本国既因中国所逼，以致费此巨饷，理应向中国索偿，方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83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

④ 同上书，第121—123页。

昭平允。”曾纪泽回答说：“向来打仗之后，始可索要兵费，今中国既不知贵国派有兵船，又愿同贵国和平商议，岂有向中国索要兵费之理？”“既有派兵船之事，岂算和好之意？相好之国，有藉兵船之势以定约者乎？”“总之，兵费一事，名目不正，中国断难应允。”“此风万不可长”。热梅尼大耍无赖，说“本国不管别国之事，……必须向中国索偿，以补兵费亏空。”^①

早在曾纪泽一行刚刚踏上俄国领土的时候，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就给沙皇政府写信，要从中国人那里索取一千到二千万卢布以上的赔款，作为归还特克斯川的补偿。考夫曼野心更大，要价更高，他要以一亿（又提出六千）卢布的赔款用来抵偿归还伊犁之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非常欣赏这个提案。热梅尼不相信中国人会用这样大的代价来收回伊犁，说如果中国人把这批款节省下来重整军备，就有希望迟早收复伊犁。陆军大臣米留金从俄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新的俄土战争将要爆发的严重情况出发，提出要尽量向中国勒索赔款，解决沙俄的财政恐慌。后来，沙俄外交部分析了清朝政府放弃伊犁和接受赔款的两种可能性，得出结论说：“中国政府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我们的态度又是继续向他们施加一种有效恐怖的话，那末他可能接受赔款的原则。”但是，要想中国人“正式地、永久地放弃伊犁，那是用幻想来欺骗我们自己，只有把枪口对准它的喉咙上的时候，才肯答应。”^②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48—150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28—129页。

面对沙皇俄国的强盗行径，曾纪泽当时就指出：“这是国际公法上没有先例的要求”^①，他拒绝接受。曾纪泽质问热梅尼：“中国未曾调兵，则贵国派兵船到中国，是无理之事；若果因中国备兵设防，鄂（俄）国乃亦备兵设防，鄂（俄）国向中国索赔兵费，请问中国所费兵饷，又向何国索偿？”^②

用什么“名目”来勒索赔款，在这个问题上布策不同意用增加伊犁占领费的名义，而要坚持用赔偿军费的名义，说是为了取得“道义上的满足”，还说“只要原则能保持，我们可以减少赔偿的总数”。不然，“中国人就可以此为把柄，把我们说成是一批穷鬼和贪钱之徒”^③。热梅尼赤裸裸地说：“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鄂（俄）国要钱”^④。他还告诉格尔斯，“我们注重实际，而不在于名词概念。”“我们应仅限于得到事实上最可能多的东西，而不在于坚持原则。至于数目，它从属于我们施加压力的程度。假若我们总数达到一千万，我想将是一个极限，而且还得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才成。”^⑤

（三）通商问题

在谈判过程中，布策根据财政部和外交部的意见，把归还伊犁作为“向中国巧取商业利益的手段”。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32页。

②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49页。

③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34页。

④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56页。

⑤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37页。

热梅尼和布策诡称，中俄两国边界相连，而通商是“联络邦交”，要求对俄国“格外从优”；坚持“原约难以更动”。经过中方代表多次交涉，沙皇政府还是坚持它原先单方面炮制的《修改陆路通商章程草案》作为基础，只允许在个别条款上略微更改，强迫清朝政府接受。

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左宗棠奉诏由哈密起程进京。这本来是清朝政府在沙俄的威胁下，准备放弃武装收复伊犁的妥协投降措施，却意外地引起了沙皇政府的不安。沙皇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布策和格尔斯几次探问曾纪泽。这时，沙俄侵略者讹诈的目的已经达到，沙皇命令“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①，把已经掠夺到的果实，通过条约，肯定下来。

十二月十二日，沙皇政府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决定：不再坚持对原约的批准，而改订新的条约。根据这个决定，由热梅尼和布策炮制了备忘录，作为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的伊犁条约的基础。中方代表接到俄方的备忘录后，连日向沙俄外交部提出声明，指出与中国政府的指示不符和不能接受之处，希望重新考虑中方的要求。格尔斯蛮横无理地说：“昨日照会，业已写明……贵爵将本国之意电报贵国，约可定则须如此定之；中国再不满意，则俄国另有办法，不能与贵爵再举一条二条朝夕辩论矣！”^②沙俄侵略者就是以如此恶劣的态度，强迫中国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的。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215页。

② 同上书，第200页。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沙皇政府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的代表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专条。《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为《改订条约》，又因订约的地点在俄国的彼得堡，亦称《圣彼得堡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方签字的代表是格尔斯和布策，中方签字的代表是曾纪泽。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但在“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的借口下，割占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大片领土。又借口斋桑湖迤东一带中俄边界“有不妥之处”，要两国派员“勘改”。条约还规定，所有尚未安设界牌的中俄各段边界，都要派员“勘定，安设界牌”，企图在“勘改”、“勘定，安设界牌”的借口下，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

（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作为武力劫迁中国各族居民的依据。

（三）用“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名目，向中国勒索赔款九百万卢布。

（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免税。

（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省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中俄伊犁条约》和沙俄强迫崇厚签订的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

争回了一部分主权。

界务方面，在伊犁地区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在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的界线，改为在《里瓦几亚条约》界线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原线之间“勘定新界”，中国收回了一部分领土。

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二处；中俄陆路通商新疆至汉口一条路线，删除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段；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

《中俄伊犁条约》及其附件，从其历史背景、谈判情况和签订过程来看，是在中俄两国关系极不平等的情况下，沙俄侵略者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给中国西北地区的边防、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西北地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第三节 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中国领土，劫走中国居民，扩大政治、经济侵略

一、割占中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俄西段边界，本来已由一八六四年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一八八一年，沙俄借交还伊犁，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在该约中，又规定了“勘改”和“勘定”中俄西段边界的条款。沙俄根据这

个条约,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间,借“勘改”和“勘定”边界,先后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中俄科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在签订这五个勘界议定书时,沙俄又用武力威胁和其他各种卑劣手段,肆意多占,把中国西北边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

现按中俄西段边界分北、中、南三段,叙述当时“勘改”、“勘定”的情况如下:

中俄西段边界的北部,从沙宾达巴哈到奎屯山一段,维持《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的边界线。从奎屯山至萨乌尔岭^①,是由一八八三年八月订立的《中俄科塔界约》和九月订立的《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勘改”的。从哈巴尔苏山口至喀尔达坂,是由一八八三年十月订立的《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勘定”的。

根据《中俄伊犁条约》第八条规定:“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以归妥协,……”。^②分界办法,俄文本明确规定:应从一八六四年所定旧界与自奎屯山过喀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所划直线之间的“中间线”勘界。^③

① 萨乌尔岭,《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作赛哩鄂拉,也有称为赛里山的。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2—383页。

③ 《中外约章汇编》,1927年出版,第七部,中俄部分,第224页。

沙俄早就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斋桑湖及其附近的大片领土强行割去，居住该地的中国哈萨克和蒙古等族的牧民无地放牧，“人众拥挤，生计日蹙”^①。此时，沙俄又以两国边界“不妥”为词，要重新“勘改”，图谋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当两国勘界官员尚未到达该地时，沙俄已于一八八二年五月派出侵略军二百多人，侵入上述“中间线”以东的中国哈巴河地区。六月，又增派五百多侵略军入侵，妄图用武力先行侵占，造成既成事实，逼迫清朝政府在谈判时割让。沙俄的这些侵略活动，引起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群情激愤，“众议沸腾”^②，坚决表示：“绝不肯将膏腴之地，让与他国”^③，若将“众民随地划归俄辖，虽死不从”^④。清朝政府派驻当地的行政官员，也对沙俄一再侵割中国领土的罪恶行径表示愤慨。他们指出：前定之界，“自应永远遵守，迄今不数年间忽又改变，则前定之界既不足为凭，而今日所定之界，又安知久而不变哉？”他们坚决反对沙俄侵割哈巴河流域的领土，指出：“倘以哈巴河而轻许之，将来逐渐开端，俄人贪得无厌，恐犹不止此，将来西北半壁几无宁日矣！”^⑤中国边疆各族群众的正义斗争，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清朝政府官员在勘界谈判中同沙俄交涉的勇气。

① 魏光焘：《勘定新疆记》，第6卷，第16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0卷，第18页。

③ 同上书，第84卷，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29卷，第1页。

⑤ 同上书，第27卷，第41—42页。

一八八三年七月初，沙俄勘界大臣巴布科夫和别夫佐夫到达哈巴河，与清朝政府勘界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进行勘界谈判。由于沙俄蓄谋侵占哈巴河地区，一开始就违反《中俄伊犁条约》关于按“中间线”酌定新界的规定，硬要以《里瓦几亚条约》提到的“直线”分界，谈判相持十余日，未能达成协议。当清朝政府代表根据条约规定，提出在“旧界”与“直线”之间“酌中定界”的方案后，沙俄代表无言可辩，但又提出以毕里则克河划界的方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之“旧界”与沙皇政府提出的“直线”相距二百八十余里。沙俄代表提出距哈巴河（哈巴河接近“直线”）以西八十余里的毕里则克河划界，就是距“直线”八十余里之处划界，这显然与按“中间线”或“酌中定界”的规定不符。而且，毕里则克河是一条小河，流程不长，如按此河划界，则哈巴河上游仍将被沙俄侵占，中国代表据约驳斥。沙俄代表却顽固坚持这一侵略方案。又经十余日，仍然未能达成协议。这时，居住在这里的蒙古、哈萨克等族牧民，“到处人情汹汹”，“至死不肯分让”^①。沙俄侵略者看到难以实现其侵略野心，不得不改变方案，最后同意以“直线”以西一百三十余里的阿拉克别克河划界。

在谈判中，沙俄勘界大臣还企图按“人随地归”的办法，将所要侵占领土上的三万多中国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全部归入俄籍。这种既占地、又抢人的侵略阴谋，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表示“虽死不从”。清朝代表也据理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9卷，第2页。

反对。后来采取了在界线以西游牧的哈萨克人，自换约之日起，于一年内愿属中、属俄，均听其便。这样，沙俄妄图劫走中国居民的阴谋没有全部得逞。

一八八三年八月，沙俄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中俄科塔界约》。根据这个界约，沙俄割占了阿拉克别克河口以西喀喇额尔齐斯河两岸原中国科布多和塔城地区所属的大片领土。同年九月，根据《中俄科塔界约》进行实地勘界，设立界牌，订立了《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和《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

塔城地区所属哈巴尔苏山口至喀尔达坂（即喀拉达坂）之间的边界，已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明确规定了走向，只是没有设立界牌。按照《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规定，“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① 按此规定，这段边界只是设立界牌的问题。

一八八三年九月，沙俄勘界大臣、七河省省长弗里德和中国清朝政府勘界大臣升泰商议按约设立界牌问题时，又“心存覬觐，意欲藉此多分”中国领土，“为占地利之计”^②。中方代表指出：此段边界根据条约规定，应按《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之旧界勘界，“原有图线条约可循，非若别处尚须斟酌议分可比，……何得再于图约外犹有希冀。”^③ 沙俄借机割占领土的侵略行径遭到驳斥后，虽已理屈词穷，但仍不甘心，复以“罢分之恣”相威胁；威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6卷，第13页。

③ 同上。

胁不成，又别出诡计，以甜言蜜语，“冀遂要求之谋”。中方代表以“非图约所指，断不敢擅行议分”^①作答。数日后，弗里德等复来，诡称：巴尔鲁克山有俄属之哈萨克住牧，“一经定界，遽难迁移，所以欲将此山划分归俄者，实欲藉以安插此辈”^②。巴尔鲁克山居住的哈萨克族，本来都是中国人，沙俄硬把中国的哈萨克族人说成是“俄属”，以达到他们既割地又抢人的目的，还说是“中外两益”。沙俄割占领土的目的没有达到，又提出要“借让”巴尔鲁克山地方。

一八八三年十月，沙俄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根据这个界约，设置了哈巴尔苏山口至喀尔达坂之间的界牌鄂博。该界约第四条虽规定：“巴尔鲁克山及塔尔巴哈台所属地方，仍属大清国地方”，但又说自换约之日起，“其巴尔鲁克山之哈萨克，予限十年，仍旧巴尔鲁克山内游牧”；“十年限内，中国官员将中国人民毋庸迁住巴尔鲁克山内，亦无须设卡。”^③就是说不让中国管辖。一八八五年一月，沙俄又通过《中俄会订塔城哈萨克归附条约》，将四千户哈萨克人强行归俄外，又重申将中国的巴尔鲁克山地区租借十年，继续霸占，进行掠夺。

巴尔鲁克山地区，不仅“木茂草肥，泉甘土沃”，而且地当伊犁、塔城、乌苏、精河的往来要冲，是中国的边防要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6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49页。

地。沙俄强行租借巴尔鲁克山地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交通和防御，犹如“骨鲠在喉”，“彼则因利乘便”，“我则形杆势隔，处处受敌”。清朝边防官员指出：若“该山一日不收，伊塔后路一日不靖，失地利，扰行旅，断后路，危疆域，为害甚大。”^①

一八九一年五月，沙俄强租巴尔鲁克山地区行将期满，清朝政府一再照会沙皇政府如期交还，但沙俄对清朝政府的要求迟迟不作回答。一八九二年八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又提出再“展限十年”^②。沙俄侵略者企图以“展借”之名，拖延不交，达到它最后侵占该地区的目的。对此，清朝政府予以驳斥。经过清朝政府多次交涉，至一八九三年十月，双方才订立了《中俄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沙俄撤出巴尔鲁克山地区。

中俄边界西段中部，即从喀尔达坂至那林哈勒噶的一段边界，是由一八八二年十月《中俄伊犁界约》“勘改”和“勘定”的。

沙俄通过一八六四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已经割占了中国博罗呼济尔和春济卡伦以西至巴尔喀什湖、包括楚河流域的大片领土。从喀尔达坂至那林哈勒噶这段边界，本来已经规定了边界走向，只是没有设立界牌。一八八一年沙俄以武力逼签《中俄伊犁条约》时，又借口“安置”被其劫走的中国伊犁居民，更改一八六四年的《中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90卷，第3—4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函牍》二，第12页；第7卷，《函牍》三，第35页。

《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不平等条约线，强迫割地。《中俄伊犁条约》第七条规定：“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地方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扎特村东边。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①

一八八二年八月，清朝政府勘界大臣、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到达那林哈勒噶地方，与沙俄勘界大臣、七河省省长弗里德会谈勘界。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两方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全线共立界牌鄂博三十三处。根据这个界约，沙俄又侵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至博罗呼济尔、廓里扎特村至春济卡伦之间、苏木拜河至达喇图河之间的大片中国领土。

《中俄伊犁条约》明确规定，自廓里扎特村往南的边界走向，应“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引者）所定旧界”勘界。《塔城界约》规定廓里扎特村以南具体的边界走向是，顺南流之达喇图河，过特克斯河，沿那林哈勒噶河，靠天山山岭为界。但是，沙俄在勘定这段边界时，不按条约规定以达喇图河为界，而把边界线推展到中国一边的苏木拜河，侵占了中国领土。这样，从别珍岛山至廓里扎特村这段边界线以西的中国领土，是沙俄根据《中俄伊犁条约》公开侵占的，从廓里扎特村以南至那林哈勒噶这段边界线以西的中国领土，则是违约侵占的。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2页。

沙俄通过《中俄伊犁界约》所定之边界，使中国伊犁西部和西南部与俄国边界的交界，由一八六四年的博罗呼济尔、春济等地，改为逼近伊犁的霍尔果斯河。至此，伊犁河北索伦营所辖博罗呼济尔等卡伦，伊犁河南锡伯营所辖春济等卡伦以东的中国领土全被沙俄占去，使中国西北重镇——伊犁经常处于沙俄的威胁之下，侵略者可随时因利乘便，进行侵略和掠夺，后患十分严重。同时，由于沙俄割占了中国的这一大片肥沃领土，致使原来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中国各族居民，特别是索伦右翼四旗，当时就将处于“无处居住，无地耕种”^①的困境。边疆各族军民强烈反对沙俄割占中国的领土，一再要求清朝政府设法交涉收回，但沙俄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不予交还。

从那林哈勒噶以南的中俄边界西段南部的边界，是由沙俄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强迫签订的《中俄喀什噶尔界约》，和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强迫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名为“勘定”，实则侵占的。

本来这段边界在一八六四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具体走向：“自此往西南，……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②由于阿古柏匪帮的入侵，没有进行勘界和设立界牌鄂博。根据《中俄伊犁条约》规定：从廓里扎特村起，“自此处往南，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0卷，第18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16页。

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① “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② 因此，这段边界只是按条约规定安设界牌的问题。这段边界的最南部，《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还规定：“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③

根据以上条款规定，喀什噶尔以北与俄七河省交界，应按“天山之顶”勘界，安设界牌；喀什噶尔以西与俄费尔干省交界，则应“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边界，安设界牌。

从那林哈勒噶到别迭里一段边界，是通过《中俄喀什噶尔界约》勘定的。这段边界应以“天山之顶”定界，就是沿“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所构成的天山正干定界。据清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西域全图》和《天山南路图》，罕腾格尔、木素尔山、萨瓦巴齐、贡古鲁克，是在“天山正干”上，是南北疆河流的分水岭，也是伊犁西路和阿克苏、乌什的分界岭。嘉庆《大清一统志》附图也是如此。

在勘定这段边界前，沙皇政府参谋总部库罗巴特金于一八七七年在库尔勒与阿古柏进行勾结后，即派该部大尉苏纳尔古洛夫等人，从库尔勒经阿克苏，潜入乌什，然后由此到达卡拉库尔。苏纳尔古洛夫一伙沿途秘密测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2页。

② 同上书，第383页。

③ 同上。

绘山川形势，窃取了大量情报。一八八二年中俄双方根据《中俄伊犁条约》勘定这段边界时，沙俄勘界代表、七河省副省长麦登斯基（旧译“密登斯开”）与中方代表沙克都林扎布等从特克斯河出发，在天山主峰罕腾格尔东侧中国的穆扎尔特山口翻越天山。沙克都林扎布等既不熟悉地理形势，又不警惕沙俄的侵略阴谋，勘界路线不是沿天山主峰行走，而是绕天山南侧支脉行走。所谓“指山为界”，实际上是指南脉的中梁为界，与天山正干相距甚远。这样，沙俄以支脉代替主峰，把边界定在天山南侧支脉上，违约侵占了中国天山正干以南扎纳尔特河源地区的大片领土。

当勘界工作结束之际，清朝边疆官员、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帮办军务张曜等，得悉沙俄违约勘界侵占中国领土，立即向清朝政府报告，要求提出交涉。刘锦棠在奏折中指出：“贡古鲁克一路，地界八城之中，为南北相通第一要津，远在界线东南，新旧条约、皇朝舆地图志，斑斑可考。”“那林迤南，约载之贡古鲁克，明明与罕腾格尔诸山连类而及，且申言天山之顶，其确指贡古鲁克山顶为言，非指乌什之贡古鲁克山麓为言，义至明也。”“骑岭分界，则乌什边外俄界，应在贡古鲁克诸山之阴，不得尽（侵）入山阳中国境地”。^①但是，几经交涉，沙俄坚持原勘界址不变。

沙俄违约以它单方面绘制的地图上的界线划界，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1卷，第4—7页；《新疆图志》，第98卷，奏议八，第13—15页。

占中国阿克苏河上游扎纳尔特河源地区的大片领土，引起中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清代末年出版的钱恂的《中俄界约勘注》，邹代钧的《中俄界记》，以及《新疆图志》等书，对此都进行了批驳。《中俄界约勘注》指出：“此界……不顺天山正脊，而向南作弧线为界，于是分水界淆，而阿克苏河源遂割入俄境（原注：洪氏界图于阿克苏河源尚绘在中国界内）。”^①邹代钧的《中俄界记》也指出：“予细读同治三年旧约，又得明谊所定界图，知此界失地为不少。……按：既曰天山之顶，必指自天山至葱岭之正干而言，断非天山西南之支阜可知。既为天山至葱岭之正干，则凡正干以南流入中国之水，皆应属之中国可知。则此界渡阿克苏河，渡扎纳尔特河，渡阿克赛河，是各水发源地，皆划在界外矣！查明谊界图诸水源均包在界内，是知同治三年实以天山正干为界。”^②《新疆图志》也指出：“既云天山之顶，必以分水为定。……是知同治三年塔约原以天山正干为界。”^③

从别迭里到葱岭的一段中俄边界，仍由沙克都林扎布和麦登斯基会勘，通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勘定的。其中从别迭里到苏约克^④一段，按约仍以“天山

① 钱恂：《中俄界约勘注》，第7卷，第11页。

② 邹代钧：《中俄界记》，下编，第39页。

③ 《新疆图志》，第5卷，国界一，第4页。

④ 苏约克，即苏约克山，在恰提尔库尔西南，沙俄七河省、费尔干省同中国交界处。自此向东北，应以“天山之顶”划界；自此向西南，应按“两国现管之界”定界。苏约克以南勘界，在下章叙述。

之顶”划界，从苏约克到葱岭，则应按“两国现管之界”定界。

从别迭里到苏约克的“天山之顶”，应该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指明的喀克善山（即廓克沙勒岭）。

在清代有关的大量图籍如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嘉庆《大清一统志》附图和《大清会典》附图、同治《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都把喀克善山作为“天山正干”，是向南流之阿克苏河水系和向北流之纳林河水系的分水岭。喀克善山^①西南与葱岭相接。《西域水道记》记载：“乌什西北有葱岭支山曰喀克善山，阿克苏河西支发焉。”^②由此可见，阿克苏河上源的乌宗图什河和阿克赛河，都在喀克善山以南，这里的大片领土，按照条约，应该划在中国一方。

上述地方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朝政府在此一直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帮办新疆军务大臣张曜的奏折中指明阿克赛河上源的喀喇多拜等地，实在中国现管界内，不能让沙俄侵占。沙克都林扎布与俄方代表勘界时，也曾亲自看到中国布鲁特牧民在上述地区游牧。但沙俄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强行把中国牧民游牧的地方划入俄国版图。沙克都林扎布等在勘界中叠次接到张曜的公文，反对沙俄违约侵占喀喇多拜等地。中方代表“与俄力

① 以阿特巴什山命名的一段山脉，应是“天山正干”喀克善山的组成部分。

②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2卷，第1页。

争，几至决裂”，但“俄竟抱定红线”，^①“坚以红线为凭”^②，不肯更改。最后清朝政府以“慎重邦交”，“不必以边隅片壤再肇争端”^③为理由，妥协退让，丧失了喀喇多拜等地的大片领土。

邹代钧《中俄界记》曾指出：“阿特巴什山北之水，均入纳林河；山南之水，均入阿克赛河，此天山之正干与葱岭相接者。同治三年明谊所议，即以此为界。后之议者，不辨山之干支，水之方向，又不细察明谊旧图，贸然从事，无端划去数十百里之地，……言之可为慨叹！”^④

从苏约克到葱岭一段边界，按约“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这样，沙俄就侵占了中国与浩罕边界之间的中国领土；而在逼签《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时，沙俄又不照《中俄伊犁条约》的规定定界，采取各种方法，一再违约，侵占了中国现管地方的大片领土。

这样，沙俄利用《中俄伊犁条约》及上述五个界约，在许多地方更改了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边界线，割占了中国阿拉克别克河至木斯岛山以西、霍尔果斯河经苏木拜河到那林哈勒噶以西、扎纳尔特河源、阿克赛河源和苏约克至乌孜别里及其“向西南”线以西的五块领土，共七万多平方公里。这是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又一条不平等的边界线。

① 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第74—76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7卷，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37卷，第20页。

④ 邹代钧：《中俄界记》，下编，第40页。

二、劫走中国十万多居民

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伊犁，逼签《中俄伊犁条约》，在交还伊犁时还劫走中国十万多伊犁居民，这是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又一重大罪行。

早在一八六六年，中俄西段边界尚未勘界，中国伊犁西境博罗呼济尔和特克斯河上游等地的土尔扈特、厄鲁特、索伦、锡伯等族居民一万三千余人到卡伦以西已被沙俄侵占的中国地方游牧，沙皇政府就将他们非法扣留，断绝他们和国内的来往，并一再威胁他们改变国籍，臣服沙俄。爱国的厄鲁特总管伯克扎布等坚决拒绝。沙俄的这一卑鄙侵略阴谋未能得逞。后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只接回三千余人，安置在科布多地区。

沙俄侵占中国伊犁后，就胁迫中国伊犁居民臣服沙俄，加入俄籍；并且从一八七七年开始，就陆续胁迫迁走伊犁地区的中国居民。特别是一八七九年逼签《里瓦几亚条约》前后，沙俄将中国居民强行登记，编入俄籍，准备大量劫走。一八八一年，沙俄通过逼签《中俄伊犁条约》，把劫迁合法化；又违反条约的规定，扩大劫迁。

《中俄伊犁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允降谕旨，将伊犁扰乱时及平靖后该处居民所为不是，无分民、教，均免究治，免追财产。”“中国官员于交收伊犁以前，……出示晓谕伊犁居民，”“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以便因人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① 这些规定，

为沙俄迁走中国居民提供了“条约根据”，沙俄又违反条约的规定，对中国居民进行欺骗和威胁，实行武力劫迁。

关于沙俄劫走中国伊犁居民的目的，沙俄七河省省长弗里德曾经透露：沙俄七河省“通过从内部省份移民的方法增加定居人口是相当缓慢的，二十五年间……仅仅相当于伊犁地区的移民（按：指劫走的伊犁居民——引者）的数量。伊犁移民耕种和灌溉至今仍然荒芜的……辽阔肥沃的土地，对于发展本地区的生产力，起了相当良好的作用。”^②

沙俄劫走中国伊犁居民的罪恶目的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方面。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在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日的训令中曾经梦呓：这些被劫走的人，由于他们“叛逆祖国”，俄国“一旦同大清政府发生纠纷时，我们就能在中国边界完整地保持一批随时准备同中国人打仗的人员”^③。一八八二年一月十日，土耳其斯坦代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在给俄国全权代表弗里德的指示中也说，要向伊犁地区的移民宣布：“所有迁到俄罗斯帝国内境的居民，……仅吉尔吉斯（指哈萨克——引者）人除外，被安置在新的地方以后，按照一般规定都要招来服兵役，或者编入哥萨克军”^④，妄图把这些中国人紧紧绑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2页。

②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1961年阿拉木图出版，第7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79页。

在沙俄继续侵略中国的战车上。后来，弗里德还自欺欺人地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时，这些移民在战时一定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①《准噶尔》一书的作者科斯岑科在谈到这次劫走中国居民问题时写道：这对俄国“是一种真正的收获。他们加强了我国边区各州的垦殖因素，除此以外，在与中国人战争的时候，将组成可靠的民警队，对我们的军队给予很大的帮助。”^②正是为了这些罪恶目的，沙俄违反《中俄伊犁条约》的规定，采取种种手段，武力劫走中国伊犁地区的大量居民。

早在一八七九年八月，中国清朝政府根据沙俄政府的要求，派人前往中国伊犁地方张贴安民布告，宣布大赦。可是要求清朝政府宣布大赦的沙俄侵略者，却慌了手脚，如临大敌。科尔帕科夫斯基急忙报告沙皇政府，说布告对他们劫走居民的阴谋“发生了很坏的影响”。沙俄外交部提出“迫切需要派一名能控制这种状况的外交特使到现场去。”^③沙俄侵略者派人把清朝政府的官员“挡回，不令贴示”。当清朝政府再次派员前往时，沙俄“竟派人阻之伊犁境外，不准复入。”^④胡说什么：“在俄国行政

①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第78页。

② 转引自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83页。

③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94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卷，第3页。

机构管辖的区域内，不准散发外国政府的布告。”^①沙俄转而采取这种粗暴行动的罪恶用心，在后来土耳其斯坦总督的训令中暴露得很清楚：“由于中国当局的宽容，伊斯兰教徒最终会顺应中国政府的统治，这样一来，……对我们来讲，将要失掉他们。”^②

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官员到伊犁张贴收复伊犁、以及对伊犁居民“一概免究”的布告时，沙俄编造种种骇人听闻的谣言，到处散布。如说什么：“你们杀了满洲人，满洲人来了要杀你们！”等等。甚至驱使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爪牙，坐上马车，沿街叫喊：“胡大（真主）赦你，天子（指清朝皇帝）不赦你！”^③制造谎言，欺骗和恐吓伊犁居民，以达到他们大量劫走的目的。

沙俄在交还伊犁时，为了劫走中国伊犁居民，除了利用它原在伊犁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布鲁斯外，又从国内派来大批军政人员，组织所谓“移民委员会”，胁迫中国伊犁居民加入俄籍，强行登记。还征调了大批车马、船只，专门修建了伊犁和阿拉木图之间的察林河和奇来克河的桥梁。

一八八一年秋天，沙俄把一百多户维吾尔族和回族，强行迁到阿拉木图。一八八二年以后，沙俄便大规模地进行武力逼迁。沙皇政府派来专人组织劫迁，一次就征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94页。

②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第78页。

③ 新疆伊犁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用九百一十四辆马车,强行劫走了四百八十六户回族,计二千四百五十四人。沙俄企图把中国伊犁居民一个村一个村,整批整批地驱赶到俄国。如伊犁(今伊宁市)城北的吉里圩孜(村),是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村,经沙俄武力劫迁后,只剩下十二户。当时,沙俄侵略军武力劫走中国伊犁居民的惨状,正如伊犁将军金顺在一八八三年五月向清朝政府的报告中所揭露的那样:“俄国留兵一年,名为保护愿迁入俄籍之人,其实日事逼胁,所迁之民,多非情愿。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扎(今伊宁市——引者)驱迫益急。其不愿迁者,鞭撻立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①当时清朝政府派往伊犁的官员,就曾当面责问沙俄侵略者:“约载迁居之民,原听其便,兹以刑驱,诘可谓之情愿?”^②

不畏强暴的中国伊犁各族人民,对沙俄逼迁的罪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英勇的斗争。有的人宁愿死于沙俄侵略者的皮鞭和刺刀之下,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一八八二年七月,伊犁河南北两山的哈萨克黑宰部落大小头目二十余人,率领所属三千余顶毡房,拒绝迁到俄国。居住在伊犁河两岸的维吾尔、回等族居民,为了反对沙俄武力劫迁,有的日钻高山,夜宿戈壁,栉风沐雨,备受艰辛,终于逃脱了沙俄侵略者武力劫迁的灾难。吉里圩孜的维吾尔族老人莫拉苦楚克,沙俄侵略者用毒打来逼迫他迁移,但他宁死不屈,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流尽了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15页。

② 同上。

最后一滴血。吉里圩孜还有一位爱国老人莫拉发卡，他揭露沙俄的欺骗宣传，号召人们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残酷迫害，结果在一个晚上，被沙俄侵略军装在口袋里，扔进了伊犁河^①。这些英雄们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

在沙俄侵略军的刺刀和皮鞭的威胁之下，伊犁居民被“胁迁而去者”，约有“十之七、八”^②。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四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沙俄从中国伊犁地区，用武力和其他手段劫走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索伦等各族居民共十万多人^③。

沙俄在武力劫走伊犁居民的同时，还大肆破坏了当地的房屋建筑、菜园、果园、农田、水渠等生产和生活设施，抢走了大批牲畜、车辆、农具和粮食。仅一八八二年秋季，从伊犁河右岸九个乡的维吾尔族居民中，劫走牲畜

① 新疆伊犁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② 《新疆外交报告表》，清宣统二年出版，杂务，第23页。

③ 清朝政府接收伊犁官员、伊犁将军金顺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五日（光绪九年四月初九日）和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的奏折称：沙俄从伊犁撤兵时，劫走中国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族居民“不下十数万众”。

又据清宣统二年新疆外交公署刊印的《新疆外交报告表》称：沙俄交还伊犁时，将伊犁居民“胁迁而去者，十之七、八”。苏联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一文根据沙俄七河省长弗里德和潘图索夫的统计，分析说，当时胁迁而走的维吾尔人占79.2%，回族人占76.9%，与上述“十之七、八”的比例数相符。再按加鲁佐在前文中的估计，沙俄统治伊犁后期的人口总数为十四万，那么，“十之七、八”，也就是十万多人。

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头(其中马三千二百零五匹,牛六千九百三十头,羊六千三百九十八只,骆驼八十二峰),大车二千三百零九辆,粮食九十万零四千八百三十一公斤^①。伊犁将军金顺在向清朝政府的报告中说:“伊犁所产之粮”,被俄人“搬运十之七、八”^②。

经过沙俄如此严重的破坏和洗劫,中国伊犁地区到处残垣断壁,田园荒芜,人烟稀少,成了一片废墟。这就是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伊犁造成的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

沙皇政府以“安置迁民”为借口,强割了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实际上把大片肥沃的土地留给它的哥萨克,使他们逼近中国边界,便于继续侵略中国,而把大批被劫走的中国伊犁居民,分配在七河省的其他地方,如托克马克、阿拉木图、皮什别克,以及流入巴尔喀什湖的阿克苏河一带的荒地上。

被劫迁的中国伊犁居民,到了俄国以后,生活十分悲惨。他们离开了原来的房屋和土地,失去了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处在最反动最野蛮的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之下,没有房屋,没有粮食,“很多人缴了份地税,还不知道这份地在什么地方。”^③就是得到份地的人,大都是未开垦的荒

① 巴拉诺娃:《论 1881—1882 年穆斯林居民从伊犁迁移七河省的问题》,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东方学部著作集》,第 1 卷,1959 年阿拉木图出版。

② 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伊犁将军金顺奏折。

③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第 97—98 页。

地,不管地种了与否,赋税一点也不能少。缴纳不起赋税,就被套上高利贷的绞索。沙皇政府还派人到这些居民点拍卖欠税人的家财。没有家产可卖的,就被关进监牢。在沙皇殖民统治的奴役下,很多被劫迁去的居民,很快就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沦为沙俄地主资本家的雇工^①。

被劫走的中国伊犁居民反抗沙俄暴行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逃回祖国。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伊犁是他们的故乡,正如《新疆图志》所说,他们“不忘故土,仍归我国”^②。后来苏联的文章也写道,沙俄侵略军在劫迁伊犁居民的过程中,“一八八三年就有农民开始向原籍逃跑”。随后,由于沙皇政府对他们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加重,这种反抗也就更为激烈,他们大批大批地离开被“安置”的地方,有不少人回到了伊犁。这篇文章引用了当时七河省的官方文件说:“跑到中国的维吾尔人,无疑都找到了生活条件,这比在我们这里份地不够,灌溉不足,缺乏生产工具的情况要强得多。”^③这样,一八八三年以后,被劫居民从俄国统治下跑回到伊犁的不绝于途。一八八四年八月,“被俄人逼迁而去”的中国哈萨克人一百八十五户,“深畏俄人苛虐”,回到伊犁,表示“誓不愿归”俄^④。沙俄对逃

①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第97—98页。

② 《新疆图志》,第57卷,交涉五,第1页。

③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第99页。

④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三日(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八日)伊犁将军锡纶奏陈。

回伊犁的中国居民,除派侵略军追赶截杀外,还不断强迫清朝政府查送。但是,尽管清朝伊犁当局“查送不已”,而逃回到伊犁的中国居民则与日俱增。正如当时新疆巡抚在向清朝政府的报告中所说:“潜逃来伊者,不知凡几”,“查不胜查,送不胜送,索讨之文,不绝于纸,……有解送后潜回数次及数十次者。”^①据沙俄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自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四年间,就有一千一百零二名维吾尔人和一百七十七名回族人从俄国跑回伊犁^②,回来的哈萨克族人更多。据伊犁将军长庚奏,仅一八九二、一八九三两年间,逃回中国的维吾尔、回等族居民就有八十九起,男女一千零七口^③。另外,一八九三年还有两批哈萨克族人回到伊犁,“求归中属”。一批是原中国哈萨克黑宰部落五百七十八人,他们向伊犁当局报告说:“原系中国黑宰哈萨克,曾在辟里沁沟游牧,光绪八年被俄兵胁迁俄国,缺少水草,我们穷苦,难于度日,乌雅斯官还要水草银两,眼见人畜都要饿死。闻中国哈萨克享受安乐,跑来伊犁,求恩安插,万不能回去”^④。另一批是奇勒霍等二十多名哈萨克人,他们向伊犁当局报告说,他们在那里生活“贫苦至极,俄官索收税银甚迫,我们不能过活,是以

① 一九〇一年三月(光绪二十七年)新疆巡抚饶应祺转呈伊塔道黄炳焜报告。

② 加鲁佐:《革命前七河省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居民》,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第99页。

③ 一八九四年一月(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伊犁将军长庚奏折。

④ 一八九四年二月五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伊犁将军长庚奏折。

逃来中国,寻找活路”^①,请求清朝政府接受。

被劫走的居民不断归来,清朝政府也觉得“旋送旋来,……俄日有索逃之文,中日有查交之累”^②,便向沙皇政府提出交涉,准其留居中国,不再迁送。沙俄后来不得不同意允许留在伊犁种地,被称为“留户”,其中自己无田产而顶种他人之地者,被称为“顶户”,共计一千余户。但是,沙俄还将这些人保留俄籍。以后沙俄领事又以“护侨”为名,不断制造事端。正如《新疆图志》所述:“嗣因民则中民,籍仍俄籍,而交涉愈多矣!”^③

在中国被劫居民的长期斗争和清朝政府的多次交涉下,一九〇一年沙皇政府作出决定,通过它的领事转告清朝伊犁当局,注销返回伊犁的被劫居民的“俄籍”。这是被劫走的中国伊犁居民反抗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沙俄帝国主义在伊犁所造成的空前浩劫,它强加给伊犁各族人民的深重苦难,是伊犁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伊犁各族人民通过这次血的教训,更加认清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更加仇恨沙俄侵略者,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更加积极地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① 一八九四年二月五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伊犁将军长庚奏折。

② 《新疆图志》,第57卷,交涉五,第1页。

③ 同上。

三、扩大政治、经济侵略，加速了中国 西北边疆地区的半殖民地化

根据《中俄伊犁条约》第十条规定：“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亦准在肃州（即嘉峪关）及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①这样，沙俄就取得了在新疆地区扩大增设领事的特权，而且，增设领事的地区，由边境深入到内地，由通商口岸扩大到政治、军事要地。不仅如此，该条约还规定：“俄国在肃州（即嘉峪关）及吐鲁番所设领事官，于附近各处地方关系俄民事件，均有前往办理之责。”^②这样，沙俄又可以将领事特权扩展到新疆和甘肃西部不设领事的地方。沙俄在新设领事地方，同样得到“可盖房屋、牧放牲畜、设立坟墓等地”^③的特权。

沙俄还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攫取了许多经济特权。

一八六二年，沙俄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攫取了“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和“俄商小本营生，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如该商欲前往贸易，中国亦断不拦阻”^④等特权。这就比一八五一年中俄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80页。

《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的边境贸易免税特权进一步扩大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还规定，“俄商运俄国货物至天津，应纳进口正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在津交纳。”如由天津水路赴议定南北各口，须“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俟抵他口，不再纳税。如由天津及他口运入内地，均应按照各国税则纳一‘子税’”^①（按：即正税之半——引者）。一八六九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改订陆路通商章程》，重申了上述免税、减税特权，并进一步扩大，将原来蒙古地方免税贸易只限“小本营生”的规定删去，允许俄国大商人在蒙古地方贸易，享受免税特权。一八八一年，沙俄逼签《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又重申了上述免税、减税特权，并进一步攫取了“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②的特权。这样，沙俄的免税贸易特权由两国边界百里内和蒙古地方扩大到新疆天山南北各城。条约和章程还规定，沙俄陆路运货至嘉峪关，享受同天津一样减税三分之一和可由嘉峪关运往内地，只纳一“子税”的特权。

《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还增加了新的商路。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九年的章程规定：俄国陆路通商道路，只有从恰克图经张家口、东瀾、通州，直抵天津一条路线，并规定“张家口不得设立行栈”^③，但可酌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80—181页。

② 同上书，第383—384页。

③ 同上书，第180、272页。

留十分之二的货物在当地销售(一八六九年的章程,改为“任听酌留若干于口销售”)。一八八一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过境卡伦增至三十五处;商路除恰克图至天津一路外,另增由尼布楚经张家口前往天津和科布多经张家口前往天津两条商路,并准俄商前往肃州(即嘉峪关)贸易。运往肃州的货物,可在该处销售,亦可运往内地,同天津一样。

在扩大免税贸易特权和增加商路的同时,通商地区比以前更为扩大了。原章程规定,俄商在华陆路贸易,只限沿边、蒙古地方和天津;张家口只限销售少量货物,不得设立行栈;通商路线所经通州、东灞等地,不得沿途销售货物。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俄商在华陆路贸易由上述地区扩大到新疆天山南北各城;张家口不设领事,而准俄商建造铺房、行栈,进行贸易活动;俄商经过之通商路线各处如通州等,亦准销售货物。这样,沙俄在蒙古地方和新疆天山南北各城贸易享受了免税特权,天津和嘉峪关享受减税、免税特权,沙俄在华的经济侵略,由边界地区进一步深入中国腹地。它不仅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享受海上贸易的特权,而且独享的陆路贸易特权,又进一步扩大了。

沙俄利用它进一步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并不断违反条约的规定,扩大侵略和掠夺,加速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半殖民地化。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除在原设领事的伊犁、塔尔巴哈台恢复领事外,喀什噶尔亦设立了领事,接着在

吐鲁番和肃州设立领事。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沙皇政府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在乌鲁木齐增设领事的要求。清朝政府和新疆省当局根据《中俄伊犁条约》的有关规定,答复俄方:条约规定,乌鲁木齐等地设立领事的问题,“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该条约还规定,新疆天山南北贸易,“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①俄国要求在乌鲁木齐增设领事,就应根据条约的上述规定,将俄商在天山南北贸易“暂不纳税”之例废弃,另订税则。对此,沙俄表示坚决不同意。以后沙俄驻华公使又多次提出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的要求,清朝政府均以上述理由作答。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沙俄乘机要求把吐鲁番领事移设于乌鲁木齐,达到它在新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乌鲁木齐设立领事的目。清朝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答应了沙俄的要求,未再坚持废除“暂不纳税”特权、另议税则的问题。第二年,沙俄即将吐鲁番领事移设于乌鲁木齐,改称“总领事”。

沙俄领事凭借种种侵略特权,处处凌驾于中国地方官员之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肆意扩大侵略。

一八八三年四月,伊犁将军金顺报称:投俄叛匪肆行抢劫,若被拿获,沙俄则以商民贩货贸易为词,“称系已归俄籍之人,莫可究诘”;“咨会俄官严禁,置若罔闻”^②;倘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3—38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2—3页。

“一经拿获，俄人辄来袒护，必须释放而后已！”^①按照条约，就是俄商犯法，也“应由领事官与地方官公同查办”^②，但沙俄领事对中国地方官员骄横跋扈，包庇纵容叛匪作恶，使中国边境军民深受其害。在中国地方官员的不断交涉下，有时沙俄领事虽表示同意“查办”，但总是包庇袒护，拖延搪塞，不了了之。

一八八三年，伊犁提督曹正兴营中战马屡次被沙俄所包庇纵容的匪徒抢劫，该营官兵擒获盗犯二名，二犯供认确系投俄之白彦虎党羽。但是，沙俄领事宝德琳蛮横无理地强迫伊犁将军金顺摘除曹正兴的“顶戴”，并威胁说要缉拿“凶手”。复于八月间通过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朝政府威逼要挟，提出“请将以上各员撤任，照例惩办。”^③又如，清朝政府惩办米尔开里木案。米尔开里木生于喀什噶尔，在这里居住有年，阿古柏匪帮入侵时，曾充当阿古柏匪帮的一个头目，残杀维吾尔族多人，民愤极大。一八八四年，清朝政府依法将米尔开里木惩办，以平民愤，这是中国的内政，沙俄无权干涉。一八八八年，沙俄领事库满，居然以保护俄侨为名，出面交涉，要求开释。新疆有关当局据理予以驳斥。库满计不得逞，又编造种种谎言，向沙俄外交部诬告。沙俄外交部根据库满的谎言，向清朝政府提出交涉，诡称：清朝地方官员“虐待俄商”，“监禁俄商”，要求“归复俄商应得之权利”^④等，向清朝政府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16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45卷，第22页。

④ 同上书，第76卷，第16—18页。

施加压力。又如一八八八年三月，一批俄国匪徒，在塔城到乌龙奇的库尔杰宁地方，杀死中国人三名，重伤一名，抢劫了价值四千卢布的货物。当沙俄领事被迫会同查办这一案件时，受害的中国人当场就认出凶手，要求捉拿惩办。可是，沙俄领事以“调查”为名，进行包庇，一拖数年。在清朝政府一再交涉，“指责领事馆窝藏自己明明知道的罪犯”时，沙俄才于一八九四年九月提出“只限于满足民事诉讼的要求，不惩办凶犯”，而以该地“未能维持好它所负责的牧区的安宁”为词，倒打一耙，最后以“未能找到该次暴行的真正凶犯”，答应赔偿六百两银子，强迫清朝政府结了案^①。那些杀人凶手和抢劫犯，在沙俄领事的包庇下逍遥法外。

一八八八年十月，沙俄驻伊犁领事的卫队非法打死中国营勇冉青云等三人，将尸体藏于领事馆附近的荒园。经清朝地方官员查获，人证物证俱在，确凿无疑，要求沙俄领事交出凶手，依法惩办。但是，“素性刁狡，借事生端”的沙俄领事吴司本却“狡推不认”，反诬说“中国兵民无端见害”，妄图开脱罪责。由于沙俄领事“居心狡赖，违背约章”，激起伊犁军民的不满，“兵怒民怨”；而吴司本不但不承担罪责，惩办凶手，反而与沙俄边防当局勾结，在霍尔果斯河以西俄卡增调军队，并派骑兵入侵伊犁，进行武力威胁^②。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俄国领事在中国西部的裁判权及塔城领事馆的司法活动》，第58—59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8卷，第20—24页。

当法国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时，沙俄又蠢蠢欲动，在领事所在地固尔扎地方，“渐次添聚马队，借递公文之名，来去无定，不容盘查；又屡次由（在）运粮草车内，暗藏大炮，运入伊犁固勒扎”^①，妄图进行分裂、颠覆等侵略活动。

沙皇政府通过《中俄伊犁条约》，攫取了免税贸易等特权后，进一步把“商品”作为侵略和掠夺的重要手段，扩大经济侵略。沙皇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刺激俄商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贸易^②，沙俄驻中国西北地区的领事提供经济情报，勾引、支持和包庇俄商。于是，贪婪的俄商成群结伙，“奔走偕来，如水赴壑”^③，俄国商行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出现，不仅在边境地区，就是远离边境的镇迪道也是“各处地方，俄铺甚多”^④。这伙商人，不仅有从俄属中亚来的，而且有莫斯科、下新城等地的商人。据塔城地方当局调查统计，一八八一年，该地仅有俄国商民十五户，俄国商行三家，商行雇佣工人六十七名；到了一八九四年，俄国商民增至一百零八户，商行增至十二家，雇佣工人增至一百八十二名。乌苏一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商已达八十户以上。在南疆各城，俄商也在不断增加。至一八八九年，长期居住在莎车的俄商将近一百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53卷，第16页。

② 据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38页记载：沙俄为了刺激俄商到中国西北地区贸易，采取了各种奖励措施。如俄商向中国西北地区输出棉纺织品，免纳棉花税；输出火柴和糖等商品，不纳消费税等。

③ 吴棣棻：《西疆交涉志要》，第5卷，第10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6卷，第18页。

人^①，和田俄商已达八十人^②。在乌鲁木齐，一八九〇年，已有俄商五十人^③，商行亦开始出现。《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的十余年间，新疆的城镇几乎到处都有俄商，俄货充斥于天山南北。不仅北疆地区的市场为沙俄所独占，就是沙俄与英国竞争的南疆的喀什噶尔市场，在整个八十年代期间，几乎没有出现过英国商人，市场也完全由俄国商人操纵^④。

由于沙俄攫取了在中国西部贸易“暂不纳税”的特权，贸易额急剧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在一八五三年，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贸易额是：输出约六十七万五千多卢布，输入为六十八万八千多卢布。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俄中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到了一八九三年，输出增至三百零三万六千多卢布，输入增至二百七十九万二千多卢布，而且由入超一万三千多卢布变为出超二十四万四千多卢布^⑤。如新疆喀什噶尔地区，根据沙俄领事的报告，一八八二年沙俄向喀什噶尔的输出总额是五十六万卢布，输入是八十万卢布；到一八九五年，沙俄的输出总额达到一

① 别夫佐夫：《喀什噶尔、昆仑山旅行记》，1949年莫斯科出版，第70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

④ 纳罗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536页；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一书也称：“外国商品开始从市场上消失，而俄国产品在中国西部的市场上占了首位。”（见该书第239页）

⑤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20—121页。

百三十二万二千卢布,输入总额“几乎没有变化”^①。又如塔城地区,据该处领事报告,一八八三年,沙俄在塔城的贸易总额是一百万卢布,到一八八六年,贸易总额已达一百七十万卢布,其中:输出总额一百一十万卢布,输入总额仅六十万卢布,出现大笔出超;在伊犁地区,一八八二年沙俄对伊犁的输出总额是八十四万卢布,到一八八六年就达一百七十万卢布^②。以上所列举的数字是俄国人统计的,很不完全,也不包括未经关卡登记的货物在内。但仅此数字,也可以看出在《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商品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大批推销的严重情况。

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商品的结构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沙俄输出的商品中工业品和半工业品占了主要地位,特别是棉织品又占首位。一八五三年,沙俄输出中国西北地区的棉织品总额约为二十八万八千多卢布,到了一八九三年,就增至二百零三万七千多卢布^③。除棉织品外,输出较多的还有糖、烟草、火柴、玻璃器皿及生铁制品等^④。沙俄从中国西部输入

① 纳罗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536—537页;这里所说的“几乎没有变化”,是与一八八四年的输入总额一百三十六万卢布相比,一八九五年没有统计数字,只是估计数字。

② 纳罗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537—539页。

③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22页。

④ 《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一书称:除棉织品外,输出到中国的商品还有糖、烟草、纸烟、靴鞋、火柴、蜡烛、玻璃、镜子、瓷器、生铁、铁器等;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第168页称:除上述商品外,还有煤油;别夫佐夫《喀什噶尔、昆仑山旅行记》称:除上述商品外,还有五金、肥皂、串珠等(见该书第70页、第95页、第144—145页、第268页)。

的商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以茶为主,一八五三年为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卢布,占六十八万八千六百卢布输入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一八九三年,仅有五万七千七百卢布,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六^①。原先向沙俄出口的土布,此时几乎停止了。而在这个时期,输入俄国的主要是牲畜、羊毛、皮革、棉花等工业原料和水果、干果、地毯、毛毡等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据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称:俄国人在那里销售俄国的纺织品,并收购丝、碎丝、皮革等农牧产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从中国西北地区输入的货物中,工业原料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输出到该地区的商品,几乎全是工业品和半工业品。从这个时期中俄贸易的性质来看,中国西部的新疆,实际上已成了沙俄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苏中经济关系概要》一书的作者说:“到了九十年代,同新疆进行贸易的几乎只有俄国一国”。“俄国的工业,特别是棉织工业,在新疆找到了有潜力的市场,俄国商品的销售,逐渐由边境沿线各点深入省内,遍及了新疆的各主要城市”。“新疆已经变成了俄国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和工业品的消费者了。”^③

贪婪的俄国资产阶级,在向中国推销商品时,除采取其他形式的盘剥勒索手段外,还采用“赊欠”的形式,进行

①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23—124页。

② 纳罗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537页。

③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23页。

剥削。沙俄领事官员鲍戈亚夫连斯基承认，这种赊欠的形式，“成了俄商抬高物价的理由，此外还可保持住经常的主顾”^①。所谓“保持住经常的主顾”，就是俄商通过“赊欠”的形式，紧紧勒住华商脖子，使他们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当华商无力偿还债务时，沙俄领事就出面干涉，逼迫清朝地方官员追还，致使华商往往“变产毁家，不容缓让。间有无力归还及避匿不到者，领事即指官为徇庇，喋喋不休！”^②

沙俄商人为了低价掠夺工业原料，还经常窜入农村、牧区，欺骗、敲榨中国居民，通过不等价交换，以极少的低劣商品，换取大量的牲畜和农畜产品，进行掠夺。一张羊皮，稍事加工，就能获取五至八倍的利润^③。沙俄侵略者在中国西北地区所获得的利润中，每一个卢布都浸透着中国各族人民的血和汗。

在沙俄如此残酷的经济掠夺下，《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的十多年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不仅边境城镇的商业贸易为沙俄所垄断，就是远离俄国的乌鲁木齐，在一八八九年前后，牲畜贸易事实上已为沙俄商人所独占。南疆喀什噶尔等地的贸易已被沙俄所控制。这种经济侵略所造成的恶果之一，是华商受到严重打击，纷纷破产。在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44页。

② 《饶应祺存稿》（手抄本）。

③ 据别夫佐夫《喀什噶尔、昆仑山旅行记》第94—95页记载：一张白色的羊皮在和田价钱为十卢布，黑色的为十五卢布，弄到俄国后，将卷毛的白色羊皮稍为弄直、洗净，以西藏皮毛之名出售，每张可售到六十——九十卢布。因而，“对俄国的贸易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天山南路,如和田和喀什噶尔等地区,“中国的布匹,特别是金属制品,由于俄国商人以同样的货物进行剧烈的竞争,因而销售极其有限。”^①天山北路的塔城,在一八八五年就出现“商贾皆悉俄人,华商十不一、二”^②的局面。由于沙俄经济侵略的结果,新疆地区的小手工业,在九十年代中叶以前,逐渐破产了^③。

沙俄对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加速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半殖民地化。

此外,沙俄还利用《中俄伊犁条约》攫取的侵略特权,以“考察”、“探险”、“游历”等为幌子,派遣军官和特务、间谍,深入中国西北广大地区,测量地形,寻找矿藏,盗窃文物,刺探情报,侵略活动极为猖獗。仅在一八八一年以后的十多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沙俄派遣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所谓“考察队”等竟达十余次之多,活动地区遍及西北各省,以及蒙古和西藏。一八八四年,沙俄侵略分子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潜入中国,经蒙古、黄河中上游至西藏高原,然后转向罗布泊、和田,越天山回国。归国后大肆宣扬“昆仑山金矿之旺”^④。第二年,沙俄领事彼罗夫斯基即将昆仑山产金情形密报沙俄外交部,鼓吹昆仑山金矿

① 别夫佐夫:《喀什噶尔、昆仑山旅行记》,第95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203卷,第4页。

③ 纳罗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539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8卷,第16页。

有利可图，说“核其砂净质重，……允为五大洲之冠”^①，妄图进行掠夺。

一八八九年，以别夫佐夫率领的所谓“中国西藏考察团”在中国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侵略活动，于一八九〇年才返回俄国。他们盗窃了大量情报，其中对中国昆仑山矿藏资源的情报，再次激起了沙俄侵略者的贪欲。该团的博格达诺维奇在昆仑山地区活动一年之久，绘图著书，将该地金矿的分布位置和采矿情况一一报告沙皇政府。

在这个时期，被沙俄派遣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过侵略活动的，还有波塔宁、格鲁姆·格尔日马依洛、伊格拉提耶夫、格鲁姆勃切夫斯基、克拉斯诺夫、科兹洛夫、罗鲍罗夫斯基、奥布鲁切夫、卡塔诺夫、卡兹纳科夫等人。他们的侵略活动，为沙皇政府继续扩大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提供了重要资料。

沙俄的疯狂野蛮的侵略，给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中国各族人民对沙俄穷凶极恶的侵略活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打击了沙皇俄国的侵略气焰。

一八八三年，清朝政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批准在新疆改建行省，在新疆普遍推行州县制，于乌鲁木齐设新疆巡抚、布政使，下辖道、府、厅、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如内地各省。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方的行政管辖，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对巩固中国西北边防，抵御沙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8卷，第17页。

第五章

沙俄武装侵占 中国帕米尔地区

帕米尔，古代称为葱岭。从地形上说，是处于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交会处的高原地带。全境一般分为八帕^①。按柯尔克孜语，帕米尔的意思是高平寒冷的地方。

从二千多年前的西汉起，中国历代政府（包括统一的中央政权和分裂的地方政权）就在帕米尔地区设官置守，有效地行使主权。生活在帕米尔地区的中国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等民族，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开发了祖国的边疆，在建设边疆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帕米尔地区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拱卫着新疆和西藏。它又是沟通费尔干盆地和印度平原的捷径。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沙俄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新疆、西藏的侵略，同时窥伺印度，同英国争夺亚洲霸

^① 八帕，即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瓦罕帕米尔。

权,使用军事侵占和外交讹诈等手段,一块一块地割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出兵侵占了帕米尔地区的北部边沿阿赖谷地。八十年代,它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扩大了它在帕米尔地区的侵略范围。九十年代初,沙俄帝国主义违反《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又出兵帕米尔地区,进一步武装侵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强占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后,威逼清朝政府,妄图以它在萨雷阔勒岭的军事占领线作为“合法”边界线强加给中国。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接着,沙俄又变换手法,强迫清朝政府同意互换在帕米尔地区维持现状的照会。对此,清朝政府当时致俄国外交部的复照中明确提出中国关于保留对帕米尔地区主权的声明。此后,帕米尔地区的绝大部分一直被沙俄侵略者所霸占,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一直未能合理解决,成为中俄近百年来边界问题的一大悬案。

第一节 沙俄开始侵略中国帕米尔地区和 逼签《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一、沙俄开始侵略帕米尔和清朝政府 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沙俄疯狂地向中亚地区扩

张,先后征服了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汗国。沙皇俄国的边界线,向南扩张到了阿姆河,开始了与英国争夺帕米尔的活动。

一八六九年十月,俄国陆军大臣米留金同英印代表道格拉斯·弗尔萨特在彼得堡谈判,划分彼此在中亚和帕米尔的势力范围。经历了三年的争夺与勾结,议定了从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萨雷库里起,顺帕米尔河和喷赤河,划定了一条俄、英在帕米尔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分界线以南的瓦罕帕米尔,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分界线以北的中国帕米尔地区被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沙俄同英国签订了上述协议,摆脱了英国的牵制以后,就回过头来并吞浩罕。一八七五年七月,浩罕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调动大军,血腥镇压了浩罕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八七六年二月,正式吞并了浩罕汗国,改名费尔干纳省,由土耳其斯坦总督直接管辖。

沙俄进攻中亚的目的,除了吞并三汗国及其他地区以外,还妄图以此为跳板,进攻中国和印度。沙俄征服中亚的头目之一捷连季耶夫中将供认:“将费尔干纳省这样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富饶的地区并入我国,不仅绰绰有余地补偿了占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获得了进攻中国,甚至攻击英国属地东印度的一个最好的基地”^①。因此,沙俄在占领浩罕的同年,便借口“在归并的领土上建立安宁”,并“保卫今后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25—426页。

自己新臣民的生命财产”，派遣侵略军“深入山区”，占领了伊斯法拉、乌奇库尔干和中国的古里察^①，并进一步入侵阿赖。

由于沙俄的入侵，中国柯尔克孜族希布察克部在阿卜杜拉伯克的领导下，首先奋起抗敌，爆发了一场反对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一八七六年沙俄派遣以斯科别列夫为头目的侵略军，通过奥希、古里察，窜入塔尔提克山口、奇吉勒阿尔特山口，一直深入到喀拉湖附近。当地居民英勇抗击沙俄的入侵。他们“躲在石砌鹿寨后面”，猛烈地射击沙俄侵略军，迫使“斯科别列夫不得不很快承认无法向这些山民进攻”，只得迂回行进。然而仍然“在阿卜杜拉伯克的炮火袭击下付出很大的牺牲”。阿卜杜拉伯克边打边退，在喀拉湖沿岸，沉重惩罚了尾随的沙俄侵略军^②。但是，由于力量悬殊，被迫撤退，中国的阿赖谷地终于被沙俄侵略者强占了。

沙俄强占阿赖谷地后，中国阿赖谷地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同沙俄侵略者进行斗争。沙俄侵略者哀叹：“无时不受到”当地人民的“骚扰”^③。一八七七年，中国军民粉碎了阿古柏的入侵势力，收复了南疆。希布察克等部首领立即赶赴喀什噶尔，向清朝大臣刘锦棠提出要求，仍愿归属中国。清朝政府准其所请^④。于是希布

①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10页。

② 鲍里斯·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1904年莫斯科出版，第42页。

③ 同上。

④ 《左文襄公奏稿》，第52卷，第57页。

察克等部相率归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安置在喀什噶尔西部山区一带放牧。

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北部边沿后，进一步派遣披着“科学家”、“探险家”外衣的先遣队，连续不断地潜入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侦察地形，刺探情报，收集资料，准备扩大军事入侵，强占整个中国帕米尔地区。

一八七七年九月，考夫曼又派出一个由西弗特洛夫率领的所谓“科学考察团”，深入帕米尔地区。这个“考察团”除了探查阿赖岭和喀拉湖一带外，还探查了郎库里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和伊西洱库尔淖尔。

一八七八年，考夫曼又派遣由阿布拉莫夫率领的“军事远征队”到帕米尔以西地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

八十年代以后，沙俄进一步组织规模庞大的“远征队”侵入帕米尔各地。一八八三年五月，由普佳塔率领的“学者考察团”，从塔什干出发，经过奥希，先后到喀拉湖、布伦库里、塔什库尔干、尼若塔什、阿克拜塔尔、郎库里、阿尔楚尔、萨雷兹库里、鄂依库里、萨雷库里、巴什拱拜孜等地，窜遍整个帕米尔地区，刺探了有关帕米尔地区各方面的重要情报。

面对沙俄的步步进犯，清朝政府在消灭阿古柏、收复南疆后，加强了对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管辖。

一八七八年，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帕米尔地区的管理，委派沙依木伯克和库鲁木旭伯克为蒙巴希（千户长），常驻六尔阿乌（今苏联木尔加布）。下设六个玉孜巴希（百

户长),分别管理喀拉湖、郎库里、六尔阿乌、阿尔楚尔、切西都完和阿克苏(今苏联克孜勒拉巴特)等地方。

同年,又按乾隆以来旧制,委派五品蓝翎顶戴艾里布为阿奇木伯克,负责管理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一带)及其附近地区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清朝政府在任命书中指示艾里布管理所属居民“各安生理”,“严守各卡”,如有要事,即前往喀什噶尔报告^①。一八七九年艾里布死,刘锦棠报请清朝政府任命艾里布的哥哥阿不都勒艾山继任五品阿奇木伯克。

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清朝政府改新疆为行省。在帕米尔地区,为了照顾兄弟民族习惯,在一段时间内,仍沿袭了过去的传统,继续委派当地部落头人为千户长和百户长,进行管辖,即郎库里的拜克波罗伯克,阿克苏的托库尔伯克,托合他买提(今托合他梅什)的托合他伯克,阿尔楚尔的卡拉库力伯克,六尔阿乌的买买里玉山伯克,切西都完的艾西巴衣伯克,波孜纳的库万提伯克,巴什拱拜孜的百提伯克。帕米尔地区的政治中心,仍在六尔阿乌。

色勒库尔是边防要地,新疆建省后,在此设立抚辑粮运局(后改为转运抚辑局),负责地方治安和转运军粮等工作,由喀什军政长官指派旗官一名管理局务,并领导当地的阿奇木伯克^②。至于色勒库尔地区的地方事务,仍由阿不都勒艾山管理。阿不都勒艾山病逝后,莎车直隶

^① 《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刘锦棠谕文》。

^②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喀什提督和喀什道台谕文》。

州知州委任他的儿子买买提克里木为阿奇木伯克，仍给五品顶戴，负责管理色勒库尔地区^①。买买提克里木一家，相继充任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在当地影响很大，工作尽职，曾多次受到清朝政府的奖励。

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每年要征收一定的赋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帕米尔地区的财政由旗官张鸿畴掌管。牙合甫夏担任税收官。牙合甫夏经常来往于六尔阿乌等地，督促检查税务工作。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的税收，一直正常地进行到沙俄武装占领帕米尔地区时止。多次入侵帕米尔的沙俄上校军官杨诺夫也曾于一八九一年六月，“在向帕米尔的偏远地区深入时”见到中国喀什噶尔的官员，“向过往商客和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征收赋税”^②。

清朝政府加强在帕米尔地区行政管理的同时，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些卡伦，以巩固帕米尔地区的防务。这些卡伦主要有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图斯库尔卡，巴什拱拜孜卡，雅尔特拱拜卡和塔克敦巴什卡。

黑孜吉牙克卡设在乌孜别里附近。新疆巡抚魏光燾给总理衙门的咨文中说：“黑孜吉牙克在最北境，与让库尔相连，为俄入帕要隘”^③。查界委员海英也说：“黑孜吉

①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莎车直隶州谕文》。

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1962年杜尚别出版，第283页。

③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3页。

牙克为扼俄人入帕境要卡”^①。清朝政府在这里设卡,以防御沙俄入侵。

六尔阿乌卡设在萨雷兹帕米尔境内的六尔阿乌河(今苏联木尔加布河)北岸。这是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中心地带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它和黑孜吉牙克卡南北相望,互为犄角,是防御沙俄入侵的第二道关口。

阿克素睦尔瓦卡,又称阿克苏卡,设在小帕米尔境内阿克苏河上游。

图斯库尔卡设在阿尔楚尔帕米尔境内。位置在图斯库里东南。

巴什拱拜孜卡和雅尔特拱拜卡都在大帕米尔境内。巴什拱拜孜卡设在巴什拱拜孜(今苏联巴什古木别孜);雅尔特拱拜卡设在雅尔特拱拜(今苏联扎尔提古木别孜)。

塔克敦巴什卡设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境内的丕伊克,这是最南的一卡,是当时防御英帝国主义北上侵犯帕米尔地区的一个重要卡伦。

以上各卡伦,分布在帕米尔广大地区,是清朝政府守卫中国神圣领土帕米尔地区的重要据点,“均设巡兵驻守”^②,并由当地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人民协助进行沿边卡伦的稽查、侦察和修路等工作。

①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0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8页。

二、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一八八一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中规定：“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①。

前面已经讲过，沙俄吞并浩罕后，继续向南扩张，侵占中国的阿赖地区，将其并入所建的费尔干纳省。因此，这里的所谓“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就是要把它已经侵占的中国阿赖地区“合法化”。

一八八三年六——十月，沙俄利用《中俄伊犁条约》中的规定，强迫清朝政府商议、勘定“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②的边界，从别迭里山口起到乌孜别里山口止，逐段设置界牌。一八八四年六月，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通过这次“勘界”和签订界约，沙俄不仅割占了中国喀什噶尔西北部的大片领土，而且在帕米尔地区，进一步割占了中国的和什库珠克帕米尔。

必须着重指出，《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条中还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这是中俄勘分帕米尔未定界地区的唯一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3页。

② 同上。

条约规定。所谓“转向西南”，就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起，分界走向大致经过伊西洱库尔淖尔西面向西南引伸。所谓“一直往南”，就是从乌孜别里朝着萨雷库里引伸。这样一来，只有在“一直往南”走向线以东的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等仍然保留在中国境内，而“转向西南”走向线以西的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都被圈进了俄国的版图。两条走向线之间的三角地带则成了“待议地区”。这个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具体议定勘分以前，中国自应在这里继续行使自己的主权。

第二节 沙俄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一、沙俄扩大侵略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准备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俄、英争夺帕米尔地区的斗争又激化起来。沙俄“为了确立自己在帕米尔的霸权”^①，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加紧了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准备。

从一八八八年起，俄国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两次派遣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潜入中国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政治、军事侦察活动。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 60—90 年代）》，第 14 页。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挂着“考察团”的招牌，到过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还先后窜到喀什噶尔、叶尔羌和西藏等地。窃取了大量的地理、政治和军事情报。并到坎巨提，诱惑坎巨提同俄国结盟，投靠沙俄。

一八九一年二月，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商定：“派一个或两个哥萨克骑兵连去巡视帕米尔。”同月十八日，参谋总长在给土耳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的回信中还说什么：“哥萨克支队要用自己的露面，来象征俄国认为帕米尔是其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决不打算放弃它”。三月二十八日，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按照沙皇政府的安排，在参谋总部尼古拉耶夫研究院作“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的专题报告，大肆鼓吹要越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边界走向，进一步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在报告中胡说甚么：“从历史上说，俄国对帕米尔的权利是自然产生的。因为帕米尔从来就是浩罕国的版图”，“俄国占领了浩罕汗国之后，当然有充分权利把帕米尔接管过来。”他企图用荒诞无稽的“继承浩罕遗产论”，作为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根据”。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初，浩罕才由一个封建城邦发展成为一个封建汗国。但是，正如本书第一章已经阐明的，早在浩罕建国以前的一千多年，帕米尔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了。浩罕建国以后，曾多次侵犯和骚扰帕米尔的色勒库尔等地，结果都被中国当地军民击

退，浩罕侵占帕米尔地区的野心始终没有得逞。如一八三四年九月，浩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派遣迈买西里普进犯塔哈尔玛，企图占领色勒库尔。清朝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帮办大臣关福立即命令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严加防守。同时，向浩罕发出谕帖，郑重声明色勒库尔系中国领土，严厉斥责浩罕妄图占领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谕帖指出：“查色呼库勒（即色勒库尔——引者）地方原系叶尔羌所属，自乾隆二十五年大兵平定叶尔羌以来，该处设立五品阿奇木伯克一员，颁赐印信一顆，管理色呼库勒地方事务，又设六品伊什罕伯克一员、六品商伯克一员、七品伯克五员，共计大小伯克八员，每年在叶尔羌支給盐菜钱四十千文，该处回子每年交金子二十七两七钱，折算布一百五十三疋，至今七十余年”。但是浩罕仍然反复滋扰。一八三六年冬，勒什噶尔胡什伯克率众二千余人，用炮轰开色勒库尔城垣，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率领当地居民奋勇抗击，负伤牺牲。道光帝加派伊犁参赞大臣奕山驰赴叶尔羌，会同兴德肃清浩罕侵略势力。在当地人民群众和伯克的积极配合下，迅速拿获了浩罕侵略者头目阿达那等八人，押解叶尔羌。经奕山审讯后，处以死刑。浩罕侵略者溃散，清朝政府收复了色勒库尔。此后，浩罕对中国色勒库尔等地的骚扰，也都未能得逞。直至一八七六年浩罕被沙俄灭亡以前，浩罕同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始终在阿赖岭。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之流妄图用“继承浩罕遗产论”替沙俄侵略中国帕米尔地区寻找所谓“历史根据”是徒

劳的。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沙俄强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对于同英国争霸亚洲的意义，他说：“如果说通过帕米尔的道路便于我们向印度进军，那么，毫无疑问，一旦落到英国人手里，这些道路更便于向我国进军”^①。他还说：“一旦同印度发生冲突”，“经过帕米尔往克什米尔派一支三、四千人的部队，……甚至俄国部队的一个小支队从帕米尔方面出现，就会吸引英国人的大量兵力而大大减轻俄国主力作战兵团的任务”^②。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并从帕米尔的气候、交通等方面说明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可能性。格罗姆勃切夫斯基的报告成了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前奏”。紧接着，沙俄政府就采纳了土耳其斯坦当局的具体建议：向帕米尔派遣一支由费尔干纳省驻军组成的“考察队”，委派土耳其斯坦第二常备营营长杨诺夫担任队长，指示杨诺夫全面探查帕米尔东部地区的主要交通点，并公然授权由他“确定俄国在帕米尔的边界”。命令杨诺夫沿慕士塔格山推进，直趋瓦赫基里山口，然后转向布才拱巴什。同时，还指示驻喀什噶尔领事彼罗夫斯基从“外交角度”保证杨诺夫的活动^③。

①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1891年版，第27—28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1962年杜尚别出版，第281页。

在这种形势下，清朝政府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一八八八年，清朝政府增兵六尔阿乌卡伦和阿克苏河流域；第二年，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燾指派旗官张鸿畴带队“巡查内外卡伦”^①。张鸿畴巡查了大帕米尔的巴什拱拜孜后，又继续向西巡查阿尔楚尔帕米尔，一直到了伊西洱库尔淖尔附近的苏满。魏光燾同意张鸿畴的建议，设立苏满卡，派兵驻守，以巩固帕米尔地区的边防。同年，还在伊斯提克河边的伊斯里克（今苏联加里宁集体农庄）设立伊斯里克卡；在萨雷阔勒岭以东的重要据点塔什库尔干、布伦库里、布伦口等处设立哨所；选派当地牧民守卫卡拉苏、丕伊克、明铁盖、托克满苏、瓦赫基里等险要山口。在六尔阿乌东和赛马克西，各修建一座土木结构的营房。此外，张鸿畴为了保证帕米尔地区的物资供应，还组织居民整修从六尔阿乌经卡衣日塔什、色斯支库里、郎库里、丘克达衣达坂到布伦口的驿道；并在卡衣日塔什和色斯支库里两处修建了驿站；整修六尔阿乌到恰如克的道路，以便转运物资，保证苏满卡的供应。并且动员军民在新港附近开荒造田，兴修水利，种植青稞和饲料。又在赛马克附近阿克苏河支流上兴建两盘水磨，以解决粮食加工问题；后来当地柯尔克孜居民称这个地方为“托克尔满吉勒尔”（水磨沟）。清朝政府的这些措施，充分说明了在沙俄武装强占帕米尔的前夕，中国政府一直在这里有效地行使着自己的主权。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7卷，第3页。

二、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一八九一年七月，杨诺夫带领一支三百多人的哥萨克骑兵，以“打勃罗羊和练习射击”为幌子，侵入中国帕米尔地区，先后窜犯阿克拜塔尔山口和阿克拜塔尔、阿克塔什、阿克素睦尔瓦、布才拱巴什等处。在经过的关隘山口，标记他们到达的日期。杨诺夫进一步侦察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交通情况和战略据点，了解到：从阿赖河谷经过奇吉勒阿尔特和阿克拜塔尔山口，可以通行驮载牲畜；从阿克拜塔尔山口到布才拱巴什，可以通行车辆；布才拱巴什是喀什噶尔、色勒库尔以及瓦罕、坎巨提等地的交通枢纽。杨诺夫还刺探了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的防务，了解到清朝政府在帕米尔东部增设了卡伦^①。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认为，杨诺夫的这些资料，“对已有的关于帕米尔的资料，作了相当大的补充，一旦在毗邻国家里采取军事行动，对于进行各种设想是很需要的”^②。

杨诺夫侵入帕米尔后，就带领一支侵略军窜入伊西洱库尔，劫走了苏满塔什的乾隆纪功碑^③。这块用满、汉、

①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281—282页。

② 同上。

③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一书叙述达维逊的亲身见闻说，杨诺夫胁迫清朝将领张鸿畴离开苏满塔什等地，“同时劫走了苏满塔什的石碑。这块石碑是中国在阿尔楚尔享有主权的确切证据。”（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973年伦敦出版，第35页）

维三种文字镌刻的、纪念乾隆年间伊西洱库尔平叛之战的石碑，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帕米尔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杨诺夫盗碑的卑劣行径，无法抹煞帕米尔地区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就连当时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向俄国提出的照会，也曾明确指出，苏满等地属于俄国的说法是“未经证实”的^①。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张鸿畴带骑兵三十人，由喀什噶尔至苏满，“在立碑旧址，筑立墙壁，为将来清界之据”^②。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新疆巡抚魏光燾饬命查界委员海英在苏满地方刊石重立纪功碑^③。

杨诺夫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后，还公然在阿克塔什等地“竖杆粘贴”告示，胡说什么当地居民“今已属俄国百姓”，胁迫他们服从沙俄统治^④。杨诺夫还带了一幅《中俄边界图》，扬言准备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这幅“边界图”中标出的“俄国领土”竟然包括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外的整个中国帕米尔地区。

为了配合杨诺夫的入侵，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带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到费尔干纳省进行“巡视”。他从奇姆肯特出发，经过费尔干纳、安集延、奥希、古里察，直达伊尔克什坦。

对于沙俄的武装入侵活动，清朝政府和新疆地方官员当即提出抗议，并采取了相应的防御措施。新疆巡抚魏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 60—90 年代）》，第 394 页。

②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 8—9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3 页。

光焘飭令喀什噶尔道同俄国领事据理辩论,促使照复,并派人前往察看。同时派遣旗官张鸿畴带领一支队伍,驻扎苏满,进行防范。魏光焘并照会土耳其斯坦总督,抗议沙俄“称兵越界”^①,要求迅速撤退。陕甘总督杨昌濬也电告总理衙门,指出“本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俄国头队兵官伊万洛甫(杨诺夫)等共马步三百余名,到新疆黑孜吉牙叱伦(卡伦),分起过苏满、阿克素睦尔瓦两卡,系直经中国属境,……该兵头等无故违约,带兵入境,其意叵测”^②,要求总理衙门照会俄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和交涉。清朝政府除向俄国公使交涉外,还指示中国驻彼得堡公使许景澄照会俄国外交部,指出黑孜吉牙克、苏满、阿克素睦尔瓦、阿克塔什等“皆系中属卡伦”,沙俄“无故越境侵占,殊属违约”,要求“速将越境兵队撤回”^③。沙俄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帕米尔地区是中国领土,撤退了侵略军。一八九一年十月三日,俄国外交副大臣希什金当面对许景澄说:俄兵已“回塔什干”,并同意清朝政府官员撤毁杨诺夫在中国帕米尔境内所立木杆^④。并表示:“此番俄武员带兵竟到中国境内,是其错处,已经行文申飭”,保证以后“当行文严戒,不准派兵入中国界;即要到该处游猎,亦须与华官商允方行”^⑤。

①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3页。

②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陕甘总督杨昌濬电》。

③ 《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许景澄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第20页。

⑤ 同上。

其实，沙俄政府的“撤兵”和“保证”，只不过是骗人的花招，是为了从事新的侵略作准备，待机卷土重来。杨诺夫侵略军刚撤退，俄国报纸就公开叫嚣：“帕米尔地方，俄国虽无属地实据，然得之亦甚有用”；“俄国生齿日繁，藉以为游牧之所”^①。其侵略嘴脸暴露无遗。

一八九一年九月初，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巡视”阿赖回到马尔格兰后，就向参谋总部提出专门报告，狂叫必须“取消”《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款（按：指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向南”），沿着萨雷阔勒岭“跟中国重新勘界”。俄国陆军参谋总部完全同意弗列夫斯基这一侵略主张，并在同年十二月上书陆军大臣，叫嚷俄国“需要帕米尔”，同时提出以兴都库什山为俄国南界的方案^②。

一八九二年一月，弗列夫斯基又向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提出专门报告。为了强占中国的帕米尔地区，他请求准许采取如下的军事行动：一、派遣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中校指挥的奥伦堡第六哥萨克团的混成连，占领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二、从土耳其斯坦第三边防旅抽调五百六十人组成分遣队，配备六门骑兵山炮，进攻帕米尔；三、在一八九二年，派遣奥伦堡第六哥萨克团越过阿赖岭筹集草料。万诺夫斯基在收到上述报告之前，就已经电令土耳其斯坦总督，立即准备调动四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

^① 《许竹箕先生出使函稿》，第8卷，第13页。

^②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1906年圣彼得堡出版，第404—405页。

四门山炮，占领布才拱巴什。同时要安排一个步兵营的后备力量^①。

沙俄政府为了策划武装占领帕米尔，在一八九二年一月召开专门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人员有外交大臣格尔斯、副大臣希什金、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参谋总长奥普鲁切夫、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参谋部亚洲部队主任及曾经带兵侵入帕米尔的杨诺夫等。会议决定武装占领中国帕米尔地区。但鉴于从奥希到布才拱巴什，路途遥远，又值冬令，冰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而决定：先向帕米尔派出一支“侦察兵”，第二年春天增调五十名哥萨克骑兵入侵卓尔库里（萨雷库里），同时准备好一个骑兵连，四个哥萨克骑兵连，四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四门山炮，夏季一到，立刻向帕米尔进犯。

专门会议还决定，立即同清朝政府和英国政府进行关于“帕米尔问题”的谈判，并由外交大臣书面命令俄国驻英大使斯塔阿利“坚定不移地捍卫对帕米尔地区的权利”，帕米尔“对于俄国来说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②。会后，沙俄陆军部和外交部，加紧了强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侵略活动。

一八九二年二月，沙皇政府派遣以陆军中尉勃尔热齐茨基为首的“侦察队”向帕米尔地区进犯。这支由哥萨克骑兵组成的侵略军，连辎重在内有八十多人和二百多匹马。这支侵略军经过喀拉湖，进犯郎库里等地，窥测了

①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406页。

②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60—90年代）》，第396页。

帕米尔东部的重要关隘，窃取了大量重要情报。

与此同时，沙俄外交部于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照会清朝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否认阿尔楚尔及伊西洱库尔淖尔是中国领土，反对中国增防苏满卡伦。第二天，许景澄就此同格尔斯会谈时，格尔斯无理取闹，说什么“阿尔楚尔帕米尔一带与我费尔干省甚近，而离喀什噶尔甚远，于理似应属俄，故不欲中国派兵到该处。”还说：“倘中国此刻派兵前往，俄国亦不得不调兵到该处”^①。在沙俄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下，清朝政府被迫撤回了增防苏满的军队。新疆巡抚陶模在复电许景澄时指出：“查中俄分界至乌孜别里止，阿里楚尔河、雅什里库尔湖均在乌孜别里南，雅什里库尔即《新疆识略》之伊西洱库尔，乾隆二十四年立碑迤北十里之苏满，断无立碑文于界外之理”^②。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苏满设卡驻兵，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外人无权干涉。一八九二年三月四日，清朝政府照会俄国驻京使臣，重申阿尔楚尔、伊西洱库尔淖尔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新疆巡抚派兵赴彼，并非侵越”^③。

对于沙俄的武装入侵，当地军民同仇敌忾，坚决主张抗击侵略者，保卫边疆，清朝官员有的也“愤激主战”。当时，张鸿畴受命保卫帕米尔。勃尔热齐茨基率侵略军到达喀拉湖时，曾致函张鸿畴，无耻地提出，他“是否可以在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5—6页。

②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9—10页。

③ 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俄国使臣照会。《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6卷，第1—3页。

喀拉库里接待中国人，或者中国人是否希望俄国人到郎库里访问”。对沙俄侵略者打着“访问”的幌子妄图侵入郎库里的侵略活动，张鸿畴严词警告说：他的“性情刚烈的同僚”是不会同意的^①。勃尔热齐茨基支队进犯郎库里时，以张鸿畴为首的郎库里驻防军，又当面警告沙俄侵略者，必须在三天之内退出，否则，将以武力对待^②。表现了中国军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

沙俄政府为了进一步策划武装占领帕米尔地区，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在彼得堡又召开了一次讨论帕米尔问题的专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参谋总长奥普鲁切夫、外交副大臣希什金、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洛巴诺夫、陆军部的库罗巴特金和外交部的季诺维耶夫等。这些家伙胡说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防务“威胁了费尔干纳的安全”。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等叫嚷：“只有在俄国采取坚决行动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帕米尔问题。假若俄国“在对待帕米尔边区的事情上有迟误，中国人可能在那里筑上防御工事，并能进行比较顽强的抵抗，拒不撤离边区”。他们还说：“帕米尔掩护和保证着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安宁，只要俄国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地区站住了脚，就有可能在兴都库什山的山麓确定边界”^③。气焰十分嚣张。最后，会议决定加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973年伦敦出版，第50—52页。

^②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7—408页。

^③ 勃·伊·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287—288页。

派侵略军，武装强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这次会议公然违反《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走向的规定，认为这段边界线“应该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起，沿萨雷阔勒岭伸向慕士塔格”^①，蓄意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

一八九二年四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布关于出兵占领帕米尔的谕旨。五月，杨诺夫再次充任“帕米尔支队”的指挥官。参谋总长奥普鲁切夫下达指令，规定这支侵略军的任务是：“保卫”沙俄已经占领的和什库珠克帕米尔等地区的“安全”；迫使清朝政府撤出在木尔加布、郎库里附近地区的卡伦和驻军；监视从木尔加布到兴都库什山的帕米尔南部地区，不让英国在这里站住脚；并要把发生的情况及时报告^②。沙俄这次出兵，就是要“占领整个帕米尔”^③。

俄国参谋总部给帕米尔支队预拨了十万卢布的装备费，每月还发给支队三万卢布的薪饷。

与此相配合，俄国外交部竟然胡说：“卡伦在彼，明系中国先占其地”^④，“帕地既须公商，中国不撤卡伦，便是先据其地”^⑤等等。无耻讹诈，进一步施加压力，企图迫

① 勃·伊·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289页。这里所说的慕士塔格山在萨雷阔勒岭以南，不是现在的慕士塔格峰。

② 同上书，第1卷，第290页。

③ 鲍里斯·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26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11页。

⑤ 同上书，第7卷，第7页。

使清朝政府撤除帕米尔境内的全部卡伦和驻防军。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七日，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军机处分别电示许景澄：俄国“似此得步进步，漫无限制，万难轻允”^①。许景澄在与俄国外交部的会谈中严正指出，中国“现留卡伦原设已久，仅有巡查之兵在彼，何至于会勘事有碍？”^②沙俄不但顽固坚持“先撤卡，后勘界”，并公然出兵，武装进犯中国帕米尔地区。

一八九二年六月，杨诺夫带领一支由一个步兵营、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四门炮组成的一千五百多人的侵略军，从马尔格兰出发，经过阿克拜塔尔山口，窜入郎库里，同早已进犯该地的勃尔热齐茨基“侦察队”会合，然后集中驻扎在木尔加布附近。杨诺夫从这里分兵向各地窜犯，猖狂进行侵略活动。他们破坏了清朝政府在阿克塔什的卡伦，并拘押守卡官兵；强迫清朝政府撤退在阿克塔什、阿克苏河谷一带的驻军；再次占领了苏满。他还派兵寻找经过布哈拉领地直达帕米尔哨所的路线；刺探清朝政府在布伦库里一带的布防情况；并深入布才拱巴什，侦察中国帕米尔南部地区。这就是沙俄所谓的“杨诺夫第二次远征”。沙俄这次“远征”，违背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条的明文规定，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郎库里平川、阿克塔什平川等中国大片领土。

十月，杨诺夫带领一部分人马回到马尔格兰。在此以前，杨诺夫根据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指示：配备了一支由

^①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总署发许景澄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11页。

两百多名官兵组成的沙展支队，留驻在木尔加布河上游的沙展，在这里构筑了工事，——设立了帕米尔哨所，作为沙俄统治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军政中心。并委派库兹涅佐夫大尉为这里的司令官，由他任免地方官员，向当地居民强征赋税，操纵地方司法机关。此外，又在郎库里构筑另一工事，防备清朝政府从喀什噶尔派出边防军。从此，中国帕米尔的大部分地区沦于沙俄军事殖民统治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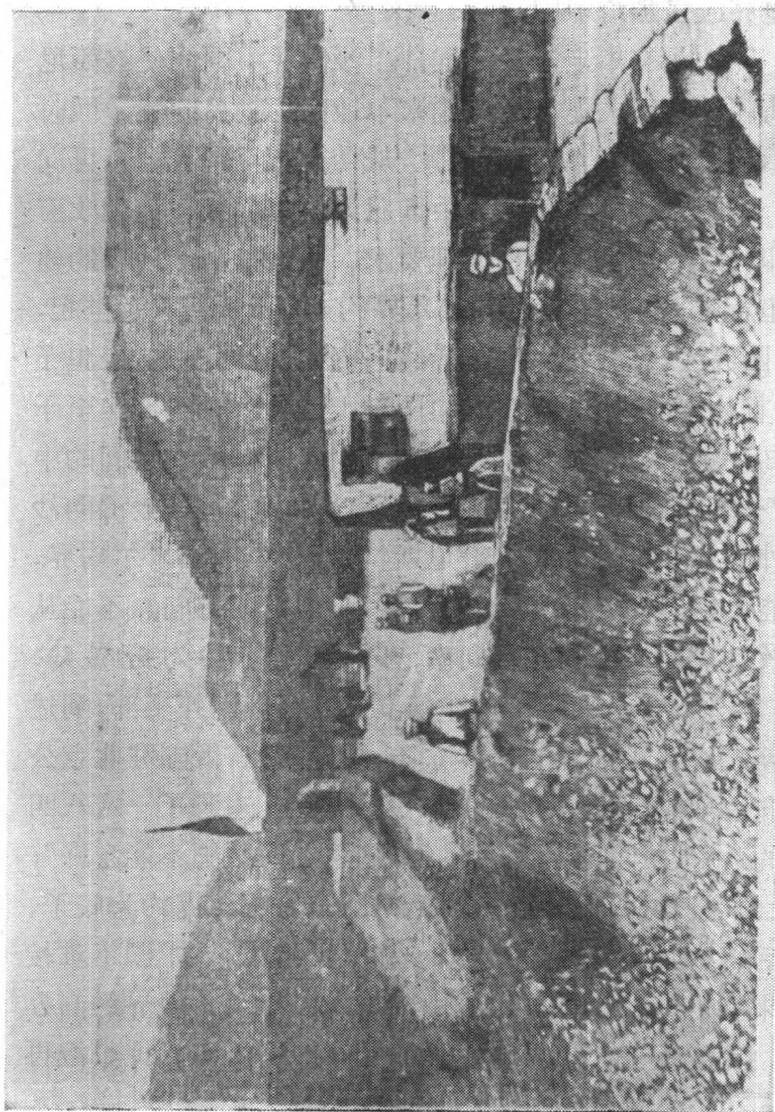
对沙俄武装强占中国帕米尔地区，清朝政府反复电示驻俄使臣许景澄向沙俄政府提出照会和交涉，抗议沙俄侵略军破坏中国设在阿克塔什的卡伦和拘押守卡官兵，^①谴责沙俄派兵占领郎库里等地，要求沙俄撤退侵略军。对于清朝政府的严正要求，沙俄用空话搪塞，说什么“俄兵仅巡逻帕地，不久扎”^②，拒不撤兵；并扬言要进一步占领布伦库里、萨雷阔勒等地。以后沙俄又增派侵略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此，中国边防军和沙俄侵略军在萨雷阔勒岭一带形成沿岭对峙的形势。

三、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划界交涉

沙俄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出动军队，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大片领土以后，就进一步采取“划界谈判”的外交讹诈手段，要求清朝政府承认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4页。

②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日、二十九日军机处收许景澄电。



沙俄侵略军非法构筑的帕米尔哨所

这种占领是“合法”的，妄图把这一条军事占领线当作合法边界线强加给中国。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俄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清朝政府正式提出会谈帕米尔地区的划界问题，同时出示地图，要求清朝政府同意，从乌孜别里起先向东再向南，企图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双方的边界线。清朝政府当即驳斥了沙俄的这种无理要求。明确指出，沙俄的建议违背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从乌孜别里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侵犯了“一直往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领土，“断不能行”。至于从乌孜别里起，“转向西南”和“一直往南”两线之间的中国“属地，则待商量”^①。清朝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向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声明：中俄帕米尔划界，只能依据《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走向，不能从乌孜别里山口先向东再向南、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许景澄又照会俄国外交部，阐述清朝政府关于划界的基本立场，明确指出，俄国驻北京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帕米尔划界方案，违背了一八八四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中国不能允许”；“我总署（即总理衙门——引者）所拟，将此界约为底子，然后将中间余地商量勘分”。并强调指出，“中国不难按历来书史以验各帕地实属中国，所以欲凭喀城界约商办者，因系两国商订之条”^②。同年十二月五日，许景澄再

①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军机处给许景澄的电报。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3—14页。

次照会俄国外交部,进一步指出,“可于乌孜别里起,往南属中国、往西南属俄国两地中间之地,寻出有山水之处,按地势议分,不难得一公平合理之界”^①。清朝政府的声明和照会说明,虽然《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还是愿意按照条约的规定解决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但沙俄无视清朝政府的声明和照会,继续采取军事、外交双管齐下的卑劣伎俩,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坚持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拒不撤退郎库里一带的侵略军,说“郎库里驻兵无多”,“无碍分界之事”^②。半年前,中国军队守卫自己的领土,沙俄以“有碍分界”为借口,强迫清朝政府撤销卡伦,撤退驻军;现在,沙俄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构筑哨所,增兵驻守,却是“无碍分界之事”,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另一方面,沙俄编造了许多否定《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分界走向的奇谈怪论,说这个界约“过于宽混,难以作准”,“如依此而分,恐于两国利益有碍;如按地势,将山岭分水之处分之,不拘东西南北之说,则尽善矣”^③。这些侵略谬论,虽经清朝政府代表反复批驳,沙俄仍然顽固坚持,蓄意割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全部中国领土,叫嚷:俄国“以萨雷阔勒山为分界之处”,“无可改移”^④。当时,清朝政府认为“非清划地界不足以弭衅争,

① 《许竹簣先生出使函稿》,第8卷,第1—2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7卷,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7卷,第30页。

非先增缮边备即不足以决界议”^①。乃向色勒库尔一带调动军队，加强防务。同时，总理衙门当面正告俄国公使喀西尼说：“新疆将士蓄〔愤〕已深，若议久无成，难免不生事故”^②。于是沙俄变换手法，假惺惺地要清朝政府提出具体划界方案，进行商谈。

一八九三年初，沙俄外交部通知许景澄：“俄国外交部本拟以萨雷阔勒山为界，今愿于此山之西，请中国指出应划入华界地名，可允和商”^③；俄公使喀西尼也向总理衙门表示：“萨山以西，中国最为注意之处，可以指明商量”^④。清朝政府又一次指出，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线，必须根据《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四月，清朝政府派驻法参赞庆常前往奥国的萨尔斯堡，同当时在那里疗养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会谈。格尔斯顽固坚持不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划界根据，诡称帕米尔属于浩罕，否认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并借口为了防止英国势力北进，沙俄必须占领阿克苏河以东通往印度的道路。庆常当即一一予以批驳。

庆常指出：“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兵〕卡，见于贵国公牍；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一则贵国‘游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2卷，第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7卷，第4页。

③ 同上书，第89卷，第5—6页。

④ 同上。

历’将弁，皆谓帕之东境归华管辖，未有定界。此皆中国实在证据。况有成约，尤为坚固。”对所谓防止英国北进的谬论，庆常指出：“俄国与他国相争，与中国无涉。吾华但欲固守帕米尔应归华属地界，不侵邻境，亦不容他国侵我之地，此最光明磊落”。至于俄国筹备战守，“尽可自行布置，不必阑入华属帕米尔界内，则中俄自然相安”。

最后，庆常郑重表示：“帕米尔界务总以喀约所订为根据，不能出其范围”。“帕米尔归中国管辖之地界，俄兵不可阑入。此为目前扼要之端”^①。庆常摆事实，讲道理，把格尔斯的种种谬论，驳得体无完肤。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特送交庆常一份地图，提出划界的修改方案，即“自乌孜别里向南数俄里，顺东南山梁折东，沿郎库里湖北岸，又东南顺山坳转至派格士别山梁，其南仍划萨山为界”^②。按照这个方案，除郎库里帕米尔的一小部分外，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大片领土仍然被划入沙俄界内，理所当然地为清朝政府所拒绝。总理衙门电令许景澄转复俄国外交部：“嘎尔斯（格尔斯特）拟分之界”，“万不能允”^③。这时，沙俄立刻剥掉“愿与中国和商”的假面具，再次采用威胁手段。格尔斯特在会谈中几次向庆常说：“与其同中国作无谓之周旋，不若与英国商定一切，以符兵部初议”^④。还说：为了“扼御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4—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9卷，第6页。

③ 同上。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26页。

英人进兵”，俄国必须占领“帕米尔东境阿〔克〕苏〔河〕以东一带地方”^①。庆常当即严词驳斥，指出“帕之东境本为中国所属地方，贵国重在守战，中国亦重边防，万难割让”^②。格尔斯理屈词穷，竟荒谬绝伦地说：“帕之东境实在葱岭之外，非中国险要”，“即使中国得地，亦毫无用处，何必争此石田，致碍和好？”庆常回答说：“中国必争此土者，一因本系旧属，一因前有喀约，固不论其有无用处。试问俄国无用之地甚多，岂能因其无益而弃之乎？”格尔斯自我解嘲地说：“两国各执己议，相持不下，本大臣亦无从调停”^③。帝国主义分子的一副狡猾嘴脸，真是活龙活现。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划界交涉，由于沙俄的肆意阻挠和破坏，终于完全陷入僵局。

四、沙俄勾结英国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

沙皇俄国不但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出兵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领土，同时，还背着清朝政府，勾结英帝国主义，瓜分帕米尔地区。

九十年代初，沙俄出动军队强占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后，打开了“南趋印度的捷径”。同时，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勾结英国，进一步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英国见沙俄已经武装占领了中国帕米尔地区，“可由湖（即萨雷库里湖——引者）东南趋印度”，为了维护它在印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3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0—31页。

度的殖民利益,阻止沙俄越过兴都库什山,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出兵占领坎巨提,并在一八九二年八月向俄国提出建议,主张从萨雷库里起,向东划一直线至萨雷阔勒山脊止,直线以南归英国“保护”,直线以北归俄国“保护”^①。同年十二月,英国驻俄大使莫里埃又向俄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特别照会。照会同意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沙俄哥尔查科夫关于划定“中立地带”以确保英、俄利益的声明,并指出,“当我们推进到了彼此距离很近的时候,当我们活动的范围仅仅被帕米尔广阔土地隔开的时候”,为了消除“严重的危险”,必须“把这一广阔地方的界线划一下”^②。英国的主张恰好符合了沙俄的意图。

为了策划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一八九三年三月,沙俄连续召开了两次专门会议^③。参加会议的除出席前几次关于帕米尔问题的会议的成员外,还有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阿利、曾经潜入中国帕米尔刺探情报的参谋部上校普佳塔、土耳其斯坦军区参谋长什维科夫斯基、多次带兵入侵帕米尔的杨诺夫以及俄国驻布哈拉政治代办列萨尔。

这两次专门会议讨论了英国的建议,认为必须按照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19—20页。

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310页。

③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60—90年代)》,第401—402页;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311—313页。

俄、英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的协定,坚持以喷赤河作为阿富汗的北部边界。还提出,“一年四季都适合于生活的帕米尔西部地区,对于俄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得到公认”^①。也就是说,要使沙俄霸占的这些地区得到“公认”。另外,在确保沙俄侵略特权的前提下,也可以承认帕米尔的部分地区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部分地区的范围是:南面到兴都库什山,北面则从萨雷库里向东引伸一条线到阿克塔什附近。关于俄、英争议的罗善、什克南和达尔瓦兹,专门会议认为,要英国说服阿富汗让罗善汗和什克南汗返回他们原来的领地,以保证帕米尔的最重要的部分属于沙皇俄国;与此同时,把布哈拉占领的阿姆河左岸的达尔瓦兹退让出去,作为罗善和什克南归并给俄国的补偿。这两次会议的主要结论,后来成为一八九五年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协议的基础。

俄、英两个帝国主义无视中国领土主权,不顾清朝政府抗议,经过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最后相互妥协,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一日,双方换文,完成了瓜分帕米尔地区的勾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俄英两国在萨雷库里以东的势力范围应以下述一线为界,即从该湖东岸的一点起,然后沿着大致与该湖

^① 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 60—90 年代)》,第 401—402 页;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 1 卷,第 311—313 页。

平行,在同一纬度上的山脊前进,一直到班得尔山口和乌尔他别尔山口。从这里起,如果纬度仍偏南,则沿原山脊行进。到阿克苏河的克孜勒拉巴特要绕过一个山角,如果这个地方仍在纬度以南,则继续向东前进,直到中国的边境。如果克孜勒拉巴特是在纬度以北,那么这条线应在最接近阿克苏河的地方,再继续前进”。

2. “这条线的标志方位,将由一个纯技术性的联合委员会来解决,这个委员会将由英俄代表和技术助理组成”。

3. “委托委员会就地报告一切可以确定中国边界的情况,以便两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达成边界协议”。

4. “俄英两国政府保证不在上述分界线以外进行活动,即英国不在分界线以北、俄国不在分界线以南进行政治活动”^①。

俄、英达成瓜分帕米尔地区的协议后,双方即分别任命以什维依科夫斯基和吉拉尔德为首的勘界委员会,负责标界工作。俄国勘界委员会的成员有:帕纳菲丁和加尔金,以及帕米尔哨所司令官扎列斯基等。

一八九五年七月,这个联合勘界委员会在萨雷库里东端树立了第一号界桩。九月,在萨雷阔勒山脊下埋下了最后一个界桩——第十二号界桩,结束了俄、英勾结瓜分帕米尔地区的标界工作。中国帕米尔地区除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郎库里帕米尔的一部分以外,就这样被俄、英

^① 霍尔狄奇:《十九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1959年伦敦出版,第73页。

帝国主义象窃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瓜分了。

勘界结果，沙俄帝国主义把它在东面的军事占领线和南面的瓜分线连接起来，并吞了中国帕米尔的绝大部分地区。一八九六年一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线。

然而，扩张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费尔干纳省省长叫嚷：“到头来，我们终于发现了，和英国达成的协议，使俄国丧失了从喀什噶尔到瓦罕和从布才拱巴什到印度河上游的交通要道，这些交通要道，在帕米尔占有有利的战略地位”^①。臭名昭著的鲍勃林斯基也叫嚷：一八九五年按照英国的要求，把通往帕米尔南部边沿的交通要道，“毫不吝惜地送给了”英国，“把从南东两面环抱帕米尔的阿克苏河谷的南部”和“通往俄国阵地的许多方便的要冲，以及贯串帕米尔、连接东西的道路，也统统交给了”英国^②。这些叫嚷，更充分地暴露了沙俄扩张主义者贪得无厌的狂妄野心。

清朝政府密切注视俄、英勾结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活动，并对这种无视中国主权、擅自瓜分中国领土的罪恶勾当，分别向俄、英两国提出交涉，郑重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表示坚决反对。早在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国外交副大臣克雷约见庆常，要他将俄、英勾

①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332—334页。

② 同上。

结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初步方案转达清朝政府时，庆常就对俄、英私分中国领土表示反对，向克雷严肃声明：“中国以喀约为据”^①。不久，庆常复与英国外交大臣罗兹贝里交涉，阐述了中国政府一贯的严正立场，坚决表示“中国实难退让”。庆常还特别指出，英国与沙俄划界，将中国地界划与俄国，“使俄视帕东境为已得之利，更欲向南争取小帕。”“俄之得步进步，虽因志在印度，亦由于英国见好于俄有以致之”^②。说明由于英国采取牺牲中国，讨好沙俄的态度，助长了沙俄的扩张野心，使帕米尔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俄、英瓜分帕米尔地区的勾当接近完成，俄国准备增兵帕米尔的阴谋公开后，庆常又代表清朝政府同沙俄外交部反复交涉，阐述中国的一贯主张，郑重表达了“中国决不能认”^③的严峻态度。清朝政府得到驻俄使馆的有关报告后，在四天内两次电示许景澄，指出：沙俄准备添兵在“东南两面画守”，是“反客为主，阻我南行，欺人太甚。”令他“力与辩论”，不能退让，必须坚持中国政府恪守《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原则立场。中国驻俄使馆遵照清朝政府的指示，反复与沙俄外交部交涉，但沙俄顽固坚持和英国瓜分中国帕米尔的协议，格尔斯基竟然胡说什么：“南界自萨湖及阿克塔什以南，英俄已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8卷，第23页。

③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北洋大臣电。

有成议，中俄关涉乃是东界”^①，态度蛮横之极。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朝政府疲于对付日本，没有向俄、英进一步交涉。可是，清朝政府的多次抗议，以及最后对驻俄公使许景澄“日后必重申前说”^②的指示，表明了反对俄、英私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严正立场。

第三节 清朝政府关于保留帕米尔地区 主权的声明和帕米尔地区各族 人民的抗俄斗争

一八九四年初，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勾当已经达成协议，尚未正式换文和具体标界。这期间，中俄帕米尔界务交涉中，沙俄虽然施尽了各种威胁手段，清朝政府始终不同意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于是狡猾的沙俄侵略者改变策略，迫使清政府同意维持沙俄军事占领的现状，以便伙同英国完成勘定萨雷库里以东的瓜分线。一八九四年四月初，俄国外交大臣向许景澄提出“两国各不进兵以作调停”^③。四月十二日，沙俄外交部正式照会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今因中俄两国商办帕米尔界务，彼此意见不同，目前实难议结。是以本国国家拟请彼此按照现在局面情形，各飭该管官员仍驻原处，不准前进，以免

①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北洋大臣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13卷，第16页。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32页。

误会而杜弊端。……现在局面暂不变动，徐候商议定局，并无妨碍。如有争论或须续商，即在北京议办”^①。蓄意拖延中俄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企图强迫清朝政府承认沙俄军事占领的现状。

当时，清朝政府电示许景澄：“当告以中国众议，定约（指已订之《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引者）必须遵守”；“界事仍随时相机与商”^②。许景澄在给俄国外交部的复照中指出：“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一八八四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③。

许景澄还照会沙俄外交部：“按照喀约，中国应得一切利权，不能因不进兵稍有减损。且两国既有喀约，必须遵守。中国众议昭然，断难漠视”^④。

清朝政府的保留声明，重申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和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领土主权及其他一切权利；指明沙俄违背条约武装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非法的。

沙俄在复照中说：“帝国政府，在自己方面，已根据相互原则，命令俄国机关不得超越他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7—1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89卷，第12—13页；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二日总署致许景澄电。

③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载196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8页。

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①对清朝政府的保留声明，在复照中无法提出异议，不敢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作为中俄边界。但是它又违背“现在局面暂不变动，徐候商议定局”的诺言，拒不恢复帕米尔边界谈判，继续霸占着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领土，致使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当沙俄用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帕米尔各族人民开展了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斗争。一八七六年，沙俄把侵略矛头指向阿赖时，就遭到了当地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和沉重打击。《吉尔吉斯史》一书也不得不承认，是在镇压了当地人民的反抗之后，阿赖地区才被并入俄国版图的^②。中国柯尔克孜族岳瓦什等部的牧民，冲破沙俄阻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如既往地继续前往屯木伦等处放牧。同时向清朝政府的喀什噶尔官员交纳畜牧税。一八八九年，沙俄殖民主义分子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潜入帕米尔西南边境及其附近地区从事政治军事间谍活动，在阿尔楚尔河中游的布伦库里一带，为当地中国军民所驱逐。一八九一年以后，沙俄几次派遣以杨诺夫为头目的侵略军，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帕米尔地区的中国领土，帕米尔的各族人民，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

① 俄国《外交部公报》，第4卷，1914年版，附录，第509页。

②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第367页。

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协同清军构筑工事，向清军传送情报，并告诉沙俄侵略者：“中国人是很好的射手”^①。

沙俄武装强占了帕米尔的广大地区以后，把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非法划入费尔干纳省。沙俄在整个帕米尔地区疯狂推行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政策。因此，帕米尔高原，各种形式的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不断出现。

帕米尔西部，“群情激愤”，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不断兴起。

帕米尔东部地区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不堪沙俄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纷纷挣脱沙俄帝国主义的枷锁，回到祖国怀抱。据苏联著作记载：一八九二年下半年，有一百二十户当地牧民，从阿克塔什回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一八九四年，有三十三户牧民相继归来。一八九五年有一百多户牧民从伊斯提克一带回到塔克敦巴什和塔哈尔满。沙俄费尔干纳省参谋部给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官的报告中哀叹：“尽管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阻止住在那些现在占踞着木尔加布以南的游牧站的牧民，迁移到邻近的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地区去游牧”^②。费尔干纳省省长也无可奈何地供认：“如果说去年因为有三十三户阿克塔什的吉尔吉斯人迁到中国境内去，使帕米尔支队在肉食供应和其他产品的供应

^① 鲍里斯·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10页。

^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331页。

方面感到情况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在运输工具方面所感到的困难了；那么有大量居民迁移走了，自然而然地就将需要支付几笔巨款，以供应支队的食品了”^①。

为抗击沙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色勒库尔地区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广大青年，一八九六年组成“色勒库尔绥远回队”，由驻防当地的马队旗官兼任管带，阿奇木伯克兼任总哨，同当地驻军一起，英勇地严守边防。

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惩罚了沙俄帝国主义强盗，并彻底揭穿了沙俄所谓“自愿归并”的无耻滥言。

^①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卷，第332页。

第六章

沙俄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西北 边疆地区的阴谋及其破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和瓜分中国的斗争就更加激烈了。

列宁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火星报》创刊号上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他深刻地揭露:“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一四页)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竞相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把长江流域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把两广、云南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把福建和东北三省南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后)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

力范围。而沙俄帝国主义则把长城以北，包括中国东北三省、蒙古及西北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妄图吞并这些地区。

在中国的西北边疆，沙俄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大片领土，攫取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在同其它帝国主义争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把中国西北边疆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进行政治控制、经济垄断，力图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同时，还寻找时机，妄图一举实现吞并中国西北边疆的狂妄野心。但是，由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沙俄的这个狂妄野心始终未能得逞；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使沙俄瓜分中国的迷梦彻底破产了。

第一节 沙俄妄图吞并中国西北的阴谋

一、沙俄的远东政策及其吞并中国西北的狂妄计划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新的阶段，十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一倍多，大企业的工人数量由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万；银行和工业开始集中，许多行业出现了辛迪加垄断组织。一九〇〇年南俄七个大工厂出产的生铁，就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巴库五个大公司出产的石油，占全国产品的百分之四十二

点六。八家大銀行控制了全国銀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七，这些资本大多是直接用于工矿企业。銀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了。

沙俄帝国主义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纏绕着。”（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八〇一页）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占统治地位，土地大量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一九〇五年仅三万个大地主就占有七千万俄亩土地。封建势力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使沙俄在经济上落后于欧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沙俄仍然是沙皇专制的统治。沙俄垄断资本家完全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积极支持沙皇政府推行传统的扩张政策，以攫取新的市场。由于沙俄帝国主义经济落后，单靠经济力量不能和英、美等帝国主义竞争，于是它更着重于发展军国主义，积极推行掠夺别国领土的扩张政策。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俄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八九三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沙俄向西、向南的扩张受挫，于是加强了对远东的侵略扩张。加以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腐败的清朝统治阶级奉行投降卖国的政策。于

是,从九十年代起,沙俄更积极在远东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其目的是兼并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把俄国领土扩展到长城脚下;吞并朝鲜;与英、日、美等帝国主义争夺在远东、太平洋上的霸权。代表沙俄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七)梦想“使俄罗斯皇帝再加上以下一些称号,如: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①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供认:“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②列宁在《“帝国主义”笔记》中也指出,沙皇俄国“在东亚也一贯按预先考虑好的计划(这个计划看情况而变动,但其重要部分保持不变)在实行扩张。目的在于直接占领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七六五页)

为了实现远东扩张计划,沙俄首先加快了修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车里雅宾斯克至海参崴)。一八九二年底,在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的狂热推动下,成立了“西伯利亚铁路特别委员会”,加速了铁路的修建工作。维特曾直言不讳地说,这条铁路是俄国实现“世界政策的工具”。尤其对于沙俄准备强迫清朝政府同意修筑的从赤塔经中国东三省到海参崴的支线,维特认为:“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

^① 《维特回忆录》,第1卷,1923年柏林出版,第398页。

^② 苏联《红档》杂志,1922年第2卷,第31页。

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①。

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同时,沙俄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一八九四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独占朝鲜,与沙俄争霸远东,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腐败的清朝政府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四月,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而且割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台湾。甲午战争揭开了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序幕。

沙俄帝国主义为了阻止日本势力的扩展,和德、法两国,导演“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接着,沙俄就无耻地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俄、法银行团四万万法郎(约合银一亿两)的贷款,年利四厘,实付款额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二五,自一八九六年三月起,三十六年还清,以海关税作抵押。沙俄通过这次贷款不仅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得以插手中国海关管理,逐渐操纵中国的财政。

上述借款正式签字后第二天(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沙俄又和法国筹建华俄道胜银行,企图通过银行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十二月,沙皇正式批准道胜银行开业。一八九八年九月,沙俄又拉清朝政府参加。清朝政府拿出库平银五百万两作为入股资本,由俄、法借款中扣拨充抵。中国加入的资本超过俄、法人股资本总额,而事实上,银行却为沙俄所操纵,“中外合办”不过是一块骗人

^① 苏联《红档》杂志,1932年第52卷,第94页。

的招牌而已。沙俄驻日公使罗森就曾供认：华俄道胜银行作为“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分支机构”^①。以后，道胜银行又陆续在中国汉口、北京、上海、伊犁等地设立分行，以控制中国财政金融。

一八九六年六月，沙俄企图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获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用三百万卢布收买在彼得堡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卖国贼李鸿章，诱迫他签订名为共同“防日”、实为侵略中国的《中俄密约》。从而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建东清铁路的特权，使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中国黑龙江、吉林，再达海参崴。九月，沙俄又通过强签《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取得了独占东北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军队通行无阻的特权等。

上述沙俄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特别是获得在中国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标志着沙俄加强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使远东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对中国来说，恶果是：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导致了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对中国争夺的加剧。

吞并中国西北，是沙俄帝国主义远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吞并中国西北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就出笼了。

一八九三年二月，巴德玛耶夫^②提出了一个侵吞中

^① 罗森：《四十年外交》，第1卷，1922年纽约出版，第198页。

^② 巴德玛耶夫是布里亚特蒙古人，改奉东正教时认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八一—一八九四年）为教父。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后，曾在沙俄外交部供职。

国西北的狂妄计划，即所谓“巴德玛耶夫计划”，交维特转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西伯利亚铁路不仅应修到海参崴，而且应从贝加尔而南，深入中国一千八百俄里，直修到甘肃之兰州。”在那里预先应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的政治中心，策动叛乱。然后，由这些叛乱分子向沙皇呈交一份请求收容他们为俄国臣民的“自愿书”，从而将“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并入俄国。巴德玛耶夫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组织布里亚特蒙古人化装成商贩，潜入中国进行活动。维特认为巴德玛耶夫“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在目下尤有意义”。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则俄国于太平洋岸上及喜马拉雅（雅）山上，不仅能控制亚洲的政事，并且能控制欧洲的政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这份计划也十分欣赏，决定拨出巨款，成立一个间谍组织——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来推行这个狂妄计划^①。

一八九八年一月，维特与英国驻俄公使欧格纳谈判划分俄、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时，曾从一张锁得严严实实的拉盖式写字台中取出一张中国地图，“用手围着直隶、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划了一个圈，然后说，‘俄国迟早会吞没这一大片土地的’”，接着“又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以后将有支线通到这个城市，又说他已草拟好了这

^① 谢曼尼柯夫：《在沙皇制度背后，西藏医生巴德玛耶夫文献集》，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转引自罗曼诺夫著，民歌译：《帝俄侵略满洲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8—50页。

条支线的长度和造价等等细节”。^①巴德玛耶夫计划是沙俄推行其远东政策的产物，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沙俄妄图吞并中国西北、华北和西藏的狂妄野心。

二、沙俄妄图在中国西北 边疆独占一切权益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斗争日趋尖锐。沙俄帝国主义并不满足于通过《中俄密约》把中国东北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它还想乘机在中国东部海岸攫取一个不冻的港口，想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称霸亚洲。于是，它伙同其它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帝国主义为了攫取中国沿海港口，扩大侵华势力，出兵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沙俄认为时机已到，暗中与德国勾结，以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为条件，向德国提出备忘录，要求它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是我们独占行动范围的原则”，“我们不能让任何外国政治势力侵入这些地区。”^②德国也乘机要求沙俄承认它“在山东的、包括黄河在内的利益”，以此作为它承认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条件^③。

沙俄野心勃勃，不仅要把东北，而且要把华北和西北

^① 转见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195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75页。

^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10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212页。

都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早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八日，即德国占领胶州湾前半个月，沙俄通过驻华代办向英国公使提出声明：“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境接壤的中国诸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①过了三个月（即一八九八年一月），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和财政大臣维特先后与英驻彼得堡公使欧格纳会谈，他们再次向英国表明：俄国将把中国黄河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地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②。

一八九九年四月，沙俄与英国通过互换照会，达成了两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协议。双方互相承认：包括中国西北在内的长城以北地区是沙俄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于一九〇〇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提出了鲜明的战斗口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给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发扬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

沙俄对义和团爱国运动极端仇视，它伙同英、法、美、德、日、意、奥等七个帝国主义国家，于同年六月组成“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而且还乘机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一举吞并，实现其“黄俄罗斯”的迷

① 转见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12页。

②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74—75页。

梦^①。

在中国西北边疆，沙俄也乘机派兵入侵，镇压西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一九〇〇年七月，沙俄借口“保护俄商”，从塔什干调兵二百余名，侵入中国境内，“欲分驻绥定、宁远”两地，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伊犁将军长庚派人前往阻止。俄军诡称：“欲自保卫，并无他意”，强行驻扎在宁远^②。同时沙俄又在通伊犁边境的要道上增兵千余名^③。九月，沙俄驻伊犁领事又欲从俄国萨玛尔运两尊大炮到宁远。长庚阻止无效，清朝政府即通过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向沙皇政府提出交涉。沙俄外交部竟无耻地回答说，运炮“不但领事、商人藉以保护，即华官亦可用弹压地方，彼此有益”^④。十月，沙俄不顾中国清朝政府的抗议，将大炮运入宁远。

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并没有被沙俄的武力威胁所吓倒，在内地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抗俄情绪日益高涨。一九〇一年一月，两千多维吾尔族人民集合到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外举行示威，有的示威群众与沙俄哥萨克卫队格斗起来。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彼罗夫斯基出动了全部

① “黄俄罗斯”计划是沙俄帝国主义妄图霸占中国东北，成立一个“黄俄罗斯”的行省或保护国的侵略计划。

② 《饶应祺奏稿》，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③ 同上。

④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饶应祺奏为伊犁领事调兵拟严密防范事》。

哥萨克卫队，镇压了这次示威运动^①。

一九〇一年二月，沙俄领事彼罗夫斯基以“办理邮政事务”为借口，派出侵略军，侵入中国喀什噶尔西南交通要道上的色勒库尔(即今塔什库尔干)^②。以后，沙俄在这里继续增兵，修建营房，建立军事据点，并阴谋在当地进行颠覆分裂活动^③。

一九〇二年初，清朝政府多次电令驻俄公使杨儒，要求沙俄撤出非法侵入伊犁等地的俄军。沙俄外交部借口“严寒”，拒不撤兵。

沙俄侵占中国东北，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和世界人民的正义谴责，也为争夺中国东北的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所反对。这种形势迫使沙俄不敢直接实行吞并中国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转而采用以“交还”东三省为手段，胁迫清朝政府承认其独占中国东北、蒙古、新疆等地的一切权益，妄图把这些地区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

一九〇〇年九月至十二月，沙俄就单独与清朝政府进行关于东三省撤军的谈判，企图通过谈判，逼签条约，使霸占东三省合法化。一九〇一年一月，清朝政府任命杨儒为全权大使，在彼得堡与沙俄开始关于交还东三省的谈判。二月，沙俄正式抛出约稿十二条。按照这一约稿，沙俄将完全霸占东三省，囊括该地军事、政治和经济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24页。

② 《中华民国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蒲犁县俄兵案》；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24页。

③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34页。

大权。约稿第八条还提出“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河(和)田、于田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的狂妄要求^①。约稿赤裸裸地暴露了沙俄帝国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东三省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而且还公然提出不准中国在自己的领土蒙古和新疆等地开矿、筑路,妄图把中国的北部和西北边疆也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

沙俄提出上述约稿后,即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强迫签字。谈判中,杨儒质问:“蒙古、甘肃、新疆……俄兵并未占据,何得包括在内?”“何得禁止中国亦不准自行造路?太无道理。”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公然恐吓说:“该数省虽未经俄兵占据,然俄之兵力足以占据”;并无耻地声称:俄国独占东北、蒙古、新疆等处路矿利益,是“顾念贵国利益”,是避免其它列强分沾这些地区的利益,“专为中国预留地步”的^②。

这个约稿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东北人民抗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日、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各自从自己在华侵略利益出发,也纷纷干涉。在这种形势下,沙俄再次用重金收买李鸿章,删掉约稿第八条及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诱迫杨儒签字。维特威胁说,如不签字,就“强割满洲之地”^③。沙俄驻华公使也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说

① 约稿全文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正月。

②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05—106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114页。

什么如不签字，俄国将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成议，勿嫌唐突”^①。三月初，沙俄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要求在十四天内签字。尽管沙俄使出了各种卑鄙手段，清朝政府还是决定拒绝签字，并通知各国驻华公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②。沙俄妄图利用“交还”东三省实现其独占中国东北、蒙古和西北边疆一切权益的阴谋终未得逞。

三、沙俄利用修订《中俄伊犁条约》 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一九〇〇年沙俄对中国东三省的侵占，以及在远东势力的扩张，使它与同样怀有霸占中国东北、吞并朝鲜野心的日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日本与英国订立军事同盟，准备用武力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一九〇四年终于爆发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沙俄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可耻的失败。

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日俄两国订立了《朴茨茅斯和约》，沙俄被迫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但仍继续霸占中国东北北部。以后，沙俄在远东的侵略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沙俄为了稳住它对中国东北北部和外蒙古的控制，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先后两次与日本签订协议（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部分），在中国

①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27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80卷，第5页。

东北划分了两国势力范围；沙俄以同意日本逐步吞并朝鲜，来换取日本承认它在中国外蒙古的“特殊利益”。特别是一九一〇年的《日俄密约》，规定双方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两国要共同采取“防卫”措施。俄日密约实际上是俄日共同宰割中国东北的反动军事同盟，是“让日本‘并吞’朝鲜和俄国并吞蒙古的条约”。（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二七页）

同时，沙俄为了与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德国，在争夺中国西藏的斗争中与英国相互妥协。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日，英、俄背着中国政府在彼得堡签订了关于瓜分中国西藏，瓜分阿富汗、波斯的条约。列宁曾指出：“1907：俄英条约（8月31日）：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准备同德国作战）。”（《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七七六页）

通过上述条约，沙俄与日、英帝国主义重新调整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它们之间的矛盾暂时缓和，沙俄向中国东北、西藏等地的扩张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于是，它一面继续巩固和加强在中国东北北部的侵略势力；一面积极对中国的外蒙古和西北边疆扩大侵略。一九一一年初，沙俄利用修改《中俄伊犁条约》扩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就是它当时侵华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一八八一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第十二、十五条规定，俄人在中国蒙古地方，及“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

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此约所载通商各条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如十年限满前六个月未请商改，应仍照行十年。”一九一一年是《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三十年，按规定只要中、俄一方提出修订，就可进行谈判。

沙俄为了保持和扩大它在中国蒙古和西北边疆的侵略特权，积极策划利用修约扩大侵略。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四日，沙俄驻北京代办世清向沙皇政府建议：俄国应利用与日本矛盾缓和的时机，继续以往对中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掠夺领土政策。目前最可利用的是，修改《伊犁条约》期限已到，这“会给我们提供重新占据一八八一年让出的伊犁地区的可能性”^①。十二月，沙皇政府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沙佐诺夫主张利用即将到来的修改《中俄伊犁条约》的时机，以武力为后盾，用“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中国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从政治、经济方面扩大俄国在华势力。^② 内阁会议基本采纳了沙佐诺夫的计划。

为了避免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沙俄首先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一九一一年一月，沙俄报刊上掀起了一片反华叫嚣，半官方的《俄罗斯》报发表文章，竭力污蔑中国违反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条约》，“且处心积虑，欲将此条约内所许俄之特权，设法取消”；鼓吹“俄政府当向中国尽其忠告，倘中国不以俄之忠告为意，则俄政府惟有尽其所能，以保障其在中国之特权及利益。其结果万一有

^① 西培脱：《协约国外交和世界》，1921年伦敦出版，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意外之危险，则皆中国政府之责任也”^①。二月十五日沙佐诺夫打电报给俄国驻英、法、日等国公使，说什么他要
对英、法、日等国公使说明，俄国将向中国提出要求“承认
圣彼得堡条约保证给我们的权利”，这件事“纯粹关系俄
中两方”，而且俄国“没有侵略意图”^②。

接着在二月十六日，沙俄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手段，向清朝政府发出照会，提出六项侵略要求：

“（一）光绪七年条约以及他项条约，并不限制俄国政
府独行于交界百里限外，订定输入输出货物之税则。其
两国边界百里内，曾行商定准两国商民任便运入各本国
土货，均不纳税。

（二）俄国人民住居中国各处应行享用治外之法权，
专属俄国官员管辖，因所有中俄民人诉讼案件应经俄华
审判员会同办理。

（三）蒙古以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处俄商民均行
享用任便往来居住、买卖各国货物，不得直接或间接征
税，以及垄断暨他项禁令限制。

（四）俄国政府除设有各领事官不计外，尚有派委领
事官前往科布多、哈密及古城之权。虽应与中国先行商
办，惟现因以上各处俄商与华商所出涉讼各案，足征本国
政府实不能耽延实行此项之权。

（五）俄国各领事官于其管辖一带应经中国地方官按

① 王慕陶：《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远东通讯社第九号通讯》。

② 史梯夫编：《伊斯伏尔斯基外交信札（1911—1914）》，第1卷，第27
页。转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21页。

照其官位相待，该地方官不得推诿会同审判俄华诉讼各案件。

(六)俄国政府于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即系伊犁、塔城、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古城，向有设立领事之权。且于该各处及张家口均准俄国商民置买地段，建造房屋。”^①

照会还以威胁口吻声称：“中国政府若不承认以上六款，或一款不欲，则可谓中国不欲遵守前约，敦固睦谊。如此，俄政府即可自由进行”^②。沙俄抢先抛出这六条要求，是企图堵住清朝政府据约提出废弃免税特权的要求，并妄图通过六条要求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

在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外，沙俄还以武力恐吓。当时，沙俄开始调动塔什干三万多军队进逼伊犁，进行武装挑衅。据沙佐诺夫说：“我们的军事领袖现在对东亚正高度地跃跃欲试，因为他们似乎相信在该处容易为陆军争得光荣。当然，陆军大臣苏卓林诺夫在沙皇面前极坚强地拥护这观点，且沙皇本人似乎也同情这观点”^③。当时，尼古拉二世和陆军部正是企图乘机重占伊犁的。

沙俄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强烈反对，纷纷集会和通电抗议。可是腐败的清朝政府既不甘心全部应允，又不敢拒绝沙俄蛮横无理的

① 王树枬：《新疆图志》，交涉六。

② 《申报》辛亥正月二十六日。

③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23页。

要求。当时驻俄公使萨荫图致外务部电报说：“俄交六款，俱关商约。不俟开议，藉端先发。许之，则议约时我所应争之权利，彼一网打尽；不许，则彼沿边调兵较速，难保无占地之虞”^①。二月二十日，清朝政府在复照中，对于增设科布多、哈密和古城领事仍要以废弃免税条款为前提；对于第三条中国不得在蒙古及天山南北进行垄断没有答复；其余各条都表示同意。接到清朝政府第一次复照后，沙俄以清朝政府没有满足它所提出的六项要求，于三月十八日第二次照会清朝政府，以要占领伊犁相威胁。同日，清朝政府第二次复照沙皇政府，再次妥协。除许俄在科布多、哈密和古城三处先添设领事外，又允许俄在《伊犁条约》所指定的地区添设领事。关于所谓中国垄断问题，复照允许俄商在关外天山南北路各处贸易可与华商平等看待，不加限制。

这时，沙俄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发出了战争狂叫，报刊上极力造谣煽动，制造战争气氛，掀起反华浪潮。彼得堡的报纸竟造谣说：中国已准备战争，增兵东北，欲进攻库页岛；俄驻华公使已被中国人暗杀；俄国已决定重新占领对其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的伊犁，“这次俄若占领，决不再还中国，因前次之还伊犁，实为俄政府之错”，等等^②。三月二十四日，沙俄发出“最后通牒”，限清朝政府于三月二十八日答复，“倘答复仍执前说，不能令俄满足，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9卷，第7页。

② 《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远东通讯社第二十一号通讯，二月十五日二十三号通讯，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六号通讯》。

或不能将……六项要求全行包括在内，则俄将以完全自由行动”^①。三月二十七日，清朝政府完全屈服。庆亲王奕劻等表示“宁自保守，别无他策”^②，复照沙俄，全部承认沙俄提出的六项要求^③。

沙俄虽然企图伺机重新侵占中国伊犁，但是，它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挑起这场战争。当时，欧洲巴尔干地区形势日益紧张，沙俄也没有力量投入东方。沙佐诺夫就曾供认：“鉴于目前欧洲的国际局势，俄国陆军力量必须避免单独在东亚行动，”“否则我们近几年来全部外交工作将完全毁灭，且我们在欧洲必须保卫的利益，也要受到危险”^④。

沙俄通过这六项要求，进一步扩大的侵略权益主要有：

第一，增设领事。《伊犁条约》第十条规定：“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第十二条还规定，俄商在蒙古“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而沙俄提出的六项要求中，不提商务兴旺，废弃免税特权，却以“俄商与华商所出涉讼各案”为借口，无理拒绝清朝政府据约提出的以废弃免税特权为增设领事前提条件的合理

①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远东通讯社第二十九号通讯》。

② 《民立报》1911年3月28日专电。

③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照录第四次致俄使照会》。

④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23—224页。

要求,攫取了在中国科布多、哈密、古城、乌里雅苏台增设领事的特权。

第二,延长贸易免税特权和不准中国“垄断暨他项禁令限制”。六项要求重申了沙俄的免税特权,把“暂不纳税”的特权无理延长。在清朝政府被迫承认沙俄六项条件后,沙俄驻华公使即于一九一一年底照会清朝政府,竟然指责清朝政府违背约章,在伊犁等处设立的皮毛公司、茶叶公司、销盐局、钱铺,“实有垄断性质,致俄商贸易利益颇受影响”等等^①。

第三,扩大了俄国商民在蒙古及新疆各地自由居住和盖房的特权。

据《伊犁条约》规定,一九一一年八月是中俄双方正式议定修改该约有关部分(包括所附陆路通商章程在内)的时间。沙俄在二月二十六日照会中,曾经表示:清朝政府如对六项要求作满意答复后,始能商议税则,商改《伊犁条约》有关通商条款。事实表明,沙俄上述声明,仍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七月,清朝政府任命陆征祥为使臣,会同驻俄公使萨荫图与俄谈判。陆征祥到达彼得堡之后,沙俄借故推延,迟迟不开议。直到一九一二年一月,双方才开始谈判。谈判中,沙俄玩弄各种阴谋诡计,提出欲废弃免税条款,议定税则,必先以相当利益作为补偿,妄图借此要挟更多的侵略权益。如要求清朝政府同意蒙古只能中俄两国通商,企图把中国的蒙古变成它独占的

^①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外务部发伊犁将军电》。

市场^①。同时,还勒索在中国西北边疆的伊犁河、特克斯河通航的特权,等等^②。陆征祥束手无策,感叹:“伊(犁)蒙古等处之收税,究竟是否可议,尚在漠然之中”;“似此盘马弯弓,结果何堪设想”^③。在沙俄的多方要挟下,谈判实际上陷入僵局。这时,中国辛亥革命已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修约谈判中止。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妄图吞并中国西北边疆的活动

一、沙俄三路出兵,入侵中国西北边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帝国主义认为侵占中国长城以北大片领土的时机已到。俄国国内一片侵略叫嚣。俄国《新时报》说,“从瓦利亚基^④时期到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我们历代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是,俄国必须靠牺牲邻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如果不利用我们邻国中国的衰弱以实现我们帝国的理想,实在是愚蠢到犯罪的程度”^⑤。针对沙俄国内的这一片叫嚣,当时列宁就尖锐地指出:沙皇政府“为了俄国资本

① 《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收驻俄陆大臣和刘大臣致外务部电》。

②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外务部发伊犁将军电》。

③ 《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收驻俄陆大臣和刘大臣致外务部电》。

④ 瓦利亚基是九世纪出没于波罗的海的北欧海盗,奉罗里克为王,传说为俄国历史的开端。

⑤ 《新时报》1912年3—4月间发表的文章,转引自达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1949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第104页。

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四五七页）。

十一月初，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说：“我敢表示，由我国利益的观点看来，现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它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沙皇尼古拉二世批示“对”^①。乘辛亥革命这个时机，分裂中国，侵占中国领土，就成为这个时期沙皇政府对华的基本政策。

为了推行这一政策，沙俄首先将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北部的内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地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在沙俄的煽动、支持和导演之下，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一小撮反动封建王公、活佛宣布“独立”，接着先后占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当外蒙古傀儡军队在沙俄侵略者指挥下进攻科布多城时，中国政府曾派遣新疆驻军东援。沙俄驻乌鲁木齐和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竟然一再照会，横加干涉。照会中，沙俄公然蛮横地声称，这些地方“暂归俄国保护”，“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②。充分暴露了沙俄分裂中国、霸占中国外蒙古的丑恶面目。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沙俄竟然威逼、引诱外

^① 苏联《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第75—76页。

^② 《补过斋文牍》戊集一，第55页。

蒙古封建统治者在其一手炮制的《俄蒙协定》及所附《通商章程》上签字，从而囊括了外蒙古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政府承认。在沙俄的胁迫下，袁世凯卖国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蒙协约》（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国仅争得“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有宗主权”的虚名，而被迫承认外蒙古“自治”。从此，外蒙古实际上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沙俄公然向中国伊犁、喀什噶尔和阿尔泰三地出兵，妄图实现吞并中国西北边疆广大地区的野心。

一九一二年初，新疆伊犁爆发了响应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起义军迅速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接着，南疆各地哥老会也纷纷响应。五月，喀什噶尔哥老会武装起义，迅速控制了喀什噶尔地区。

伊犁武装起义后不久，沙皇政府连续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入侵中国。会上，陆军大臣苏卓林诺夫主张派遣军队占领伊犁。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害怕这种露骨的武装侵占会引起其它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主张借口“保护”俄国领事馆和俄商，以增加领事馆卫队的名义，派遣沙俄侵略军进驻伊犁，伺机而动^①。会议采纳了沙佐诺夫的主张。

一九一二年五月八日，沙俄哥萨克马队约二百余名

^① 达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第146页。

从霍尔果斯尼堪卡侵入中国境内,强行进入宁远^①。

长期以来,沙皇政府及其驻新疆领事总是把伊犁看作是俄国“潜在的属地”^②。一九一三年,在沙俄出兵伊犁后,沙俄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又积极向沙皇建议,要“使包括伊犁的新疆北部全境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或者成为俄国的属地”^③。

在南疆喀什噶尔地区,沙俄于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在它出兵入侵伊犁后的一个半月,又借口“保护领馆、商民”,增加领事馆卫队,派遣约七百名哥萨克兵(步、骑兵各一半)侵入南疆喀什噶尔,分七处驻扎在疏附县城北门外^④。以后,又逐渐增加到一千多名^⑤。

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凭借增驻的侵略军,竭力推行颠覆和分裂中国南疆的阴谋计划。据沙俄入侵喀什噶尔的指挥官巴勃洛夫供认: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想把中国南疆“变成沙皇帝国的一个省,而由他任总督”^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俄领事彼罗夫斯基准备在南疆策动一次叛乱,让沙俄豢养的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出面,成立一个在沙俄卵翼下的傀儡政权。长期以来,沙俄就收留了逃窜到沙俄费尔干纳的伯克胡里,让他在那里自称“喀

① 《中华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伊犁俄领署增设护兵案》(民国元年五月起)。

② 达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第146页。

③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第173页。

④ 《补过斋文牍》,第3编,卷五,外交上,第2页。

⑤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24页。

⑥ 同上书,第197页。

什噶尔王”，还给以一笔政治津贴。伯克胡里的儿子慕士塔法罕被聘为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府的“雇员”，经常往来于塔什干和喀什噶尔沙俄领事馆之间，阴谋活动。一九一一年六月初，沙俄驻喀什噶尔副领事贝伦斯就曾向英国驻喀什噶尔官员马继业透露，他认为应使新疆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作为俄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国^①。为此，沙俄在南疆和田、莎车、叶城等地公然大批胁迫中国各族人民加入俄籍，有计划地指使“俄侨”闹事，为其武装干涉制造借口。

沙俄在出兵伊犁、喀什噶尔之后，又将侵略军开进中国的阿尔泰地区。

阿尔泰地区原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清朝政府为了加强防御力量，便于管理，将阿尔泰地区从科布多划出，专门设置阿尔泰办事大臣（辛亥革命后改为阿尔泰办事长官），驻承化寺（在今阿勒泰县），直接管理。

阿尔泰地区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早为沙俄所垂涎。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采取各种手段妄图把阿尔泰地区变为自己军事控制下的殖民地。

一九一二年初，沙俄诱迫当时的阿尔泰办事大臣帕勒塔，非法攫取了在喀喇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布尔津河通航，在布尔津修筑码头、商栈，以及在承化寺设置领事等特权。以后，沙俄商人和殖民者纷纷窜入阿尔泰地区，俨然把这里当作沙俄的殖民地。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02—203页。

一九一三年七月，沙俄又指挥侵占科布多的外蒙古傀儡军西犯阿尔泰，妄图假手外蒙古反动封建主侵占阿尔泰。七月四日及十一日，驻守在科、阿交界附近的新疆军队，在当地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给来犯的外蒙古傀儡军以迎头痛击^①。七月二十二日，沙俄又别生事端，驻阿尔泰俄国领事借故持棍乱打中国政府从伊犁派至阿尔泰的驻军长官及士兵。中国兵士持枪自卫，刺伤俄国领事。沙俄即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撤出新疆军队、惩办“凶手”，并向俄国“道歉”。在沙俄的威逼下，中国政府被迫撤退了新疆军队，处罚了刺伤俄国领事的官兵。当该军一撤离，沙俄又借口中国政府对刺伤俄领事的官兵处罚太轻，于九月间出兵一千五百余名侵入阿尔泰承化寺等地^②。

十月初，俄国驻阿尔泰领事胁迫阿尔泰长官帕勒塔就外蒙古傀儡军进犯阿尔泰一事，签订《临时停战条约草案》六条^③。其中第二条规定：中俄协约未经成立以前，阿尔泰与科布多疆界暂以阿尔泰山最高分水岭和布尔根河为界限。这样就将原属阿尔泰管辖的一部分土地划归沙俄控制的外蒙古管辖。当时，中国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下，拒绝批准这个条约。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帕勒塔与俄驻阿尔泰领事库齐明斯基在承化寺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共四条。规定驻察罕通古的中国军队于

① 《补过斋文牍》戊集三，第4—5页，第14—15页。

② 《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承化寺俄兵案》。

③ 全文见《补过斋文牍》戊集四，第3—4页。

THE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
FOR THE TELEGRAPH DEPARTMENT OF THE POST

STATION

TELEGRAM No. 迪化 Class _____ Words _____

迪化

警署派兵俄帕一相尚甘因俄新
 的化一俄守民尚日甚其害怕
 部承所有受心兵刻一電情去有楊
 軍去俄駐巴圖圖人甘嘉志有居漢
 北陸軍兵六城站中俄向王世時民
 部因俄何阿換法待此晚日王人飽
 急謀密到尔为篇信俄王怕九晚外世
 參拱正布叔兵王律出十帕中王長

楊增新關於沙俄出兵入侵阿爾泰給北京參謀部陸軍部電

此约签订后三个月，退至新疆元湖地方，并特别说明此条约系指双方驻军地点而言，与科、阿疆界问题无涉。科、阿分界应以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所附《声明另件》第四条办理^①。届期中蒙双方撤军。沙俄唆使外蒙古傀儡军侵占阿尔泰地区的阴谋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未能得逞。

但是，沙俄仍不甘心，转而利用中国士兵自卫、枪伤俄国领事事件，出兵阿尔泰，妄图长期占领。中国政府一再照会，要求撤除在阿尔泰所驻俄军。沙俄以“该处华官力不至或不能保护俄民生命财产，且有纵容伤害本国领事”为借口，拒不撤兵。入侵俄军在承化寺、布尔津河等地抢占土地、砍伐林木、建筑营房、架设电线、设立邮局；甚至打死打伤中国人民，安设哨卡，盘查行人；把中国阿尔泰地区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②。

一九一四年二月六日，沙俄向中国政府提出撤出阿尔泰俄军的六项条件，企图胁迫中国政府承认。这六项条件是：

“甲、为地方平靖起见，该处哈萨克仍应归该哈萨克总管节制，其应交中国官库各项税捐，按照公平厘定，不

^① 《声明另件》第四条是：“外蒙古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惟现因无蒙古详细地图，而该各处行政区域又未划清界限，是以确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尔泰划界之处，应按照声明文件第五款所载，日后商定”。（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第949页）。

^② 《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承化寺俄兵案》。

得勒行收用哈萨克之牧地。

乙、俄人民暂行享用在喀喇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免税贸易及航行之利益，应完全承认，并准俄人经理该河之航政。

丙、应将布尔楚木河（即布尔津河——引者）口已经划定俄商之码头再行扩充，足敷该处商业骤臻发达之用。且于哈巴河口及克兰河口暨乌伦古海峡之都鲁布金地方三处，划定地段，以便修筑码头。并准俄轮船公司于玛纳斯及古城设立货物代办所，以便招揽货物输运。

丁、完全承认俄人民于阿尔泰区域享有地段及他项不动产之权，或购置或租赁，并可建造工商各项之房产暨任意居住、渔猎、耕种各项之利益。

戊、每年至少组织司牙孜^①一次，会同清理交界人民之案件。

己、中国政府应行声明，完全实行光绪七年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引者）第十二条内载：“天山南北各路俄商任意运入及沿途售出货物各利益，其中国货物及茶品亦在其内”^②。

沙俄提出的六项条件是侵吞中国阿尔泰地区的严重步骤。六项条件中规定“该处哈萨克仍应归该哈萨克总管节制”，中国政府“不得勒行收用哈萨克之牧地”，是沙

^① 司牙孜是会审之意。司牙孜制度，即在中国西北地区，中俄双方会同审理边境人民互控案件的一种特别制度。在执行这一办法过程中，俄方官吏往往虚报案件，恃强欺诈。另外，司牙孜制度只能审理非俄罗斯族人，俄罗斯族人仍须由沙俄领事馆审理。

^② 《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承化寺俄兵案》。

俄企图否认中国政府对该地的主权，“欲引哈萨克外向，使逐渐脱离中国管理之权，俨然含有独立性质”^①。六条中还规定沙俄在喀喇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上的航行、免税贸易、扩建码头及经理该河航政特权；在阿尔泰地区“任便居住、渔猎、耕种”的特权。沙俄所提六项条件勒索的侵略权益也不仅在阿尔泰地区。如：无理要求“准俄轮船公司于玛纳斯及古城设立货物代办所”；曲解《中俄伊犁条约》，要求“天山南北各路俄商任便运入及沿途售出货物各利益，其中国货物及茶品亦在其内”。按《中俄伊犁条约》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的有关规定，俄商由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返回俄国，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且“沿途不得销售”。沙俄提出上述要求，实际上是违背《中俄伊犁条约》，意欲随意贩运中国内地土货（特别是茶叶）至新疆，沿途洒卖，牟取暴利。

二月二十七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在答复中指出：俄国“所提条件与撤兵乃系两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对沙俄提出的六项条件，除关于举行司牙孜会议一条同意外，其余各条均予以驳斥。

四月十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逐条驳斥了沙俄的无理要求，声明说：

“甲款、哈萨克向归总管节制，其税捐亦仍旧制征收，将来如有变更之处，应照汉民一律办理。哈萨克本系中国人民，阿尔泰系中国土地，政府自无收用之事，倘有必须收用之时，亦必为代筹生计，不得因此限制中国之

^① 《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页。

殖民。

乙款、前次业已答复，兹再声明：开放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准中俄人民办理航业，惟免税系指陆路通商而言。今既开放水路，应由中国设立税关，征收商税，所有行船征税各事，另定妥章，以便遵守。

丙款、前次业已答复，兹再声明：布尔楚木河口业经拨给地段，足敷建设之用，不须再行扩充。哈巴河亦允拨给地段，俾敷建筑码头之用。奇林河口应俟轮船果能达到时，再行核办。至都尔布里津拨地一层，为前议所无，碍难照准。古城、玛纳斯祇准该轮船公司租赁房屋，作为代办所，不得购地建筑，并不准他项商人援以为例。

丁款、前次答复以承化寺业已设领，所有俄人购置租赁应照约办理，是以承化寺地方准俄人有购租建造之权。惟渔猎、耕种勿相侵越，以免辚轳。

戊款、司牙孜前已同意，并已由该长官与贵国领事商议开办，自无问题。

己款、实行条约，中(国)政府业已同意。惟运茶专章现拟提议修正，应归另案办理”^①。

在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沙俄驻华公使克鲁宾斯基即上报沙皇政府，提议拒绝撤兵。他在报告中说：“可以看出，这个答复实质上对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已逐条加以拒绝，除了组织年度司牙孜来审理边境居民间的争议案件这条要求外……既然对我们很不过分的要求如此对待，中国政府自然不能期望俄国军队撤离阿尔泰地

^① 《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承化寺俄兵案》。

区”^①。如此狂妄的侵略要求，沙俄侵略者竟然说是“很不过分”，这再次充分地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丑恶嘴脸。

综上所述，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先后三路出兵，侵入中国西北边疆，就是妄想实现吞并中国西北边疆的狂妄野心。但是，侵略者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力量。中国西北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使沙俄吞并中国西北边疆的狂妄野心未能得逞。《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一书的作者曾写道，中国革命虽然给沙俄“提供了催促吞并喀什噶尔地区的机会，但也推翻了他们的计划”^②。

同时，沙俄同英、法联盟，与德国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日趋尖锐，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沙俄不得不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首先撤离了在喀什噶尔增驻的侵略军。第二年十月，又撤出了增驻伊犁的侵略军。而增驻阿尔泰地区的沙俄侵略军却一直盘踞在那里，赖着不走^③。

但是，沙俄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吞并中国西北边疆的狂妄计划。到了一九一六年，沙俄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还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秘密奏折中说：改变中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3辑，第1卷，1931年版，第508—509页。

②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07页。

③ 直到1917年沙皇政府崩溃后，增驻阿尔泰的俄军才撤出。

国和俄国的边界是非常紧急的事，提出要“从汗腾格里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划一直线”，“来改变我们和中国的国界”，这样，“伊犁、蒙古北部和满洲就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了”^①。

二、沙俄霸占中国唐努乌梁海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帝国主义不仅策动外蒙古“自治”，出兵新疆、阿尔泰等地，而且还乘机霸占了中国西北的唐努乌梁海约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②。

唐努乌梁海在外蒙古西北，东面与北面同沙俄接界，南面至唐努山，与中国外蒙古扎萨克图汗及杜尔伯特游牧地相邻，西面与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相接。叶尼塞河上源及其支流流经其地，山多森林，金矿丰富，适宜畜牧、渔猎，并宜耕种，是一块富饶的地方。

这里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末，即沙俄入侵西伯利亚之前，在这里居住的乌梁海等部是中国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的一部分。十七世纪初，沙俄在吞并西部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已将侵略魔爪伸进了这一地区^③。

十八世纪初，清朝政府将唐努乌梁海地区划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并将该地划为五旗（即唐努旗、克穆齐克旗、托锦旗、萨尔吉克旗和库苏古尔旗）、四

① 苏联《红档》杂志，1929年第3卷，第73页。

② 这块地方大致为今苏联的图瓦自治州。

③ 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十六佐领(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直辖二十五佐领、扎萨克图汗部所属五佐领、三音诺颜部所属十三佐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三佐领)。每旗设总管一人,五旗总管中,又由唐努旗总管任大总管(副都统衔),兼统其余四旗。总管世袭,由清朝政府册封。清朝政府颁布的典籍,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理藩院则例》、《大清一统志》等,均详细记载了关于唐努乌梁海各旗所辖范围、官制、赋税等规定。

沙宾达巴哈以东唐努乌梁海东部和北部与沙俄的边界,是一七二七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如第二章所述,根据这一条约,沙俄获得了萨彦岭以北中国扎萨克图汗所辖的大片领土,萨彦岭以南的唐努乌梁海仍属中国。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中俄双方根据《布连斯奇条约》的规定,从恰克图以西至沙宾达巴哈,设立了二十四处界牌,签订了《中俄色楞额界约》。

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九年,沙俄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侵吞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十佐领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全部土地。按照《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由沙宾达巴哈往西转南至科布多所属之柏郭苏克山止,共设立了八个界牌。该约还规定,每年两国派员共同会查边界界牌。

尽管中国唐努乌梁海与沙俄交界处双方正式划定了边界,设立了界牌,沙俄对这里的侵略活动仍然日益猖狂。

六十年代,临近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米努辛斯克

商人、商业资本家大批涌进了唐努乌梁海。他们从俄国运来布疋(印花布、平布、厚棉布等)、日用小杂货、铁制品、皮革等工业产品,通过以物易物或赊销的方式,换取当地人民的牛、羊、未加工的皮革、毛皮等畜牧产品。这种贸易是典型的殖民掠夺。苏联早期出版的一本研究唐努乌梁海的著作写道:在唐努乌梁海,“俄国贸易的掠夺性,特别是在持续了三、四十年之久的初期阶段,是任何一个论及这一问题的人都清楚的。‘侵占’和‘欺诈’在当地贸易中起主要作用”^①。贪婪的俄国商人最初可以用装有打火石、烟叶、针等小货物的口袋,骗取当地牧民好几头驮载着熟羊皮、羊羔皮的牲口,或赶走一群牲畜。“一包针(二十五枚)价值五戈比,用它可从托锦人那里换回一张到二张灰鼠皮,价值二十——三十戈比。马合烟在米努辛斯克用四戈比可买八分之一镑,到托锦可换一、二张灰鼠皮。猎枪值三——五卢布,可换一张貂皮,至少值十五——二十卢布”^②。俄国商人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中,获取了百分之三百——四百的利润。他们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掠夺,在当地人民中甚至形成一种谚语:俄国商人“心黑”,“给他一个指头,他要拿走整个手”^③。

赊销贸易是沙俄商人掠夺唐努乌梁海人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赊销贸易是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的

① 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1934年莫斯科出版,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2—103页。

③ 奥斯特洛夫斯基:《乌梁海对南西伯利亚的意义》,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第35卷,第337页。

一种形式，它比上述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更加残酷。俄商先把一些商品(往往是卖不出去的劣等商品)赊销给乌梁海猎人或牧民，规定期限，到期再从他们那里勒索高几倍或几十倍的价钱，通常是用皮毛、牲畜或其它畜产品交付。如果到期不能交付，则加倍偿还。随着沙俄商业资本的不断深入，绝大部分唐努乌梁海人民陷入了沙俄高利贷的罗网中，而且越陷越深。俄商追讨债务的手段十分残酷，他们强行赶走牲畜，如不够数，便将债户的亲属或族人的牲畜赶走。

在唐努乌梁海地区，有一批俄国商业资本家，靠掠夺性的贸易发了横财，逐渐在这里建立起固定的商站。这些商站有坚固的木房、杂用房、货仓，周围是高大结实的围墙。随着商站的建立和不断扩展，沙俄在这里的贸易便逐年扩大，并且深入到各地。这些商站促进了沙俄在这里的殖民活动，许多商站后来就成为沙俄非法殖民的村镇。

挖掘金矿和非法捕鱼是沙俄掠夺唐努乌梁海地区自然资源的两种主要方法。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就有一些沙俄冒险家窜到唐努乌梁海探掘金矿。七、八十年代后，这种盗窃金矿的侵略活动更加猖獗。据俄国人自己统计，仅一八八三年，在西斯季克穆河四十五个矿坑中，沙俄就窃夺了约五百五十普特（约合九千公斤）金砂^①。沙俄米努辛斯克当局甚至派遣矿山工程师在该地

① 《乌梁海对南西伯利亚的意义》，第 325 页。

勘查金矿的分布情况。

邻近的俄人还窜入唐努乌梁海地区偷偷地捕鱼，每年用木筏沿叶尼塞河将掠夺的鱼运往米努辛斯克等地销售。

沙俄还积极地向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殖民。二十世紀前，大批俄国米努辛斯克乌斯地区、叶尼塞斯克边区的居民纷纷非法逾过萨彦岭中俄边界到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殖民。七十年代初，他们逐渐占据了乌尤克河谷（今大叶尼塞河支流）等地，建立了一些殖民点，如土兰、乌尤克等。以后，沙俄殖民点逐渐扩展，“一步一步地把开阔的好地方据为己有，发展畜牧业，扩大耕种面积，砍伐森林，浮运木材，并占据了渔业区、狩猎区”^①。一八八六年，沙皇政府在乌斯设置了一名“乌斯边务官”，专门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殖民，维护沙俄的侵略利益，并继续推行殖民政策。

对于沙俄上述的种种侵略活动，当地中国乌梁海官吏不断提出抗议，中国中央政府也正式向沙俄提出抗议和交涉。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乌里雅苏台将军上报有沙俄商人非法在唐努乌梁海境内“建盖行栈数处”，又自这年春季以来，“有俄人或三、五十人，或八、九十人不等，在奇木齐克河北一带中唐努山内，刨挖金砂”^②。清朝政府即照会沙俄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要沙俄转饬边界官员，“查明禁止”。凯阳德在回照中，一面虚伪地声

① 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37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9卷，第17—18页。

称：“俄人挖金如果在中国境内，自必禁止。”同时，又无理要求允许俄商在该地“暂设堆货之草棚土屋，以防潮湿，而杜失窃”^①。一八八一年，又有俄人在萨尔鲁克地方，扎立木棚十处，在附近挖掘金矿大小一百余处^②。一八八八年，又有俄人沿沙宾达巴哈以东至霍呢音达巴罕迤西唐努乌梁海沿边一带偷挖金砂四十五处^③。

沙俄还借口已得清朝政府准允在此“暂设堆货之草棚土屋”，大肆非法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盖造坚固房屋十数处，侵入中国境内数百里。又在乌克、多伦两河岸地方，非法“开垦地亩三块，长一千三百余尺，宽八百二十余尺。”^④

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激起了当地中国唐努乌梁海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烧毁俄商非法建造的货栈和房屋，驱逐采掘金矿的俄国殖民者，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气焰^⑤。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派员调查沙俄侵入该地盖房、挖金、开地等侵略事实，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⑥。

到二十世纪初，随着沙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中国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就日益成为它兼并的目标。一九〇四年，一个曾几次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窜到唐努乌梁海进行间谍活动的俄国参谋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9卷，第1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78卷，第14页。

④ 同上书，第78卷，第14页；第79卷，第18—19页。

⑤ 见《乌梁海领土对南西伯利亚的意义》，第325—326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8卷，第13—16页。

总部波波夫上尉，向沙皇政府呈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大肆鼓吹俄国占领唐努乌梁海的必要性。沙俄西伯利亚当局也蠢蠢欲动，妄图在这里设置俄国边务专员，加强控制。但由于当时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在这场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遭到可耻的失败，使它未能采取行动。可是，到一九〇五年后，沙皇政府“希望通过使用武力和夺取中国某些地区的办法”来达到巩固它在远东的地位^①，沙俄准备用武力夺取的地区就包括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因此，沙俄加紧了侵占唐努乌梁海的准备。

一九一〇年，沙俄公然践踏一八六九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拔去并焚毁了沙宾达巴哈以西八个界牌中的第四个——察布齐雅界牌，并拒绝按约派员参加中俄会查这一段边界^②。

当时，清朝政府照会沙俄驻华公使，提出按约自行补修，并要求惩办焚毁界牌的俄员。沙俄驻华公使在复照中诡称什么：“该处有无木牌于未经查明前，未能定其是否。须经两国派员就地查明”^③。可是，当清朝政府电令乌里雅苏台将军派人会同俄国官员查办时，沙俄驻华公使出尔反尔，于一九一二年四月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乌梁海界限系未决之问题，于未经议订该处界限、方向以前，碍难查办察布齐雅勒达巴木牌之案”^④。七月，又复照

① 见《沙佐诺夫 1911 年 1 月 10 日奏折》，载苏联《红档》杂志，1926 年第 5 卷，第 89 页。

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 21 卷，第 38—39 页。

③ 《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俄毁牌博牵及乌梁海案》。

④ 同上。

中国政府，威胁说：“若中国官员独行设法查勘界线，或复立界牌，本国政府概不承认”等^①。

以后，虽经中国政府据约驳斥，严正抗议，然而，沙俄仍蛮不讲理，竟复称什么：“近年调查乌梁海地势，颇滋疑惑，同治八年订立分界，共设牌博之举，甚欠妥协，因乌梁海全域并未就地订立分界，须将关于此事之案卷详查校对后，方可订明该处界限方向之问题”^②。为了侵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沙俄竟公然撕毁一八六九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

与此同时，沙俄一面加紧修筑道路和改进通往唐努乌梁海的交通，以扩大其殖民活动和为军事占领作准备；一面大造舆论，为侵占唐努乌梁海作准备。

一九〇九年六月，沙皇政府决定从国库拨款，修建一条从米努辛斯克县格里戈利耶夫村到乌辛斯科耶村的马车道。一九一一年，又拨款改进叶尼塞河上游航道，清除急滩的乱石等。

一九一一年二月，在伊尔库次克，沙俄召开了专门会议，策划加强俄国在唐努乌梁海的势力，以及侵吞唐努乌梁海的措施。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伊尔库次克总督尼亚泽夫、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勃里列维奇、军区参谋长苏利克维奇、波波夫上校、乌斯边务官恰基洛夫等人。这次会议拟订了“逐步吞并”和“公开占领”唐努乌梁海的详细计划。会议基本上同意采取“立即公开占领”乌梁海的一切

^① 《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俄毁牌博牵及乌梁海案》。

^② 同上。

措施。《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一书的作者写道：“伊尔库次克会议所制定的占领乌梁海边区的计划是挑衅、欺骗和残暴镇压的大杂烩”^①。

当时，沙俄国内资产阶级报刊，不论是彼得堡出版的《新时报》，还是海参崴出版的《远东报》，都掀起了俄国应立即占领唐努乌梁海的叫嚣。沙俄一些资本家和地方势力通过召开会议、上书等形式，大肆制造舆论，推动政府吞并唐努乌梁海。沙俄反动报刊和书籍制造了种种谬论，说什么早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统治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和罗卜藏就“臣属”了俄国；什么一七二七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所订恰克图至沙宾达巴哈一段边界，不是沿萨彦岭，而是沿着唐努乌梁海南境的唐努山，只是因为“俄国人的误会和注意不周”，才使中国统治了这一地区，等等^②。关于“阿勒坦汗”“臣属”俄国一事，在本书第二章已论及。所谓“阿勒坦汗国”，实际上只是中国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的一部。沙俄在那时频繁地派遣“使节”妄图诱使俄木布额尔德尼、罗卜藏等“加入俄国籍”，这种非法的侵略活动并没有得逞。至于《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所订的这段边界，当时换文及所立界牌鄂博俱在，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在策动外蒙古“自治”的同时，积极准备以武力霸占唐努乌梁海。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沙俄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吞

^① 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55页。

^② 参看巴拉诺夫：《乌梁海问题》，第19页等。

并唐努乌梁海问题。在铁的事实面前，参加会议的俄国官员们也不得不承认唐努乌梁海属于中国。但是，会议仍然决定：加强俄国向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殖民，派遣军队驻守在邻近该地的乌辛斯科耶村，加速完成上述的马车道和改进叶尼塞河上游航行条件等侵略措施^①。

就在内阁会议后几天，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向沙皇呈递了一份奏摺。上面写道：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驻华代理公使提出立即占领唐努乌梁海的紧急报告，提出占领该地的理由，“一方面我国对此一地区无疑有法律上的权利，他方面达到目的适当政治情况业已具备”。在奏摺里，沙佐诺夫供认：证明俄国对该地有法律上的权利，“已被莫斯科总档案库文牍四等文官贝洛库罗夫不久以前完成的工作所驳倒，贝洛库罗夫根据十八世纪末（约当俄国和中国缔结布连斯奇条约时）的原文件及地图材料得到下列结论：一七二七年由俄国和中国代表依布连斯奇条约所划界规定了沿萨彦岭的疆界，在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即萨瓦·卢基奇·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引者）监督下划界以后的交界地图也确定了同样的情况”。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对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报告上却批示：“反之，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问题以来，已三个多月，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

^① 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58—162页。

利益。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区的历史吧！”^①尼古拉二世的批示表明，他要利用中国革命的时机，立即占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为此，他还要沙佐诺夫回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即先侵占，然后强迫中国政府承认。尼古拉二世的批示，充分暴露了沙俄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根据尼古拉二世这个侵略旨意，沙皇政府遂于一九一三年在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地区设置了一名“边境专员”和一名“移民官员”。边境专员的任务是加紧对这里总管们实行“说服”和“劝告”，即诱迫他们投靠俄国，以便给吞并这一地区披上一件“自愿并入”俄国的外衣。而移民官员的任务就是加强对这里的殖民，以便“俄国人悄悄地占满这个地区，未经许可便把它弄到手”^②。

沙俄第一任边境专员采列林到任后，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威胁利诱唐努乌梁海的封建上层分子。首先，利用唐努乌梁海旗大总管棍布台吉企图借俄国势力巩固其权势的野心，将他掌握在手中。接着，采列林又劝诱唐努乌梁海最大的克木齐克旗的两个旗（大旗和贝子旗）向沙皇政府呈交了“要求”加入俄国国籍的“申请书”。在导演了这场“自愿归并”的丑剧后，沙皇政府认为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条件已“成熟”，遂于一九一四年六月悍然决定：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行“保护”。在采取这一侵略行动时，沙皇政府做贼心虚，所以，沙佐诺夫特别指示伊尔

^① 苏联《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第96—97页。

^② 明茨洛夫：《秘密的使命》，里加版，第6页。

库次克总督：“为了避免曲解和夸大我们所做的这一步，恳请不予公布这一步骤”^①。

与此同时，在沙俄驻唐努乌梁海移民官的组织和策划下，大批俄国人移入这里，抢占土地和牧场，“任意建筑房屋，圈插木栏，而垦田割草，实繁有徒”^②。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一一年时，该地已有俄国居民点九十多个，约三千人；一九一一年后，沙俄殖民发展十分迅速，到一九一八年该地俄国居民点已增至一百七十多个，约一万一千多人^③。而该地乌梁海人一共才六万多名。

沙俄帝国主义武力霸占唐努乌梁海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唐努乌梁海地区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和愤怒谴责。沙俄为了镇压当地中国人民的反抗，于一九一四年底，改派格里戈里耶夫为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进行血腥统治。格里戈里耶夫上任后，首先把不够驯服的大总管棍布台吉撤职，改派完全投靠沙俄的卖国贼阿官德木齐为大总管。接着，沙俄哥萨克侵略军血腥镇压了各地人民的反抗，用武力强迫其它各旗总管宣誓“效忠”沙皇，在哥萨克侵略军刺刀和警察的皮鞭之下，建立起了沙俄的血腥统治。

但是，中国唐努乌梁海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仍然不断高涨。有时整个佐领的人民起来反抗沙俄野蛮的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3辑，第2卷，第282页。

② 《民国六年六月十一日克木齐克乌梁海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急乞救援呈》。

③ 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73页。

殖民统治。一九一六年五月，勾结沙俄的卖国贼阿官德木齐在五个哥萨克兵士和三个官吏的护送下，拜神归来，行至索拉马河边时，被愤怒的乌梁海人击毙^①。这使沙俄侵略者大为恐慌，格里戈里耶夫急忙请求伊尔库次克总督，调一团士兵到乌梁海来，以镇压人民反侵略的斗争。这些铁的事实，有力地戳穿了唐努乌梁海“自愿归并”俄国的无耻谎言。

中国历届政府对于沙俄非法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未承认。

第三节 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

一、沙俄扩张领事特权，加强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力图把这里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

扩张领事特权，发展侵略势力，是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控制的主要方法。

按《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规定，沙俄在伊、塔所设领事是“专管贸易”的。可是，沙俄却使它起所谓“外交代

^① 见《民国六年六月三日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咨陈》附《克木齐克总管所派大喇嘛达克丹面陈节略》等。

表”的作用。曾任过驻伊、塔两地领事馆官员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就毫无掩饰地说过：“驻中国的领事作为外交代表，他的作用特别大。作为一个外交代表，领事在其管辖区内力求达到某一时期我国政府认为重要的政治目的”^①。所谓“政治目的”，即扩大在华的侵略势力。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曾潜至中国蒙古、新疆等地“探险”的沙俄侵略分子边宁格供认：“如果要扩大我国通商权，伸张我国的势力，就需要在于我们有利的一切城镇，急速地开设领事馆，以优秀的将校担任武官的领事护卫队（每馆至少五十人）的出现，不仅对当地居民心理影响极大，而且十分有助于我国势力范围的扩张”^②。

自一八五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短短的六十年间，沙俄先后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乌鲁木齐、肃州、哈密、承化寺、古城等地设置领事馆和行使领事裁判等特权。一八五八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同意它在伊犁、塔城两处领事馆设武装卫队五十名。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驻伊犁领事馆的卫队增加到约二百名，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卫队增加到六十名^③。这些装备优良的卫队驻在中国领土上，“其所盖造的兵房，俨然的照营团布置”。“平时俄兵出入边卡，都是绝对没有护照验看，不服盘查，甚至还迫我方的卡兵供应一切”^④。不仅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45页。

② 边宁格：《现代蒙古》，1914年东京出版，第61—62页。

③ 参看《新疆图志》，卷58，交涉六；《新疆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

④ 杨赞绪等：《现在的新疆》，第60—61页。

如此，每当中俄有重大交涉时，沙俄即以保护领事馆、俄商为名，随意增加卫队，有时一处即达千余名。这种卫队是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设置的领事馆所罕见的。这些武装卫队是沙俄向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扩张侵略势力的重要工具。

沙俄在一些城镇还非法委派乡约（即名义上的商务董事，又称阿克萨哈尔、商约），作为各地领事的耳目和爪牙。俄乡约或由附近领事任命，或由当地俄商推选，经领事批准，然后知照中国地方当局。除设乡约外，有时还设所谓“帮办乡约”。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日沙俄乌鲁木齐总领事给清朝地方当局关于在古城设置乡约、帮办乡约的照会上说：“兹经古城贸易俄商人等公举俄属塔什干缠回哈吉柏拉特拜为俄乡约、浩罕缠回哈其木得然为帮办乡约。本署领事已允所请。以后一切交涉案件、保全商务，皆系该乡约等应办之责，应照请贵道，札饬奇台县，嗣后遇有应办事件，准该乡约、帮办乡约来署报明核办，俄人一切事宜均归哈吉柏拉特拜暨哈其木得然二人经理，他人无管理之权”^①。各地俄乡约狐假虎威，凌驾于中国地方官员之上，擅作威福，欺压中国人民。他们争占水利，抢掠财产，贩运私茶，勒索华商，盘剥重利，潜运烟土，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沙俄通过领事馆和各地的乡约，逐渐在中国西北边疆形成了凌驾于中国地方当局之上的侵略势力。

^① 见《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致镇迪道兼巡抚照会》。

大俄署理烏魯木齊領事官科

為

照會事茲經古城貿易俄商人等公舉俄屬塔什干纏回哈吉柏
拉特拜為俄鄉約浩罕纏回哈其木得然為幫辦鄉約本署領事
已允所請以後一切交涉案件保全商務皆係該鄉約等應辦之
責相應照請

貴道札飭奇台縣嗣後遇有應辦事件准該鄉約幫辦鄉約來署
報明核辦俄人一切事宜均歸哈吉柏拉特拜暨哈其木得然二
人經理他人無管理之權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沙俄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關於在古城設鄉約
給清朝地方政府的照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领事加强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主要手段是操纵当地官吏。

沙俄领事凭借其政治、军事势力,强迫清朝政府撤换对他不屈从的地方官吏,代之以一贯媚外的奴才。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月,彼罗夫斯基以帕米尔俄国信卒在布伦库尔被打和色勒库尔俄国驿书被逐为借口,通过沙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强迫新疆地方当局调换了色勒库尔旗官戴富臣^①。第二年初,他又干涉喀什噶尔知府的任命,坚持要与沙俄勾结的官吏充任。一九〇一年八月,在他无理要求下,莎车知府被撤换。当时,喀什噶尔提督张宗本因在一九〇〇年曾支持过当地人民的抗俄示威,彼罗夫斯基千方百计地要撤换他。一九〇一年十月,以增兵喀什噶尔相威胁,强迫新疆当局撤换张宗本,未遂。于是,他通过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一九〇二年三月,腐败的清朝政府终于调离了张宗本,将他降为阿克苏镇总兵。喀什噶尔提督一职,沙俄领事提名由焦大聚代替^②。

一九一三年,喀什噶尔通商局局长刘润通,事事听命于俄人,深得沙俄领事赏识,沙俄示意清朝政府加以提拔,署和田州,任交涉局长^③。皮山县知县蔡甫周,因反

①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日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致中国镇迪道照会》;《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镇迪道复照》。

②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27—128页。

③ 《西北杂志》,1913年第3期,附录,第3页。

对沙俄在该地非法发展俄侨，严办了一些加入俄籍的地痞流氓。沙俄领事即要求一味媚外的喀什噶尔道尹张应选加以惩罚。蔡甫周“愤不能忍”，投水自杀^①。伊犁地区的“中俄交涉局”，名为中国交涉机关，但每有交涉案件，总是沙俄领事说了算数。局员如有不合沙俄心意，不但会遭到辱骂，事后还得向俄官赔情道歉^②。

沙俄领事操纵了一部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官吏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主权，扩大侵略权益。

一九〇六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柯洛柯洛夫就通过喀什噶尔道尹，强行修筑了一条从中俄边境的图噶尔特山口到喀什噶尔的道路。这条道路对于沙俄入侵中国南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③。一九一三年三月，沙俄道胜银行要在中国新疆发行金卢布(纸币)，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索柯夫竟照会喀什噶尔道尹，转报新疆都督及阿克苏道尹，“查照施行”^④。如果中国地方当局采取的某些措施触犯了沙俄的利益，领事即出面干涉，勒令取消。如一九一〇年冬，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出示禁止面粉出口，沙俄领事即以“此项禁令并未知照俄领”为借口，蛮横地要求取消。

沙俄领事还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积极推行殖民政

① 谢彬：《新疆游记》，192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33—234页。

② 叶锡祺：《习坎斋文稿》，第3卷，《交涉要言》，第15页。

③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47页。

④ 《1913年3月杨增新呈大总统俄道胜银行发行新币请速与俄使严重交涉电》。

策,妄图通过殖民,侵吞中国领土。任过沙俄驻伊犁领事官的弗沃多罗夫曾叫嚷:“伊犁地区是一个适合于大批移民居住的农业地区,如果这里完全居住俄国移民,这对我们将是十分重要的”^①。他曾经强租伊犁索伦营所辖从霍尔果斯至阿克苏一带五十里地方,给俄国殖民者放牧羊马^②。伊犁一带的牧场,俄人偷越放牧的约二、三千户,牲畜达二十余万头^③。这些俄国殖民者,“皆统辖于俄国总领事馆,其下复设村长、组长,从殖民中选出,以治理内外事务”^④。

在阿尔泰地区,沙俄的殖民活动更为猖獗。一九一二年,沙俄殖民者在阿尔泰哈巴河、布尔津河一带大肆开垦土地,盖房居住。据一九一三年的调查,在哈巴河一带,俄国殖民所种之地“已达籽种大麦、菟豆壹佰石以上,每石约重四百斤”,修房四十七间,“又于民房侧四处下桩,料理建筑。”在布尔津河一带,俄国殖民者种地也达七十石以上,“住房十间,带有眷口,牛马甚多,渠水概被强占”^⑤。一九一五年,沙俄竟然派遣侵略军用武力支持俄国殖民者抢占哈巴河及布尔津河附近冲呼尔各处土地,“越种地亩,强占渠水,伐树盖房,捕鱼设渡”,甚至用武力强迫当地中国居民限期腾房^⑥。

① 转引自《俄国在亚洲的兴起》,第146页。

② 《伊犁将军马广奏稿》,第3册,光绪二十九年六月。

③ 杨赞绪:《现在的新疆》,第14页。

④ 《新疆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

⑤ 《民国三年十月九日阿尔泰长官刘长炳致国务院呈大总统电》。

⑥ 《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俄人在哈巴河越界种地案》(民国四年四月)。

出陸今種估 知育了 所以能將請州國中會存效身 滿
 人見又種我種 以公布自 爾見牙謝肯公兵夫估應國野
 意間馬不果 驟然不物 性多 遠應航人士改子業島社
 表我以以水我 添八津五 願 可因官事潮及有保佳龍等應
 何理以轉估 龍相何能 送而此庫送我老女讀肯查共
 以確騰忘我 地 出岸標并 即鼓擊收連煤蓋案其頗河之庫
 仙史為地林 家 和或得難赴藏行願 官何實事一人
 地危名行本 是是通院心 証在增文應奇得明此 布公 一守以印

阿尔泰办事长官刘长炳关于沙俄侵略阿尔泰情形给大总统电

沙俄的商民和洋行，在领事馆的庇护、支持下，也往往恃强逞凶，肆意侵占中国牧场、耕地。如于田县努勒村，俄民侵占当地人民草湖牧场。沙俄德盛洋行等十余家强占奇台县(古城)属白杨河以东南山农民的耕地，牧放牲畜达四十余万头，不仅不纳税，反而“故意纵放牲畜，伤害禾苗。”当地农民如加以阻止，他们便逞凶打人，甚至“割民之耳，殴人致毙”^①。

至于各城沙俄领事平时飞扬跋扈，欺压中国各族人民的罪行，更是层出不穷。伊犁领事为了抢掠一维吾尔族妇女，公然带领哥萨克卫兵，闯入宁远县衙^②。乌鲁木齐领事乘车外出，必有十多名哥萨克护卫，前呼后拥，倘有中国人民躲避不及，即遭毒打^③。

非法发展俄侨是沙俄扩大侵略势力，加强政治控制的又一罪恶活动。

沙俄领事馆非法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发展俄侨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开登记，二是非法出售“通商票”。

一九一一年六月，沙俄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特意任命曾在上海、沈阳等地担任过总领事的爱德华·贝伦斯为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副领事。野心勃勃的贝伦斯到任后，就于同年底从喀什噶尔窜到于田、莎车、叶城等地，非法诱迫中国人民加入俄籍。他强

① 《补过斋文牍》庚集，第1页。

② 《习坎斋文稿》，第3卷，《交涉要言》，第15页。

③ 勒哥克著，陶谦译：《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地下宝藏》，载《地学杂志》，1932年第2期。

迫那些父母出生在巴尔提斯坦、奇特拉尔、吉尔吉特，而自己出生在中国南疆，并早已取得中国国籍的人，声明自己是俄国人^①。这些人根本同沙俄毫无关系，更不是“俄侨”。但是，贝伦斯却强行把这些人登记为“俄侨”。在中国南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祖先从中亚安集延等地迁来后，世代定居在中国土地上，早已是中国人。可是，贝伦斯也强迫他们每人以二十五到五十两银子的高价购买俄国国籍证明书，脱离中国籍。更恶劣的是，贝伦斯还指使一些俄国乡约伪造家谱，硬指一些中国维吾尔族人为乌孜别克人的后裔，逼令他们购买俄籍证明书，加入俄籍。

沙俄领事馆还以非法出售通商票的手段发展俄侨。所谓“通商票”，是沙俄领事发给俄商的贸易执照。根据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俄商在中国天山南北贸易免税，通商票就是俄国商人免税的执照，与国籍证明书毫不相干。沙俄为了扩展势力，纵容各地俄国乡约和俄商非法出售通商票给中国奸商，从中获利。这些中国奸商执沙俄通商票，冒充俄商，投机倒把，偷税漏税，一经查获，沙俄领事就加以庇护，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一些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也仿效奸商，贿赂通商票，投靠沙俄，为非作歹。这样，沙俄领事馆就将出售通商票作为一种发展俄侨的手段，大肆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非法出售通商票，发展俄侨。如拜城，从前根本没有俄侨，一九一二年三月，乌什的俄国乡约阿布都哈的窜到该处，诱迫当地人用银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71页。

四两或五两贿赂通商票，非法发展俄侨一百余人，而且先后安置了两名俄国乡约^①。五月，莎车知事向新疆总督呈报，该地俄国乡约“以通商路票欺哄乡愚，或给片纸小条，伪为准入俄籍凭据”。六月，皮山知事又呈称：该地桑株沙布尔庄户民阿哈买提等四人，赴县衙缴通商路票，“出具甘结”，恢复中国籍。而俄国乡约吉力里带领多人，竟将阿哈买提等四人“扭至家中，用柳条私刑拷打，背脊几无完肤”，并“关锁私室”。为此，中国地方当局向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提出严重交涉^②。又据伽师县一九一四年清查国籍，发现有八十三人“冒领商票”，投入俄籍^③。在焉耆、和田等南疆各地均有类似情况。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更有最大之隐患足以亡南疆而有余者，则通商票是也”。“若长此不止，恐人民去而土地随之，天山南路，不难立沦异域”^④。

二、沙俄垄断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

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沙俄从经济上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加紧掠夺和实行垄断。到二十世纪初，沙俄实际上独占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市场，通过推销商品，输出资本，操纵了这里的经济命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在中国西北边疆地

① 《俄人勾引华人入籍之骇闻》，载 1912 年 12 月 31 日《时报》。

② 《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喀什各属俄乡约诱引华人入俄籍案》。

③ 《伽师县造赍民国四年份调查外交统计十项表》备考。

④ 《西北杂志》，1913 年第 3 期，附录。

区,随着它侵略势力的扩张,在许多方面超过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肆无忌惮地推行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政策。

首先,沙俄领事馆通过对中国西北边疆一些地方官吏的控制,胁迫他们采取有利于俄商的措施。如一九〇一年,在喀什噶尔沙俄卢布与新疆货币的官方兑换率是一卢布比十腾格。但由于卢布开始行使,信用不足,市场上卢布只能折换八点五个腾格。沙俄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强迫当时道尹黄光达出示布告,要各商店售货时,必须按十腾格的官方兑换率接受卢布付款^①。

沙俄还违反不平等条约的有关规定,无视中国主权,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非法设卡,抽收华商捐税。早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就背着清朝政府,非法在喀什噶尔设立税局,强迫入俄贸易华商买票,每票勒索俄币一个半卢布。到一九一四年,该处沙俄税局对入俄贸易华商又增收货税,计毡毯、土布每驮增收税银至五两^②。根据《中俄伊犁条约》及所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的有关规定,华、俄商人在中俄百里之内贸易是免税的。沙俄不仅非法一律抽收华商货税,而且竟然将税局设在中国领土之内。当中国政府向沙俄提出抗议之后,沙俄进行狡辩,说什么俄国在喀什噶尔设局是为了便利华商,抽收的是“盖戳费”,已实行二十余年;而且还威胁说:“新疆巡按使提议此事,足征为排俄之新证”,“殊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26页。

② 《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收喀什道尹电》。

于中国有害也”^①。中国政府一再交涉，沙俄理屈词穷，不得不撤去了在喀什噶尔所设税局，改设在中俄边境上的伊尔克什坦，只收入俄华商报关验货费^②。

不仅如此，沙俄商民还霸占中国牧场，放牧牲畜，抗缴牧场税。经中国政府多次抗议和交涉，沙俄领事歪曲条约进行强辩，说什么“按照中俄现行约章，凡侨居华境之俄民除地亩正供外，他项税课均在豁免之例，牲畜一节绝不能与田亩正供相提并论”等等。中国政府据约指出：“查中俄条约所载，俄人于天山南北暂免纳税，系专指贸易而言。……若牧放牲畜之草场税与种地应纳粮税，均系就地征收，同在国家地亩正供之内，未可任意豁免”^③。沙俄自知理亏，但仍然多方狡辩，直至一九一六年，才不得不同意俄国商民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牧放牲畜应缴纳牧场税^④。

此外，沙俄还违反《中俄伊犁条约》及所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关于俄商从天津、通州等处贩运土货（中国货物）回国，应按规定的路线、卡伦行走，且“沿途不得销售”等规定，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非法沿途销售土货，牟取暴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一九〇六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使俄商得以直接从中国内地购买茶叶，假道塔城、伊犁运往俄国。章程

① 《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收驻俄刘公使电》；《民国四年三月十二日收俄库使节略》。

② 《民国四年八月十二日收俄使馆节略》。

③ 《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俄库使照会》。

④ 《民国五年三月十二日收新疆巡按使咨陈》。

明文规定：“经过中国地面，不准俄商偷卖”。并规定：俄商“预出押款，存于地方官”，“倘沿途有私卖情事，按照条约……除将茶觔充公外，并中俄局所存一分俄例税，归中国公收”^①。但事实上，俄商往往违反此章程，沿途销售。一经查获，沙俄领事则百般庇护，使中国政府不能按上述规定执行，“护送”出国了事。

由于沙俄积极推行对中国西北边疆经济掠夺政策，自一八九五年后，它在这里的贸易急剧上升，俄商和俄国洋行几乎遍于各地，逐渐垄断了这里的商品市场。

这段时间，俄商成倍地涌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特别是沙俄资本家开设的洋行（如“天兴”、“仁忠信”、“德盛”、“德和”、“茂升”、“吉利”、“大力”等）已深入到新疆各重要城镇，资本从数十万到百万卢布以上。仅乌鲁木齐一地，一八九八年还只有俄国商店三、四家，俄商二百多人，到一九〇七年商店增至三十余家，俄商达八百余人^②。沙俄洋行，一八九五年前只有三家，到一九〇八年增至八家。又如奇台县，一九〇五年前这里没有沙俄洋行，到一九〇七年先后有德盛、大盛、吉利、德和、义和等五家洋行，每家洋行雇工多人^③。塔城在一八九五年有俄商一百零八户，到一九〇九年增加到二百多户。许多沙俄洋行还在新疆各处设置分行，如德盛洋行在奇台、焉耆、疏附、库尔勒、哈密等地均有分行。据一九一三年前后中国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362—364页。

② 《新疆图志》，第57卷，交涉五，第7页。

③ 《新疆省奇台县造贲中华民国三年外人在内地经商或传教各项表》。

资料记载：当时俄商在新疆地区活动的人数达万余人^①。

这些俄商，有的是经营大宗进出口贸易，在各地开设铺面，既销售商品，又经营收购原料的“巨商”，上述洋行基本属于这一类。有的俄商是从中国内地或新疆地区收购原料产品，然后卖与俄国工厂主。而为数众多的是将各城镇俄国大商人或洋行的货物运到各城乡零售的商贩^②。各种类型的俄商从城市到穷乡僻壤，足迹遍于天山南北，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

随着俄商、洋行的增加，俄国商品大量销售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据俄国人极不完全的统计，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四年，沙俄输入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货物由价值三百七十二万四千卢布增加到一千一百零五万六千卢布，几乎增长了二倍。同一时期，从新疆输出到沙俄的货物，更增长了二点七倍，其中牲畜从五十六万五千卢布，增加到一百六十九万七千卢布；羊毛从一千四百六十七吨，增加到六千零八十七吨；毛皮从六百二十一吨，增加到二千四百七十五吨^③。又如，伊犁地区沙俄商品输入总额：一九〇四年是一百五十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卢布，一九一三年增至二百三十万卢布。喀什噶尔地区，一九〇二年是一百八十九万九千六百八十卢布，一九一三年增至三百五十万卢布。乌鲁木齐地区，一九〇三年是七十七万三

① 《新疆之现状》，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苏莘：《论新疆边防》，载《地学杂志》，1913年第6期。

② 参看《俄国领事商务报告之发现》，载《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

③ 《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62、167页。

千八百九十九卢布，一九一三年骤增至二百七十万卢布^①。这些统计数字虽然很不完全，很不系统，但已足见沙俄商品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大量推销的情况了。

享有各种经济特权的沙俄商人，在沙皇政府的鼓励和领事的庇护下，他们打击中国商人，排挤其它国家的商人，逐渐取得了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独占地位。到二十世纪头十几年，原由中国内地运至新疆地区的砂糖、陶磁器皿等商品，均为俄制品所代替。阿尔泰、伊犁、塔城等地各族人民所用的布匹、器皿，都是俄货^②。南疆喀什噶尔地区，这一时期英国从印度输入的商品，同样受到俄国商品的排挤。如早年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天鹅绒，以及其它便宜的棉织品，也无能与俄国布匹竞争了。据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五日在新疆从事“考察”的法国人伯希和给巴黎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塔什特的报告说，一九〇四年喀什道与沙俄的输出、入总值为一千二百五十七万马克。同年喀什道与英印贸易的输出、入总值为三百六十一万五千马克。俄、英在中国喀什道贸易总额之比为三点五比一^③。总的说来，新疆外货输入，沙俄占百分之八、九十^④。中国土货也以输往沙俄为主，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这种情况，就连鲍戈亚夫连斯基也承认，这一时期

① 参看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9章；克拉未息夫著，王正旺译：《中国西北部经济状况》，第183页。

② 《民立报》，1911年5月25日；《时报》宣统元年四月初九日。

③ 转见马丁·哈特曼：《中国土耳其斯坦》，1908年哈雷出版，第31—32页，第62—64页。

④ 苏莘：《论新疆边防》，载《地学杂志》，1913年第6期。

“从中国西部向俄国境内的出口贸易和这个地区的进口贸易，主要是掌握在俄国人的手里”^①。

俄国商人、洋行还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如他们凭借着对这里贸易垄断的地位，操纵市场，任意抬高俄国商品价格，压低中国土货价格，从中牟取暴利。沙俄洋行在新疆各城镇遍设行栈，就地压价收购当地原料产品，甚至通过赊贷的方式，“先借金与卖主，预定最廉之货价”，或“放债定货，既取本利，又复勒低货价”^②。如“初年举债一金（即银一两——引者），次年四月交二齿羊一头，届期不偿，罚息一倍，再罚则再倍”^③。当时一头二齿羊值银五两，一金交二齿羊一头，就是借一两还五两，利息为本金的四倍。俄商还利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牧民缺少货币的情况，采取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进行赊销，重利盘剥。当时，俄商用一尺洋布换牧民一张羊皮，一块茶砖换一只羊。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原是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沙俄的经济侵略，在这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手工业方面，原有的手工业部门遭到严重摧残，广大手工业者陷入破产失业的深渊。如孚远水西沟的铁矿，原来产量很高，由于俄铁输入日多，价廉为中国铁的三分之二，至一九〇六年，终于停办^④。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35页。

② 谢彬：《国防与外交》，第42页；杨赞绪：《新疆刍议》，第8页等。

③ 《新疆图志》，第28卷，实业一。

④ 《新疆图志》，第28卷，实业二。

金、铜、铁三者并产的巴尔噶逊，也因俄铁畅行，销路壅滞，厂矿关闭^①。在农牧业方面，这里的农牧产品日益纳入沙俄的市场范围。仅吐鲁番一地，自一九〇三年后，每年输出到俄国的棉花价值银五、六十万两。其它各地出产的干果、生丝、皮毛、牲畜等每年均大量输出到俄国。至于商业，由于俄商享有免税等特权，垄断了市场，操纵了贸易，致使中国商人纷纷破产，幸存者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总之，上述情况表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已经成为沙俄垄断下的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服从于沙俄帝国主义的需要。

沙俄帝国主义在向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输出商品，垄断市场的同时，还输出资本，操纵这里的金融和财政。

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资本输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银行，操纵这里的财政、金融和贸易。

如前所述，一八九五年后，沙俄控制下的华俄道胜银行，相继在中国各地设立分行^②。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喀什噶尔、伊犁、塔城和乌鲁木齐等地，沙俄也先后设立了道胜银行分行，办理存款、借贷、汇兑等业务，还非法发行大量纸币。

道胜银行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先后发行的纸币，有金卢布纸币、银两纸币及银元纸币三类，分伊犁、塔城、喀

① 钟广生：《新疆志稿》，第2卷，第47页。

② 一九一〇年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北方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但中国名称不变。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西北边疆发行的纸币

什噶尔及全新疆省通用等四种。用这种纸币不仅可以购买商品,甚至可以用来缴纳赋税。据现有资料表明,至一九一五年前后,上述纸币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共发行约五百万卢布。最初每一卢布纸币合中国银五钱。到一九〇二年后,卢布通行,俄商不用中国银两,凡购买货物必用卢布,于是一卢布价值涨到合华银八、九钱不等。形成了新疆地区,“卢布羌帖,盈溢闾阗。市民交易,非俄票不行;中国钱币寻废不用,彼贵如珠玉,而我贱于粪土”^①。有的地方,如塔城竟连政府收入也以俄币为计算标准^②。这样,沙俄通过道胜银行分行控制了新疆地区

① 钟广生:《新疆交涉志要》,第5卷,通商。

② 林竟:《新疆纪略》,商业,第29页。

的金融市场,控制通货,左右货币兑换率的涨落,“其贱入贵出,独握操奇计赢之券”^①。《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一书的作者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华俄银行就打算把做中国货币和卢布的生意作为俄国控制这个省(指新疆省——引者)经济的战略的一部分”^②。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俄币贬值,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流通的沙俄纸币的价格一落千丈。当时,华商和一般人民手中存蓄俄币甚多,道胜银行竟拒绝兑换现金。当地中国政府多次同该行及沙俄领事交涉,沙俄一味推诿,迟迟不予解决,致使中国商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如伊犁华俄道胜银行分行“一面推诿,谓停战六个月一律兑现,一面暗中设法收回”,致使“该行以不兑换纸币吸收中国之土货及现金,数年来获利甚大,而华商存储使用价值日跌亏损无穷。伊犁大小商号无不受其影响”^③。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一种变相的掠夺。

垄断汇兑,是华俄道胜银行分行控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财政、金融的另一手段。新疆中俄贸易初期的汇兑关系,无论是俄商由国内汇银至新疆,或中国商人汇银至俄国,都由两国商人互相拨兑。而新疆与关内张家口、京津等地的汇兑,则由中国票号及各商号经手^④。随着

① 《民立报》1911年5月27日,“俄银行之发达”。

②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32页。

③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财政部、币制局咨文》。

④ 《新疆外交报告表》,商务,第29页;《俄国领事商务报告之发现》,载《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

沙俄经济侵略的深入，原来俄商在新疆各地开设的洋行，就逐渐纳入俄国金融资本的范围，开始兼营关内各处及国外的汇兑^①。这样，新疆汇兑主权丧失，中国票号及各商号汇兑业务一部分被夺取。到民国初年，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就几乎垄断了新疆地区的汇兑。

道胜银行利用汇款时必须将中国新疆货币兑换成俄国卢布的机会，抬高卢布价格；而受款人在内地道胜银行取款时，该行又借口电报未至，有意拖延时日，“此中汇水（即汇费——引者）及无形损失，岁在百万以上”^②。在廉价换得新疆纸币后，道胜银行分行又转贷给俄商，由他们向当地各族人民放债，或掠取土货出口，进行残酷剥削^③。

道胜银行分行和俄商往往还利用中国新疆纸币的贬值，大肆贱价收揽，然后向当地官钱局索兑现金，从中渔利。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由于伊犁地方当局大量发行伊犁官票（纸币），引起市场上纸币严重贬值。当时，一卢布可以换伊犁官票一至二两。俄商乘机大量收揽伊犁官票。然后，向伊犁官钱局索兑现银。如宁远俄商铁里巴依（巴依意为财主）用车载伊犁官票三十余万两至官钱局，要求兑换现银。官钱局无银可兑，遂被迫缓期付款，每月按一分出息。过了一个多月，国内协饷到达伊

① 蒋君章：《新疆经营论》，第 77 页。

② 林克：《新疆纪略》，商业，第 28 页。

③ 同上。

犁。官钱局即按官票本利付款，铁里巴依从中勒索到巨额利润。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间，道胜银行伊犁分行和一些俄商又以一卢布可换伊犁官票三、四两的比价，收揽伊犁官票四十七万余两，要求兑现。伊犁官钱局一时无银可兑，遂与道胜银行、俄商协议：由新疆省司库拨还新疆省官票。每新疆官票一两抵伊犁官钱一两三钱。而当时市场上，伊犁官票二两六、七钱才能换新疆官票一两。也就是说，“俄人交伊票一两，即可赢余利银一两”^①。一九一三年七月，新疆当局经多次交涉无效，被迫全数将伊犁官票收回。可是，贪得无厌的沙俄又通过乌鲁木齐总领事照会新疆当局，说什么伊犁道胜银行分行以为，中国归还的新疆官票贬值，一百七十五两才能换俄币一百卢布，俄商受亏，应再付加水亏银十二万六千两。并且还要求新疆当局收回已付新疆官票，以和田黄金归还。对这一无耻的新勒索，新疆当局立即回照，严词拒绝^②。沙俄通过道胜银行利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纸币不统一和各地发行的差价，巧取豪夺，事实上操纵了这里的财政和金融。

此外，道胜银行分行还依仗它的政治、经济特权和雄厚的资本，直接经营大宗进出口贸易，通过办理期票贴现，定购商品，投资入股等办法，逐渐垄断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贸易。

^① 《民国外交部公函》，二年商字第二一七号，附《照录新疆杨都督电》（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② 《民国三年七月三十日杨增新致财政部咨陈》。

道胜银行分行采用贷款给俄商，或直接投资入洋行等办法，逐渐将遍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俄商、洋行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许多洋行实际上已变成道胜银行的一个商业机构。正如当时新疆都督杨增新所说：“查该行向违银行通例，于银行业务之外，兼营贩卖。贩卖土货，及各项商行为副业，垄断中商利权，中民蓄忿已深”^①。该行还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订购商品，或免税转售俄商，或直接售与当地居民。如南疆一度急需棉籽和蚕子，该行即向美国订购，按上述方式出售^②，以牟取暴利，操纵市场。

以贷款为名，行高利贷之实，是道胜银行分行扼杀、掠夺中国工商业的又一手段。据当时中国报纸揭露：“该行放债，物产坐抵，而常年且五分行息。如届期不偿或见息尾，即将物产扣抵。华商之困，实俄银行之贪狡致之也”^③。

这样，道胜银行分行及其控制的洋行、俄商，既排挤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工商业，又以借贷等方式加以扼杀，致使当地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

（二）控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交通运输和邮政事业。

沙俄帝国主义利用它攫取的特权，逐渐控制了这里的内河航行和公路运输。一九一二年，沙俄从阿尔泰办

① 《补过斋文牍》，三编，第6卷，“外交”下。

②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46—247页。

③ 《民立报》1911年5月27日，《俄银行之发达》。

事大臣帕勒塔手中，非法攫取了在布尔津河通航和建筑码头、行栈的特权，控制了喀喇额尔齐斯河的航运。沙俄一家名为“希望”的运输公司在塔城、宁远、乌鲁木齐均设置了办事处，办理商品货物的运输业务^①。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沙俄一直企图对伊犁河航运进行控制。它曾通过各种手段，妄图实现这一目的，但均未得逞。一九一四年，它又在中国伊犁河“栽插标记，实行测量，地方官不能阻止。”可见，“俄人于伊犁行航权利，未尝一日去诸怀”^②。

沙俄还于一九〇六年强迫喀什噶尔道尹，同意修筑从中俄边境的图鲁噶尔特山口到喀什的道路，并于同年底签订合同，规定由道胜银行分行贷款二万卢布，将来在道路通过税中扣除。这条道路的修筑，使道胜银行垄断了从俄国到喀什噶尔间所有的货物、邮件和旅客的运输^③。

在乌鲁木齐、塔城、伊犁、喀什噶尔、承化寺等地，沙俄先后非法设立邮局，办理邮寄、通讯等业务，每年收入达十万卢布以上^④。在当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邮政事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沙俄几乎垄断了这里的邮政。同时，沙俄还企图由俄国的奥什、伊尔克什坦架设电线至喀什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 279 页。

② 《补过斋文牍》甲集上，第 24 页。

③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 147 页。

④ 钟广生：《新疆志稿》，第 3 卷，第 89 页。

噶尔^①。

(三) 经营工业企业,利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掠夺。

工业投资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一种方式。二十世纪初,沙俄除继续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经营一些完全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工业,如羊毛的洗涮、打包等而外,还为了便利掠夺原料和劳力,在伊犁、和田等地相继开设工厂,经营制毛、制皮、制粉,以及制造毛毯、绸缎工业。

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地下埋藏的丰富矿产,沙俄侵略者更是垂涎已久。它根据不断潜入这里的间谍收集的大量情报,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掠夺。一八九九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允许它与新疆当局合办塔城金矿,各出一半资本。该矿开工五年后,由于亏本过多,宣布停办^②。一九〇七年,喀什噶尔道尹袁鸿祐组织商人开采和田附近金矿,沙俄又乘机派人“钻了进来,监管矿山的工作”^③。一九一二年,又有沙俄企业主西罗特金和尤尔达舍夫在沙俄伊犁领事的支持下,妄图利用当地财政困难,以二百万卢布的贷款,夺取开发伊犁地区矿山的租让权,成立矿

① 尽管沙俄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用撤离增驻喀什噶尔一千多名侵略军为条件,迫使中国政府同意它架设伊尔克什坦至喀什的电线,但均遭拒绝。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中俄双方签订了《伊尔克斯唐中俄接线条款》六条,规定“中国自行建设由喀什噶尔设线至中俄交界之伊尔克斯唐地方,与俄国电线衔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974—975页)

② 《饶应祺奏稿》,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日;《清德宗实录》,第518卷,第16页等。

③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53页。

务公司。后因中国政府的反对，未能得逞^①。

还应当指出，沙俄帝国主义在向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推销商品、输出资本的过程中，培植了一批买办。沙俄利用买办贱价收购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原料产品，推销俄国商品。而买办则打着俄商的招牌，闯关漏税，获取非法暴利。如伊犁华商玉山巴依，作为沙俄的买办，经常将贱价套购的几万只羊，运往俄国。事实上，“俄商在新（指新疆——引者）收买土货，多系假手华商，鲜有直接前往乡间收取者”^②。这些代俄商收买土货的华商，有的就是沙俄的买办。又如，一九〇三年，有一自称阿不多买勒的伊犁俄商来到哈密，用俄人资本开设德盛洋行。不久，俄人又将货物暗交哈密一华商尼牙孜承办。尼牙孜仍在自己商店营业，明为与阿不多买勒合伙，实则是借此名义企图免税。他们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垄断了当地羊皮、皮货的贸易，而且平时趾高气扬，“意在压倒一切，欲使人畏之，以遂其垄断罔利之计”^③。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沙俄帝国主义操纵和垄断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命脉，对这里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使这里半殖民地化进一步

① 《补过斋文牍》壬集上，第21页；《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3辑，第1卷，第304页。

② 谢彬：《新疆游记》，第381页。

③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新疆省税务总局移请新疆镇迪道兵备兼按察使事》。

加深。

第四节 策勒事件和西北边疆各族 人民抗俄斗争的高涨

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第五九五页）自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以来，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前赴后继，一浪高过一浪。辛亥革命前后，面对沙俄帝国主义日益疯狂的侵略，西北各族人民进一步觉醒，反抗侵略者的斗争烈火，愈烧愈旺。策勒事件就是当时西北各族人民抗俄斗争高涨的标志。

策勒事件是中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团结斗争，反抗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反帝运动；也是沙俄帝国主义进行破坏捣乱，妄图搞分裂颠覆的又一次可耻纪录。

前面已经叙及，辛亥革命时期，沙俄为了乘机实现其吞并中国西北边疆的野心，派遣侵略军侵入南疆喀什噶尔，并指示该地领事大肆非法发展俄侨，妄图搞颠覆分裂活动。策勒事件就正是南疆于田地区革命群众对沙俄上述侵略活动的有力反击。

早在一九一〇年五月，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索柯夫

就非法在于田县设置了俄国乡约^①。以后,又在策勒、玉陇哈什等地设置俄国乡约。索柯夫通过这些乡约,收集情报,发展俄侨,竭力扩张沙俄在这里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前夕,索柯夫又专门派遣间谍色依提以俄商的身份潜入于田、策勒一带,进行颠覆分裂活动。

色依提原是乌兹别克人,生于浩罕的马尔格兰,是沙俄一手训练出来的间谍。他到了策勒之后,指挥附近的俄国乡约,以伪造证件、家谱,欺骗收买,威胁恫吓等卑劣手段,强迫当地群众加入俄国国籍。甚至还公然煽动:投俄之后,中国官吏再不能管束,粮税亦不须完纳,渠水可任意引用。仅在策勒一地,色依提就非法发展了一百多个“俄侨”,并私置武器,与当地政府对抗。色依提一伙霸占了当地水源,垄断了当地市场,残酷盘剥当地人民。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当地群众稍有不满意,即被他们关锁幽禁,任意拷打。更恶毒的是,色依提还开办学校,自任总管,强迫策勒人民送子女上学,向入学儿童进行殖民主义教育,煽动他们的父兄脱离中国,投靠沙俄。

色依提一伙分裂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以苏朴尔格为首的策勒

(1) 据现存的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索柯夫《致于田县全体俄籍侨民的命令》中说:“特致此令知照。你们经商人员曾给总领事馆送来你们大家推举出来的两位适合担任阿克沙噶尔(即乡约——引者)的人选的报告书,一位是马尔格兰籍人依布拉欣江·阿洪巴依,另一位是哈希木霍加。你们请求确定其中一人为你们的阿克沙噶尔。有关此事,总领事根据你们的要求,指定依布拉欣江·阿洪巴依为阿克沙噶尔,哈希木霍加为其副手。依布拉欣江如有事外出,那么哈希木霍加履行阿克沙噶尔职务。”

群众同色依提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一二年二月，苏朴尔格等策勒群众到于田县控告色依提颠覆分裂中国的种种罪行。色依提得知后，竟然带领一伙“俄侨”，骑马闯入县衙。当时，于田县官员在民众的支持下，扣押了色依提。沙俄领事出面干涉，将色依提传调喀什噶尔，保护在领事馆内，随后又偷偷将他释放。五月，色依提返回策勒时，他的爪牙们在村口列队欢迎，鸣枪三响，到达家门时，又鸣枪三响，向当地群众示威^①。同时，正在于田一带阴谋活动的沙俄驻喀什噶尔副领事贝伦斯，召见了色依提，鼓励和策动他以“交战的姿态”继续顽抗。色依提的气焰更为嚣张，公然对当地群众进行报复和迫害。

六月中旬，色依提又毒打群众多人，更加激起群众的公愤。以苏朴尔格为首的策勒群众向当时已经掌握了喀什噶尔地区政权的哥老会揭露和控告贝伦斯、色依提一系列欺压中国人民、蓄意挑衅的罪行。喀什噶尔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坚决支持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决定派参将熊高升和助手赵大胜赴于田，处理色依提一案。熊高升等人的到来，使当地群众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激情更加高涨。群众坚决要求严惩色依提这个作恶多端的沙俄间谍。在群众的正义要求下，熊高升派五名士兵到策勒，传调色依提。

色依提得知熊高升到达于田的消息后，按照贝伦斯的指示，摆出了“交战的姿态”，纠集他的党徒和被迫加入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89页。

俄籍的一百多人，在他岳父阿布列孜卡热的高大房院里^①。在房顶上悬挂沙俄的国旗，叫嚣要“和熊高升开战”^②。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这座房院。六月二十四日，即在沙俄增兵喀什噶尔后第三天，熊高升到了策勒，立即三次传讯色依提，色依提顽抗不到。熊高升派军士周树棠带十名士兵再去传讯。色依提开枪打死周树棠等士兵二人及群众数人。这一血腥暴行更激起了群众的怒火，他们“呼声若雷”，“奋勇争先”，进行反击，当场击毙几个暴徒^③。少数暴徒仍在顽抗，愤怒的群众烧了色依提等人盘踞的房院。色依提及其亲随挖开后墙，狼狈逃去，胁从的“俄侨”大部分离开了现场，一部分被烧死^④。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策勒事件”。

事实表明，策勒事件完全是沙俄侵略者一手造成的。这连当时侵入喀什噶尔的沙俄军队指挥官鲍勃罗夫也供认不讳，他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想要把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指南疆地区——引者）变成沙皇帝国的一个省，由他任总督。因此，他才成百的，不，简直是成千地登记伪造的俄国侨民，所以才有了策勒事件”^⑤。

① 辛亥革命前夕，色依提窜到于田后，按照沙俄领事馆的旨意，娶了策勒大商人阿布列孜卡热的女儿为妻。以后，他即以岳父家为据点，进行颠覆分裂活动。

②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90—191页。

③ 《喀什噶尔和田州属俄人被戕案》（民国元年八月）。

④ 沙俄照会中国政府曾诡称：“俄人被焚及枪毙者已查出有七十六名之多”。据中国政府调查，实际死二十九名。（民国元年八月《喀什噶尔和田州属俄人被戕案》）

⑤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97页。

这次事件,显示了深受沙俄侵略、压迫的中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决心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南疆各族人民热烈拥护和支持熊高升,熊高升所到之处受到各族群众的盛大欢迎,皮山、叶城、莎车各处,派兵迎接,并施放礼炮^①。

事件发生后,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索柯夫叫嚷要带二百名哥萨克骑兵去进行报复。沙俄国内也掀起反华的歇斯底里狂叫。七月中旬,沙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赔礼、惩凶、抚恤被杀“俄人”家属等三项无理要求。并提出由俄国派遣官员到策勒进行调查。

当时,袁世凯卖国政府在沙俄的恐吓、威胁下,不仅不抗议和谴责沙俄领事的罪行;反而按照沙俄旨意,电令新疆都督杨增新从严惩办所谓“罪犯”。八月间又一再指示杨增新,要他责令喀什噶尔提督、道尹按照沙俄提出的三项要求,尽先向沙俄领事道歉;将和田知州唐允中、于田县令沈永清撤职,将熊高升、赵大胜等“扣留查办”。同时,知照沙俄领事派遣人员,会同中国官员前往于田查办^②。

但是,沙俄侵略者并不满足,它既拒绝派员会同查办,也反对由喀什道尹主持审判。九月,沙俄竟撇开中国政府,由贝伦斯亲自出马,带领一名哥萨克少尉和二十名兵士,再次窜到于田、策勒等处。在于田等地,贝伦斯强迫当地官员“审判”了两名反对色依提的民众,销毁了不

① 《喀什噶尔和田州属俄人被戕案》(民国元年九月)。

② 同上。

少色依提的罪证^①。同时,还以“事件在喀什解决”为借口,欲将苏朴尔格等二十多人以及两名当地官员押解到喀什噶尔。一千多名当地民众包围了贝伦斯,与他展开了说理斗争。随后,许多民众跟着被沙俄带走的苏朴尔格等人一同到了喀什,决心与沙俄侵略者斗争到底。

在沙俄侵略者要挟和威逼下,新疆都督杨增新竟下令南疆各级官吏向沙俄侵略者妥协,并将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和所率新军调离喀什噶尔^②。这样,就严重地削弱了南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力量。

经沙俄领事一番精心策划之后,一九一三年二月下旬,策勒事件的“审判”在喀什噶尔开庭。审判由喀什道尹、提督和喀什知府主持,二十六名“俄侨”原告由索柯夫监护出庭,被告是熊高升、唐允中及苏朴尔格等七十多名策勒群众。由于索柯夫“难以编造出特效的罪状”,因此,审判一开始,他就陷入尴尬的境地^③。苏朴尔格在法庭上愤怒揭发了沙俄指使色依提分裂中国的罪行。他说:“……色依提不是商人,是间谍。他采用欺骗、收买、体罚、威逼等手段,硬把策勒的中国人说成是俄侨;他指派阿克萨哈尔,打出俄国国旗,霸占水源,干涉地方行政,宣称‘安集延人不纳税’。这些所作所为,不正是色依提想要吞并我们吗!”^④苏朴尔格的揭发,使索柯夫狼狈不堪。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92、198页。

② 《补过斋文牍》乙集二,第38页。

③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18页。

④ 调查资料。

索柯夫气急败坏，蛮横指责“策勒的被告们否认罪状”，叫嚷他要“亲手掌握审判”^①。由于沙俄领事的干扰，策勒事件的审判无形中断。

一九一三年五月，沙俄凶相毕露，公然以增兵喀什噶尔相威胁。五月二十三日，沙俄以调防为名，又增派三百多名步、骑兵入侵喀什噶尔，使该地俄国侵略军达到一千多名。在军事威胁的同时，沙俄驻华公使又利用袁世凯忙于对付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的机会，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免去王炳坤的喀什道尹职务和务使整个策勒事件达到“满意解决”的照会。袁世凯无耻地立即满足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指定新任喀什噶尔提督兼外交特派员杨赞绪与俄领事处理策勒事件，免去了王炳坤道尹职务。索柯夫和杨赞绪关于策勒事件的协议于八月达成。协议规定：唐允中、沈永清被罚款，中国政府赔偿抚恤费银七万两；熊高升判处十二年徒刑，苏朴尔格等被控放火烧了色依提岳父的家宅，分别判处徒刑；“俄侨”的国籍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等。至此，交涉经年的策勒案件，由于袁世凯反动政权的屈辱妥协，宣告结束。

从策勒事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中，再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这场斗争也充分地显示了中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英勇反抗沙俄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这场斗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在策勒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18页。

事件的推动下，抗俄斗争的烈火迅速地燃遍了整个天山南北。

在南疆地区，由于哥老会的积极支持，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日益高涨。沙俄在这里的爪牙——俄国乡约和一些俄侨再也不敢象往日那样作威作福，任意欺压中国人民。沙俄领事公开强迫中国人民加入俄籍的非法活动，也有所收敛。因策勒事件被判刑的熊高升，仍以哥老会领袖著称，鼓舞着喀什噶尔地区人民的抗俄斗争^①。一九一五年，策勒事件被判处徒刑的部分群众，刑满回策勒，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他们同当地群众一道，继续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时，南疆一些地区被骗入俄籍的中国人，不顾沙俄乡约的威胁，纷纷起来揭发沙俄的罪行，要求恢复中国国籍。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皮山县呈新疆外交公署关于县民而增木恳请复籍的报告就是其中一例。报告中写道：“案据桑株巴恩哈庄民而增木报案供称：‘户民世居桑株，父名古巴下阿吉，实系中国百姓，置有田地房屋。民国元年冻巴哈庄民亚艾提毛拉捏称户民系伊兄弟，父名叫恰瓦阿吉，在俄商约吉里力处领票一张，户民坚不肯要，该亚艾提毛拉强估给与户民。……户民被人强估冒领通商票，实属不合，今悔心已极，仍愿缴票复回中籍’。”^②

在阿尔泰地区，面对沙俄侵略者的猖狂侵略，各族人民掀起了英勇的抗俄斗争。一九一三年七月，沙俄指挥

①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合著：《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35页。

② 《民国四年十二月皮山县详为据实报明恳请照会复籍事》。

外蒙古傀儡军向阿尔泰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在察罕通古一带两次给来犯的外蒙古傀儡军以沉重打击。当时，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中国军队。旧土尔扈特五部互相联合，添派军队，自行筹备饷糈，准备参战^①。不堪沙俄、外蒙古傀儡军欺压的许多原属阿尔泰或科布多的蒙古爱国王公和人民，纷纷挣脱外蒙古傀儡军的控制，率部迁入新疆。如新土尔扈特亲王密西克栋固鲁布于一九一三年五月率部数千南徙到孚远县。和硕特公达木鼎、策德恩，新土尔扈特副盟长特玛克苏勒扎布等也纷纷向中国驻军投诚，并积极协助抗击来犯的外蒙古傀儡军^②。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沙俄企图假手外蒙古傀儡军吞并阿尔泰地区的阴谋破产了。

一九一三年八月，承化寺中国驻军因该处沙俄领事的无理逞凶，奋起自卫，刺伤俄国领事。一九一三年十月，承化寺附近各族人民又自动组织起来，围攻盗伐林木的沙俄侵略军，伤俄兵三人，迫使侵略军“脱命逃往领署”^③。一九一五年五月，沙俄侵略军和殖民者在阿尔泰冲呼尔一带，再次强占水渠，驱逐当地中国人民。当地中国驻军和人民忍无可忍，“成群持械”与侵略者说理。沙俄侵略军首先开枪打死中国民众三人，重伤五人。愤怒已极的群众进行反击，当场打伤俄人六名^④。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西北各族人民通过各种形式

① 《申报》1913年5月9日。

② 《补过斋文牍》戊集四，第12—13页，第25—27页。

③ 《民国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承化寺俄兵案》。

④ 《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冲呼尔河中俄兵民冲突案》。

掀起了抗俄的英勇斗争，遏止了沙俄帝国主义妄图乘机吞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阴谋。

毛主席指出：“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沙皇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四九九页）。尽管沙俄帝国主义到处伸手，疯狂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弱小国家的领土，镇压各国革命；疯狂侵略中国，妄图侵占一直到长城脚下的中国领土。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它垂死前的挣扎而已。一九一四年爆发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一九一七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埋葬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沙俄的罪恶统治，也宣告了老沙皇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的破产。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声明，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这些国家享有的特权，准备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正式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接着，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又发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

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原则，特别强调和明确地指出：“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①。

一九二三年九月四日，苏维埃政府又发表了《苏联驻华代表卡拉罕对报界的声明》，即第三次对华宣言，明确地阐述了前两个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这个声明说：“沙皇俄国把征服中国领土，征服与俄国边界接壤的领土上的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任务。为此不择手段依靠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以推行自己的政策”。“俄国的工农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同各国人民的关系中现正在制定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它利益的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这样”^②。

苏维埃政府几次对华宣言，深刻地揭露了沙皇政府侵略中国的罪行，庄严宣告废除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一切中国领土，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和苏维埃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议定“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月内举行会

① 《苏中关系 1917—1954》(文件汇编)，第 52 页。

② 《中国年鉴》，1924 年天津出版，第 865 页。

议”，“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同时“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①。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实现。

^①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1962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422—424页。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 郭璞撰，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
- 孔晁注：《逸周书》
- 郭璞注：《穆天子传》
- 徐文靖撰：《禹贡会笺》
- 司马迁撰：《史记》
- 班固撰：《汉书》
- 王先谦撰：《汉书补注》
- 徐松撰：《汉书西域传补注》
- 范曄撰：《后汉书》
- 陈寿撰：《三国志》
- 房玄龄等撰：《晋书》
- 魏收撰：《魏书》
- 李延寿撰：《北史》
- 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
- 刘昫等撰：《旧唐书》
-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
-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
- 脱脱等撰：《宋史》
- 脱脱等撰：《辽史》
- 脱脱等撰：《金史》
- 宋濂等撰：《元史》
- 《元朝秘史》
- 张廷玉等撰：《明史》
-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 释道宣撰：《广弘明集》
- 徐坚撰：《初学集》
- 杜佑撰：《通典》
-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
- 曹寅等编：《全唐诗》
- 董诰等编：《全唐文》
- 王欽若等编：《册府元龟》
- 耶律楚材撰：《西游录》
- 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
-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 姚广孝等纂：《明实录》
- 《清实录》
- 金毓黻编：《宣统正记》
-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 《清朝通志》
- 来保、托津等撰：嘉庆朝《大清会典》
- 《理藩院则例》
- 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 温达等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 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
- 曹振鏞等撰：《平定回疆剿擒逆

裔方略》
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
魏源撰：《圣武记》
魏光燾撰：《勘定新疆记》
何秋涛撰：《朔方备乘》
洪亮吉撰：《乾隆府州厅县图志》
《嘉庆重修一统志》
傅恒等撰：《皇舆西域图志》
七十一(椿园)撰：《西域闻见录》
松筠撰：《西陲总统事略》
松筠等撰：《新疆识略》
永保撰：《塔尔巴哈台事宜》
和瑛撰：《三州辑略》
和宁撰：《回疆通志》
祁韵士撰：《西陲要略》
王树枏等撰：《新疆图志》
钟广生撰：《新疆志稿》
杨赞绪撰：《新疆台议》
杨赞绪、汪日昌同编：《现在的新疆》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
蒋君章著：《新疆经营论》
谢彬著：《新疆游记》
林竞著：《新疆纪略》
刘道仁著：《查办蒙古伊犁事宜》
富俊撰：《科布多政务总册》
张穆撰：《蒙古游牧记》

齐召南撰：《水道提纲》
徐松撰：《西域水道记》
那彦成撰，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
萨迎阿撰：《新疆龙堆奏议》
龚自珍撰：《定盦全集》
李鸿章撰：《李文忠公全书》
左宗棠撰：《左文襄公奏稿》
薛福成撰：《庸庵全集》
瑞洵撰：《散木居奏稿》
曾纪泽撰：《曾惠敏公遗集》
邵友濂撰：《邵友濂文稿》
饶应祺撰：《饶应祺存稿》
马广撰：《伊犁将军马广奏稿》
许景澄撰：《许文肃公遗稿》
许景澄撰：《许竹笥先生出使函稿》
叶锡祺撰：《习坎斋文稿》
杨增新撰：《补过斋文牍》
王国维撰：《观堂集林》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
文庆、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
王彦威等辑:《清季外交史料》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
《中华民国政务司各国悬案选辑》
民国外交部文书科编:《中华民国外交部交涉节要》
谢彬著:《国防与外交》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西国近事汇编(1878—1880年)》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
刘彦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
献可著:《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
陈复光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新疆交涉公署外交研究所编辑:《新疆外交说明书》
新疆交涉公署外交研究所编辑:《新疆外交报告表》
钟镛著:《新疆交涉志要》

《新疆中俄界务汇编》
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
许景澄撰:《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
许景澄撰:《帕米尔图说》
钱洵撰:《中俄界约勘注》
邹代钧撰:《中俄界记》
玉井是博等著,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从考》
《克拉维约东使记》
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
林乐知著:《喀什噶尔略论》
克拉未息夫著,王正旺译:《中国西北部经济状况》
桑鸷藏著,杨鍊译:《张骞西征考》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
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

附 录 二

外文参考书目

(一) 俄文

Адрианов, А. В.

Очерки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Томск, 1904. (阿德里安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概况》, 1904年托木斯克出版。)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СПб., 1914. (《亚洲的俄罗斯》, 1914年圣彼得堡出版。)

Акишев, К. А.

Отчет о работе Илий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54 года.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т. 1, (Археология), Алма-Ата, 1956. (阿基谢夫:《1954年伊犁考古考察团工作报告》, 载苏联《民族志和考古学历史研究所著作集》, 第1卷(考古学), 1956年阿拉木图出版。)

Бабков, И.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службе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859-1875 г. СПб., 1912.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912年圣彼得堡出版。)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 1882年喀山出版。)

Баранов, А.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Харбин, 1913. (巴拉诺夫:《乌梁海问题》,1913年哈尔滨出版。)

Баранова, Ю.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есечени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из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в семиречье в 1881-1882 гг. «Труды Сектор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КазССР», 1959, т.1. (巴拉诺娃:《论1881—1882年穆斯林居民从伊犁迁移七河省问题》,载《哈萨克科学院东方学部著作集》,第1卷,1959年出版。)

Бартольд, В.В. т.2, Москва, 1963. (巴尔托里德:《巴尔托里德文集》,第2卷,1963年莫斯科出版。)

Бекмаханов, Е. Б.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к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57. (别克马哈诺夫:《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1957年莫斯科出版。)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Н.В.

Западный застенный Китай. СПб., 1906.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1906年圣彼得堡出版。)

Юрисдикция русских консулов в западном Китае и судеб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угучакского консульства. (鲍戈亚夫连斯基:《俄国领事在中国西部的裁判权及塔城领事馆的司法活动》。)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03. (帝俄《大百科全书》,1903年彼得堡出版。)

Буксгевден, А.

Пек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860 г. Порт-Артур, 1902.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1902年旅顺出版。)

Валиханов, Ч.

Очерки Джунгарии.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Алма-Ата, 1958. (瓦里汉诺夫:《准噶尔概况》,载《瓦里汉诺夫选集》,1958年阿拉木图出版。)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лма-Ата, 1961. (瓦里汉诺夫:《瓦里汉诺夫文集》,1961年阿拉木图出版。)

Витте, С. 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рлин, 1923. (维特:《维特回忆录》,1923年柏林出版。)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Алма-Ата, 1961.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1961年阿拉木图出版。)

Гатауллина, Л. М. и др.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607-1636. Москва, 1959. (曼塔乌里纳等:《俄蒙关系史资料(1607—1636)》,1959年莫斯科出版。)

Громбчевский, Б. Л.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на Памире. 1891.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1891年出版。)

Джамгерчинов, Б.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иргизии к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59. (佐姆戈尔捷诺夫:《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1959年莫斯科出版。)

Дмитриев, С. С. и др.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948. (德米特利耶夫等:《苏联历史文选》,1948年版。)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Берлин, 1909. («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回忆录》,1909年柏林出版。)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1635—1758). Москва, 1964.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964年莫斯科出版。)

Искандаров, Б. И.

Восточная Бухара и Памир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Душанбе, 1962.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1962年杜尚别出版。)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Алма-Ата, 1957. (《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史》(从远古到现代),1957年阿拉木图出版。)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ии. Фрунзе, 1963. (《吉尔吉斯史》,1963年伏龙芝出版。)

Кабо, Р.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Тувы.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34. (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Киселев, С. 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черепицы.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 3, 1959. (基谢列夫:《中国瓦当的历史》,载《苏联考古》杂志,1959年第3期。)

Костенко, Л. Ф.

Чжунгария. (科斯岑科:《准噶尔》。)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2, 3, 5, 34, 52, 53. (《红档》杂志,第2、3、5、34、52、53卷。)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Кашгария. СПб., 1879.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1879年圣彼得堡出版。)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1913.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圣彼得堡出版。)

Кызласов, Л. Р.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в 1953—1954 гг. «Труды Киргиз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Москва, 1959. (克兹拉索夫: «1953—1954 年对阿克别西姆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 载《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志考察团著作集》, 1959 年莫斯科出版。)

Лященко, П. И.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т. I и II, Москва, 1947—1948. (梁士琴科: «苏联国民经济史», 第 1、2 卷, 1947—1948 年莫斯科出版。)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М-Л., 1941. (米勒尔: «西伯利亚史», 1941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Милютин, Д. А.

Дневник. Москва, 1950. (米留金: «米留金日记», 1950 年莫斯科出版。)

Минцлов, С. Р.

Секретное поруче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рянхай), Рига (明茨洛夫: «秘密的使命»(乌梁海之行), 里加出版。)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1895. Москва, 1956. (纳罗契尼茨基: «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 (1860—1895)», 1956 年莫斯科出版。)

Островский, П. Е.

Значение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и дл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звестия ИРГО», т. 35, 1899. (奥斯特洛夫斯基: «乌梁海领土对南西伯利亚的意义», 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 1899 年第 35 卷。)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56. («苏联史纲»(十八世纪下半叶), 1956年莫斯科出版。)

Певцов, М.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ашгарию и Кунлунь. Москва, 1949. (别夫佐夫: «喀什噶尔、昆仑山旅行记», 1949年莫斯科出版。)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ерия 3.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 第三辑。)

Пясецкий, П. Я.

Неудач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итай (1874—1875). СПб., 1881. (皮谢茨基: «1874—1875年到中国不成功的考察», 1881年圣彼得堡出版。)

Рожкова, М.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с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ей (40—6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63. (洛日柯娃: «十九世纪40—60年代俄国同中亚的经济联系», 1963年莫斯科出版。)

Романов, Б. А.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895—1907). М-Л, 1955. (罗曼诺夫: «日俄战争外交史纲 (1895—1907)», 195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Семенов, П. 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янь-Шань в 1856—1857 гг. Москва, 1947. (谢苗诺夫: «1856—1857年天山游记», 1947年莫斯科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осква, 1957. (斯拉特科夫斯基: «苏中经济关系概要», 1957年莫斯科出版。)

Сосновский, Ю. 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итай 1874—1875 гг. Москва, 1883. (索思诺夫斯基: «1874—1875 年到中国的考察», 1883 年莫斯科出版。)

Тагеев, Б. Л.

В заоблачной стране. Москва, 1904. (塔格耶夫: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 1904 年莫斯科出版。)

Терентьев, М. А.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Пб., 1906. (捷连季耶夫: «征服中亚史», 1906 年圣彼得堡出版。)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др.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Т. I, 1969; Т. II, 1972. (齐赫文斯基等: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 第 1 卷, 1969 年; 第 2 卷, 1972 年, 莫斯科出版。)

Федоров, Д.

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 Ташкент, 1903. (费奥多罗夫: «伊犁地区军事统计概述试作», 1903 年塔什干出版。)

Халфин, Н. 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1857—1868). Москва, 1960. (哈尔芬: «俄国在中亚的政策 (1857—1868)», 1960 年莫斯科出版。)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 России (60—90-е годы XIX в.). Москва, 1965. (哈尔芬: «中亚归并于俄国(十九世纪 60—90 年代)», 1965 年莫斯科出版。)

Щукина, Н. М.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1955. (休基纳:《中亚地图是怎样形成的》,1955年莫斯科出版。)

Яковлева, П. Г.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Москва, 1958.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年莫斯科出版。)

(二) 英文

Baddeley, John F.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19.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1919年伦敦出版。)

Boulger, D. C.

The life of Yakoob Beg. London, 1878.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1878年伦敦出版。)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i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

Japan 1857—1859. (英国议会文件:《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日本的通讯》。)

Corzon, G. N. C.

The Pamirs and the Source of the Oxus. London, 1898. (寇松:《帕米尔和阿姆河河源》,1898年伦敦出版。)

Dallin, D. Y.

The Rise of Russia in Asia. N. Y., 1949. (达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1949年纽约出版。)

Hartmann, Martin

Chinesisch-Turkestan. Halle, 1908. (哈特曼:《中国土耳其斯坦》,1908年哈雷出版。)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Leiden, 1959. (查尔斯·

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 1959年来丁出版。)

Lansdell, Henry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1893. (兰斯代尔:《中国中亚细亚》,1893年伦敦出版。)

Through Central Asia. London, 1887. (兰斯代尔:《穿过中亚》,1887年伦敦出版。)

Lobanov-Rostovsky, A.

Russia and Asia. N. Y., 1933. (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1933年纽约出版。)

Prejevalsky, N.

From Kulja, across the Tien Shan to Lob-Nor. London, 1879. (普尔热瓦斯基:《从固尔扎越天山到罗布淖尔》, 1879年伦敦出版。)

Rosen, Baro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N. Y., 1922. (罗森:《四十年外交》,1922年纽约版。)

Schuyler, Eugene

Turkestan. London, 1876. (斯楚勒:《土耳其斯坦》,1876年伦敦出版。)

Siebert, B. de

Entente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1921. (西培脱:《协约国外交和世界》,1921年纽约和伦敦出版。)

Skrine, C. P. and Nightingel, P.

Macartney at Kashgar. London, 1973. (斯克林因,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973年伦敦出版。)

Skyine, F. H. & Rose, E. D.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1899. (斯克林,罗森:《亚洲

的心脏»,1899年伦敦出版。)

Terentyef, M. A.

Russia and England in Central Asia. Calcutta, 1876. (捷连季耶夫:《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细亚》,1876年加尔格答出版。)

(三) 法文

Levchine, A. de.

Description des Hordes et des Steppes des Kirghiz-Kazaks ou Kirghiz-Kaissaks. 1840.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1840年。)

(四) 日文

边宁格:

《现代蒙古》,1914年东京出版。

附 录 三

俄中人名对照表

А

Абдулла Каскинов 阿布杜
拉·卡斯金诺夫
Абрамов 阿布拉莫夫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亚历山
大·涅夫斯基
Арефий Незнаев 阿列菲·
涅兹纳耶夫

Б

Бабков, И. Ф. 巴布科夫
Бадмаев 巴德玛耶夫
Балицкий 巴利茨基
Баллюзек 巴留捷克
Белоголов, И. 贝洛戈洛夫
Белокуров 贝洛库罗夫
Бисеров 弼罗甫(今译:毕谢
洛夫)

Бобринский, А. 鲍勃林斯基
Богданович 博格达诺维奇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Н. В. 鲍戈
亚夫连斯基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鲍戈斯拉夫斯
基
Бржезицкий 勃尔热齐茨基
Буксгевден, А. 布克斯盖夫
登
Бухгольц, И. 布赫戈列兹
Бюцов, Е. К. 布策

В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瓦里汉诺
夫
Ванновский, Б. С. 万诺夫
斯基
Василий III 瓦西里三世
Венюков, М. И. 维纽科夫
Витте, С. Ю. 维特
Влангали, А. Е. 倭良嘎里
Власов 乌拉索夫

Вревский, А. Б. 弗列夫斯基

Г

Гагарин, М. П. 加加林
Гагарин, С. И. 加加林
Галкин 加尔金
Гасфорд, Г. Х. 加斯弗尔德
Гейден 格依金
Гирс 格尔斯
Глинка 格林卡
Головин, Петр 彼得·戈洛文

Головкин 戈洛夫金
Горчаков, А. М. 哥尔查科夫
Горчаков, П. Д. 戈尔恰可夫
Громбчевский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Г.Е. 格鲁姆·格尔日马依洛
Гутковский 古特科夫斯基

Д

Даниил, А. 丹尼尔
Дюгамель, А. И. 杜加麦利

Е

Екатерина II 叶卡特林娜二

世

Еленский 叶连斯基
Ермак, Т. 叶尔马克

Ж

Жомини, А. 热梅尼

З

Залеский 扎列斯基
Замань-бек 扎曼伯克
Захаров, И. И. 扎哈罗夫
Зеленов 泽列诺夫
Зиновьев 季诺维耶夫

И

Иван IV 伊凡四世
Игнатьев, Н. П. 伊格纳提耶夫
Измайлов 伊兹迈洛夫
Ионов, М. 杨诺夫

К

Казнаков, А. Н. 卡兹纳科夫
Калмаков, И. 卡尔马科夫
Каменский 卡缅斯基
Капнист 卡普尼斯特
Карбинчев 卡尔宾切夫
Касини 喀西尼
Катанов, Н. Ф. 卡塔诺夫

Каульбарс, А. В. 考尔巴斯
(又译:考利巴尔斯)

Кауфман, К. П. 考夫曼

Кибирев Григорий 基比列
夫

Киндерман 金杰尔曼

Князев 克尼亚泽夫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 П. 科瓦列
夫斯基

Козлов, П. К. 科兹洛夫

Козмин 科兹明

Колотовкин 科洛托夫金

Колпаковский, Г. А. 科尔
帕科夫斯基

Костенко, Л. 科斯岑科

Кояндер, А. 凯阳德

Краснов, А. Н. 克拉斯诺夫

Крупенский 克鲁宾斯基

Кузнецов, В. П. 库兹涅佐
夫

Кумани, А. М. 库瞞

Куницын, И. 库尼增

Куракин, Г. С. 库拉金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库罗巴
特金

Л

Ламздорф, В. Н. 拉姆斯道
夫

Ланг, Л. 郎克

Лессар 列萨尔

Лессовский, С. С. 勒索夫
斯基

Лихарев 利哈列夫

Лобанов 洛巴诺夫

Лутшев 卢特舍夫

Любимов 柳比莫夫

М

Матвей Юдин 马特维·尤金

Матусовский 马图索夫斯基

Мединский, В. 麦登斯基

Мельников 梅尼科甫

Мещеринов 麦谢里诺夫

Миллер 米列尔

Милютин, Д. А. 米留金

Михаловский 米哈洛夫斯基

Мохов 莫霍甫(今译:莫霍
夫)

Муравьев, М. Н. 穆拉维约
夫

Муравьев, Н. Н. 穆拉维约
夫

Муромцов, Н. 穆罗姆佐夫

Н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涅维尔
斯科伊

Нератов 尼拉托夫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 В. 涅谢尔
罗迭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I 尼古拉二世

Нюхалов 纽哈洛夫

О

Обручев 奥勃鲁切夫

П

Павлинов 巴甫林诺夫(庞
令)

Падерин 宝德琳

Палафитин 帕纳菲丁

Пантусов, Н. Н. 潘图索夫

Певцов, М. В. 别夫佐夫

Первущин 彼尔武申

Перемышльский 彼列梅什
里斯基

Перовский 彼罗夫斯基

Петровский, Н. В. 彼得罗
夫斯基

Петров, Т. 彼得罗夫

Пещуров 佩休罗夫

Петр I 彼得一世

Поликарп 波里卡尔普

Полторацкий 波尔塔拉茨基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танин, Г. Н. 波塔宁

Поярков, В. Д. 波雅科夫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普尔
热瓦尔斯基

Пустьцев 普蒂采夫

Путята 普佳塔

Путятин, Е. В. 普提雅廷

Пясецкий, П. Я. 皮谢茨基

Р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 В. 拉古津
斯基

Рейнталь 莱茵达尔

Роборовский 罗鲍罗夫斯基

С

Сазонов 沙佐诺夫

Семенов, П. П. 谢苗诺夫

Скачков 斯卡奇科夫

Скобелев 斯科别列夫

Соболев 索包列夫

Сомов 索莫夫

Сосновский 索思诺夫斯基

Стааль 斯塔阿利

Старков 斯塔尔科夫

Сунаргулов 苏纳尔古洛夫

Сухозанет, Н. О. 苏霍扎涅
特

Т

Татаринов, П. П. 塔塔林诺

夫

Таубе 塔乌别

Терентьев, М. А. 捷连季耶

夫

У

Унковский, И. 翁科夫斯基

Урасов, А. 乌拉索夫

Уэйд 邬兰托

Ф

Фео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

Фриде, К. А. 弗里德

Х

Хабаров, Е. П. 哈巴罗夫

Хлудов 赫鲁道夫

Хоментовский 哈明托夫斯

基

Ц

Церерин 采列林

Циммерман, А. Э. 齐麦尔
曼

Ч

Чакиров 恰基洛夫

Чередов 契列多夫

Черкасов 契尔卡索夫

Черняев, М. Г. 切尔尼亚耶
夫

Ш

Швыйковский 什维科夫斯基

Шишкин 希什金

Шпрингер 施普里格尔

Шубин 舒宾

Щ

Щекин 世清

Я

Яковлев 雅科夫列夫

附 录 四

俄中地名对照表

А	
Абакан, р.	阿巴根河(即:阿穆哈河)
Ак-Байгал,	阿克拜塔尔
Ак-бешим	阿克别西姆
Ак-Кент	阿克肯特
Аккуль, оз.	阿克库勒池
Ак-мечеть	阿克麦吉特(阿克美切特)
Аксай, р.	阿克赛河
Аксу, р.	阿克苏河
Ак-су (Кизил-Рабат)	阿克苏(克孜勒拉巴特)
Ак-таш	阿克塔什
Ак-Тюбе	阿克求别
Алайская долина	阿赖谷地
Алайский хребет	阿赖岭
Ала-куль, оз.	阿拉湖
Алатау, хр.	阿拉套山
Алатовский округ	阿拉托夫区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即:雅克萨)
Аличур-Памир	阿尔楚尔帕米尔
Аличур	阿尔楚尔
Алкабек, р.	阿拉克别克河
Алма-Ата	阿拉木图
Алтай	阿尔泰
Алтан-Тэбши, хр.	阿勒坦特布什山岭
Алтын, р.	阿勒坦河
Алтын-нор	河勒坦淖尔(即:捷列茨科耶湖)
Алтын-нор Урянхай	阿勒坦淖尔乌梁海
Алтынэмель, хр.	阿尔坦额墨勒山
Аму-Дарья	阿姆河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Андижан	安集延
Аральск	阿拉尔斯克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Аручиндалан 阿鲁沁达兰
Атбаши 阿特巴什
Ашхабад 阿斯拉巴得
Аягуз 阿亚古斯(爱古斯)

Б

Бадахшан 巴达克山
Базай-и-гумбез 布才拱巴什
Базарык 巴泽雷克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Бакту 巴克图
Баку 巴库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алхаш, оз. 巴尔喀什湖
Барлук 巴尔鲁克
Барлыкские горы 巴尔鲁克
山脉
Барогиль, пер. 巴罗吉勒山
口
Бартанг, р. 巴尔唐河
Баскан, р. 巴斯坎河
Баян-аул 巴彦村(巴彦乌尔)
Бедель 别牒里(别迭里)
Беджин-тау, хр. 别珍岛山
Белезек, р. 毕里则克河
Белое море 白海
Березов 别廖佐夫

Биень, р. 比茵河
Бийликоль, оз. 必库勒池
Бийск 比斯克
Бирюбаш, хр. 比留巴什山
(即: 比尔巴什山)
Бия, р. 毕雅河
Благовеш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
克(即: 海兰泡)
Богосук-Дабхань 布果苏克
达巴哈(即: 柏郭苏克山)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ский хребет
大阿勒台山
Большой Памир 大帕米尔
Боротала, р. 博尔塔拉河
Боро-Хуцзир, р. 博罗呼济
尔河
Бугаз, р. 布古什河(今苏联
布噶孜河)

Букон, р. 布康河(即: 布昆
河)
Бурчум, р. 布尔津河(即: 布
尔楚木河)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Бухтарма, р. 布克图尔玛河

В

Вахан, р. 瓦罕河
Вахан-Памир 瓦罕帕米尔
Вахджир, пер. 瓦赫基里山口

Верный 维尔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海参崴(今苏联
符拉迪沃斯托克)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Вэйтанцзы 苇塘子

Г

Гилит 吉尔吉特
Гиндукуш, хр. 兴都库什山
Григорьевка 格里戈里耶夫
村
Гульча 古里察

Д

Дарату, р. 达喇图河
Дараут-Курган 达拉乌特库
尔干
Дарваз 达尔瓦兹
Дербент 德尔本特
Джамбул 江布尔
Джанарт, р. 扎纳尔特河
Джерард 吉拉尔德
Джилгын-Баши 吉尔根巴什
Джунгал 珠穆翰
Д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Днепр, р. 德涅伯尔河
Дон, р. 顿河

Е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Енисейск 叶尼塞斯克

Ж

Желе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热列金
斯克堡

З

Зайсан, оз. 斋桑泊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
亚
Зеравшан, р. 泽拉夫善河

И

Или, р. 伊犁河
Или-бирай-цикин, пик. 伊
犁河齐钦卡伦
Иргиз 伊尔吉兹
Ирджор 伊尔扎尔
Иркештам 伊尔克什坦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Ирт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Искрык 伊斯里克
Иссык-Куль 伊塞克湖(即:特
木尔图淖尔)
Истык, р. 伊斯提克河
Исфара, р. 伊斯法拉河
Ишим, р. 伊希姆河

К

Кабтагай 哈布塔盖

Кавказ 高加索
Какшал, хр. 喀克善山
Калб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卡尔宾斯基山
Калгуты, р. 卡尔古蒂河(即:海留图河)
Кальджир 喀尔奇喇
Кальта-Даван 喀里他达湾(喀尔阿尔特)
Кама, р. 卡马河
Канжуг 坎巨提
Карабуга, р. 哈尔巴哈河(今苏联喀喇布噶河)
Карабулак 哈喇布拉克
Карабура 哈喇布拉岭
Кара-Вани 喀拉完治
Кара-дабан 喀拉达坂
Каразак 喀拉扎克
Караиртыш, р. 喀喇额尔齐斯河
Каракол 卡拉库尔(今苏联普尔热瓦尔斯基城)
Каракорум 喀拉昆仑山
Каракуль, оз. 喀拉湖
Каратал 卡拉塔尔
Каратау, хр. 喀喇套山
Каркаралинск 卡尔卡拉林斯克
Карлыган, хр. 喀尔雷罕山

脉

Казкелен, р. 卡斯克连河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атунь, р. 哈屯河(卡通河)
Кашмир 克什米尔
Кегень 格根
Кетмень 克特缅
Кетмень-тюбе 克特缅丘别
Кизил-Рабат 克孜勒拉巴特
Кизиль-Арт, пер. 奇吉勒阿尔特山口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й-Тас, гор. 奎塔斯山
Коканд 浩罕
Кокпект 科克佩克特
Кокпектинск 科克佩克丁斯克
Кок-су, Р. 科克苏河(即:库克鄂罗木河)
Коктал 阔克塔勒
Кокчетов 科克契托夫
Кольджат 廓里扎特村
Конгор-обо, гор. 匡果罗鄂博山
Конур-Олен, пик. 匡果罗鄂伦卡伦
Коныролен 昆乃伦列
Копал 科帕尔
Кос-Агачь 科斯阿加奇

Кочкорка 科契科尔
Кран, р. 克兰河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雅尔
斯克

Кудара 库达拉
Кузнецк 库兹涅茨克
Куйтун Олла 奎屯鄂拉(奎
屯山)

Кукуртлюк, хр. 贡古鲁克山
(即:库库尔图留克山)
Кукэ-гом 库克托木
Кулан-ацзирха 库兰·阿吉
尔干

Кумурчи, пик. 库木尔齐卡
伦

Кур-Караусу 库尔喀喇乌苏
Кызыларт, пер. 奇吉勒阿
尔特山口

Кяхта 恰克图

Л

Лена, р. 勒拿河
Лепса 勒布什
Лепсинск 列普辛斯克
Ливадия 里瓦几亚

М

Малый Памир 小帕米尔
Мальтабар, р. 玛里他巴尔
河

Маниту 玛尼图
Маниту-Гагул-хан 玛尼图噶
图勒干

Маргелан 马尔格兰
Маркансу, р. 马尔堪苏河
Мингтеке 明铁盖
Минусинск 米努辛斯克
Модо-Барлук, пик. 莫多巴
尔鲁克卡伦

Музарт 穆扎尔特
Музтагата 慕士塔格山
Мургаб 木尔加布(即:六尔
阿乌)

Мус-Тау, гор. 木斯岛山

Н

Нарын, р. 纳林河(锡尔河上
源)

Нарын, р. 那林河(额尔齐
斯河支流)

Нарын-халг 那林哈勒噶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尼布
楚)

Николаевск 尼古拉耶夫斯克

О

Обь, р. 鄂毕河
Ока, р. 奥喀河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мь, р. 鄂木河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Орск 奥尔斯克
Орхон, р. 鄂尔琿河
Орь, р. 奥尔河
Ош 奥希(又译鄂什、奥什)

П

Памир 帕米尔
Пейхо 白河
Перовск 彼罗夫斯克(即:今
克孜尔奥尔达)
Персия 波斯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夫
洛夫斯克
Пийк 丕伊克
Пишпек 皮什别克
Пяндж, р. 喷赤河

Р

Раим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赖姆堡
垒(鹹海堡)
Ранкуль 郎库里
Ранг-Куль-Памир 郎库里帕
米尔
Рошан 罗善山

С

Савабци, гор. 萨瓦巴齐山
Сайлюгемский хребет 赛留

格木山脉

Самарканд 撒马尔罕
Санташ, пер. 善塔斯山口
Сара-булак 沙喇布拉克
Сарбакту, р. 萨尔巴克图河
Сарез-Памир 萨雷兹帕米尔
Сарезское озеро 萨雷兹湖
Сарыкол, хр. 萨雷阔勒岭
Сары-Куль 萨雷库里(卓尔
库里)
Сасыкколь 萨色克湖(即:布
隆库勒)
Сауры, хр. 萨乌尔山脉(赛
哩鄂拉)
Сахалин, остр. 萨哈林岛(库
页岛)
Саянский хребет 萨彦岭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塞米巴拉金
斯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七
河省
Сергиополь 谢尔基奥波利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сти-хем, р. 西斯季克穆
河
Со-даба, хр. 索达巴哈山
Суек 苏约克
Сума-Таш 苏满塔什(即:苏

满)

Сумбе, р. 苏木拜河
Сургут 苏尔古特
Сыр-Дарь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锡
尔河省
Сыр-дарья 锡尔河

Т

Тагдумбаш 塔克敦巴什
Тагдумбаш Памир 塔克敦
巴什帕米尔
Талдык, пер. 塔尔迪克山口
Талды-Курган 塔尔迪·库
尔干
Танну-Олла 唐努鄂拉(唐努
山)
Танну-Урянхай 唐努乌梁海
Тара 塔拉
Тарбахатай 塔尔巴哈台
Ташкент 塔什干
Ташкурган 塔什库尔干(即:
色勒库尔)
Тегес, р. 特克斯河
Телембинск 捷连姆宾斯克
Телецкое озеро 捷列茨科耶
湖(即:阿勒坦淖尔)
Темурлик 特穆尔里克
Терек-даван 铁列克达坂
Тобол, р. 托博尔河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
Тогуз-Торо 图古斯塔老
Токмак 托克马克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омурун 屯木伦
Торугарт, пер. 图鲁戈尔特
山口

Тузколь 图斯库里
Тура, р. 土腊河
Туран, р. 吐兰河
Тургай, р. 土尔盖河
Тургень, р. 图尔根河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
Туркмения 土库曼
Тэмурту-нор 特穆尔图淖尔
(即:伊塞克湖)
Тюмень 秋明
Тянь-Шань 天山

У

Убсу-нур 乌布萨泊
Уда(Удь), р. 乌第河
Удинск 乌丁斯克
Уз-Бель 乌孜别里(又称:克
孜勒治业克)
Узунтау, гор. 乌宗岛山
Укок, пик. 乌克克卡伦(即:
乌科克卡伦)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

Улясуту 乌里雅苏图
Унду-булак, р. 温都布拉克
河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джар 乌尔扎尔(即:雅尔)
Урлу 乌尔鲁
Урга-Бель, пер. 乌尔他别尔
山口
Урянхай 乌梁海
Ус 乌斯
Усек 乌塞克
Усинское село 乌辛斯科耶
村
У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 乌斯季-
卡缅诺戈尔斯克(即:铿格
尔图喇)
Уч-курган 乌奇库尔干
Учь-Бель 乌赤别里
Уюк 乌尤克

Ф

Фергана 费尔干纳

Х

Хаба, р. 哈巴河
Хабар-асу 哈巴尔苏
Хангайский хребет 杭爱山
Хан-карчагай, хр. 罕喀尔察
盖山

Хан-Тенгри 罕腾格尔(即:罕
腾格里)
Харгуши, хр. 和什库珠克岭
Харгуши-Памир 和什库珠
克帕米尔
Хива 希瓦
Ходжент 霍振特
Хой-майлаху, пик. 和尼迈
拉虎卡伦
Хоргос 霍尔果斯
Хубсугул, оз. 库苏泊

Ц

Цицихань 齐齐哈尔
Цунл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葱岭

Ч

Чагань-тогой 察汗托霍依
Чакильмес, гор. 察奇勒莫
斯山(即:察奇勒莫斯鄂拉)
Чакмактинкуль 恰克马克京
库里(即:鄂依库里)
Чар, р. 恰尔河(即:察尔河)
Чарын, р. 察林河
Чарыш, р. 恰雷什河(即:察
拉斯河)
Чатыр-Куль, оз. 察提尔库尔
湖
Чатырь-Таш 察提尔塔什
Челябинск 车里雅宾斯克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хан, р. 切罕河 (即: 察罕
米哈尔河)
Чилик, р. 奇来克河
Чимкент 奇姆肯特
Чингистай, пик. 昌吉斯台
卡伦
Чиндагайту 沁达盖图
Читрал 奇特拉尔
Чу, р. 楚河 (即: 吹河)
Чу-илийские горы 楚伊犁山
脉
Чуклык, р. 楚克里克河 (今
苏联科克佩克特河)
Чуьцзи, пик. 春济卡伦
Чуя, р. 推河

Ш

Шабин-Дабаг 沙宾达巴哈
Шаймак 赛马克
Шяботу, пик. 锡伯图卡伦
Шугнан 什克南

Э

Эргэту 额尔格图

Я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
Ямыш, оз. 亚梅什湖
Яшиль-Куль 雅什里库尔湖
(即: 伊西洱库尔; 又称: 叶什
勒库勒淖尔)

